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人际是非



## 跋

由于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拙著《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三国智谋精粹》，该社杨岗副编审经常与我有信往来，我们神交已久。杨岗副编审曾约我有空到京商谈长期合作问题，我趁今年五月间到浙江富阳县参加中国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之便，顺道到京拜访，我们一见如故。我将我撰写的“甘五史类评”的四本书稿（现改为“智慧四书”）的提纲交给杨岗副编审，他看了当即答应“四书”一起出版。第二天我打电话给他，他说已向韩天雨总编辑汇报，并征得其同意，嘱我将书稿尽快整理寄来。我对中国经济出版社处理书稿的果断、快捷和魄力，深为敬佩和感谢。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深深地体会到“为他人做嫁衣裳”的酸甜苦辣，编辑编改的好作品，人们赞美的是作者，编辑自甘默默无名。如这“智慧四书”，该社编辑同志费了很多时间审改，并对有关史料、典故逐一稽考核实。仅是书名，杨岗副编审与韩天雨总编辑就商量过多次才最后改定。这套丛书如为读者喜欢，有益于社会，作者不敢专美，因该社编辑也花了不少宝贵的心血。在此，特向中国经济出版社深表谢忱。

霍雨佳

1993年8月13日写于海口胤园

## 绪论：论人际关系

“廿五史”，从某方面看，可以说是人际间的种种关系的历史。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能否正确处理人际间的种种关系，决定着个人、集体、国家以至民族的祸福。因此，我们总结中国古代人际间的种种关系的经验教训，并试图从中概括出一些规律性东西，希能对人们有点借鉴作用。

人际间的关系，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其发展的标志是人的兽性越来越少，人性却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处理人际间的关系的道德水平和智商越来越高。我们之所以比前人更高明，是因为接受了经验教训。因为历史不能割断，而是必须继承，前人处理关系的错误教训可使我们免步其覆辙，其处理关系的正确经验可使我们少走弯路。能接受前人的经验教训，我们才能把人际间的关系处理得更好，使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以至促进我们所处的社会和时代更进步、更文明。

## 人际关系与社会

个人不能离群而独立存在，人要生存、繁殖和发展，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一是要有两性，即有男有女，不然，人类就不能繁殖下去。二是要有一群人，互相协作才能具有生存的手段。在最初的人类社会里，不仅要抵御禽兽的侵害，还要猎取之以取得衣食之源，禽兽肉可食，其羽皮毛可御寒。由于那时猎取技术很差，光靠这不行。还要采集可食的植物，这非一个人能做到，没有一群人共同协作不行。有了一群人，有男有女，便既有两性关系，又有为生存而共同协作的关系。这两种关系，哪先哪后，难以确定，可能是两种关系都同时发生，因为这两种关系缺了哪一种，人类都不可能存在。所以孔老夫子说：“食色性也。”食和色确是人类的本性。古人常说民以食为天，没有食的东西，人类是生存不了的，而没有女人就没有男人的世界，没有男人也就没有女人的世界。《镜花缘》里所描写的女人国，只不过是小说家的幻想而已。

可见，有人际，彼此必发生关系，而在最初的人类社会，是只有食和色的关系。但人类在繁殖，社会在前进，人类社会由群体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既有私的关系，也有公的关系，而公的关系往往通过私的关系来体现，不搞好私的关系也难搞好公的关系。世界在趋向现代化，国家之间，人际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复杂，能否处理好各种关系，其影响及后果都极大，因而处理好关系的手段也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在处理各种关系中，首先要处理好各种个人的关系，个人关系处理好了，才能处理好公共的关系。进而言之，一国之内各种关系理顺了，才有力量与各国确立平等的关系。

如果关系以善恶划分的话，古代社会的关系是以恶为主的。有的政治家为托古改制，把古代社会或王国写成最美的世界。其实那时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规律已很起作用，且是极其残酷的。我们从猴子社会里可以想见，强者各占山头，为“食色”往往打得你死我活。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争霸争雄从无已时，孟子所说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就是描写这个像群兽狂斗一样的王国时代。而早在部落时代，部落之间的争战更其野蛮，把对方打败了，不仅掠夺其土地、牲畜，奴役其成员，甚至将之族灭。这种野蛮行为至中世纪还经常出现。项羽一次就坑秦降卒 20 余万，连

被人赞誉的一代之雄曹操也经常屠城。即使是元、清两朝的开拓者成吉思汗和努尔哈赤，在进行统一各部落的战争中，所采取的屠杀手段也是毫无人性的。

如此处理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显示了人兽性的发作。对此，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及其学说的继承和发扬者孟子是极力反对的。孔子提出“仁”字，这是其学说的中心思想。他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治理人民则主张施行仁政。他还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以“和为贵”。虽然在兽性为主要的时代，他的主张是行不通的。但他的思想却是人性对兽性的第一次否定。人类之间经过无数次的互相残杀，即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懂得这个道理，即认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应以“和为贵”。孟子则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把人民置于最重要的地位。如能确立人民这种地位，就不会把人民像禽兽一样随意屠杀，就可减少统治者的兽性的发作。孟子还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其实人之初性无善恶，而是决定于其所处的环境、地位、条件、教育如何。而在古代性恶是占上风的，孟子主张“性善”说是他一种良好的愿望。既然人性是善的，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应是善的。不过一方性恶，一方性善，即使善者能以德报怨，对一些人可能有效，对某些人则不起作用，于是，以恶报恶也就不可避免要发生，即人们常说的“以毒攻毒”。这是人们不能和平相处的原因之一。

为了维护封建社会正常秩序，孔子很强调要调整好君臣、父子的关系，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而要搞好这两种关系，他以“忠孝”作为其指导思想，但他对于“君不君”的，也主张予以谴责。西汉以后，都强调“以忠孝治天下”，尔后历代帝王之所以把“忠孝”作为治国之本，实是使为臣者愚忠、为子者愚孝，服服贴贴地为统治者卖命，帮其统治人民。这虽能愚人和见效于一时，但不能解决“长治久安”的问题，在整个封建社会里，臣弑君、子弑父的无代无之。既然君臣、父子是两对关系，就不可能由一方一厢情愿。如君要臣忠，而臣愿不愿忠，或君值不值得忠；父要子孝，而子愿不愿孝，或父值不值得孝；还有君如何能使臣忠，父如何能使子孝，这都涉及君、父和臣、子的品德和才干等问题。其他各种关系，也有与之相类的问题需要解决。

在我国古代社会里，从个人关系而言，共有五种主要的关系，即上下关系、夫妻关系、父子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处理好这五种关系就能“齐家治国平天下”，否则可能出现祸乱，以至国家衰亡，这在我国古代史里已不是个别的例子。

## 人际关系与事业

上述五种关系，能否处理好，都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其中尤以上下关系为最。

上下关系的好坏，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在上者善于用人和团结人，在下者有才干又忠诚，事业则兴旺发达。三国时代，蜀吴的上下关系是较协调的，故能以弱小之国抗击强大的曹魏，促进三国鼎立达近半个世纪之久。刘备能从一个织履之徒到在西蜀称王，主要是因得下属之心，用得其人，将相为之竭力尽智。他是先得关羽、张飞与之同患难，对他忠心耿耿，任何人都撼不动，打不散，虽经过颠沛流离，最后还是聚集一起，为共同事业而战。

斗到最后的一息；后又招得大贤人诸葛亮，二人关系有如鱼水。因刘备以其三顾茅庐之诚，诸葛亮感其知遇之恩，献千古奇策“隆中对”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由于君臣协力，刘备从命途多蹇到前程似锦，取荆益二州，称王西蜀，成为一代英主。孙权继承父兄之业，年轻登位，而曹、刘屡次来犯都以失败告终，东吴岿然不动，其原因安在？无他，同样是用得其人之故也。刘备誉为“万人之英”的周瑜，感孙权待之以骨肉之恩，又因孙权的充分信任而得行其志，在赤壁之战中，他英姿英发，与刘备、诸葛亮协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奸雄曹操。孙权一见鲁肃便视为知己，提拔他于凡品之中，鲁肃因得遇明主故能充分发挥其才智，献“榻上策”后，始终坚决执行联蜀抗曹之策，促进了天下三分，使东吴鼎足于江东。孙权对吕蒙关怀备至，不仅提拔他于行伍，并勉其奋志读书，使他由一介武夫成为文武全才的大将，在智袭荆州、擒杀关羽中立了功勋。未有远名的陆逊，因得到孙权的赏识和充分信任，被任命为抗蜀的大将，以其超人的智谋，终于打败了沙场老将刘备。蜀吴的成功是由于上下的协调，历史上能创业或守业者也如此。元、清原都是我国边疆的少数民族，除尚武精神外，政治、经济、文化都极其落后，而他们能统一并统治庞大的中国，也是因用得其人，上下信任无间。元世祖对刘秉忠等言听计从，用“汉法”以治汉；皇太极听从范文程的计策，君臣一心，为统一中国奠下了基础。以上所谈的是因君臣同心协力而由弱变强，但是，即使是强大的帝国。如果上下离心，各怀异志，也将由强变弱，以至灭亡。隋之亡，并非因其兵不众、刃不利、国不富、仓库不实，而是因隋炀帝暴虐奢侈，近佞臣、远贤臣、劳民众，导致众叛亲离，终被缢死。唐玄宗在相当长的时间，任用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名相，君臣之间，一心一德，励精图治，把盛唐推向其黄金的顶峰。可是在他的晚年，贪图享乐，不理朝政，饰非拒谏，任用奸相李林甫、杨国忠，这些人跟他貌合而心违，使国事日非，终于促成“安史之乱”，之后又形成长期的藩镇割据局面，使盛唐从其黄金的顶峰跌落下来，确是：成也玄宗，败也玄宗！

妇女在封建社会里，地位是低下的，是男人的附属品，即使是那些“金枝玉叶”的皇族妇女也不能改变她们的这种附属的地位。尽管如此，也不能否定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夫妻关系的好坏，对家庭甚至对国事都有影响。夫妻和睦，是家庭的幸福，而家有贤妻也可助夫成家立业；不少女人还协助丈夫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业，以至帮助丈夫打天下坐江山。朱元璋初投郭子兴时只不过当个亲兵，后得郭子兴养女马秀英为妻，二人情投意合，每当朱元璋处于危急的境地时，都得到马秀英为他解忧救难；在朱元璋即皇帝位后、对他的错误也就婉转进谏，她对朱元璋的帮助是很大的。忽必烈的皇后察必，在争夺汗位的斗争中，她能明察对手的阴谋。及时采取对策，并迅速报告在外远征的忽必烈及时赶回，使对方的阴谋不能得逞，为忽必烈登上大汗宝座立下了汗马功劳。家有贤妻丈夫少犯错误，皇后孙氏就帮助唐太宗纠正了不少错误。唐太宗有一次对魏征的谏诤认为是对他的侮辱，怒气冲冲地说“要杀死这个乡巴佬！”如果不是长孙皇后巧妙地进谏，杀了一代良臣魏征，唐太宗就不可能成为一代贤君，也可能不会出现“贞观之治”。有个别女强人不仅助夫治国，而且驾御天下臣民，理直气壮地当起皇帝来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她颠倒了世界，使所有的男人在她统治之下，她不能当皇帝，且当得不错。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即继承唐太宗的事业和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人可为善也可为恶，女人也不例外，

处在皇权中心的女人，做起恶来，为害更大。白痴晋惠帝娶了奸恶的贾南风，她当了皇后便矫旨胡为。引起了“八王之乱”，使中国长期支离破碎，人民痛苦不堪。韦后想效其婆婆武则天所为，拟杀夫君取而代之，“东施效颦”的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狗”，终被族灭。

父子关系是天伦关系，理应相爱，亲密无间，但事实往往相反，在封建社会里，子弑父，父杀子之事，屡见不鲜。之所以出现这种血腥行为，与王子从小娇生惯养、缺乏严格的教育大有关系。由于王子一生下来，便生活在女人、太监的手里，视之如宝贝，以享人间福，不知世间苦，故王宫实是培养二流子的策源地。王子大多是酒色财气齐全，一旦有机会继位，必然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祸，以至断送祖宗手创之业。秦国有胡亥，传二世而亡。西汉自元帝以后，不是庸主就是草包皇帝，任由外戚摆布，当个傀儡而已。东汉除开国君主汉光武帝外，大多是糊涂皇帝或娃娃皇帝，由外戚、宦官轮流掌权。唐太宗的后代，除出个前期有所作为的玄宗外，其他也多是庸主。明则盛出恶棍式或二流子的皇帝。由此观之，能否培养好接班人，有关国家的兴亡。有些开国皇帝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后果重要性，如唐太宗为培养其接班人，对王子的教育很认真，但也有过于溺爱之嫌，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继位也与此有关，唐太宗也因之几乎自杀。当然也有好的，不过有如凤毛麟角，忽必烈对真金太子、朱元璋对朱标太子，为使之将来继位掌好权费尽了心血，时人都赞他俩为贤王，昔天下不假以年，不能造福国家和人民。能否正确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对事业对自己都有影响，敢于在大庭广众中，叱秦王、辱其群臣的蔺相如，却屈事廉颇，廉颇为其顾全大局的胸怀深深感动，便肉袒负荆请罪，二人成了刎颈之交；由于他二人团结事赵，使强秦并赵的阴谋一时不能得逞，留下了“将相和”的佳话。肖何不因韩信才高而妒忌，闻其逃亡，来不及告知刘邦，便争往追之，并极力向刘邦推荐，使一个管理粮食的治粟都尉萧何一下子被提升为大将，也因此促使刘邦成帝业，至今仍传下“肖何月下追韩信”的动人故事。东吴四英——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辗转相荐，辅佐孙权，使东吴安如磐石，他们都成为名将，扬名后世。可是，以陷害同僚而爬上高位的人如秦桧、严嵩之流，因他们心术太坏，一旦掌权，都祸国殃民，遗臭万年。有的为私怨而寻仇互斗，如田蚡与窦婴，到头来都没有好结果。

我国古代流传着不少以义气为重结成生死交的感人事迹。如鲍叔牙与管仲，二人少时一起经商，管仲多自取，叔牙知管仲贤而贫，从不与他计较。后管仲和叔牙分别任齐国公子纠、公子小白的师傅。齐襄公被杀，齐国大乱，在争夺王位中，小白得立，是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被囚。叔牙推荐管仲，管仲才能任政于齐，桓公得以称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叔牙如此厚爱 and 推重，管仲深为感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如何对待旧交，也会牵涉到能否得人的问题。陈涉少时，跟一些雇工一起为人耕田，在垄上休息闲谈时，陈胜说：“苟富贵，无相忘。”后陈胜揭竿起义反秦，被拥立为王，穷朋友们知道，都往投奔，陈胜也接纳了，但他们却喜谈陈胜的旧事，陈胜认为对己不敬，将之斩了，于是陈胜的亲戚和老朋友都离去，消息传开，人心尽失，这是陈胜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而刘邦对于微时之交，如肖何、曹参、樊哙等始信任，这些人也就忠心耿耿，为他创业、守业竭尽全力。有些人对于才高于己的朋友，由于妒忌而害之，如庞涓因本领不及学友孙臆，乃阴使人召他来魏，断其两足，后孙臆被齐使救出，在魏齐交战中，

庞涓中孙臆计，在马陵狭道中被迫自杀，庞涓害人反害了自己。受秦王敬仰的韩非入秦，他的学友李斯怕其被重用，竟用毒计杀了韩非，使这个集法家学说之大成者不能施展其才智而饮恨终身，对秦国也是个大损失。李斯这个为保富贵而不择手段的人，最后也自取灭亡。

## 人际关系与利害

人间任何关系的好坏，主要以利害为转移，利害一致则亲密无间，利害不同则分道扬镳。但对利害异同，人们的认识并不一样，因而愿望和结果出现了千差万异的现象。

如果彼此都以公心来衡量利害，其利害观当然是一致的。历代创业之主，在他取得政权后，都把天下视为其一家之私产，所考虑的问题也是从此出发的，即如何巩固其家天下，唐太宗也不例外，但他与其他创业之主独特之处，是能以隋亡为鉴，认识到“载舟覆舟”的真理，在考虑自己的利害时，也顾及人民的利害，因而能以公心来衡量利害。他做一事说一句话都想到是对人民有利或有害，总担心做错了事说错了话会得罪人民，他的唐家天下就会步亡隋的后尘。由于他有这个公心，臣下的进谏，于国于民有利的就采纳付之实施；于国于民有害的就改正过来。正因他有这个胸怀和这种风格，魏征等也就敢于谏诤。魏征也是个能以公心来衡量利害的良臣，他对于国于民有利或有害的，都敢建言、敢谏诤，即使是唐太宗跟他的看法相反。尽管君臣为此屡争得耳红脸赤，甚至引起唐太宗怒火冲天，最后，彼此还是以公心来衡量是非，在为国为民这个大局上取得一致。这在古代君臣中是罕见的。

有些创业之主，在其图天下时也能以公心待人，及其登上帝位，巩固国家天下的私心日益膨胀，便向曾与他患难与共、为他舍生入死的功臣大开杀戒。出身于平民的皇帝刘邦和朱元璋都是这么干的。在秦末大乱中，刘邦是以忠厚长者的面貌出现于政治舞台的，因而“五湖四海”之士多归之，连曾在项羽军营的韩信、陈平、黥布也投奔其麾下，由于人心背楚归汉，刘邦在垓下之战打败项羽登上了帝位。在战争中，上下关系是多么协调，刘邦“解衣衣人，推食食人”，当时可拥兵自重且举足轻重的韩信，因感其知遇之恩而不忍背叛。可是，当了皇帝的刘邦为巩固其家天下的统治，竟以“莫须有”的罪名先后将战功最大的韩信和彭越、黥布杀掉。朱元璋在其打天下时，何其礼贤下士，及其统一了天下，因恐掌握实权的功臣动摇其家天下的统治，便脸色一变，大肆屠杀功臣。昔日亲密的战友，纷纷变成刀下鬼。朱元璋是个绝对专制主义者，也就必然是个极端自私自利者，他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已发展到变态的最高度，因而其手段就极其残酷而狠毒，其超过刘邦何止千万倍！刘邦杀的只不过几个功臣，而他杀的是成千成万！

利害这个概念，人们不易于判断，因而对于人们来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认为利者未必有利，认为害者未必有害。秦二世认为杀了其兄扶苏和其他兄弟姐妹以及皇室要员，便以为没有人跟他争皇位了，用严刑峻法来镇压人民，人民服服贴贴地奉献其一切供其无穷的享乐；但是恰恰相反，他因此而成孤家寡人，人民受不了他的残酷的压榨，便起来造反，二世只在位三年便被曾认为是心腹的赵高杀了，秦也迅即灭亡。隋炀帝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君，支持己者认为心腹，持异见者便视为叛逆，结果，炀帝认为于己有利的，却于己有害，缢死他的恰恰是昔日认为是支持自己的心腹。

即使是知交，如利害不同，也将义断情绝，甚至成为死敌。张耳、陈余都是魏名士，曾为刎颈交，秦末大乱，两人参加反秦斗争，都有战功，后两人有误会而互相怨望，又因利害各异各事其主，陈余终被张耳所杀。楚大将钟离昧曾与韩信相好，项羽死，逃楚归信。刘邦怨昧，听说他在楚，便下诏令楚捕昧。刘邦以“将游云梦”为名，派使者约诸侯来会，实是用陈平计欲袭韩信，信还在梦中。刘邦将到楚，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见刘邦，又怕被擒。有人对信说：“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信为讨好刘邦，便与钟离昧谈此事。昧说：“汉所以不击取楚，以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于汉，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乃骂信说：“公非长者！”便自刎。信持其首，谒见刘邦于陈，结果还是被刘邦所擒，这时韩信后悔已迟了。

即使在家庭间，彼此关系如何也因利害不同而各不一样。苏秦在家庭中前后不同的遭遇便是个很典型的例子。苏秦是东周雒阳人，曾向纵横家鬼谷子学习，学成出外游说，不被任用，一无所得，穷困而归。兄弟嫂妹妻妾都看不起他，窃笑他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之利。今舍本而想以口舌求富贵，穷困，不亦宜乎！”苏秦听了，很惭愧，暗自伤心，便闭门不出，将藏书偏观之，得太公《阴符》日夜苦读，尽得其智谋要诀，说：“此可以说当世君矣。”于是西至秦，说惠王不被用，又先后游说赵、燕、韩、魏、齐、楚，使六国合纵并力抗秦，苏秦被任为纵约长，并受六国封相。当苏秦赴赵途中行经家乡雒阳时，威风得很，车马辎重，六国诸侯各发使送之甚众，其派场有如王者。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优侍取食。苏秦笑问其嫂说：“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匍匐在地上爬行，以面掩地答道：“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高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

利害决定关系，这是一般而论，并非绝对如此。彼此关系不顾利害而以道义为重、生死不渝的，在古代也不乏其人，关羽就是这样的对人肝胆相照的义士。刘备为平原相时，关羽为别部司马，与刘备“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刘备领徐州，曹操东征，刘备投奔袁绍，曹操擒关羽归，拜为偏将军，待之甚厚。关羽斩袁绍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赏赐甚丰。但关羽不因富贵而忘故主之情，及知刘备在袁绍处，尽管这时刘备无立锥之地寄人篱下，却尽封其所赐，致书曹操告辞，而奔刘备于袁军。左右追之，曹操说：“彼各为其主，勿追也。”关羽以大义为重，不为高官厚禄所动，而曹操能成其志，亦可人也。在此以前，曹操尝使张辽试探其意，关羽说：“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张辽将其言转告曹操，曹操赞叹说：“事君不忘其本，天下义士也。”

## 人际关系与方法

处理关系，不能不讲方法。当然关系的好坏，主要决定于利害是否一致，但即使一致，如果方法不对头，也有可能把关系搞环。

在处理关系上，宋太祖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妙方。夺取皇位和统一天下，历来都是最残酷的血腥屠杀，宋太祖虽也以武力为后盾，却尽量争取用和平手段，他没有伤害后周皇族一根毫毛，巧妙地以“黄袍加身”登上了皇位；为防止武官掌握兵权“取而代之”，独出心裁地以“杯酒释兵权”；尽管他是“卧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对被征服的各国国主都予以宽待；即使是过

去的仇敌和曾经侮辱过他的人，也能以德报怨。因此，本来是已经激化的各种矛盾，都能得到和解，使上下关系趋向协调一致，确是：化干戈为玉帛，使仇敌为臣民。在中国历史上处理关系如此高明的皇帝，宋太祖一人而在历史上，开国皇帝与功臣的关系，大多是始善而终裂。但也有少数功臣因其明智，而与开国皇帝善始善终的。功居第一的肖何就是以他的忠心和谦虚谨慎而取得刘邦的高度信任：在留守关中时，做到后勤供粮供兵及时外，还送其亲属及宗族到前线为刘邦卖命，使刘邦对他更其赞赏；他在战时甚得关中之人之心，战后他贱买民间田宅以自污，使刘邦十分高兴，认为丞相想当富家翁而没有政治野心，对他大为放心。三大功臣之一的张良，功成身退，表示无意人间富贵，辟谷学道，“欲从赤松子游”，使汉统治者对这个“运等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智者毫无疑问，后为吕后设计以保持其母子地位而倍受尊敬。为刘邦多出奇计的陈平，表面上顺从吕后封吕氏诸王，后却与周勃一起除之，保卫了刘家，与汉统治者关系始终保持一致。

魏征与唐太宗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它不建立在顺从的基础上，而是在冲突中求得一致。所谓“冲突”即是说魏征敢于触犯龙的逆鳞，自古以来，敢触犯逆鳞的多没有好结果，魏征却能例外，其奥妙何在？奥妙在于，他能抓住唐太宗“怕亡国”的要害，进谏以隋亡为鉴诫，并能讲究方法，即每次谏诤都有充足的理由和事实，并苦口婆心地坚持到底，使太宗认识到是为了巩固其统治，故魏征的谏诤多能奏效。

苏轼在处理关系上显示了他的高风亮节。他与王安石是好友，二人对彼此文章道德都互相敬佩，苏轼因对王安石的变法有不同意见被贬，当王安石变法失败下野后，他前往拜访王安石，二人对酒和诗，谈笑无间。当他被召回朝廷，因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不分好坏，一律废除，又提出意见，因之又遭贬，但他对司马光毫无芥蒂之心。苏轼这种政见不同而友谊常在的风格，非一般人能做到。

有些人之所以善于处理关系，是有其独特的长处：宁愿自己受委屈，也宽以待人，以德报怨。明朝永乐时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同列有善，即采纳之。或有小过，必为之掩覆。”甚至代下僚受过。即使有人攻击他，他对其人的才干也为之推举。因而赢得同事的尊敬和信赖，大家跟他同心协力做好工作，他主持的财政工作，成绩卓著。

汉武帝对女人是厌故喜新，唯独对死去的李夫人思念不已，始终保持着恩爱夫妻的关系，这是什么原因呢？李夫人因有“倾国倾城”的美貌，得到汉武帝的宠爱。可是，她病重时，汉武帝几次要求见她一面，都被她坚决拒绝。如果让汉武帝看了她那骨瘦如柴的病容，“色衰爱弛”的规律将对汉武帝起作用；正因不让他见其病容，她那“倾国倾城”的美貌就永远留在汉武帝的脑际里。她死后，汉武帝想见她，还请人为之“召灵”，而那“朦胧的影子”“可望不可即”，使他更其思念，悲叹“何其姗姗来迟！”作赋哀悼，缠绵悱恻，无限怀念；使人作画挂于宫中，日夜观看。也因此，使一个一贯把女人视为玩物的色狂变成了多情郎。

## 前 言

每个人呱呱堕地之后，即与别人形成一定的关系，但要获得生存和发展，必须在人际间建立种种关系。而与别人关系的好坏，与什么样的人发生关系，以及建立什么样的关系，往往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甚至可决定其前途。可见，正确处理好人际间的各种关系是何等重要。

有些人常常宣称“我是不搞关系的”，以自鸣清高。其实不能说搞关系就不清高，问题是如何搞关系，搞什么样的关系，即使为个人利益而搞关系，如不违法害人和有损人格，搞关系也不应非议。而为了公共利益搞好人际关系，那就更名正言顺，应予充分肯定。

不少历史事实说明：凡善于正确处理好人际间的种种关系的，对自己家庭和别人以至国家都有好处，能促进事业的成功；相反，会使事业遭到失败。

当然，并非善于搞好关系的都值得称赞。有的媚人取宠，有的投人所好以获得信任，用此以售其奸，损公以利己，以至害国害民，这些人虽得意于一时，却为人所不齿。

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现代交通、信息把住在地球各个角落的人拉得更近，人际间的交往越来越频繁而辽阔，关系越来越密切而复杂，处理好人际间各种关系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们将我国古代几千年来如何处理各种关系的史实加以分类归纳，从上下、夫妻、父子、同事、朋友等五种人际是非进行评述，并从一定理论的高度进行探讨，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也许对人们观古鉴今有点启发。

人际学是一门高深而微妙的学问，这里听总结的是古代人际关系中的一部分，不可能使人窥见其全貌，只是旨在抛砖引玉而已。

霍雨佳

1992年11月11日写于海口胤园

## 自序

作为中国人，我们为伟大祖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感到自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祖辈辈遗留下了在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丰富历史遗产，其中积淀着无穷无尽智慧。在这“优胜劣汰”的时代，中国人要想登上世界舞台占得一席重要的位置，不是依靠别的，而是要依靠自己的智慧。在竞争中智者胜，这个古老的真理，又为今天世界上的无数事实所证实。因此，开发中华民族的智慧宝库，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实践加以发扬光大，无疑是我们重要的历史使命。

古老的智慧不将之创新，就不能发展，“四大发明”诞生于中国，因没有很好利用，在中国就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可是，“四大发明”流传到了欧洲，促进了欧洲科学技术的发展，加速了欧洲现代文明的出现。不前进就落后，落后就挨打，中国人正因此曾经尝尽了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苦头。

智慧要积累和继承才能发展。这是因为人们认识每一事物，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思考；要证明一个真理，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考验；要有所发明，要经过无数次的实践和试验。这就是说，经过我们的先人一代接一代对客观事物的努力探索，积累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智慧，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智慧，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民族智慧的素质是有所遗传的，故中国人的智商是较高的，当具备一定的条件时将会发挥出来。事实正是如此，今天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在激烈竞争中出人头地，涌现了不少科学巨子和经济巨人；他们吸收西方的先进科学结合民族智慧取得了惊人的成果，为中华民族增了光。

可见，要发展必须继承。当今中国人要想在国际的各种竞争中取胜，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智慧。过去，每当发现自己落后时，便出现“学西方热”，对自己则“妄自菲薄”，只强调传统文化糟粕的一面，连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也否认了，有人甚至主张不读中国书。学习别国的优秀文化任何时候都是必需的，但否认自己的优秀文化显然是极端错误的。笔者对此是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的。在长达四十三年之久的记者、编辑生涯中，工作之余，我一直喜读古代书籍，尤其喜读“廿五史”。这是一套最完整的、最系统的、最宝贵的中国古代系列丛书，是二十五部纪传体史籍的总称，全部有三千八百一十一卷，共五千四百六十一万八千字。记述了上自黄帝起，下迄清代止的全部历史，这套古史籍的鸿篇巨著，既是祖国文化的宝库，也是我国古代智慧的总汇。将其中能启人智慧、广人知识、长人才干、供人借鉴的典例分类评述，显然是记有意义的。为此，笔者以“廿五史”为主，参考其他史书，撰写了《权利之争》、《攻心有术》、《人际是非》、《鹿死谁手》四本小册子，合称“智慧四书”。希能对读者有举一反三的启迪作用。

霍雨佳

1993年5月31日写于海口胤园

霍雨佳，68岁，海南省儋县白马井镇人。文史编审。1949年到1992年间，先后任湖北口报编辑、海南日报编辑组组长，海南帅专学报主任、海南大学学报主编。现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领导小组历史学科规划组组长，海南省文学研究学会副会长，海南省出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长期从事中华民族智慧的研究。已出版《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三国智谋精粹》、《三国演义用人艺术》、《三国演义谋略新探》、《三国演义与现代商战》，后三书已在海外多次再版发行。现在出版的“智慧四书”，即《权利之争》、《攻心有术》、《鹿死谁手》、《人际是非》，是霍雨佳编审继研究《三国演义》之后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

## 第一章 上下关系

上下关系，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上下关系，既有务的关系，也有个人之间的关系。公务关系好坏则建立在人关系好坏的基础之上。不论干好事或干坏事，都需要上关系协调一致，这决定于彼此志同道合和爱憎一致，否则造成分裂。既然上下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上级对下级的工和前程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封建朝代则起了绝对性的作用，可使下飞黄腾达，也可随时将之置于死地，故有“伴君如虎”之虑。能否正确处理上下关系，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关系到国家、人民利益的得失。不同素质的人对处理上下关系有不同态度和做法，本章所写的十五节文字，则是从各种不同的度，对古代各种上下关系加以总结和评论，并用对比的形说明，以是是非非更其鲜明。虽然上下关系是如此复杂，多多样，但概言之，只有正确和错误两种而已。

### 一、招得大才如鱼之得水

刘备三顾草庐，请得孔明出山相助，两人“情好日密”，备对关羽、张飞说，“孤之得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无独有偶，一百多年后，即十六国时代，王猛投苻坚于未称王前，人一见便如平生知交，谈及兴亡大事，极其投机，苻坚觉得：“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刘备与苻坚都是英主，孔明与王猛都是大才，君臣如此相得，传为千古美谈。

#### 刘备、孔明相得是因志同道合

刘备和孔明相得力何比为“犹鱼之有水”，这是有其原因的。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及“裴注”记载：

刘备是靠镇压黄巾军和起兵参加讨伐董卓起家的，但在当时军阀混战中，他的军力是最弱的，即使他争得了地盘也被别人端了。如他经过于辛万苦才被拥立为徐州牧，当他与来犯的袁术相持于盱眙、淮阴时，吕布从后面起兵袭取了徐州，后来他转战各地，大都被人打败，经常颠沛流离，投奔过曹操、袁绍，都不安于其位。

为什么刘备跟曹操、袁绍等人的关系如此下协调，不肯为之卖命呢？本来曹操和袁绍都是非常敬佩刘备的。如陈登等就拥立刘备为徐州牧事致书征求袁绍意见时，袁绍回书说：“刘玄德为人有大量有信义，今徐州人欲拥立，我是赞成的。”刘备去投袁绍时，他派将前往迎接，自己也离邳城二百里与刘备相见。曹操同样对刘备也十分赞赏，他尝从容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指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当时，袁绍的力量比曹操还强，操却不把他看在眼里，而曹操这时已“挟天子以令诸侯”，却将寄其篱下的刘备与己并列为“天下两大英雄”，足见他对刘备的评价是多么高。既然曹操和袁绍都如此敬重刘备，刘备如肯为之用，都必然得到重用。事实上，刘备投奔曹操后，操已表刘备为“左将军”，“礼之愈重，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但是，刘备是天下之枭雄，有图天下之志，当然不肯为人下，这使他必然与曹操、袁绍分道扬镳。

因此，刘备在后来投靠据有荆州的同宗刘表时，表从刘备的经历中知其不肯为人下，虽亲自前往郊迎，以上宾礼待之，但心实疑而阴御之。刘表不

重用刘备，刘备也不会因刘表给他在新野屯兵而感到满足。《九州春秋》记载刘表和刘备的一段对话便足以说明：刘备在荆州数年，无所作为，一日在刘表家里，入厕时见髀里肉生，感慨流泪。还坐时，刘表见他脸有泪痕怪而问之，刘备说：“我过去经常骑马作战，身不离鞍，髀肉皆消。因久已不骑马作战，髀里肉又复生，岁月流逝，人快老了，而功业不成，是以感到可悲。”刘备的“悲”不是消极的“悲”，而是积极的“悲”，即因“功业不成”而“悲”，因他这种人是不会由于失意而意志消磨的。他从屡次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要成大事业，得人才是关键，所以在荆州时，他广结人才，荆州豪杰知其有作为，归附的日多。恰在这时，孔明才出山辅佐刘备。

是孔明去见刘备，还是刘备去拜访孔明，史书记载不同：《魏略》说是刘备屯兵樊城时，孔明去见刘备。《襄阳记》就说是司马德操先向刘备推荐孔明庞统说：“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这时，刘备才知道孔明大名。”《三国志·蜀书·先主传》则明确肯定是刘备去拜访孔明说：“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在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又据孔明后来写给后主刘禅的《前出师表》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於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显然，非孔明先去见刘备，而是刘备“三顾草庐”求教于孔明。这“三顾”充分说明刘备是多么思贤若渴，对孔明极其礼遇和虚心请教，因此使孔明“感激”而许为刘备“驱驰”，刘备也就得聆“隆中对策”，从此，终于从逆境走向顺境，最后称帝西蜀；孔明为了刘备的事业，也是他俩的共同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君臣如此合契，除了刘备“三顾”虚心待贤外，还由于：一、君臣志同道合。刘备一见孔明就申明其志，因“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欲“信大义于天下”，以兴复汉室为己任。这是与孔明不谋而合的，孔明也是个忠汉派，孔明不向北投曹操，向东投孙权，是因他们志不同道不合，故躬耕于隆中。在他一生的实践中，同样是以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为己任的，在《前出师表》中申明其抱负是，“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正因君臣志同道合，为共同事业而奋斗，故彼此合作无间，这是其君臣合契的一条重要的原因。二、孔明与刘备虽都是英雄，却是不同类型的英雄，刘备是枭雄，孔明是效忠式的英雄，这也是其君臣能合契的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如果孔明也是个枭雄，那就会像刘备跟曹操、袁绍一样必然要分道扬镳了。由于孔明是个为事业而不谋个人地位的英雄，即使刘备死后，由他那个昏庸儿子阿斗继位，孔明还是让他安安稳稳地当皇帝，自己就“庶竭驽钝”，始终是忠心耿耿力蜀汉事业无私地贡献其一生。

### 苻坚对王猛始终信任无间

君臣之间始终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如苻坚与王猛的，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罕见的。

孔明隐居隆中，王猛隐居于华阴山，都是饱读诗书，探讨兴亡及治国之道，怀着“佐世之志”，待时择主而动。《晋书·王猛传》记载：王猛，字

景略，北海郡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少时贫贱，以贩卖畚箕为业。他为人谨严庄重，胸怀大志，拜名师于华阴山，博学好兵书，这为他后来武能开国、文能治国奠定基础。他尝游后赵国都邺城，未被时人所知，只有侍中徐统见而奇之，召为功曹，他认为不能施展己之才能，没有上任。东晋荆州镇将桓温北伐打败前秦天王苻健，驻军灊上，王猛穿麻布短衣前去求见。在会谈时，王猛一面扞虱，一面纵谈当世之事，旁若无人，桓温听了，敬佩其才，退兵时，赐给车马，任他为都护，请其一起南下。王猛认为，桓温入关，而长安近在咫尺，却不渡灊水去把它拿下，显然桓温无意恢复北方，故犹疑不决。他回山请教其师，师说：“追随桓温是没有什么作为的，在此自有富贵，何必远去。”王猛乃决定不与桓温南返。

桓温退走第二年，前秦政局发生剧变。《晋书·苻坚传》记载；苻坚，字永固，一名文玉，氏族，八岁学汉文化，“博学多才艺，有经济大志”。其伯父前秦天王苻健死，子苻生继位，其人昏虐，天下离心，国势垂危，这时，任龙骧将军的苻坚决心除掉苻生，以挽救国家，于是广结人才，以图大举。闻王猛有王佐之才，便召为羽翼。正因王猛识英雄于草创之先，择明主于患难之时，为苻坚出谋画策，诛灭苻生及其帮凶，使之登上大秦天王位，并以其文韬武略，转战沙场，基本上统一了北方，因而得到苻坚的信任和敬佩，比之为“卧龙”，认为君臣“精契神交，千载之会！”

但是，君臣的这种“精契神交”的关系是经过实践才形成的。始平县位于京师西北，战略地位重要，但那里豪强横行，劫盗充斥，苻坚便派王猛去任该县县令。王猛一下车，就澄察善恶，明法峻刑，严惩了不少为非作恶的豪强。有一个作恶多端的好吏，王猛将之鞭死，其党上告，有关司法部门不问是非，竟将王猛逮捕。苻坚亲自审问，说：“为政之体，德化为先，你到任不久便杀人不少，太残酷了。”王猛说：“臣闻理治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派臣治理难治之县，臣决意为明君翦除凶猾之徒。现在才杀一个奸吏，还有无数坏人尚未伏法。如果臣不能尽除残暴，肃清在法者而受惩处，臣甘心伏罪；现在却认为臣实行酷政而加以惩处。臣实在不敢接受。”苻坚听了，认为王猛做的说的有理，对群臣赞扬王猛说：“王景略确是管仲、子产一类人物！”

王猛打击豪强，政绩卓著，升为侍中、中书令京兆尹。京兆尹是管理京都的长官，其任务比之治始平县艰巨得多，因京都是皇亲国戚所居之地，违法乱纪更其严重。特进强德是皇太后的弟弟，其人酗酒豪横，无恶不作，为百姓之患，王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御史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王猛通力合作，数旬之间，贵戚豪强被杀的有二十多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苻坚赞叹说：“我现在才知道天下之有法，天子之为尊。”

时王猛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丞相左史庶宝数谮毁之，坚大怒，将之贬职。特进樊世是氏豪，有大功于苻氏，居功骄傲，曾当众辱骂王猛，又在苻坚面前抗拒苻坚命令，并与王猛争论，王猛责其目无天子，竟挥拳要打王猛，被左右制止，便出丑言大骂，苻坚由此发怒，命斩之。如果没有苻坚的全力支持，王猛是难安于位，不能充分发挥其治国才能的。

王猛主政期间，“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业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并实行了一系列革新措施，大秦出现了一派崭新气象。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

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海我荫黎。’”“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

苻坚取得政权时，大秦只不过局处于关中一隅，当时北方割据政权林立，它处于四面受敌的地位。由于苻坚与王猛君臣一心，协力治国，兵强国富，在与群雄逐鹿中，愈战愈强。王猛经常统兵征伐，每战必胜，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天才，在他生时已基本统一了北方。由于王猛的文治武功，苻坚对他的评价极高，不只“比拟为孔明”，还认为“超过了姜太公”。他经常嘱咐太子宏等说：“你们事王公，要象奉事我一样。”其见重如此！

### 风云际遇既相同又相异

刘备与孔明，苻坚与王猛，他们君臣都生长于乱世，这也正是英雄用武之时，因而都有机会逐鹿中原，各得行其大志，施展其雄才。当然，他们之相遇，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还由于刘备和苻坚都是英明之主，知人善任，而孔明、王猛都善于择主，且都有大才又忠心辅主，故能君臣合契，为共同的事业而英勇奋斗。

这两对君臣内貌各有其相同之处：刘备和苻坚都胸怀大志，以统一天下为己任；孔明“每比管仲、乐毅”，王猛则“博学好兵书”，怀佐世之志”。各自外貌也有相似之处：刘备是“垂手过膝”，苻坚也是“臂垂过膝”；孔明“身長八尺”，王猛是“瑰姿俊伟”，都长得一表人材。其结局也相同，刘备不听孔明劝告伐东吴，猇亭之战几乎全军覆灭，使蜀汉从其顶峰上跌落下来，最后死于白帝城；苻坚不听王猛生前劝告急于伐晋，在淝水之战遭到惨败，大秦从此瓦解，苻坚被羌族首领姚萇勒死于五将山。孔明是“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猛则在苻坚代晋前病逝，他俩虽都各辅助其主登上皇帝宝座，但都壮志未酬，不能实现其统一天下的愿望。

这两对君臣各有其相同之点，也各有其相异之处。孔明、王猛都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但各有其长短：王猛不仅是军事家，还是一员猛将，他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功显赫；孔明虽能以弱小蜀国抗击强大魏国并向其发动进攻，使司马懿“畏蜀如虎”，不敢窥视蜀国，但五出祁山，劳而无功，对比之下在军事成就上则逊于王猛，孔明运用政治手段取得的成就则胜过王猛，孔明征南方，是以“攻心为上”，七擒七纵孟获，以服其心，使“南人不复反”；王猛虽能使北方各族归降大秦，却主要以武力征服，杀伤过多，其心不服，这就是淝水之战惨败后，各族首领纷纷叛变的主要原因。在治乱邦用重刑上，王猛和孔明是一致的，但孔明能“不因情废法，执法不忘情”，使法严而民无怨；王猛则执法过严，内部有怨气。因此，蜀汉虽屡遭战败，仍人心齐，政权巩固；大秦则经不起淝水战败，人心已散，政权迅即垮台。

这两对君臣其关系虽有如鱼之得水，但也有所差别。在刘备生前，军国大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孔明只不过是谋主而已。刘备并非都听孔明的话，如刘备猇亭惨败逃回白帝城后，孔明叹说：“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可见，孔明在这方面对刘备的影响力还不如法正，所以孔明因自己不能劝刘备代吴而以为憾事。苻坚则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由王猛裁决。苻坚尝感激地对王猛说，“您日夜操劳，忧勤万机，我可以放心悠哉游哉过日子了。”王猛病逝，苻坚悲痛万分，

他伤心地对太子宏说：“老天爷不欲我统一天下吗？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景略啊！”足见苻坚对王猛是多么信任和见重！王猛和孔明相比，王猛得到的信任多些。

## 二、忌贤妒才害人也害己

凡能得天下、治天下的，都因其身边有济济贤才，可以说贤才是建国治国之本。这是一个普通的道理，只要读过史书的人都懂得。但在暴君统治的时候，却出现忌贤妒才的现象，而历史上的暴君，不少是既有文才又熟悉历史，对治乱之道也有所涉猎，为何却忌贤妒才，残杀贤才，致失去治国之本，导朝致政紊乱，众叛亲离，国破身亡呢？这是因为：一是私欲膨胀，二是本性残忍，三是自以为是，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便构成暴君的特点。而贤才之士，能洞悉是非，预见事件之发展，当他们看不惯暴君的胡作非为，不肯顺其意或进行谏诤时，便成为暴君忌妒的对象，以至惨遭杀戮。三国时的孙皓、南朝梁的肖绎就是忌贤妒才的暴君，据说孙皓好学有才，肖绎是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都忌贤妒才，结果是害人也害己。

### 孙皓残杀贤才众叛亲离

《三国志·吴书·孙皓传》记载：孙皓字元宗，孙权孙。一名彭祖，字皓宗。孙休立为吴帝，封皓为乌程侯，遣就国。孙休死，这时蜀刚被魏所灭，吴国所属交阯郡（今越南北部）叛变，国内震恐，希望能有一个年长有才能的君主治国。左典军万或在乌程任县令时，跟孙皓相好，便屡次向丞相濮阳兴、左将军张布为他吹嘘，说孙皓“才识明断，是他曾祖孙坚类型的人物”，“又好学，遵守法度”。濮阳兴、张布便向孙休的皇后朱氏推荐孙皓，朱氏说：“我寡妇人，怎能考虑国家大事，只要吴国能保宗庙有赖便行了。”遂立孙皓为吴帝，时年二十三。皓即位之初，下诏申明为国为民之意，开仓济贫，放出宫女配无妻之人，为节约粮食将大批禽兽放出归山。但不久，孙皓的本色便日益暴露，他“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大小失望。”濮阳兴、张布对拥立孙皓为帝感到后悔，有人也对孙皓说他俩的坏话，孙皓便借故将兴、布杀了。连对那位同意他继位、不问政治的朱太后也不放过，孙皓即位月余，便贬他为景皇后，不久又将之逼死，他任用外戚、宠信佞臣，封后父滕牧为高密侯，舅何洪等三人皆封列侯。何定善窥测其意，逢迎巴结，最得孙皓宠信，被赐爵关内侯。他仗势作恶，专权朝中。

孙皓倒行逆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许多贤才之士遭到无辜的残杀。会稽太守车浚廉洁奉公，值郡荒旱，人民饥饿，便上表要求赈济，孙皓却说他欲收买人心，派人把他杀了。尚书熊睦见孙皓酷虐，微有所谏，孙皓使人以刀环撞杀之，身无完肌。中书令兼太子太傅贺邵，为人忠直，因“皓暴骄矜。政事日弊，”便上书进谏，皓深恨之。后邵中风，口不能言，请病假数月，皓疑他装病，便将之逮捕，严刑拷打致死，邵终无一言。负责宫中侍卫工作的楼玄为人清忠奉公，当世服其操。他正身率众，奉公而行，应对切直，数违皓意，渐见责怒。有人诬玄与贺邵相逢时，常耳语大笑，谤讪政事，便将之贬广州。东观令华核上表赞楼玄“清忠奉公，当世之冠”，请赦其罪。孙皓妒玄名声，使至交阯参战赎罪，却暗中下敕令使交阯将张奕杀之，奕不忍杀，会奕暴死，玄殡敛奕，于器中见皓敕书，便自杀。侍中韦曜是东吴著名史学家，被称为“汉之史迁”。他修吴史，孙皓要把其父孙和列入本纪，曜认为孙和没有登帝位，坚持宜放在列传，孙皓心中怀恨，寻隙加罪。皓每举行宴会，要求每人都要喝完七升，如不饮完，即使人强灌。曜酒量不超过

二升，初因受礼遇，特予减少，或以茶代酒，及至宠衰，不饮完七升便加罪，说地不奉诏，抓进狱中杀掉。孙皓自命不凡，自以为居人之上，人超过或触犯己者则忌恨之，以至借故意戮。侍中、中书令张尚有俊才，以言语辩捷知名，孙皓使他鼓琴，尚说不会，有一次谈及琴之精妙，尚说，“晋平公使师旷作清角，旷说吾君德薄，不足以听之。”皓认为尚讥讽其德薄，很不高兴。有一次他问张尚：“鸟最大的是鹤，最小的是雀，对吗？”张尚答道：“大者有秃，小者有鹪鹩。”每次谈论问题，张尚见识都在他之上。而皓忌人胜己，因而积以为恨。另一次，他问张尚：“我的酒量可比谁？”尚答道：“陛下有百觚之量？”据说，尧饮千钟，孔子百觚，孙皓认为把他比之孔子的酒量，是把他比低了，于是，便将张尚关进监狱，后送到建安（今福建建瓯）参加造船的劳动，不久把他杀了。孙皓就这样动辄杀人。且杀人手段极其残忍，如剥人之面，或凿人之眼，是以上下离心，众叛亲离。

孙皓很迷信“讖”，常以此来指导军国大事，决策王朝战略。蜀亡后，不久晋代魏，晋武帝司马炎忙于巩固内部的统治，暂与吴和解，待准备好后南征，孙皓则误以为晋软弱可欺，也想起兵灭晋。这时，有一个叫刁玄的人，编造一条讖文说：“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而孙皓未即位前也有人相他当大贵，于是他便亲率大军渡江伐晋，结果不堪一击便退回江东。孙皓原以为侍长江天堑可高枕无忧，现在人心已散，无人愿效力，长江不过通途，一跨便过。279年11月，二十多万晋军分成六路，在千里战线上同时发起总攻，所向皆克，吴军望风披靡，晋军以破竹之势直捣建业，孙皓只能素衣舆棕投降。孙皓将败前致书其舅何植说：“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耶？孤之罪也。”这时，孙皓虽有所认识，但已晚了。唐诗人刘禹锡写一诗形象地评述晋灭吴的实况：“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既然已众叛亲离，“千寻铁锁”也就阻止不了晋军过江前进，孙皓除了“一征降幡出石头”外已别无选择。

### 肖绎狠毒多忌国破身亡

《南史·梁元帝纪》记载：梁元帝，字世诚，小字七符，梁武帝肖衍第七子。年七岁，封湘东王。累官至镇西将军、都督、荆州刺史，镇守江陵，548年，侯景起兵叛乱，攻陷建康，控制朝政。肖绎起兵讨侯景，陈先霸、王僧辩克建康，侯景败死，肖绎即位。

肖绎聪悟过人，天才英发，说话音响如钟。五六岁时，武帝问他读什么书，他答道，“读《典礼》”，武帝使诵之，他诵上篇，左右莫不惊叹。他患眼病，武帝亲为医治，却治盲了一眼。及长好学，博览群书。因视力差，便叫左右轮值读书，日夜不停。夜间，五人各伺一更，以至天晓，虽熟睡，卷犹不释，读有差误或越篇，他必惊觉，更令追读，作文章，援笔立就。他不好声色，颇慕高名。为荆州刺史，在孔子庙建州学，派劝学从事二人负责教学事宜。他工书善画，自画孔子像，为之赞而书之，时人称为三绝。与裴子野、刘显、肖子云、张缵等当时知名才士为布衣交。他一生著述甚丰，计有：《孝德传》、《忠臣传》各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百卷，《连山》三十卷、《词林》三卷，《玉韬》、《金楼子》、《补阙子》各十卷，《老子讲疏》四卷，

《怀旧传》二卷，《古今全德志》、《荆南地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肖绎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是个很残忍的人，侯景之乱前后，为了争夺统治权，死于他手下的兄弟子侄就有十三人。初肖绎扬言要起兵讨侯景，却以俟四方援兵至为托词，淹留不进，骨鯉之士、中记室参军肖贲说：“大王以十万之众，未见贼而退，奈何！”绎听了深恨之，不久，便借故把他杀了。他派竟陵太守王僧辩，信州刺史东海鲍泉攻湘州，分给兵粮，令刻日起兵。僧辩以所属竟陵兵未到齐，想等兵到后才行，便与泉入请绎准予延期，绎疑僧辩观望，按剑厉声说：“你敢拒命，是否与贼有勾结？今日你只有一死！”便拔剑砍僧辩，中其左髀，僧辩昏绝，久之方醒，便将他送进监狱，后僧辩母亲哀求，才赐以良药，故得不死。在他败死前，江陵狱中还有罪犯几千人，有人建议释放他们去守城，他却下令将之全部杀死，由于西魏及时攻下江陵，这些人才得以不死。

肖绎多猜忌，才名有胜过自己的，必加杀害。王铜兄弟九人，在当时都享有盛名。因他们的父亲名是王琳，而当时士人很忌讳别人提到自己先人的名字，于是他将自己宠妾的哥哥名字改为琳，以侮辱之。刘之遴学识为时人所仰慕，因避侯景之乱从京师来江陵避难，肖绎便使人于途中将他毒死。不少有才能之士就是这样被他杀害，即使是他自己的骨肉也不能避免。

由于肖绎狠毒残忍，不仅受到臣民的厌弃，其亲属也恨之入骨。554年，其侄肖警引西魏军攻破江陵，俘肖绎，旋杀之。破城前，肖绎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其所藏的古今图书十四万卷。他将赴火自焚，宫人左右共止之。他以宝剑砍柱令折，叹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焚书、折剑，是说文武之道完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焚书？”他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其实，其国破家亡，不是因读书而是由于他残忍多忌，招致众叛亲离，成了孤家寡人，不亡何待！

### 三、要上下一心始能成事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能成大事的都由于上下一心。艰苦奋斗的结果。古代英明之主，疑人不用，用之不疑，认为其可托重任，则予以信任，充分发挥其才能；被用者感其知遇之恩，为之竭智效力，故能做出显著成绩。孙权对周瑜、鲁肃、吕蒙正是这样，因彼此委心，关系协调一致，对保卫江东，促进鼎足三分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周瑜受孙权重任大破曹军

赤壁之战，是有关东吴存亡之战，而孙权能联合刘备抗操取得胜利，其原因之一是用得其人。他充分信任周瑜，让其挂帅，而周瑜感其知遇之恩，且君臣关系有如骨肉之亲，故不为敌人游说所动，用其“文武筹略”，大破曹军。当然，这一对君臣如此互相信任是有其历史原因的。

《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及“裴注”记载：周瑜，字公瑾，庐江舒（今安徽舒城）人。他与孙权的哥哥孙策是密友，曾帮助孙策开拓江东。攻破皖时，得乔公两女，皆绝色美人，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策从容戏瑜说，“乔公二女流离失所，得我二人作婿，应该高兴了。”孙策死，由其弟孙权继承其事业，时周瑜任中护军，孙权有大事都与周瑜商量决定。202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下书要孙权派子去做人质，孙权召君臣会议，张昭等犹疑不决，周瑜坚决反对。权本不同意，便请周瑜去见其母做最后决定。周瑜说：“今将军继承父兄基业，兼有六郡之众，兵精粮多，将士用命，境内富饶，何必受制于人。在人之下，最大不过封侯，只有仆从十余人，车数乘，马数匹，哪能与南面称孤相比？不如勿遣，徐观其变。”孙权母亲对孙权说：“公瑾说得很对。公瑾与伯符（孙策字）同年，小一个月，我视他如子，你要以兄事之。”于是，孙权时周瑜亲如骨肉。

208年九月，曹操南征，刘琮投降，曹得其水军、步军数十万，东吴将士闻之皆惊。曹操准备顺流而下进军江东。致书威胁孙权说：“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东吴。”孙权召集群臣讨论对策，议者多认为双方力量悬殊，主张“不如迎之”，实是向曹操投降，只有鲁肃坚决主张抗操。因知孙权信任周瑜，便建议召回周瑜，共商大计。周瑜立即赶回柴桑，在大臣会议上坚决反对投降，他慷慨激昂地说：“操虽托名汉相，实是汉贼。将军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的威望，割据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用足，正是英雄创业之时，当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现在曹操是自来送死，哪能迎之呢？”接着他为孙权分析了曹军的弱点：“曹操后方并未安定，马超、韩遂尚在关西，是其后顾之忧，不可能旷日持久跟我们较胜负；且舍鞍马，仗舟楫，与江东争衡，本非其所长；现在又正是严冬，马无饲料，北方部队不服水土，必生疾病。这皆用兵之患，而操皆冒昧行之。将军擒操，宜在今日。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证为将军破之。”孙权听了增强抗操的决心，说：“曹操老贼早就想废汉自立，只因顾忌二袁、吕布、刘表和我，故还没有动手。今数雄已灭，只有我尚在，我与老贼，势不两立。你主张抗操，甚合我意，这是老天爷以你来辅助我。”于是，拔刀砍前奏案说：“诸将吏敢复有言当迎操者，与此案同。”便选精兵三万，由周瑜挂帅，与刘备并力抗操。

在赤壁之战前，曹操闻周瑜年少有美才，认为自己势大可以游说其归顺，便密下扬州，派九江蒋干往说周瑜。蒋干是周瑜的同乡，很有辩才，当蒋干来访时，周瑜一见面便说：子翼太辛苦了，远涉江湖为曹操作说客吗？”干说：“我与你是同乡，阔别久了特来相叙，却说是说客，无乃太过？”瑜说：“我虽不及夔、旷等音乐大师，听了弦音便知其意。”便设酒欢待。瑜请蒋干参观其军营，看仓库军资器仗，以说明其军资之丰富；回来宴饮时，又摆出自己的服饰珍玩之物，以显示其生活之阔绰，于是，对蒋干说：“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行计从，祸福共之，假使苏张更生，酈叟复出，犹抚其背而折其辞，足下岂能离间我们君臣关系？”蒋干听了只是微笑，终无一言说瑜。干还，对曹操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

正因周瑜与孙权的关系是“内结骨肉之恩”、“祸福共之”，对孙权忠心耿耿，故能为保卫江东竭其才智破操。周瑜、刘备两军与曹军相遇于赤壁，而曹军甚众，周、刘军少，周瑜与部将黄盖决计以火攻之。先是由黄盖向曹操献诈降书，至战日，用大战船十艘，内放满柴草，灌上膏油，用帷幕遮覆，上面插着旗帜，船到江中，黄盖使众兵高喊：“投降！”曹军以为真来投降，皆出营立观。距曹军二里余时，同时点火，时东南风急，风猛火烈，倾之，烟炎张天，烧尽曹船。火势延及岸边营寨，人马烧溺死者甚多。周瑜、刘备率军猛烈追击，曹军大败。从此，曹操无力南顾，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

之后，周瑜本欲取蜀、并张鲁，与马超结援，以图北方，协助孙权统一天下，但不幸病死，时年才三十六岁。孙权痛哭说：“公瑾有王佐之资，今忽短命，我有谁可依赖！”孙权称帝后，还念念不忘周瑜的功勋，说：“没有周公瑾，我今天哪能称帝啊！”

### 鲁肃与孙权一见如故成为谋主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记载：鲁肃，字子敬，临淮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城）人。他生而失父，由祖母抚养。肃体貌魁奇，有壮志，好奇计。家富有，喜施与。当时天下已乱。他学击剑骑射，招聚少年，给其衣食，往来南山中射猎，阴相部勒，讲武习兵。见民不聊生，便大散财货，变卖田地，济贫救危，甚得乡邻的欢心。周瑜任居巢长时，带领数百人路过临淮东城时，闻其名前往拜访，请其资助粮食。鲁肃家有两囤米，各三千石，肃指一囤赠瑜，瑜见其慷慨如此，于是与他深相结交。孙权继承父兄业，广招贤士，周瑜向孙权推荐鲁肃，说其才可佐时，劝他重用鲁肃，以成功业。经周瑜推荐，孙权立即召见鲁肃，二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会见结束，众宾客退出，肃亦告辞，孙权只请他留下，设酒相待，两人坐在榻上对饮，抵足而谈。孙权坦率他说：“今汉倾危，天下大乱，我继承父兄余业，想建桓文之功，请问有何良策？”肃答道：“过去汉高祖想尊事义帝而不得，是因项羽杀害了义帝。现在的曹操，就是昔日的项羽，将军怎能建桓文那样的功业呢？”接着为之画策说：“以我之见，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变。趁北方多事，曹操无力南顾，可先剿除江夏的黄祖，进而讨伐荆州的刘表，完全占据长江以南之地，然后称帝以图天下，这就是说要建立像汉高祖那样的事业。”鲁肃所献之策，因是在榻上谈的，

史称“榻上策”。此策引起孙权对鲁肃的重视，尔后奉为国策，鲁肃当时才二十九岁，而孙权对他如此刮目相看，大臣张昭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鲁肃“谦下不足”，便向孙权谗毁鲁肃，说：“肃年少粗疏，未可任用。”孙权并不把他的话放在心里，而是更加器重鲁肃，特地赐给他母亲许多衣服帏帐和居处杂物。鲁肃原是个普通平民，未有何突出表现，而孙权与他一席话见其识见超人，便知其非凡品，不听重臣张昭的谗言而如此信任并重用之，足见孙权知人善任。以后的事实说明鲁肃是个很有政治远见的文武兼备的杰出将领。

“榻上策”所说的北方多事，是指曹操与其在北方的敌对势力正在较量，特别是袁绍与曹操的争霸。当时，袁绍强而曹操弱，鲁肃已预见“曹操不可卒除，”把他视为东吴的主要敌手。因此，在曹操大军未下江南以前，他已着手进行联合在荆州的新兴势力刘备以抵抗曹操的活动。刘表死，鲁肃就向孙权建议：“今表新亡，其二子素不和睦，军中诸将各怀异心。刘备是天下枭雄，与操有隙，寄寓于刘表，在忌其能不加重用。肃请得奉命前去向其二子吊丧，慰劳其军中有为的将领，并说刘备使抚其众，同心一意，共抗曹操，相信刘备必喜而从命。今不速往，恐落在曹操后头了。”孙权即命鲁肃前往荆州吊丧，以探虚实。鲁肃到夏口时，曹操率领大军昼夜兼程急袭荆州，及到南郡，表子刘琮已投降曹操，刘备惶惶出走，欲南渡长江。鲁肃径往迎之，到当阳长阪，刚好与刘备相会，便向刘备说明孙权的旨意，以及江东的实力，劝刘备与孙权协力抗操，诸葛亮早在“隆中策”中已提出联合东吴抗操的方针，因此，刘备听了鲁肃的建议很是高兴，当即派诸葛亮随鲁肃到东吴说孙权。亮到东吴后，“以连横之略说孙权，权大喜。”于是孙刘联盟，孙权派周瑜率军与刘备并力抗操，终于在赤壁之战中大破曹军。孙、刘联盟破操促成了天下三分的形势。因此，可以说孙、刘联盟和三国鼎立，诸葛亮和鲁肃是其奠基者。

打败曹军后，鲁肃从前线回到柴桑时，孙权亲自率领全体文武大臣欢迎，鲁肃将入阁拜见，孙权起立敬礼，对鲁肃说：“子敬，孤亲自抚鞍下马相迎，足以显示你的荣耀吗？”鲁肃笑并回答道：“未也。”众人听了无不惊讶。步入大殿就坐时，鲁肃才举起马鞭说：“愿至尊威德遍及四海，统一天下，成就帝业，到时以安车软轮召见我，那才荣耀哩！”孙权听后，抚掌大笑。

周瑜病危，上疏推荐鲁肃说：“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孙权即拜鲁肃为奋武校尉，代领瑜兵，后拜汉昌太守、偏将军。217年，鲁肃因病去世，年仅四十六岁，对他的去世，孙权极为悲痛，为之举哀，并参加他的葬礼。因鲁肃功勋显著，孙权曾称他是自己的邓禹（汉光武帝的重要将领）。孙权称帝，登上坛时，顾谓公卿说：“昔日鲁子敬曾劝我‘成就帝业’，可知他是很有远见的。”

### 吕蒙接受孙权教诲终成文武全才

《三国志·吴书·吕蒙传》及“裴注”记载：吕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今安徽阜南东南）人。少年时南渡，依靠姐夫邓当。邓当为孙策将，有一次，邓当兵镇压山越叛乱，他偷偷地随军参战，邓当见了大吃一惊，呵斥不能禁止。这时他才十五六岁。邓当出征归来告诉他的母亲，其母非常生气。欲惩罚他，他申辩说：“我家贫穷，这样下去是很难过活的，如果参战有功，

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焉得虎子？”其母哀而怜之。当时，邓当手下一小吏因蒙年少而轻视他，说：“这小子有何作为？参战只不过是肉喂老虎。”他日碰见吕蒙又辱之，吕蒙大怒，拔刀把他杀死，逃到一个老乡家里去躲。后向校尉袁雄自首，袁雄乘便向孙策帮他说好话，孙策召见奇之，留他在身边。数年后，邓当病死，张昭推荐吕蒙代领其兵，任他为别部司马，参战屡立功。孙策遇刺身亡，其弟孙权统事。208年，吕蒙随权征夏口黄祖，黄祖令都督陈就率水军出战，吕蒙率部在前冲锋，亲手斩下陈就首级，将士乘胜，进攻江夏城。黄祖听说陈就被杀，弃城而逃，吴兵追上把他擒杀了。孙权说：“这次能取得胜利，是因吕蒙斩了陈就。”于是，升蒙为横野中郎将，赐钱千万，这一年，又与周瑜、程普等西破曹操于乌林，围曹仁于南郡。因有功，封偏将军，任寻阳令。孙权征皖城时，平明进兵，吕蒙率军在前亲自擂鼓，士卒拼命而上，辰时城破。张辽卒领的救军未到，闻城已破，只好退兵，孙权嘉其功，任为庐江大守。

吕蒙果敢有胆，每战冲锋在前，屡立奇功，甚得孙权赏识，但他不读书，不懂兵法，难成大将，为培养他，孙权便鼓励他学习。有一次，孙权对吕蒙和蒋钦说，“你俩今掌握兵权，应读书学习以增长知识。”吕蒙说：“军中事务繁多忙得很，哪有时间读书。”孙权说：“我并作要你学习经书当博士，只不过要你读些史书知道往事罢了。我的事务比你繁杂得多，我少年时就读过《诗经》。《书经》、《礼记》、《左传》、《国语》，只是没有读过《易经》。自从统事以来，我又读了三史（即《史记》、《汉书》、《东汉观记》）和诸家兵书，感到大有收获。你俩都很聪明，学必有所得。应抓紧时间，读《孙子兵法》、《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汉光武帝在戎马倥偬之中，手不释卷。曹操亦自称老而好学。你俩何不自勉力求上进呢？”由于孙权的教诲，吕蒙才开始读书，从此笃志不倦。由于他读了大量兵书和史籍，见识大增，鲁肃见吕蒙缺少知识，以为他只不过是个粗犷的武将，对他并不重视，他代瑜领兵后，有一次因公务往看吕蒙。吕蒙设酒款待，酒酣，蒙问肃说：“君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何计略，以防不虞？”肃随口答道：“临时施宜。”蒙曰：“今两家虽同盟，关羽实是熊虎，哪能不早谋对策。”便密为肃提五策。鲁肃听了大惊，想不到蒙有如此奇谋深策，便越席抚其背说：“我以为大弟只有武略，现在你的学识如此英博，已不是昔日吴下的阿蒙了。”

吕蒙巧袭荆州擒关羽，就突出地显示了他超人的智谋。鲁肃死，吕蒙代之，驻守陆口与关羽对峙，他表面上极力讨好关羽，但暗中图之。关羽进攻樊城，但留兵将防守公安、南郡。吕蒙上疏献谋荆州之策说：“关羽进攻樊城而多留备兵，是恐蒙图其后，蒙常有病，乞分一部分兵回建业，以治病为名，关羽闻之，必撤备兵，尽调赴襄阳。这时，派大军袭其空虚，则南郡可下，关羽可擒了。”于是，吕蒙诈称病重，权召吕蒙回，阴与商议图谋荆州之计。先是以陆逊代吕蒙守陆口，陆逊致书关羽，重申吴蜀和好，卑辞赞美其威武，以傲其心，关羽果无复有忧江东之意，便调兵赴樊城。在关羽麻痹无备的情况下，吕蒙率军袭荆州，兵士尽伏在战船中，使白衣摇橹，都穿着商人的衣服，昼夜兼程，将关羽置在江边的屯侯兵，尽收缚之，是故关羽不闻知。到南郡，守将傅士仁、糜芳不战而降，吕蒙不费一兵一卒，袭取了荆州。吕蒙率军入城，尽得关羽及将士家属，都加以抚慰，并严禁将士不得干扰百姓，有所求取。有一士兵，是汝南人，吕蒙的同乡，因下雨，取民家一

笠盖官铠，官铠虽是公家的，吕蒙还是认为是犯了军纪，不因他是同乡而废法，遂挥泪斩之。于是，军中震栗，路不拾遗。吕蒙还派人慰问老人，有疾病的送医药，饥寒的送衣粮。关羽退军，在途中，数派使来，吕蒙厚待之，使其到关羽将士家走访，了解将士家属情况。使者回去后，将士都知家门无恙，见待过于平时，故将士全无斗志。孙权随后率大军到，将士都弃关羽而降，关羽自知势孤便走麦城，西到漳乡时，因归路被孙权派兵所阻，关羽及其子关平终被擒杀。

吕蒙袭荆州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典型战例，也是“攻心战”的绝唱。关羽是三国时代具有“万人敌”之你的名将，他善待士卒，有显赫战功，可是在吕蒙智计面前，全军不战而溃，自己变成孤家寡人，最后被无名小将所擒杀。可见，吕蒙已从一勇之夫变成了文武全才的大将。这虽是吕蒙笃志学习所致，也是孙权为培养吕蒙而鼓励其读书的结果。

吕蒙因袭荆州之功，被任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蒙固辞金钱，孙权不许，封爵未下，适逢吕蒙旧病发作，权时在公安，便迎蒙来内殿治病，召募名医为蒙治病，说如能治好，将赐以千金。蒙病情加剧，权心里就很悲痛；有数次想去探望吕蒙，又怕干忧他，常穿壁偷看，见吕蒙能食点东西则高兴，跟左右谈笑，不然则唉声叹气，夜不能睡。吕蒙病稍好转，为之下赦令，群臣都祝贺。后病转重，令道士为之请命。但终医不好蒙病，年四十二岁，死于内殿。孙权十分悲痛，饭也吃不下。君对臣如此关怀，这是罕见的。

#### 四、猜忌多疑者败事有余

猜忌多疑的人，其突出的特点是：不相信别人，只相信自己。凡干大事的，要依靠众智众力，才可能成功；如果认为别人都不可靠，不可信任，即使你自己有三头六臂，也只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明末亡国之君朱由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即位后，称思宗，号崇祯。他一改前任皇帝熹宗朱由校不理朝政的作风，“宵衣旰食”、“殚心治理”，给人一种“励精图治”的印象，故《明史》的作者说他“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其实崇祯皇帝是想有所作为而无所作为，因而促进了明亡。之所以如此，是因其人猜忌多疑，几乎对朝中文武大臣都存有戒心，虽有名将而不能重用，有忠臣为谋而不听，且滥加屠杀，他相信的是太监、佞臣，导致内忧外患日炽，自己成了孤家寡人，最后只能吊死在煤山上。

#### 朱由检为何中敌离间计斩袁崇焕

朱由检曾说恨当世无岳飞。其实袁崇焕就是岳飞式的英雄，但袁崇焕却遭到岳飞同样命运，他虽屡败后金兵战果显赫，却被朱由检斩了！而岳飞之死是因宋高宗的自私，袁崇焕之死导火线虽由于皇太极的离间计，而朱由检中计却是由于他的猜忌多疑在起作用。

《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字元素，东莞（今广东东莞县）人。1419年中进士，任邵武知县。为人慷慨有胆略，好谈兵。当时，后金常侵扰边境，崇焕关心国事，遇边塞退休将士便向他们请教塞上事，故熟悉边塞战守情况，以边才自许。熹宗在位时，御史侯恂请破格用之，升兵部职方主事。后金努尔哈赤南下，关外尽失，明廷朝野震惊。崇焕单骑前往观察，谈关上形势，说：“给我兵马钱粮，我一人可守山海关。”廷臣益称其才，兵部给事中蔡思允上疏推荐袁崇焕，遂破格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监关外军，发给帑二十万，以招募军队。后崇焕奉命守宁远城，宁远距山海关二百里，是扼守山海关的重镇，也是守护京都的重关，崇焕坚固城池，确定“主守而后战”的方针，高策来督师，说关外不能守，令尽撤关外军入关。崇焕坚决反对，说：“我是宁前道，在此当官，当死在这里，决不入关。”后金努尔哈赤率军来攻。崇焕刺血为书，誓与城共存亡，将士被其忠义所激，都愿效死。他尽焚烧城外民舍，坚壁清野，以待敌军。八旗兵来攻，冒死凿城，俱被打退；对近的用“万人敌”，远的发“红夷大炮”，后金兵死伤狼藉。这次战斗极其激烈，鏖战至深夜二更，后金兵才退。第二天，又来猛攻，又被打退，后金统帅努尔哈赤在这次战斗中被炮所伤，回去不久便死了。崇焕因功升辽东巡抚，关外防务尽由他负责。皇太极继位后为雪宁远之耻，先率军攻锦州，明廷令崇焕救援，崇焕预料后金必来攻，派将率兵前往，自己则坐镇宁远，皇太极知宁远分兵，突然率大军来攻，明军开炮还击，后金兵也拼死战斗，双方死伤惨重，但宁远仍岿然不动。攻宁远不下，皇太极又回师锦州，由于锦州壕深炮猛，无法攻下，只好班师东去。宁远、锦州之战以明军胜利而结束，史称“宁、锦大捷”。尽管崇焕建立如此功勋，当时擅政的宦官魏忠贤为冒功却指使其党羽上书弹崇焕不亲率兵救锦州为“暮气”，崇焕被迫辞职回乡。

但是崇焕的功勋是不可泯灭的，这个抗清名将已威扬塞内外，为国人所

敬佩。崇祯继位，杀魏忠贤，惩处冒功者。廷臣争请召崇焕，朱由检未称帝前已知他是个杰出的将领，便下诏任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登州、莱州、天津的军务。崇焕从东莞至京，即上疏奏陈兵事。崇祯于平台召见，问抗战方略。崇焕说：“方略已写在疏上。臣受陛下眷爱，请给便宜行事，五年便可收复全辽。”崇祯说：“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崇焕叩头谢恩。崇焕回去休息。给事中许誉卿问其五年复辽之略，崇焕说：“圣心焦急，聊以相慰。”誉卿说：“如做不到，他日责备，你怎么办？”崇焕才知失言，心里很不安。一会儿，崇祯出来，崇焕奏道：“复辽事本不易办。陛下既委托臣，臣安敢辞难，但五年内，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要给予方便，方克有济。”崇祯命令四部如其言给予照顾。崇焕又说，“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封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远在万里。忌能妒功，哪能无人，即使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这时崇祯是站着听他说，便告诉他，“你不用疑虑，朕自有主张”。并赐崇焕上方剑，给其便宜行事，还设宴招待。当时，崇祯对崇焕是何等重视和信任。但是，崇焕鉴于以前熊廷弼、孙承宗在辽督师时被人排挤和构陷，因而不能竟其志，便上疏说，“御使廷臣与边臣有所不同，因为军中可惊可疑的事甚多，应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拘泥于一言一行的微瑕细事，事任既重，怨者必多，有利于封疆的事，都不利于己身，图敌急了，敌人将设计间之，所以做边臣很难。陛下爱臣知臣，本来臣不必过于疑惊，但心中有所顾虑，不敢不告。”崇祯诏复令其放心，并赐蟒袍玉带和银币，崇焕上疏辞蟒袍、玉带不受。但是崇焕的疑惊并不是多余的，敌人的离间，政敌的陷害，后来都集于其一身，这他都预见到了，想不到的是主要置他于死地的恰恰是这位猜忌多疑的崇祯皇帝。“事任既重，怨者必多，有利于封疆的事，都不利于己身。”这对于崇焕来说，他是不幸而言中了。

崇焕赴辽东后，整顿军务，改革军政管理办法，处死据地称雄胡作非为的将领毛文龙，对所统辖的四镇兵五十余万，战马八万多匹，严加训练，把四镇建成铜墙铁壁，使后金兵不敢窥视。皇太极乃决定绕过崇焕防区，取道蒙古，穿过喜峰口，一举夺取遵化，进而挥师南进，直向北京方向扑来。崇焕得知，急督师回援，期以先敌于城下，背护京师。部将们担心未有朝廷命令，会遭到猜忌。崇焕果断他说：“皇上危急，顾不了那么多，如能解难，虽死无憾。”崇焕督师抵广渠门，崇祯立即召见，赐以御饌及貂裘，犒赏其将士。崇焕以士马疲乏，请入城休息，崇祯不许，可见崇祯对他有所疑忌。崇焕在广渠门布阵，身先士卒与来攻的后金兵展开激烈的战斗，歼敌数以千计。皇太极叹息说：“十五年来未尝有此劲敌也。”

后金兵所经之地并非崇焕防区，而崇焕闻变千里回援京城，自谓有功无罪。可是正在这时，其政敌散布的流言四起：有的诬崇焕拥兵纵敌，有的诬崇焕引敌胁和。皇太极知有崇焕在，则难打败明军，于是采用离间计：使人装作在无意中透露崇焕与后金订有密约，令所俘虏的太监知之，并阴纵他逃走。这个太监奔告崇祯，崇祯对崇焕做事往往先斩后奏，早有疑忌，现在又听了流言和太监的密告竟信以为真，于是在面见时，将崇焕逮捕入狱。阉党余孽也趁机起哄，上书以“擅立和议、专戮大臣”等罪诬害崇焕。其实所谓和议，崇焕是为争取时间进行备战的权宜之计，崇祯也不问是非，终以谋叛罪论死，被磔（分裂肢体，古代的一种酷刑）于市，兄弟妻子被流放三千里，抄没其家，而其家“无余资。”其忠如此，其廉又如此，故天下人冤之。

本来，皇太极的离间计不过是《三国演义》的周瑜愚蒋干的翻版，又只是一面之词，明眼人一看便穿；其政敌所告的都是诬陷，且毫无根据。崇焕在广渠门，身先士卒，重创后金兵，仅此已见其忠，而因崇祯为人猜忌多疑，且武断专横，自以为是，未经调查研究，便冤杀崇焕，这实是自毁长城，修《明史》的清人谈及此事时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是定了。”

### 卢象升孤军无援战死是谁之咎

《明史·卢象升传》记载：卢象升，字建斗，宜兴（今江苏省南部）人。1622年（天启二年）中进士，任户部主事，后升大名知府。1628年（崇祯二年），京师戒严他募万人入卫。明年晋升右参政兼副使，统领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号“天雄军”。象升虽文士，却熟知将略，善于治军。因屡立战功，任湖广巡抚，总理东南军务，二次赐其上方剑，准许便宜行事。1638年9月，后金南下，入墙子岭、青山口，蓟辽总督吴阿衡被杀。京师危急，崇祯召象升率师入卫，赐象升上方剑，使其督天下援兵。象升正遭父丧，便穿着麻衣，誓师保国。

这时，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杨嗣昌与监督中官高起潜主和议。象升闻之，顿足叹气说：“我受国恩，恨不得死所，万一不幸、宁捐躯断颈，决不求和。”崇祯召见，问其拒敌的方略。他答道：“臣主战。”崇祯听了脸色一变、良久才说：“和议是外廷所议，你去跟嗣昌、起潜商量。”象升出与嗣昌、起潜议论，彼二人主和，象升主战，意见不合，不欢而散。明日，崇祯发万金犒军，杨嗣昌来送行时，使左右退出后，告诫他切勿轻战，便回去。象升率师到昌平时，崇祯派中官送帑金三万犒军，明日又送来御马一百匹、太仆马一千匹，以及银铁鞭五百条，象升见崇祯如此厚赐便认为：“主和只不过外廷所议，帝主战是坚决的。”可是，象升的一切决策和抗战措施，多为嗣昌、起潜所阻挠。象升便上疏请分兵，嗣昌以宜、大，山西等地的兵归象升，关、宁诸路的兵属起潜，主要兵力掌握在起潜手里，而象升虽名说是督天下兵，实际上他统领的兵还不到二万人。

先是，嗣昌常暗派卖卜瞽者周元忠与后金联系议和，人皆知之。象升师次顺义时，嗣昌来，象升责备他说：“文弱（嗣昌字），难道你不知城下之盟，《春秋》耻之，却常派人与后金议和。长安人口舌如锋，袁崇焕之祸你能得免吗？”嗣昌听了脸都红了，说：“你简直要把上方剑加在我的头上了。”象升说：“既不能奔丧，又不能战，上方剑将加在我头上，我哪能加给别人。”嗣昌无话可说。象升又说：“元忠和，往来已非一日，举国闻之，这哪能隐瞒呢。”嗣昌语塞而去。

后金兵又南下，三路入侵，象升进据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大战于庆都。还在与后金军拼搏的生死关头，嗣昌却绝其粮饷，又以云、晋告警，抽调归象升所管的总兵王楼引兵去，这时象升只剩下五千疲卒。象升进师至钜鹿贾壮，起潜拥关、宁重兵在鸡泽，两军相距仅有五十里，象升派使乞援，起潜置之不理，终不派一兵一卒支援。象升率师到蒿水桥，遇后金兵，象升挥师与战，夜半，后金的鼙鼓之声四起，及旦，已被后金数万骑兵重重包围，象升麾兵疾战，呼声振天，从早晨战斗到中午，炮尽矢穷。象升拼死斗，后金骑皆上，他手杀数十人，身中四矢三刃，才力尽仆地。掌牧杨陆凯为保其尸免被所残而伏其上，背后负二十矢以死。全军覆灭。

象升孤军无援战死，显然是由于嗣昌、起潜从中阻挠和破坏，但与崇祯大有关系。由于当时农民起义遍及大江南北，崇祯想“先安内后攘外”，便力主议和。嗣昌、起潜都是崇祯的心腹，嗣昌有心术而无大才，因善揣摩崇祯意故得宠；起潜则是个碌碌庸人。由于崇祯猜忌多疑、对大臣大都不信任，事事都要过问，便派宦官监管一切，兵事则委起潜。崇祯虽主和，但不便公开出面，于是便由嗣昌、起潜办理。和议事，实是崇祯所主使，故崇祯一听象升说“臣主战”，便脸色立变，好久说不出话，后来才推说是“外廷所议”。作为皇帝而订立胁下之盟是被人耻笑的，崇祯又是个自命“英明之主”的人，他主和是秘密进行，假手于人。嗣昌、起潜是其主和的可靠代理人。崇祯明知象升“主战”而三赐上方剑，数次赏钱犒军，也是为遮其主和事，表面上装作支援抗战，其实他不同意主战，对象升是不信任的；象升错误认为主和是外廷事，崇祯是坚决主战的，便是被这种表面现象所迷惑。主和是崇祯的一贯思想，嗣昌死后，其所推荐的陈新甲主办其事。时陈新甲任兵部尚书，崇祯以和议委托之，为此事手诏往返有数十次之多，都告诫要绝密，勿为人知。有一天，陈新甲看了有关和议的密报后放在桌上，他的家僮误以为是一般塘报，便交给抄传，于是便露了底，这引起举朝大哗。崇祯很为恼火，下旨严斥新甲。新甲认为和议是崇祯主使，故不服罪，反而上疏自诩其功，崇祯看了更火，便将他逮捕斩之于市。崇祯就是这样文过饰非，好事归己，以显示其“英明”；坏事归他人，以掩盖其错误。正因崇祯主和，嗣昌、起潜才敢阻挠和破坏抗战，导致象升孤军无援战死，崇祯应负主要责任。

当后金兵南下、京师告急时，编修杨廷麟上疏弹劾兵部尚书杨嗣昌说：“陛下有讨伐之志，大臣无御侮之才，谋之不善，以国事为戏。杨嗣昌及蓟辽总督吴阿衡内外相通，朋谋误国。杨嗣昌与高起潜、方一藻倡和议，不讲武备，以至于此。督臣卢象升以祸国责枢臣，言之痛心。南仲在内，李纲无功；潜善掌权，宗泽殒命。望陛下明正向者主和之罪，使将士畏法，无有二心。并召见大小诸臣，跟他们一起商议抗战方略。令卢象升召集诸路援师，乘机赴敌，不要从中掣肘。这便是今日的急务。”杨廷麟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主和派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祸。后金兵能如入无人之境，是因蓟辽总督吴阿衡跟嗣昌、起潜内外相通，力主和议，不讲武备，整天饮酒作乐，对后金兵入侵毫无所知，当敌人入总督府时，吴阿衡正酩酊大醉不能率军抵抗，后金兵不费吹灰之力便把他杀了。杨廷麟见嗣昌、起潜对卢象升诸多掣肘，故把嗣昌、起潜比作南仲、潜善等奸臣，认为卢象升将遭到李纲、宗泽的不幸命运，这预见后来证实了。但他跟象升一样，同样被崇祯的假象所惑，说“陛下有讨伐之志”是错了，既然嗣昌、起潜主和是其所指使，对杨廷麟弹劾嗣昌崇祯必然置之不理。

由于孤军无援，畿南三郡父老劝象升移军广顺召集义军再战，象升悲愤他说：“感谢父老厚意。我虽身经百战未尝战败，但现在分给我的只有五千疲卒，而大敌当前，援师东隔，请事又多被掣肘，我军已食尽力穷，旦夕将被消灭，不必再劳累父老们了。”一个英勇善战的爱国将领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战死了！当象升战败时，驻军附近，一向以割死人首级冒功的高起潜惶惶逃窜了，却不言象升英勇战死的情况，而主和派却诬象升投降，后来弄清真相，其亲人多次请朝廷赠恤，崇祯却不许，足见其对象升为主战而死是有异议的。崇祯除信任宦官和个别佞臣外，对其他大臣都是怀疑的，认为不可信，军国事都是自作主张，他因主张和，对主战的卢象升是不信任的，故把

重兵由宦官高起潜掌握，分给象升不到二万兵又借故抽调去一万多，只留下五千疲卒，并断绝其粮饷，起潜重兵近在附近也不派兵支援，所以说象升孤军无援战死，与崇祯的猜忌多疑有关。

## 五、言者无罪人才敢说话

下级对于上级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要有这样的前提，说对了得到上级的采纳，说错了也“不打棍子、戴帽子”，即言者无罪。如果因多提意见而遭到报复、打击以至加罪，人家有意见也不想说不敢提。而要使下级想说敢说，这决定于上级，上级要虚怀若谷，尤其在思想上要认识到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对的不对的，才能全面考虑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即使决策错了，实践上出现了问题也能及时加以纠正。只有这样始能少犯错误，或不犯错误。

古人对这些道理早就懂得，身体力行，为后人做出了典范，其中以唐太宗和宋太祖为最。唐太宗经常鼓励群臣进谏，才出现了魏征这样的诤臣，纳谏、敢谏成为贞观之风的主要内容；宋太祖对于士大夫是言者无罪，故宋代多敢言的谏臣。唐太宗、宋太祖对待言者的态度，至今仍为人们赞赏。

### 唐太宗纳谏魏征才敢谏

善于纳谏是唐太宗最突出的特点，也是他能成为千古名君的主要原因。正因唐太宗善于纳谏，魏征才能成为他的“人镜”。而他们君臣之间能协调一致，为巩固唐朝的统治而纳谏、敢谏，这有一个认识和实践的过程，也就是说这良好的风气并不是一下子形成的。

唐太宗一生中说了不少错话，做了不少错事，如为了享乐强要已订婚的美女，要建豪华的行宫，征求珍奇异物；出于个人的喜爱或需要，随意赏罚，“出尔反尔”地修改法律；因好大喜功，想封禅，征高丽，等等，这些所作所为都是正在步着隋炀帝的后尘，经魏征等谏臣指出后，他能纳谏不干或及时纠正过来了。他是亲眼看见强大的隋朝一下子便土崩瓦解的，为了不重蹈隋亡的覆辙，使唐王朝长治久安，经常与魏征等探讨隋亡的经验教训，魏征等就趁机指出其所作所为与隋亡的相似之处，以引起他的警诫，使他认识其危险性，一反隋亡之道而行之。隋炀帝促使隋速亡的主要原因，是因其奢侈暴虐，好大喜功，独断独行。唐太宗在魏征等的不断谏诤下，认识到为君的不能随意而为和“载舟覆舟”的教训，要让人民休养生息，不能得罪人民，特别是他接受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教导，故没有像隋炀帝那样偏听偏信，独断独行，因而能听臣下的谏诤，得以少犯或不犯错误。唐太宗之所以能如此，主要是其人的本质是好的，是一个想大有作为的人，想成为一个继往开来的明君，他对自己的一言一行，都能考虑到是否利国利民，不敢随便说随便干，既听人言也畏人言，对谏臣是既尊重又害怕。《资治通鉴》记载：“上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征来，匿怀中，征奏事久不已，鹞竟死怀中。”太宗虚怀纳谏，正如他自己所说：“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

魏征敢谏，主要则是由于唐太宗能纳谏。《新唐书·魏征传》记载：唐太宗欢宴大臣于丹霄楼，他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圭都忠于建成、元吉，当时诚可恶，我能不计较旧怨用之，可说无愧于古人。但魏征进谏我不听，我所坚持的他却不同意，为什么要这样呢？”征说：“臣认为不对的事才进谏，如果不应该做的事也赞成了，执行了，就错了。”太宗说：“答应了再

说，不行吗？”征说：“昔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答应，背后乱说。’如果当面认可，后又说不同意，这就不是尧舜的稷、那样的良臣了。”太宗大笑说：“人言征举动疏慢，我觉得他很抚媚！”征拜谢说：“陛下鼓励臣进谏，所以敢于谏诤；如果陛下不纳谏，臣哪敢数批逆鳞呢！”魏征说出了他敢谏的心里话，正因唐太宗敛容虚怀纳谏，魏征才敢犯颜逆鳞进谏。

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并非一下子能达到。唐太宗和魏征也是如此。因为魏征既不是晋阳起义旧部，也不是“玄武门之变”的策臣，而是来自敌营之臣，他不可能一下子得到唐太宗的信任。魏征曾先后事农民起义军首领李密、窦建德，建德败，初投唐时被太子建成用为洗马，他见秦王李世民功高，阴劝建成早做准备。建成被杀，李世民赏识其才，恕其既往而用之，可是一见面便责备他：“你离间我兄弟，为了什么？”魏征答道：“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死于今日的祸了。”魏征毫不求饶，也不后悔，而是坦直地抗言，显示他的骨心是硬的。幸好是碰着李世民宽大为怀，不仅不怪他，反而器重他的直言。虽然如此，魏征开始并没有得到重用，唐太宗即位后，他和王圭被任为谏议大夫，这是提意见没有实权的职务。后被派往安抚河北有成绩，被任为尚书右丞，兼谏议大夫，尚书右丞只不过四品官。他虽与王圭同为东宫旧臣，唐太宗即位之初即任王圭为黄门侍郎参预政事，三年后魏征才任秘书监参预朝政。由于魏征来自敌营，唐太宗的左右旧臣对他是有意见的，甚至无事生非攻击他，如有的大臣说他“虽忠信而可疑。”有的还诬告他“阿党亲戚”，唐太宗派温彦博审理此事，查无事实，彦博还是对唐太宗说，“征做事不避嫌疑、致被人诽谤，这是应该责备的。”唐太宗不加思索便同意，叫彦博去责备魏征。魏征不服，便往见唐太宗说：“臣闻君臣同心，是谓一体，哪有为了公事而避嫌疑？如果上下都是这样，国家的兴亡就难料了！”唐太宗说：“我领悟了。”承认自己同意责备魏征是不对的。魏征事唐太宗七年后，太宗知其谏诤是为了使己成为尧舜式的君主，才晋升他为侍中，即得任宰相的职务，就是说魏征经历七年之久的考验才进入上层最高权力集团。

在贞观时期，进谏是一种风气，而魏征锋芒毕露成为唐太宗最信服的谏臣，不只是因他敢谏，还由于他善谏，他能抓住唐太宗怕亡国的要害随时指出其错误之处，并说得有理有据，且其进谏大多在错误刚露出苗头之时，使唐太宗能及时改正，达到防微杜渐之效；加上魏征有辩才，文笔生辉，不管是面陈或上疏，唐太宗都深为敬佩和赞赏，往往将其所谏写在屏风上，或置之案头，作为座右铭，用以警诫自己。即使唐太宗如此纳谏，但不能说纳谏的态度始终如一。为使唐太宗纳谏慎终如始，以免在晚年犯错误，魏征曾当面指出了唐太宗对待进谏的三个时期的不同态度：魏征见天下太平，唐太宗对“以隋亡为戒”有所忽略，在一次讨论政事时，乘便对唐太宗说：“陛下在贞观之初，主动鼓励人进谏。三年以后，对进谏的正确意见高兴地接受。近一二年，虽然勉强纳谏，但心里却不舒服。”这一下提醒了唐太宗，他惊问：“你有事实证明吗？”魏征有理有据地答道：“陛下初即位时，判元律师死罪，孙伏伽谏以为法不当死，陛下赐他兰陵公主园，价值高达百万。有人说：‘赏赐太厚了。’陛下说：‘朕即位以来，还没有人敢谏，所以要赏之’。这是陛下为了鼓励臣下进谏。后柳雄妄报隋资，有司劾其伪将论死，戴胄奏说其罪应流放，陛下说：‘你能按法治罪，不会有滥罚了。’这说明陛下是高兴地接受进谏。近日皇甫德参上书说：‘修洛阳，是劳民伤财；收

地租，是厚敛于民；民间女人高髻，是因宫中提倡。’陛下发怒说：‘这小子是要使国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宫人无发，才称其意。’臣奏：‘人臣上书，说得不激切不引起人注意，激切了就近于诽谤。’这时，陛下虽听臣言，赏赐帛后罢之，但心里终不平。这说明陛下现在是难于接受进谏的。”唐太宗说：“不是你，不能指出我纳谏的变化。人是苦于不自觉啊！”不过人要自觉是不易，往往需要别人敲警钟。唐太宗尽管在思想上认识纳谏的重要性，且身体力行之，但有时却不自觉地有拒绝进谏的表现，经魏征提醒后，他才知道自己错了。由于唐太宗能纳谏，谏事的日多，有的不符合事实，唐太宗厌之，欲加以斥责或免职，魏征谏说：“古者立谤木，欲闻己过。让人上书奏事，实是谤木的遗风！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畅所欲言。说对了，对朝廷有益；说错了，不采纳，无损于政事。”唐太宗听了很高兴，对上书奏事的皆慰劳之。说对了，有功；说错了，不受到谴责或加罪。于是，在贞观时进谏成风。

唐太宗对魏征这位诤臣的评价是很高的。有一天，唐太宗欢宴群臣，他公开赞扬房玄龄、魏征说：“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没有人超过他。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谏，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征而已。虽古代名臣也不过如此。”他又曾问群宦：“征与诸葛亮比较，谁贤？”岑久本说：“亮才兼将相，魏征是比不上的。”唐太宗说：“魏征以仁义辅佐我，欲致我成为尧舜那样的君王，人这方面说，诸葛亮是难与他相比的。”魏征病逝后，太宗称之为“人镜”。

尽管唐太宗对魏征评价如此之高，魏征出于对唐太宗的忠心而经常谏诤，但不能说他俩人之间毫无芥蒂。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关系是最复杂的，君臣之间的关系尤其如此。作为一代英主唐太宗，为了巩固其家天下，他在使用和信任臣下时，不能不予以考察；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魏征，政治风云的变幻，历代君臣之间的不幸教训，他是深有体会的，决不会因唐太宗的信任而忘乎所以，而是想“功成身退”。《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魏征奉诏负责主持修魏、梁、陈、周、齐、隋六代史完成后，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但“征自以无功于国，徒以辩识，遂参帷幄，深惊满盈，后以目疾频表逊位。”太宗不同意说：“朕提拔你于仇虏之中，任你以枢要之职，身见朕之非，未尝不谏。金在矿时是不珍贵的，经过冶炼成器，才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为金，以你为良匠。你虽有疾，还没有衰老，哪能便告退。”后来，魏征又面请让位，太宗难违其意，乃拜征为特进，仍知门下事。不过，后来的事实说明，魏征的“深惊满盈”并不是多余的。魏征病死，唐太宗思念不已，登凌烟阁观其画像，赋诗以表哀念。对此，有些人忌嫉之，百般毁短。因魏征曾推荐杜正伦、侯君集才堪任宰相，及正伦以罪被罢黜，君集谋逆被杀，这些人便诬告魏征跟他俩是朋党；又说征曾录前后谏诤语给史官褚遂良，以显唐太宗之过。唐太宗听了很不高兴，原说将衡山公主许其子叔玉，便下手诏停婚，并将自己亲笔为魏征写的碑推倒。但唐太宗终究是个明君，也许后来感到这样对待魏征错了，他征高丽无所得归来，怅然说：“魏征如在，我就不会有此行了！”于是，召魏征家人到宫里，赏赐和慰劳其妻子，以少牢祭其墓，复立碑，对其家人恩礼有加。

魏征状貌不过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唐太宗赫然大怒，他还是神色不变，有理有据地力陈其说。贞观之治，魏征是有大功的；但是，来自敌营的魏征，如不遇善于纳谏的唐太宗，他也不会成为一代名臣。正因

君纳谏臣敢谏，才给后人留下唐太宗、魏征君臣之间的千古佳话。

### 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宋多谏臣

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把“重文”作为国策，立下了三条后世戒规，要求以后接班皇帝世代遵守，其中有一条便是不杀士大夫（即高级知识分子）。他尊重文臣，给予优厚待遇，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当官的大都是文人，连领兵打仗的统帅也由文臣担任，在那时确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所以有人把宋代称为“知识分子的乐园”。既然，士大夫受到如此重视，必然感恩戴德，为之竭力尽智；又没有杀头的危险，所以士大夫为了效忠，大都敢说敢干。因此，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涌现的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忠臣义士最多。

在这里，我们仍要指出，不杀士大夫只是宋太祖和平手段取天下和治天下的一个具体政策。从《宋史·宋太祖本纪》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宋太祖赵匡胤取天下和治天下，虽靠武力，但和隋文帝“以大杀立威”相反，而是尽量采取和平手段，能不杀的则不杀，以收拾人心，调和各方面的关系，以巩固赵家天下的统治。如他在黄袍加身后，除因其手下疑韩通组织反抗将之杀害外，原周少帝和太后以及皇族都给予优待，原周朝官员照旧任用，就这样兵不血刃地夺取了政权；为防止武人发动兵变，不杀功臣而是“杯酒释兵权”。让功臣们享乐去，因而心甘情愿地交出了兵权；把兵权直接掌握在中央手里；在统一天下时，北汉、后蜀、南汉、南唐、吴越、荆南等国之主，投降的一概不杀。赵匡胤统一天下后，他过去所熟悉的武的一套已不适应于和平时期，这时他不懂的事情感到越来越多，许多事情都要向文人请教，才认识到“作相须用读书人”。由是大重儒者。并吸取五代时期“谁兵强马壮，谁就可当皇帝”的教训，为保住皇位便制订重文轻武的政策。而要使读书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除了重用外，还要让他们敢说敢干，于是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誓言。这是宋太祖英明之处。宽待敌对势力，使他们戴德归心，故能顺利接管政权和统一天下。而不杀士大夫，对整个宋朝的影响就更为深远。

如果把宋朝与明朝在这方面进行比较，宋朝不杀士大夫的政策和明朝把臣下视为“奴隶”，动不动廷杖、杀头相比，其后果的优劣是十分明显的。宋、明都极力加强中央集权，而明的中央集权实际是皇权，一切权力都操纵在皇帝一人手里、可以生杀予夺，独行其是，大臣不过是其手中工具、奴才而已。在明太祖立下的极端专制主义制度之下，明朝出现了不少恶棍式的昏君。宋朝的中央集权，实际是操纵在以皇帝为首有重臣参加的最高权力机关手里。尤其因有“不杀士大夫”的戒规，士大夫大都敢说敢干，甚至敢于违背皇帝的意旨，据理直争，而说错了做误了，一般情况下最重的处分不过是流放。如苏轼、苏辙、欧阳修等都曾被扣上攻击皇帝的“大帽子”，只受到撤职或贬谪的处分，贬谪了还当闲官。

正因“不杀士大夫”，臣下认为皇帝做得不对的，敢于反对，提出自己的意见。宋初，宰相赵普向宋太祖奏荐某人为某官，太祖不用。普明日复奏荐其人，亦不用。明日，普又奏荐其人，太祖怒，将其奏折撕碎掷于地下，普神色不变，跪而拾之归。他日补缀旧纸，复奏荐如初，太祖终于同意任用其人。又有某臣应升官，太祖素恶其人，不给他升官，普却坚持要升，太祖

怒说：“朕不升他的官，你要怎样？”普说：“刑以惩罪，赏以酬功，这是古今通道。且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岂得以喜怒专之。太祖听了更冒火，站起来走开，普亦跟随着他，太祖进入宫，普立在宫门，久之不去，太祖终于允其所请。

不仅是宋初，在以后也出现了不少诤臣。倡导“先忧后乐”和坚持仁人志士节操的范仲淹，认为对国对民不利之事，都敢于进谏，史称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他曾三次直言，三次遭到贬官，而每一次因直言而被贬，一次比一次得到人们更大的赞誉，他的声誉也就越来越大。他第三次被贬时，正直的王质扶病载酒前来跟他告别，赞他：“范君此行，尤为光荣！”范仲淹笑着说：“仲淹前后已经‘三光’了。下次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品吧！”尽管范仲淹屡次干预朝政，后来还是得到起用，任边帅抗击西夏立了功，并得任副相，实行庆历新政。虽因种种原因新政失败了，他的“先忧后乐”精神却永留人间。

宋代士大夫对赵宋王朝是感恩戴德的，在宋朝衰亡时期不断出现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忠臣义士不是偶然的。宗泽不能“渡河”而死不瞑目，李纲不能实现其抗金志愿而饮恨终身。文天祥正因感“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不自量力而奋不顾身抗击元军，最后失败被俘不屈而死。崖山战事失败，陆秀夫为尽节不受辱，抱着幼帝投海自尽。赵宋王朝“重文”和不杀士大夫的政策，杰出的士大夫给它的报答是：敢说敢干，尽忠报国。这也是赵宋王朝得传延这三百余年之久的原因之

## 六、在上独裁在下多佞人

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皇帝权力最大，地位至尊，可以为所欲为。但英明之主如唐太宗、宋太祖并不认为自己无所不知，而是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虽有专制之权而不独裁、能虚心纳谏，择其善者而从之。故臣下能畅所欲言，多出现诤臣。专制暴君则不然，其权力无限，私欲也无限，不遂己意的杀之，媚己者宠之，故多佞臣。隋炀帝、明世宗时就是如此。

### 隋炀帝说“谁想升官一定要听话”

隋炀帝尝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这是独裁者的独特性格，他说的话，不许说不对；他做的事，只能顺着他，不许违背。也就是说他唯一喜欢的是那些唯唯喏喏、吹牛拍马的人，最不喜欢的是有自己的思想、善于分清是非，又敢说话的人。于是在他的身边打转的都是那些想升官而听话的人。炀帝骄奢淫逸，大肆出游，游江都那次，队伍就有一二十万人（其中美女有三万），那些听话的佞臣也跟着悠哉游哉，天天欢醉吮吸沿途人民的血汗；炀帝大兴土木，建新宫，凿运河，动辄征民夫几十万至几百万，那些听话的佞臣逼民照办；炀帝三次劳师远征高丽，那些听话的佞臣为之摇旗呐喊。而人民因供应和劳役、兵役已弄得穷苦不堪，铤而走险，国势日危，他却像被追逐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无视垂危的现实，认为这样便安全了，欺人自欺以显示他威武不可侵犯。而那些听话的佞臣还不敢说个“不”字。正是这些人顺着他的意，帮他迅速走向死亡。

在这诸多的佞臣中，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三位，即虞世基、裴蕴、袁充。

虞世基为人沉静，喜怒不形于色，他博学有高才，草书楷书写得很好。曾在陈当官，陈灭归隋，炀帝即位。重其才，得参预朝政。世基感炀帝知遇之恩，也想报效，见“盗贼”日多，便建议派兵屯守洛阳仓、以备不虞。炀帝不从，轻蔑地说：“书生胆小。”是时天下大乱，世基知炀帝是不听谏的，又见高颖、张衡等因议论炀帝暴政相继被杀，害怕祸及己，于是明哲保身，虽是炀帝身边的人，常有机会对朝政提意见也不敢说，只有唯唯喏喏，炀帝要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敢违背其意。尽管“盗贼”四起，郡县多被占据，因炀帝厌听这方面的消息，以后有关下边报告被打败的事，都不敢如实反映。因此，外面发生的变故，炀帝都蒙在鼓中。炀帝曾派太仆杨义臣率兵镇压造反者，降敌数十万，向炀帝报捷。炀帝叹说：“我想不到贼势如此，义臣降贼竟这么多！”世基答道：“这不过是些鼠窃，其众虽多，未足为虑。义臣打胜，拥兵不少，久在外边，很不适宜。”炀帝说：“你说得很对”。便召回义臣，将降众解散。又越王侗派太常丞元普达偷越李密占领的地区，到江都奏事说，“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京都，并据有洛口仓，城内已无食。如陛下速回京都，其乌合之众必散，不然京都将被占据。”说了歔歔呜咽，炀帝听了很担心。世基见炀帝色忧，为取得炀帝欢心，便说：“越王年少，被这些人欺骗了。如果贼这么多，善达怎能来到这里？”炀帝勃然大怒说：“善达这小子，敢廷辱我！”便派他经过李密驻军地向东阳催运粮食，善达遂为“群盗”所杀。从此，“外人杜口，莫敢以贼闻奏。”世基就是这样善于迎合炀帝的喜爱，所以言多合意，得到炀帝宠信，在朝臣中无人可及（《隋书·虞

世基传》)。

裴蕴也像虞世基一样，原来并不是不分事非的人，而是一个有才能干的官僚，后来他摸透了炀帝的为人，自己光靠才能不能升官，升官的捷径是阿谀奉承，于是以其高妙的拍马屁手段使官运亨通，不断升官，成了炀帝的必腹大臣。据《隋书·裴蕴传》称：裴蕴原在陈做官，隋南下前，他暗中上书隋文帝愿为内应。隋灭陈后被重用，历任洋、直、棣三州刺史，政绩颇著。隋炀帝即位，他提出以貌查户口办法，过去偷漏的户口被发现了，新增加六十四万一千五百。炀帝高兴地对百官赞扬裴蕴说：“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于是，渐得炀帝宠信，参掌机密。裴蕴知炀帝不喜听相反意见，只爱听话的人，便下功夫伺察炀帝的爱憎，顺其意行之。他任御史大夫后，炀帝想给谁加罪，则曲法顺情，构成其罪；炀帝欲宽有谁，则重罪轻判，将之释放。炀帝见其所判都合己意，大小刑狱都由他专断。杨玄感叛变后，炀帝命裴蕴处理其党羽，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可知天下人不要多，多便相聚为盗。不尽杀之，则无以劝诫后人。”于是裴蕴峻法治之，杀了数万人，都抄没其家。炀帝大为赞扬。司隶大夫薛道衡因违炀帝意遭到谴责，裴蕴知了“投石下井”说：“道衡自负有才和恃是旧臣，有无君之心。每见诏书，背后便非议，把罪过推给朝廷，制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炀帝说：“对！我少时曾与此人共事，彼轻我年少，跟高颖、贺若弼等外擅权威。及我即位，心不自安，赖天下无事，不敢叛变。你说其人叛逆，跟我看法一样。”于是，杀道衡。裴蕴为扩大自己的权势，指使虞世基奏增置御史百余人，监督郡县和军队、京都留守以及诸蕃互市，并引致奸黠之徒组成朋党，作恶多端，侵扰百姓，使人心日益厌隋。

袁充也原在陈当官，陈灭后归隋。他获得炀帝宠信，是因他另有绝招，即以星相学顺从上意。他因懂星相学被任为太史令。他知文帝和独孤后想废太子杨勇，便用星相学来投机说：“近口观玄象，太子当废。”文帝迷信星相，便决心废太子杨勇，立杨广为太子，后继位称炀帝。袁充这次投机当然得到炀帝的宠信，以后凡炀帝想干什么就以星相来附和，炀帝大兴土木，他就说：“这是陛下修德，符合天象。”其后天下大乱，炀帝遭雁门之危，人民又纷纷造反，炀帝心不自安，袁充便假托天象，上表陈述嘉瑞，说什么天象预示着“贼必败”、“突厥将亡”、“天赞有道，助歼凶孽”，天下太平。炀帝看了奏书，信以为真，高兴得很，破格往他为秘书令，亲昵异常。炀帝再欲征讨，袁充皆预知之，又假托星象，鼓励其出征。

炀帝的倒行逆施就是在虞世基、裴蕴、袁充等佞臣的推波助澜之下，走向死胡同，导致众叛亲离，统治十五年后便寿终正寝。

### 明世宗谁支持他修道就宠信谁

隋炀帝在人间纵欲，明世宗则幻想升天成仙。但彼此一样的独裁，听话的升官，提相反意见的杀戮。独裁后果则不相同，隋炀帝纵欲虽害国害民害己，而并非无所作为的皇帝，其所作所为不都是坏的，如开凿运河虽为游乐，可是对沟通南北河运、繁荣经济是有作用的，也有益于后世；明世宗则是无所作为的昏君，他向往着虚无缥缈的世界，对于人间毫无感情，其修道厌政使佞臣专权，于国于民于己都是有害无

益。

在封建帝王中，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祖规最多，而诸多祖规的核心思想是独裁，连大臣也视如奴隶，稍不顺意无须司法机关审理，即可处以廷杖，在群臣众目睽睽之下在廷会时当场打死。其他刑罚也残酷，如剥皮、实革示众之刑等等，其用意是“杀鸡给猴子看”，谁不听活就照此办理。尽管朱元璋的不少祖训被其后代所废弃，这些酷刑却始终遵守。这样，朱元璋所创立的极端专制主义制度代代相传，像明世宗这位修道皇帝，别看他道貌岸然，对待不同意己见的大臣比魔鬼还凶恶。方士殷朝用以所炼白金器百余献给世宗，说用此饮食物，供斋醮，神仙可致。世宗召见与语，大喜。朝用又说，只要世宗深居不与外人接近，黄金可炼成，不死药可得。世宗更加高兴，告谕廷臣令太子监国，自己去专心修炼一二年。举朝惊愕，无人敢言。当时有一个名叫杨最的，因其当官为政便民有政绩，被升为太仆卿，这位直臣看见朝政日益败坏便抗疏谏说：“陛下还在壮年，竟听道士欺骗要想成神仙。神仙是栖于深山的修炼的人所为，哪有高居宫殿，穿皇服食御膳，而能白日升天的。臣虽至愚，不敢奉诏。”世宗大怒，立即廷杖，杖未毕而死（见《明史·杨最传》）。御史杨爵见世宗一心修道，不理朝政，也冒死上书进谏，对世宗疏远谗臣亲奸臣、建斋醮、修斋坛劳民伤财，专心修炼不理朝政，听信左道致貽四方之笑，拒忠臣之谏随意杀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世宗见奏大怒，将之逮捕入狱，折磨长达七年终于致死（见《明史·杨爵传》）。

凡支持他玄修或向他献不死药方的就得到宠信，于是奸臣、阿谀之徒及骗子环绕在他的身边，把朝政弄得更加乱七八糟。明代有名的大奸臣、大贪污犯严嵩因善于媚上而得到宠信，时间长达二十多年。世宗修道不上朝，除严嵩外，其他大臣都难得见他一面。严嵩得到宠信，是因他投其所好，凡有好事，都上书歌功颂德归于世宗斋醮，极力支持其修雷坛，精心为之写上奏天神的表章——青词，日夜侍候在西苑板旁，秉承其意志办事。世宗初即位，任兵科绘事的夏言表现还不错，提出不少好建议，因其有才能升礼部左侍郎。后见世宗修道，为取得其信任，也曲意顺从，尤以善写青词得到世宗宠信，跟世宗无涉的事如天旱后有微雷，则上表说是世宗斋醮所致，因而得升为首辅。不少骗子也各施其术以取得世宗的宠信。有一个名叫顾可学的，中进士后任浙江参议，因偷官帑被罢官，在家闲居了二十余年，因知世宗想长生不死，灵机一动，便以厚礼贿赂严嵩，通过他转告世宗说，他能将童男童女的小便炼成秋石，服了可延年益寿。世宗听了严嵩的介绍大喜，立即派人送金币给顾可学，任为右通政，到民间取来大批童男童女，由顾可学用其小便炼成秋石来服食，这一下顾可学得官不费工夫，不断升官，由工部尚书而礼部尚书，再加至太子太保。又有一个名叫邵元节的，原是龙虎山上清宫道士，世宗召其入京，让他专司祷祀，因天旱祷祀偶有验，大加宠信。世宗未有皇嗣，命元节祷祀，过三年恰巧连生皇子，任元节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他还山，后为之建道院，赐名仙源宫，每年给米百石，派校尉四十人为其洒扫，赐庄田三十顷，免租税。陶仲文跟邵元节相好，据说他尝得罗田万玉山授符水术，元节将之推荐给世宗，太子患痘，仲文祷之，碰巧太子病愈，从此，宠信异常。军国以及个人之事，都由仲文祈祷，有好事都归功于其祈祷。世宗有病，既而病好，却说是仲文祈祷之功。不及二年，连授少师、少傅、少保，在有明一代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一人兼这三种官爵的只有陶仲文一人而已。仲文又请建雷坛于乡县，为世宗祝寿，于是到处兴建，督促又急，人民大受其害。陶仲文的子孙、徒弟也大批被录用在朝廷当官。

明世宗这位道头和独裁者，汇集在其身边的也必然是这些害国害民的奸臣和骗子。

## 七、宽诚待人人乐为之用

王莽代汉创建新朝，因改革失败引起天下大乱，群雄崛起，逐鹿中原，而最后刘秀得其“鹿”，原因何在？

### 刘秀得天下与其人宽诚有关

刘秀得天下的原因虽有种种，其宽诚待人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其对人宽，人多感其恩；对人诚，人多信之，故人人乐为其用。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字文叔，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九岁便成为孤儿，由其叔父抚养。及长，为人谨慎厚道，勤于耕种。他的哥哥刘縯性格与之相反，不事生产，喜欢交游，常讥笑他像刘邦的哥哥仲喜一样喜欢耕种，将来是没有什么大作为的。但事实却和刘縯所预料的相反，刘秀这个老实宽厚的青年人，后来却笃志于学，手不释卷，以其雄才大略，创建了东汉王朝，登上了皇帝宝座，称汉光武帝。

时势造英雄。由于天下大乱，刘家子孙为了兴复汉室，也纷纷起来反新，刘秀便是其中之一。起义开始是由他的哥哥刘縯领头，他动员春陵青少年造反，但大家纷纷逃亡藏匿，说：“这是把我们推向火坑。”后来看见刘秀也穿戴着绛衣大冠的将军服装，都惊讶地说：“这样谨慎宽厚的人也起来造反了，大概没有什么危险。”于是，大家才安下心来，并投入造反队伍。可见刘秀的谨慎宽厚给人印象甚好，人们都很信任他，见他造反也放心跟他造反。

刘秀率领的队伍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也是因他善于招降纳叛，这些人一投到其麾下，大都忠心为之效力。他之所以能使他们神悦心服，是因他对人宽厚，以诚相见。刘秀于 县蒲阳等地大破铜马军，并降其众，封其首领为列侯，令他们率领原所属的兵将，并自乘轻骑前往各部慰问，降者心大安，互相语说，“肖王（指刘秀）推赤心置人腹中，能不使人为他效死！”降众皆服。刘秀便将降兵编入部属，这样，他的部队一下增到数十万，人称“铜马帝”。

刘秀对文臣、武将一般能推心置腹、宽恕待人。对于将领不予掣肘，在战争中给其自主权，攻守、进退由其相机权变，从容制敌，故常取胜。消灭王郎时缴获不少其部下与王郎私通文件，他令全部烧毁。对部属的小过失，不予计较，即使是死敌，改悔投降，也既往不咎，立功的予以封赏、信任。如在更始（刘玄）时，朱鲔曾参与谋害他的哥哥刘縯，朱鲔投降后，官职、爵位照原保留，始终没有报复，“后为少府，传封后代”。由于刘秀诚宽待人，文臣武将都感戴其恩德，为之效力，密切了君臣关系。刘秀对臣属很少用刑杀立威，而是以“柔术治理天下”，正因此，他从招降纳叛中，吸收了很多开国有功的武将和治国有术的文臣，如马援、冯异、王常、耿况、寇恂、吴汉等东汉名将都来自敌营。在得天下后，其开国功臣也没有遭到“狡兔尽，走狗烹”的悲惨结局，相反，为了保护功臣，他对功臣谆谆教诲，要他们守法，慎终如始。

### 马援见刘秀真诚决心报效

《后汉书·马援传》记载：马援，字文渊，扶风茂陵人。他的祖先赵奢

为赵将，因有功又善于服驳马，故被赵惠文王赐爵号为马服君。从此，子孙以马为姓。马援任郡督邮时，有一次押送犯有重罪的犯人，因可怜他，便放他走了，自己则逃亡到北地。后来遇赦，便留在那里牧畜，来归附的有数百家之多。他常对宾客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因他努力耕田和放牧，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既而自叹说：“凡增殖财货，可贵的是能施赈穷苦人，否则只不过是一个守财奴罢了。”于是散财赈济。足见马援之志不在聚财富，而是有其抱负。

新朝末，马援因人推荐，王莽任他为新成（原称汉中）大尹。及莽败，留西州，割据西州的隗嚣很敬重他，任他为绥德将军，参与决策。当时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便派马援前往观察，看是否可以依靠。马援与公孙述是同乡，少年时的好朋友，马援原以为一到两人当握手欢如平生，而公孙述盛陈警卫，才喊马援入见，交拜礼毕，便叫他出，先到宗庙等候，然后盛装带大批从属官兵而入，以显示帝威，在其座旁设旧交位叫马援坐下，公孙述欲授他以封侯大将军位。随队的宾客都劝他留下就职，马援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述不出迎国士，与之图成败，反修饰边幅，不过是木偶之形。这小子哪能留天下之士呢？”于是辞归，告诉隗嚣说：“公孙述只不过是井底蛙，却妄自尊大，不如投靠汉光武帝刘秀？”

隗嚣又派马援奉书前往洛阳。马援到，刘秀只穿便衣、戴头巾，请他在宣德殿周围一间小屋子里会见。刘秀一见马援便起立笑着对他说：“你遨游二帝间，先往见公孙述，现在我才见到你，自己很感到惭愧。”援叩头辞谢，说：“当今之世，不只是君择臣，臣亦择君。臣与公孙述是同乡，少时是好朋友。臣前到蜀，公孙述盛陈警卫才让我入见。臣今远来，陛下哪能知道我不是刺害，会见竟简便如此？”刘秀又笑说：“你不是刺客，只不过是说客。”马援说，“天下反覆，盗名称帝的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有高祖之风，乃知有真的帝王。”刘秀甚壮之。马援从刘秀南至黎丘又转至东海，返洛阳后刘秀派使送马援回去。隗嚣问马援出使情况，马援说：“前到朝廷，汉光武帝接见数十次，每与谈话，自晚上至天晓，其才明勇略，非他人可敌。且上对人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略与高帝同。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嚣问：“比高帝怎样？”援答道：“高帝无可无不可；今上好吏事，动如节度，又不喜欢饮酒。”嚣听了不以为然，说：“如你所说，是胜过高帝了？”因他信任马援，便送长子恂做人质。马援也带家属随恂归洛阳。居数月未见任职，马援以三辅地旷土沃，而随来的宾客多，便上书求屯田上林苑中，刘秀许之。后隗嚣听别人计，意便孤疑，马援数致书责嚣，嚣怨援背己，得书增怒，便发兵拒汉。马援上书刘秀献灭嚣之策，刘秀用之，亲自征，终于击溃嚣军。马援被任为太中大夫，不久，又任陇西太守。后调入京师任虎贲中郎将。马援善兵策，刘秀屡次召见，每有所谋，未尝不用。刘秀常说：“伏波论兵，与我意合。”马援因钦佩刘秀的“才明勇略”，又感其对人“开心见诚”，故归汉后始终死心塌地为之效忠。因马援屡立战功，为刘秀统一天下立了卓越的功勋，被任为伏波将军，封新息侯，成为东汉开国的名将。

### 冯异与刘秀难乐始终相共

《后汉书·冯异传》记载：冯异，字公孙，颍川父城人。好读书，通《左

氏春秋》、《孙子兵法》。异以郡椽监五县，与父城长苗明共守城，为王莽拒汉。刘秀为更始将，攻父城不下，驻兵于巾车乡。异到属县，为汉兵所捉。因在刘秀麾下任职的戚友的推荐，得召见。异说：“只用异一人，起不了什么作用，有老母在城中，愿归据五城，以效功报德。”刘秀称“善”。异归对苗明说：“今更始诸将多横暴，只有刘将军所到不虏掠。观其言语举止，不是庸人，可以托身。”苗明同意说：“死生同命，敬从子计。”刘秀南返宛，更始诸将前后攻父城的有十余次，异坚守不下；及刘秀为司隶校尉，道经父城，异等开门奉牛酒迎接。刘秀任异为主簿，一个从敌营来投效的人，留在身边掌管军事文书，刘秀确是推诚信人。冯异从此为之忠谋、奋战沙场。

刘秀自从哥哥刘縯被更始杀后，他表面上强作欢笑如常，但无人处，暗自哭泣，枕处常有泪痕。异知其哀情，加以劝慰。刘秀嘱说：“你勿妄言。”冯异趁便说刘秀道，“天下人同苦王氏，思汉已久。今更始诸将横行暴虐，到处虏掠，百姓失望，无所依靠。今公专管一方面，施行恩德。而有桀纣之乱，才见汤武之功；人久饥渴，易为充饱。宜急派官员到郡县，处理冤屈，赈济饥困。”光武照办，人心归之。异不仅有谋略，且善用兵，为刘秀屡立战功，但为人谦虚，行与诸将相逢，往往引车避道。诸将并坐论功，异独处树下，军中号称“大树将军”。由于冯异竭智尽力忠事刘秀而不争功，故甚得刘秀重视和信任。

冯异对刘秀是患难与共，百般关心。王郎占据河北称帝，刘秀率军进入河北攻击王郎，因天气寒烈，众皆饥寒，连刘秀也如此，冯异弄到豆，煮豆粥给刘秀吃。明晨，刘秀对诸将说，“昨得公孙豆粥，饥寒俱解。”有时遇大风雨，刘秀引车入道旁空舍避风雨，冯异捡柴，邓禹起火，刘秀燎衣，异复进餐饭。冯异对刘秀关怀如此。后刘秀称帝，冯异主管一方面军，有一次入朝见，刘秀对公卿说：“这是我起兵时的主将。他为我披荆棘，定关中。”朝罢，刘秀赐冯异珍宝、衣服、钱帛。诏说：“仓卒得萁亭豆粥，滹沱河餐饭，厚意久不报。”异叩头谢说：“臣听说管仲对桓公说：‘愿君毋忘射钩，臣无忘槛车。’齐国赖之。臣今亦愿国家无忘河北之难，小臣不敢忘巾车之恩。”这是说，管仲曾射桓公，后被捉得赦并得大用，齐得称霸；冯异也愿刘秀不要忘记争夺河北时受到饥寒之苦，他对刘秀的赦免、任用之恩也永世不忘。刘秀对冯异在患难之中的关怀是如此铭记于心！而冯异对刘秀的知遇之恩是如此感激！

刘秀对于冯异，即使有人进谗言，也开诚布公，始终信任。冯异任征西大将军时，大破赤眉军，威行关中，后又破公孙述军，功勋显赫。异认为久在外，恐被猜疑，便上书要求回朝廷，愿亲帷幄，刘秀不同意。后有人上章说“异专制关中，斩长安令，权威至重，百姓归心，号‘咸阳王’。”意在警告刘秀要有所戒备。刘秀便将此章送给冯异，异惊，上书解释，刘秀复诏说：“将军之于国家，义为君臣，恩犹父子，何嫌于疑，而有惊意？”后异来朝，数次召见，定议图蜀，留十余日，令异妻子随异回关中。后冯异率诸将进击隗嚣余众，攻落门时病发，死于军中。

刘秀与冯异君臣之间，就是这样始终患难与共，安乐同享，始终推诚信任。

## 八、文过饰非者难与共事

文过饰非的人，功归于己，过推于人，必然功过混淆，是非颠倒，虽然，功过能一时混淆，是非可一度颠倒，但终有澄清之日。而文过饰非的人，也许自以为高明，其实是愚人做蠢事，不仅误了事，也误己误人。对于这种人，人们将心有恐惧，敬而远之，不愿与之共事。秦昭王把被赵所败之罪归于白起，宋真宗将他与契丹结城下之盟的过错推给寇准，企图以此洗刷自己的耻辱，以抹煞白起的远见和寇准之功，历史昭昭，过岂能文，非焉可饰？！

### 秦昭王嫁罪于人白起遭冤死

《史记·白起传》记载：白起，善用兵，郿（今陕西眉县）人。事秦昭王。他屡战屡胜，战功赫赫，夺得韩、魏、赵、楚许多土地，因战功不断升迁，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公元前278年，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西北），被封武安君。

白起用兵善于忖时度势，灵活应用，变化无常，且能根据敌我双方情况，以少击众、以弱击强。楚当时是大国之一，地方千里，拥甲百万，白起却敢以数万之众深入楚地，直捣楚国都郢。郢是楚国都郢的西大门，郢城失守，郢将不保，故起先攻郢，楚集中大量精兵保卫。白起久攻不下，乃在郢城以西筑堰堤，拦截西长谷水，积水为渠，等水蓄到一定高度便下令决堰放水，滔滔洪水，遮地盖天而来，吞没了郢城，军民随波逐流，白起乘胜前进，以雷霆万钧之势占领了楚国都郢，楚王将国都迁往陈（今河南淮阳），以避其锋。秦以郢为南郡。在破赵括军的战斗中，更显示了白起的军事才能。先是，秦使王龁领兵攻赵，赵将廉颇初战不利，便坚壁以守，秦军数挑战，赵军不出。赵成王却数次派使责备廉颇畏敌怯战。秦相范雎使用千金派人到赵行反间计，说，“秦最怕是赵奢的儿子当大将，廉颇好对付，不久他会投降的。”赵孝成王对廉颇军数败，伤亡不少，坚壁不敢战非常不满，现又听了秦反间之言，便使赵括代廉颇为将以抗秦。其实包括是空谈兵书而无实战经验的人，用他为将正中秦人之计。于是，秦乃阴使武安君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副将，令军中有敢泄武安君为将者斩。赵括一到任，即出兵击秦，秦军佯败而走，赵括以为得胜，便猛追猛冲，一直打到秦军的中军之寨，而秦壁坚拒不得入。白起看到赵军已陷入埋伏圈，立即下令秦军主力发起反攻。在此之前，白起已派奇兵二万五千人插向赵军后方，以断其归路；另派奇兵二万五千人将赵军守寨中军与其进攻的军队拦腰切割。这时，赵军一分为二，使赵军首尾不能相顾，粮道也被堵断了。赵军战不利，便筑壁紧守，以待援兵。秦王当即调兵以阻击赵国的援军和掐断赵国的粮道。赵军断粮已有四十六天，军队互相杀食以充饥。赵括把部队分成四队，轮番冲击秦军，想脱围逃走，都不得逞，赵括便亲率锐卒搏战，秦军射杀赵括。赵军主帅死，四十万赵军向白起投降。白起恐赵卒叛变为乱，除让年纪较小的二百四十人回赵外，其余在夜间设计坑杀之。

赵、韩两国大惊，恐白起乘胜进攻，便派苏代带重金游说范雎说：“赵亡，秦国则称王，武安君就要当三公。武安君为秦战胜攻取七十余城，南取郢、郢、汉中，北灭赵括大军，虽周公、召公、吕望之功也不能超过他。今赵亡。秦王称王，武安君为二公，君能为他之下吗？想不为之下也不行了。

秦曾攻韩，围邢丘，困上党，上党之民皆反而归赵，天下人都不愿为秦民。今亡赵，北地入燕，东地入齐，南地入韩魏，则君之所得民无几何。故不如接受赵、韩割地以和，武安君则不能成其功。”于是，范雎对秦王说：“秦兵，已疲惫。请许韩、赵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秦王听之，割韩的垣雍和赵的六城以和。武安君知道了，由是与范雎“有隙”。

赵国被打败后，举国上下发奋图强，君臣励精图治，发展生产，增强国力，以期雪耻报仇。同时，派使臣携带重金，联络各国，结好燕、魏，联合齐、楚，共同抗秦。在这种新的形势下，白起对秦王伐赵持相反的意见。秦王因赵不肯割六城，愤而派王陵起兵攻赵邯郸，战少利，虽增兵，也不能取胜。秦王欲使白起代陵为将，白起说：“邯郸实不易攻，且诸侯救兵日多，而诸侯恨秦已久，必与之拼力。秦在长平虽破赵军，自己士卒也死伤过半。远离河山去争人国都，赵坚壁抗击于内，装侯攻其外，秦军必败。”白起表示不愿代陵为将。秦王又派范雎请之，白起终辞不肯行，遂称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将，围邯郸，不能拔。楚使春申君、魏派信陵君将兵数十万救赵，猛攻秦军，秦军多死亡。白起说：“秦王不听臣计，今果如此！”秦王听了很为恼怒，强令白起率兵征赵，白起以病重为辞。范雎请之，不起。于是，秦王免去白起职务，降为士兵，徙至阴密。白起病，不能行。秦王下令白起立即起行，不得再留在咸阳。白起只好带病起程，出咸阳西门十里，至杜邮。秦王与范雎等群臣计议说，“白起被迁徙，其意尚快快，有怨言。”秦王乃派使者赐之剑，令白起自杀。白起引剑将自刭，说：“我获何罪于天而至此？”良久，自答道：“我固当死。长平之战，赵卒降者数十万人，我用诈计尽坑之，我死有余辜。”遂自刎。《白起传》作者指出：白起“死而非其罪，秦人怜之，乡邑祭祀焉。”

白起在战前能预见其胜败，能胜则战，预见其败则坚决不战，他确是个卓越的军事家。秦攻邯郸之败，果如白起所预见，秦王如听白起之言，将不会被诸侯军所败。而其败责在秦王，秦王竟将其失败迁怒于白起，使其自杀，可见与文过饰非者共事，确是可怕！

### 宋真宗推脱己过寇准被撤职

《宋史·寇准传》记载，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准年少英俊，通《春秋》三传，十九岁，中进士。宋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罢去。有人教准加岁数，他答道：“准方图进取，哪能欺君。”在朝任职时，宋太宗召集百官言事，准极陈利害，太宗器重之，由转监铁判官升尚书虞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铨。尝在殿中奏事，语不合，太宗怒起，准便牵帝衣，令帝复坐，事决才退。太宗由是嘉之，说：“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征。”后为参知政事，加给事中。

宋真宗时任宰相。契丹常来侵扰，纵游骑掠深、祁间，小不利便退，徜徉无斗意。准说：“是在欺骗我。请练师命将，选骁锐据要害以备之。”不久，契丹果大举入侵，准因早做好御敌的准备，故不慌张，谈笑自如。同列告知真宗，真宗大惊，问准，准说：“陛下欲了此事，不过五日罢了。”因请真宗驾幸澶州。同列惊，欲退，准止之，令候驾起，真宗有难色，欲回内殿。准说：“陛下入则臣不得见，大事去了，请不要回内殿，立即起行。”真宗乃议亲征，召群臣问方略。

既而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他请迁都驾幸金陵；陈尧叟是蜀人，他请驾幸成都。真宗问寇准的意见，准知二人谋，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如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胜算在我。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入，天下哪能保？”遂请真宗驾幸澶州。

及至南城，契丹兵方盛，众请真宗驻蹕以看敌势。准固请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不是树威以决胜。且王超精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时，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进？”众议皆惊，准力争之，不决。准出遇高琼于屏间，对他说：“太慰受国恩，今日不有以报吗？”高琼答道：“琼武人，愿效死。”准复入奏事，琼随立庭下，准厉声说：“陛下不以臣言为然，可试问琼等。”琼即仰奏说：“寇准言是。机不可失，当起驾。”真宗始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将士望见御驾，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人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真宗尽以军事委托寇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敌数千骑乘胜攻至城下，宋军迎击，斩杀大半，契丹军退去。真宗回行宫，留准居城上，使人视准何为，见准方与人饮酒下棋，欢笑如常。真宗喜说：“准如此，我复何忧。”双方相持十余日，契丹统军挾览亲自督战，宋军用床子弩发矢，矢中挾览额，挾览死，契丹便奉书请盟。准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真宗欲许之。准欲使契丹称臣，且献幽州地。真宗厌战想和，又有人进谗言说寇准拥兵自重，准不得已才同意。真宗派曹利用到契丹军中议贡岁币事，说：“百万以下皆可许之。”准召利用于帷幄，对他说，“虽有皇帝敕，汝所许不能超过三十万，超过三十万，我要你的脑袋。”利用至契丹军，以三十万得成而还。打胜仗却向敌方贡币以求和，这真是大怪事！

寇准为相，用人不循旧例，贤者升不肖者退，同列颇不悦。后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准颇自矜澶州之功，真宗亦因此待准甚厚。曾主张迁都以避契丹的王钦若甚为妒忌。一日会朝，准先退，钦若对真宗说：“陛下敬寇准，是否因其有社稷功？”真宗说：“是这样。”钦若说：“澶州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说有社稷功，为何如此？”真宗愕然，问：“何故？”钦若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州之举，是城下之盟。以万乘之责而订城下盟，是最可耻的！”真宗愀然为之不悦。钦若说，“陛下听说赌博吗？赌者输钱欲尽，乃出所有以博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的孤注，是极其危险的。”真宗为遮己耻，便将“城下之盟”之过推给寇准，对准恩宠渐衰，终于将他罢相。

澶州之役的胜利，功在寇准。准早料契丹将大入寇，早就遣将派兵守备并做好迎击的准备，故当契丹入侵，他成竹在胸，不慌不忙，谈笑自若。他请御驾亲征助威，同列都惊而不同意，因他力排众议，力陈胜算在我之议，终于促成真宗亲征。在澶州打败契丹军，死其统帅。敌人才求和。寇准不同意，是欲让契丹称臣和交还幽州。而结城下之盟的却是真宗，当有人认为这是最耻之事时，却反归罪于寇准。然而历史的功过是非如此分明，真宗的文过饰非是徒劳的。

## 九、功高震主造成的悲剧

上下关系的好坏虽决定于利害是否一致，但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既决定于客观形势的发展，也决定于主观认识如何，因关系好要两相情愿，不能一厢情愿。即使在下者忠心耿耿以奉上，未必得到上的赞赏，也许是恰恰相反，这种例子在我国的“廿五史”中比比皆是。在历代王朝，君臣关系能善始善终的不多，尤其是开国功臣不被杀戮的更少见。韩信被汉高祖刘邦逮捕时悲痛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几乎是功臣的归宿。刘邦能创立西汉王朝，韩信、彭越、黥布是立下不朽的功劳的，没有他们的支持以及最后起兵与刘邦围困项羽于垓下，刘邦是不可能打败项羽的。可是，刘邦登上皇帝宝座后，为巩固刘家天下，便采取各种手段把他们杀了。

### 韩信是谋反抑是被冤杀

韩信之死，是谋反抑被冤杀，历来引起人们的争论。韩信手握重权可以三分天下时不反，却谋反于失势被软禁之后，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但是，《汉书·韩信传》却明明写着：韩信曾与陈豨谋内外起事，及陈豨反，刘邦亲自带兵去镇压，韩信“阴使人之豨所，而与家臣谋，夜诈赦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报。”据说韩信谋反被揭发，是因有人告密：“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这与《史记·淮阴侯列传》所记的是一样的。

据上所记，所谓韩信谋反是不能定案的：一、上告韩信谋反仅是口头揭发，跟上一次有人告韩信要谋反一样，都是既无行动，也无证据，而吕后用肖何计骗韩信入宫后，不经审讯立即斩了。二、韩信这时无兵无权，实际上是处在软禁之中，何以能“诈赦诸官徒奴”，即使办得到，这些乌合之众能“袭吕后、太子”吗？在此之前，已屡次发生谋叛事件，西汉王朝正在着手向功臣开刀，且刘邦出征在外，宫廷不会不作严密的防范，如果韩信真的如此行事，显然是以蛋碰石，自取灭亡，具有丰富战争经验的韩信决不会无知至此。三、吕后此女人心狠手毒，联系其诱杀彭越及刘邦死后拟尽杀众将之谋，她捏造事实以冤杀韩信是有可能的。四、韩信被斩前说：“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所诈”是说被吕后所诈害，“悔不听蒯通之计”，是说他悔不在有大权有强兵时反汉，可是他认识到这点时已经迟了。

当楚汉相争到关键时刻，韩信已灭燕、赵、魏、代和三齐，从侧面严重威胁着项羽的后方，他在楚汉之中举足轻重，故项羽极力争取他。《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项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韩信，指出汉王不可靠，韩信终将为其所擒，而“足下还没有被汉王所擒，因有项王尚存在。”他劝韩信“何不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之？”韩信谢说：“我事项王，官不过侍卫，言不听，策不用，故背楚归汉。汉王拜我为大将，统领几万大军，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我才得有今天。汉王如此深信和厚待我，我背之不好，虽死也不能这样做。”

武涉走后，齐人蒯通知天下之权掌握在韩信手里，便去说韩信，他首先分析了当时天下形势，指出：楚汉相争三年，彼此“智勇俱困”，民不聊生，

现在“非天下之圣贤不能治天下之祸”。而“当今两主之命在你的手里，你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但“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我认为以你的大智大勇，又拥有如此多的兵将，为民请命，怀诸侯以德，天下将风起响应。古语云：‘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请你深思啊！”最后强调：“你有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归楚，楚人不信；归汉，汉人震恐，你如果不用我的计，我真为你担忧。”韩信总认为汉王待他甚厚，不能做向利背义之事，终不忍背汉。

刘邦对韩信的赏识和恩遇，韩信对刘邦的忠心和报效，君臣际会，确是千古罕见。但随着形势和地位的变比，即刘邦得了天下登上皇帝宝座后，对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的韩信深怀恐惧，于是“狡兔死，走狗烹”的事正在进行，而韩信又不忍背汉，韩信之死是不可避免的了。

### 彭越的叛变纯属“莫须有”

韩信死后，又轮到梁王彭越。在楚汉战争中，他为汉立了大功，其功勋仅次于韩信，正因其功大，才被封梁王。由于他是异姓王，占有较大的地盘，拥有较强的兵力，不杀之，西汉王朝统治者是枕不安席的彭越反楚拥汉是最坚决的，始终如一。《汉书·彭越传》记载：秦末，百姓被繁重的赋役压榨得活不下去，彭越跟其他人一样纷纷逃入深山大泽中，铤而走险，“常渔钜野泽中，为盗。”陈胜揭竿起义，有人对彭越说：“各地豪杰相继反秦，你何不效法他们。”彭越说：“两龙相斗，且待之。”这是说，陈胜与秦正在搏斗，看看情况再说。一年多后，住在钜野泽的少年百余人去见彭越，要他为他们的头头，率众造反。他开始不同意，因诸少年固请才答应，并约定：明天太阳一出时要按时到，后到的斩。届时，迟到的有十余人，有的到中午才来。于是彭越宣布：“我年已老，大家强要我为头头。我既为头头，就要按法办事，约期而后到的多，不可尽杀，杀最后到的一人。”令校长斩之。诸少年笑说：“何至如此，以后不迟到便了。”彭越还是将最后到的一人斩了，设坛祭之，以号令所属。所属皆惊，畏越，不敢仰视。可见，彭越一开始聚众起事就严明军纪以御众，使众人畏而服他。于是，才率众占地，收诸侯散卒得千余人。

时任沛公的刘邦率军进攻昌邑，彭越起兵助之，还未破城，刘邦就奉义帝之命入关攻秦，唐项羽入关，封诸王，各引兵归封地。后汉王刘邦从蜀地下三秦，与项王争天下，这时，彭越在钜野泽聚众已有万余人，刘邦给他将军印，令他下济阴攻楚，他大破楚将肖公角。后从外黄率兵三万余归汉，与诸侯军东向击楚。彭越攻占魏地十余城。以后，在楚汉战争中，彭越深入项羽腹地，流动作战，神出鬼没地袭击楚军：他经常骚扰项羽的运输线，断绝其粮食及作战物资供应，使项羽往往因断粮而被迫撤军；或者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方法。有一次，项羽南征阳夏，彭越立即进军占领昌邑附近二十余城，得粟十余万斛，及时供应汉军粮食，使刘邦能在成皋继续坚持战斗。正因彭越能灵活运用游击战，使项羽被动挨打，疲于奔命，对刘邦的支持是巨大的。最后决战前，刘邦在固陵被项羽打败，在这关键的时刻，彭越与韩信等及时赶到，与刘邦围困项羽于垓下，大败楚军，逼使项羽自刎于乌江。

刘邦当皇帝后为巩固其家天下，杀了韩信后，正在找消灭其他异姓王的

借口，后来终找到了所谓“彭越谋反”的把柄。初，陈豨在代地叛变，刘邦亲往镇压，向梁征兵，彭越称病，只派将领兵前往参战。刘邦见彭越不来大怒，派人去责备彭越，彭越害怕了，想前往谢罪。其将扈辄说：“大王不亲领兵去参战，现在被责备了才去。去必被其所擒，不如起兵叛变。”彭越不听，但怕被擒，称病不去。梁太仆犯罪，彭越要惩办他，他便逃到洛阳向刘邦告梁王与扈辄谋反，这正中刘邦下怀，于是派使到梁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逮捕彭越，囚于洛阳监狱。有司论其罪时说“反形已具”。但刘邦只废彭越为平民，流放他到西蜀青衣县。彭越走到郑县时，恰遇到从长安去洛阳的吕后，便向她哭诉自己无罪，要求让他回到老家昌邑。吕后假装答应，便带他到洛阳。吕后对汉高祖刘邦说：“彭越是壮士，今流放到西蜀必遗后患，不如杀之。我已带他来了。”于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谋反。”刘邦同意，便把彭越杀了，并跟韩信一样遭到灭族之祸。

所谓彭越“反形已具”是不能成立的。而唐初的颜师古为《汉书》作注引各注本对此事的看法：“张晏曰：‘扈辄劝越反，越不听，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辄劝越反，而越不诛辄，是反形具也。’师古曰：‘瓚曰是也。’”显然，张晏的意见是对的。至于“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复反”，也没有说出事实，反正权在手，跟定韩信的谋反罪一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汉书·高后纪》称：吕后“佐高祖定天下”，其实在楚汉相争中，吕后一直被俘在楚作人质，至楚快要被打败时才被释放出来，如果说她“佐高祖定天下”的话，只能说是她帮助刘邦杀了韩信和彭越。

### 黥布除叛乱外别无选择

黥布虽也为汉立大功，但他与汉王的关系比不上韩信、彭越深厚，而黥布与韩信、彭越“功为一体”，且处境相同，彼二人被杀后，黥布侥幸独存是不可能的了，这时他只有二条路可走：一是束手待擒，一是发兵造反，黥布当然不择前者而择后者，因后者有希望取而代之。

黥布原是项羽的猛将。《汉书·黥布传》记载：黥布本不姓黥，而是姓英。秦以酷刑治民，无数人犯罪被刑，不杀的大多送往服劳役，黥布便是其中之一。他因受黥刑（在脸上刺字），故人们不称他英布，称他黥布。他被送到骊山为秦始皇筑陵墓。当时在骊山的劳工有数十万人，黥布因不堪奴役，便聚众逃亡，在“江中为群盗”。项梁起兵反秦，黥布率所部投其麾下，他所率的‘骊山之徒’最恨暴秦，故与秦军作战极其英勇，为诸军之冠。项梁败死，其侄项羽领其众，与诸侯军北救赵，使黥布先过河击秦军，屡战屡胜。项羽乃破釜沉舟，引全军渡河大破秦军，降秦主将章邯等。在击秦军时，黥布率军在前，以一当十，杀声震天，诸侯军无不怕服，由是诸侯兵都归属项羽。项羽取得如此辉煌战果，黥布功最大。项羽西向入关，也是黥布破关先入。而项羽在西安夜坑秦降卒二十余万，以及杀义帝等，也都由黥布去执行，可见黥布与项羽关系之深。因此，项羽入关后，封英布为九江王。

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如钢铁堡垒，坚不可摧；有时如鸡蛋，一碰就破，黥布与项羽的关系就是如此。反秦时，黥布拼命战斗，与项羽同心协力消灭暴秦，及楚汉战争，黥布就不那么积极支持项羽了。汉王刘邦下三秦后，诸侯纷纷叛楚，因齐王田荣叛变，项羽前往镇压，并向九江征兵，黥布称病，只派将领数千兵去。趁项羽伐齐，刘邦统诸侯军破项羽老巢彭城，黥

布见刘邦势大，持着观望态度，又称病不助楚。因此，项羽恨黥布，数次派使来召，布更害怕，不敢前往。刘邦知黥布与项羽有矛盾，便派随何前往淮南以利害说黥布，黥布果跟随何归汉。黥布到，刘邦因曾与黥布同时封王，为折服他，故意坐在床上洗脚时召见。黥布认为刘邦在侮辱他，大怒，后悔归汉，欲自杀。可是，刘邦为他安排的住处，以及饮食和从官人数，都跟汉王刘邦一样，是王的待遇，黥布又大喜过望。于是，死心助汉。他又诱楚的大司马周殷反楚归汉。项羽得力的谋臣猛将只有范增、黥布、龙且、周殷等数人，范增中陈平离间计愤而出走，龙且被韩信所杀，黥布、周殷降汉，余下的非妻即项氏的亲属，都是碌碌庸人，加上军心厌战，可以说这时项羽已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了。黥布乃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项羽于垓下。论功，刘邦封黥布为淮南王。

楚王韩信被杀，黥布心惊，接着梁王彭越又被杀，刘邦还把其尸体剁成肉酱遍赐诸侯，送到淮南时，淮南王黥布正在打猎，见肉酱，大惊，便决定谋反。因被人先告发，便提前发兵反。刘邦亲率兵镇压，在阵上望见布，说：“为什么要叛变？”布说，“想当皇帝罢了。”刘邦气得破口大骂，遂战，破布军。布逃亡，被人诱杀。在击布时，刘邦为流矢所中，回去病情加剧，不久也病死了。

## 十、善于两全其美的智者

刘邦打败项羽取得天下，是因文有肖何、张良、陈平为之辅助，武有韩信、彭越、黥布助其击楚。在战时，刘邦把他们视为左右手，可是在战后，刘邦与韩信等三个大将的关系却恶化，先后将之杀掉；而肖何等三个文臣与西汉王朝始终保持良好关系，不仅助其稳定政局，有的还为保卫西汉王朝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原因虽有种种，但跟他们善于避祸趋福也大有关系。

### 肖何想方设法避嫌疑

与刘邦关系最深，对西汉王朝功勋最大，要算是肖何。据《汉书·肖何传》与《汉书·高帝纪》记载：

肖何，沛人，跟刘邦是同乡，他任沛县主吏。刘邦少时无赖，数次有涉及刑法事，幸有肖何保护得以无事。刘邦当亭长时，也经常得到肖何的帮助，刘邦带民夫到咸阳服徭役，县里其他小吏皆送刘邦三百钱以资行，肖何独送他五百钱。可见肖何对刘邦的交情比别人深，刘邦对肖何多送他二百钱也念念不忘，他当皇帝后，论功封赏肖何时特多封二千户，以表示对肖何的感激。

陈胜起义，四方响应，这时刘邦已聚众数百人在芒砀山中，肖何派樊哙去招来刘邦，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杀了沛县令，拥立刘邦为沛公，肖何为丞督，专督众事。肖何是这次起义的倡议者和组织者，而刘邦这次起义成功对他后来的事业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肖何为刘邦立了极其重要的第一功。后来刘邦进咸阳，诸将都争夺金帛财物，肖何则只收集秦的律令、图书，这使刘邦集团“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为其争天下和后来治国提供了很有益的参考资料，足见肖何的眼光异于常人，总是从大处着眼。消灭暴秦后，刘邦被西楚霸王项羽封为汉王，迁蜀，项羽还将秦地三分，分封三个秦降将为王，使他们扼守秦川险处，以困住汉王使其不能东向。为打破这种局面，肖何向刘邦提出了重要的战略决策：“臣愿大王王关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汉王称“善”，封肖何为丞相。反来汉王能图天下，正是因执行了这个战略决策。刘邦同意肖何推荐韩信并设坛拜之为大将军后，于是定三秦，东向与项羽争天下。刘邦留肖何镇关中，让其便宜行事。肖何做好“养其民”的工作，把关中建成刘邦的牢固的根据地，汉王虽屡战屡败，由于肖何能及时补充兵卒，供应粮食，故能把战争坚持到最后胜利。刘邦当皇帝后。论功行封，因肖何“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对支持打败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故肖何功评第一。

肖何虽与刘邦是贫贱、患难之交，两人关系甚深，且在楚汉战争中功居第一，但不管是战时或战后，他从不恃宠欺人，以功自傲，而是始终谦虚谨慎，小心翼翼，协调君臣关系。刘邦与项羽相持于荥阳、成皋时，数次派使到关中慰劳肖何，鲍生对肖何说：“今上暴衣露盖在外作战。数次派使来慰劳你，是对你有疑心。为你计议，不如派能带兵的兄弟子孙到前线去，上就会放心了，将会更信任你。”肖何从其计，汉王大悦。后论功行赏，谈及肖何之功，刘邦就提到这事说：“诸君跟随我的，家属多的只有两三人，而肖何的宗族就有数十人随我在前线作战，其功不可忘。”刘邦率军镇压陈豨叛军时，听知韩信在关中谋反被吕后所杀，便派使封肖何丞相为相国，加封五

千户，又派一都尉领五百兵保卫相国。人们都向肖何祝贺，只有召平独吊，他对肖何说：“祸从此生了。上在外作战，你守于内，没有矢石之功，却益封户增卫队，这是因韩信在内谋反，上怀疑你。现在派卫队保护你，并不是宠爱你，请你让封户勿接受，要以家中私财佐军用。”何从其计，刘邦才放心。刘邦统军伐黥布叛军时，也数次派使到关中问“相国在干什么”，有人对肖何说：“你族灭不久了。你任相国，功又第一，已无可再封。你初入关时，就得民心，你在关中十余年尽力为民谋利，百姓都拥护你。正因你得人心，上对你怀疑，所以数次派人查问你在干什么，实是怕你在关中反。你何不多强买民田宅，使上知你贪财就会失民心，他就可以安心了。”于是肖何从其计；刘邦知道肖何强买民田宅，知他不收买人心，不会有大作为，心里很高兴。刘邦从前线回关中时，有民数千遮道告状，说丞相强贱买民田宅。肖何去拜见刘邦，刘邦笑着说：“相国做利民好事！”便把民的告状都交给肖何，说，“你自己去处理好了”。

强买民田宅，仅是肖何避疑权宜之计，其实肖何是尽力为国为民办事的。他见长安地少，而上林苑（皇家花园）却占有大片土地，太浪费了，便向刘邦建议：让民去耕种，刘邦听了大怒说：“你接受商人财物，却来请要我的花园！”便把肖何抓起来送进监狱。王卫尉侍侯刘邦时，乘便问：“相国有什么罪，陛下将他关在监狱。”刘邦说：“我听说李斯相秦皇帝时，有善归上，有恶归己。今相国多受商人金却来请要我的花园，以取悦于民，以显示我占有花园之过，所以我要惩治他。”王卫尉说：“有便于民的事而请之，这是宰相的事，陛下怎能疑宰相受商人的金呢？楚汉战争数年，以及陈豨、黥布反时，陛下率军征伐在外，当时相国守关中，如他有异心，关西不会是陛下的了。相国不在那时取大利，现在会贪商人的小利吗？李斯不让秦皇帝知道自己的错误所以秦亡了，李斯将恶归己是不值得效法的。陛下为何这样毫无根据地怀疑丞相？”刘邦听了感到愧悔，当即派人去放出肖何。肖何年老，为人素谨慎，便光着脚步行入宫向刘邦谢恩。刘邦说：“相国回去休息好了。相国为民请花园，我不许，这是桀纣王的行为，相国是贤相。我故意把相国抓起来，使百姓知道我的过，显示相国之贤。”刘邦这么说，既遮掩了自己处理丞相的错误，也为自己说好话。表明他这么做是为了赞誉丞相，以免肖何心怀怨望，使两人关系有所芥蒂。

肖何虽然善于协调关系，但不可能把任何关系都搞得好。他与曹参同是刘邦起义的首发难者，在汉建国评功时，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却评肖何第一，曹参不服，对肖何有怨，因此二人关系不好，但肖何不因私人关系不好而对曹参说坏话。肖何病重时，当时继位的孝惠帝来探问，说：“丞相百岁后，谁可继位？”肖何说：“知臣莫若主。”孝惠帝说：“曹参如何！”肖何叩头说：“帝得之了，臣死不恨了！”曹参任丞相三年，他不因与肖何关系不好，对其所为有所更改，而是“肖规曹随”，百姓歌之：“肖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

### 张良明哲保身的妙策

张良是汉高祖刘邦所赞“三人杰”之一，他认为能用这“三人杰”，才能取得天下。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说，“上（指刘邦）曰：‘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

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一个“貌如妇人好女”的人，竟能辅佐汉高祖开创西汉帝国，确是不能以貌取人。

张良的祖父、父亲都为韩相，秦灭韩，他决心散家财为韩报仇，他求得一力士，为其制一重一百二十斤的铁椎，两人埋伏于博浪沙中，待秦始皇东游经过时，刺客突起用铁椎击其乘车，但误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索天下，而张良已逃得无影无踪。这时，张良更改姓名，藏匿于下邳，交结豪杰，伺机起事。陈胜起义，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本往投在留地举事的楚假王景驹，因途中遇见到下邳占地的沛公刘邦，二人谈得投机，便为刘邦效力。张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张良随沛公刘邦入关攻秦，南阳守将败后走宛城，沛公想绕过城西向，张良谏说：“沛公急欲入关，但秦兵还多，拒险而守。今不攻破宛城，其守将从后击，强大的秦军在前，两面夹攻是很危险的。”于是与沛公设计约降宛守将，封为殷侯，才引兵西向。秦人知沛公优待降将，所至无不投降。沛公入关后，见豪华的秦宫及无数美女，被迷住了，想住在秦宫里享乐。樊哙谏，沛公不听。张良入见沛公说：“秦无道，沛公才得到这里，为天下除残暴，要反秦之道而行之。今始入秦，就安于淫乐，这是‘助桀为虐’。‘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的话。”沛公才回军霸上。项羽到鸿门，见沛公驻军霸上，拟击沛公。是时项羽兵四十万，沛公兵十万，彼此力量悬殊，胜负已明。项羽叔父项伯与张良是老朋友，不忍张良死于兵刃，夜往见之，促其速离。张良说：“沛公危急，离去不义。”便将这一情况告知沛公，并进计使沛公和项伯结义连姻，请他向项羽说：“沛公不敢背项王，所以派兵守关是为防备它盗”，还使沛公亲到鸿门拜见项羽，澄清“误会”，从而演出了“鸿门宴”，使沛公及其军队幸免于难。沛公刘邦被封为汉王，入蜀时，张良还说汉王烧绝栈道，以示无东向之意，项羽因之无西顾之忧，沛公能入关和摆脱被消灭的危险，张良是有大功的。

在楚汉战争，张良也立了不朽的功勋，汉王下三秦，趁项王伐刘，彭城空虚，汉王率诸侯军破彭城，项王回兵大败汉军。汉王至下邳，张良向汉王献破楚之策：九江王布是楚的枭将，现与项王有矛盾，可使人说其背楚归汉；令彭越在楚后方，流动作战，断绝楚粮道；由韩信独当一面，消灭归属项王的北方诸王，从侧面威胁项王。汉王执行此策，给予项王致命打击，终于破楚。在项王围困汉王于荥阳时，汉王与酈食其讨论如何削弱项王的势力，酈食其建议封六国后以壮大反楚势力，刘邦称“善”，叫酈食其刻印去分封。酈食其还未行，张良适从外来见汉王，汉王将此事告知张良，张良指出行此事有“八不可”之后，认为立六国后将士各归其主“陛下焉得而臣之？”“如用此谋，陛下事完了。”刘邦这时正在吃饭，立即停止，气得将口中的东西都吐出来，骂道：“竖儒，几败乃公事！”立即令销毁了封六国后的印章。汉王追项王至阳夏南，因征诸侯兵不到，被项王打败，只好坚守困陵。汉王对张良说：“诸侯不从，奈何？”张良献计说：“诸侯不来，是因没存封地。如能把睢阳以北到谷城的土地封彭越为王，把从陈县以东到海滨的土地封韩信为王，使各自为战，楚就可打败了。”于是汉王分别派使去封韩信、彭越为王，二人立即引兵前来，会师垓下，打败了项羽。

从入关破秦到与项羽争天下，刘邦每处于危急关头，都有赖于张良的奇谋深策，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因此，张良被列为开国功臣，封为留侯，但他幸运的是，没有遭“敌国破，谋臣亡”之祸，不仅得到刘邦的信任，也得

到吕后的尊敬。而张良能以奇谋深策帮助刘邦图天下，与西汉统治者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与他善于处理好人际关系大有关系：

张良行刺秦王未遂藏匿于下邳时，“有一天在桥上散步，有一穿麻布衣的老人行近张良时，故意把鞋丢到桥下，命令张良说：‘小伙子下去给我取鞋！’张良听了很不高兴，想教训他，因见其老，强忍住气，下桥去取鞋。老人伸着脚，说：‘给我穿上！’张良已为他取鞋，只好跪着给他穿上。鞋穿好了，老人笑着走了。老人走了一会儿又回来，说：‘小伙子可教。过五天天黎明，到此与我相会！’张良觉得奇怪，跪着说：‘诺’。张良到时去老人已先在，怒说：‘跟老人约为何迟到，回去！过五天要早来相会！’约定那天，雄鸡一叫，张良就去，老人又先至，复怒说：‘为何又迟到，回去，过五天再早来！’届时，夜未半，张良便去，一会儿，老人才来，高兴地说：‘应该这样！’拿出一本书交给张良，说：‘读这本书则可为王者师了，十年后你会功成名遂，再过三年你将在济北见到我，谷城山下那块黄石就是我。’老人不再说什么便走了，不再相见。天亮了，张良看其书，方知是《太公兵法》。张良知是奇书，便日夜诵读。”老人可能是一个有学问的隐者，为传其书，故意多次考验张良，后认为“小伙子可教”，才传此书。张良因尊敬老人，又有很强的忍耐性，受老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指使和责备而始终听命，才得传《太公兵法》，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足智多谋的兵谋家。

张良功成名显后并不如一些人一样，计较地位，汲汲于富贵，而是急流勇退。这是因他看到当时跟他一起为西汉王朝建大功的韩信、彭越、黥布等一个个被族灭了，使他认识到“伴君如伴虎”，智如张良不能不萌明哲保身之念，便宣称：“我的祖、父都为韩国相，韩国灭，散万金家财，寻求刺客向秦报仇，事虽不成，已引起天下震动。我以三寸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我的愿望已满足了。愿弃人间事，从仙人赤松子游。”于是自请告退，学道引，欲轻身飞升。刘邦见他“六尘不染”，当然不会想到他会谋反，张良也就得以自乐其道以保其身了。

但是，张良并没有成仙，仍住在帝都，对朝廷大事他不可能都置身度外。汉高祖认为太子盈为人仁弱，不像他，而其宠爱的戚姬生的儿子如意像他，要立如意代太子，说“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太子是吕后所生，知高祖要废太子很害怕，不知怎么办好，便派人去向张良求教，这使张良感到两头为难，高祖意已决，触犯他会得罪高祖，不理吕后也怕她不满，于是想出一个计策，教吕后令太子派人去恭请东国公、绮里季、夏黄公、角里先生来辅佐。因四人义不为汉臣，逃匿山中，高祖很敬重此四人，求之不得，有此四人辅佐，可以提高太子身价。于是太子便卑辞厚礼迎来四人。有一次高祖欢宴，太子侍候，四人从太子，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高祖怪而问：“你们是做什么的？”四人上前，各言名姓。高祖大惊说：“我求公等数年，公等逃避我，现在公等为何从我儿呢？”四人皆说，“陛下轻士喜欢骂人，臣等义不受辱，故恐惧而逃匿。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愿为太子死者，故臣等来从太子。”高祖说，“烦公等营护太子。”四人祝寿后便离去。高祖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着四人说，“我欲易太子，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了。”戚夫人哭泣。高祖说：“你为我跳楚舞，我为你唱楚歌。”歌曰：“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当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高祖一连唱了数次，便罢酒离去，于是，不易太子。这是张良设计召来四人辅佐太子之故。因此，吕后十分感

谢张良，她见张良学辟谷，强他恢复正常饮食，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何必自苦如此！”张良乃饮食如故。尽管吕后杀其他功臣心毒手狠，对张良却格外关心，人与人的关系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

### 陈平以权变保身保国

《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少时家贫，但喜读书和善交游，抱有大志。秦末，天下大乱，他初事魏王咎，不用其计，投项王也不被信任，乃归汉。刘邦任他为都尉，参与做军队的人事工作，老将周勃、灌婴等很有意见，说：“陈平外表上是个美丈夫，内则未必。听说他曾盗其嫂。现在他掌管军职的选用，常受诸将的贿赂，金多的得善职，金少的得劣职。这种人不能重用。”刘邦便责备其介绍人魏无知，无知说：“臣推荐陈平，是因其有才能，陛下现在所责备的是他的德行。今有尾生、孝己的德行，无益于图天下，这种人对陛下有什么用处呢？楚汉相争，臣推荐奇谋之士，这要看他对汉有利与否。即使盗嫂受金又有什么关系呢？”刘邦召陈平来责备说：“先生先事魏，又事楚，今又归我，是否多心？”陈平说：“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信任人，其所任和宠信的，不是其族人就是妻的兄弟，虽有奇士也不能用，平乃离楚。听说大王能用人才归汉。臣来时一无所有，不受金何以为活。臣的计策可采用的，愿大王用之，如果无可用的，金还在，可归还，让臣离去。”刘邦认为他说得对，对他表示歉意，厚加赏赐，拜为护军中尉，负责军职的选任的工作。

陈平确有奇计，他不仅能将楚君臣关系分化瓦解，严重削弱楚军的力量，且在刘邦处于绝境时能使他转危为安：

楚绝汉粮围汉王于荥阳城，汉王请割荥阳以西以和，汉王求计于陈平，陈平说，“项王为人，恭敬爱人，士之廉节好礼的多归之。对于有功的人，却舍不得给官封地，士人因此多不归附。大王虽对人傲慢无礼，廉节的士人不肯来，但大王能给人官职和土地，寡廉无耻之徒为贪利多归汉。如果能各去其两端，用其两长，天下不久则可定。不过，大王侮慢人，不可能得廉节之士。项王骨鲠之臣不过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数人罢了，大王舍得出数万金，行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关系，使其互相怀疑，项王这人容易信谗言，必然发生内讧，汉乘而攻之，必能破楚。”汉王也以为然，便拿出黄金四万斤给陈平，任由他使用，不过问其开支。于是，陈平散金行反间计于楚军，扬言钟离昧等将功虽多终不得分地封王，他们跟汉勾结，欲灭项氏以分封其地。项王一听谗言便信为真，不再信任钟离昧等将。项王派使到汉，汉王按照陈平计，摆丰盛的酒宴招待，见是楚使，佯惊说，“我以为亚父使，原来是楚使！”便撤去酒宴，叫拿粗茶冷饭给楚使食。楚使归，将此事报告项王。项王果大疑亚父。亚父欲急攻下荥阳城，项王不信，不肯听。亚父知项王疑他，发火说：“天下事已定，君王自为之！愿让我保存骸骨归去！”亚父归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因项王不听亚父计，使陈平得从容布置解围，在夜间派出女子二千人出荥阳城东门，楚军击之，陈平便与汉王从西门偷偷地溜走了，回至关中，收散兵复东向与项王争天下。

前200年，汉高祖率兵镇压韩王信，在平城为匈奴所围，粮已尽，七日不得食，危在旦夕。史称：“高帝用陈平奇计，使说单于阏氏，围得以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据桓谭《新论》说：“陈平往说阏氏，说

汉王被困急，已派人回去迎取一天下最美的女人给单于，单于见此美女必宠爱之而疏远阼氏，不如说单于让汉王得脱围回去，就不会迎美女来了，阼氏果往说单于，汉王才得解围。”桓谭所说，是推测，还是事实，不得而知。但匈奴围得如此困急，不经战斗而脱去，没有奇计是不可能解围的。

陈平为汉王六出奇计，六次增加封邑，因其计秘，没有都公开。

陈平的奇计，还体现在：他善于权变，不仅保身也保国。当他离项王渡河往投刘邦时，船人见他是美丈夫且独行，疑是逃亡的将领，腰中心藏有金玉宝器，注目看他，欲杀之，陈平知其意，立即脱光上衣帮助摇船，船人知其无有，才不下手，陈平得免于死。燕王卢绾反，汉高祖派樊哙领兵去镇压。有人说樊哙坏话，汉高祖正在病重以为樊哙在他死后有异志，用陈平谋召周勃受诏于床下，令他两人急到樊哙军中，由周勃代樊哙，陈平到军即斩哙头。陈平认为樊哙是吕后妹夫，高祖的旧交，功多，有亲且贵，高祖一时发怒要斩他，恐后悔，这对己不利，于是到哙军后，令周勃代将兵，将樊哙囚送回长安，由高祖杀之。同时，适高祖病死，如果陈平按高祖意去斩樊哙，陈平将得罪吕后，可能受到报复。可见陈平处理问题是很权变的。又如吕后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说：“不可！”问陈平，陈平说：“可。”吕后便废去王陵右丞相职，以陈平代之，任审食其为左丞相。审食其是吕后的情夫，及为相，军国事都包揽处理，陈平便日饮美酒玩女人，不管事。吕后妹吕嬃因高帝用陈平谋逮捕樊哙怀恨于心，便向吕后进谗，陈平听到了更纵情享乐。吕太后知道了心里很高兴，因陈平不理事，其情夫则可独擅大权，实际权尽归己。吕太后当其妹吕嬃面对陈平说：“俗话说‘儿妇人口不可信’，看你对待我怎样，不必害怕吕嬃进谗言。”陈平一切顺着吕太后，但他是向汉的，及吕太后死，陈平便设谋与周勃等杀诸吕，立孝文皇帝。

## 十一、忠于谋国不顾身的人

商鞅、晁错都是善于谋国而不善于谋身的人，他俩都因被人陷害而致死。

### 秦惠王车裂商鞅以报私怨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原姓公孙，名鞅，后被秦孝公封为商君，故人以此名，也称商鞅。鞅少时好“刑名之学”，在魏国相公叔座手下当个中庶子（掌管公族事）的小官，公叔座很重视其才，准备推荐。当魏惠王来探望其病时，公叔座推荐公孙鞅说：“座的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默默不语，公叔座知其不许，便说：“王如不用鞅，必须把他杀掉，不要让他出魏国国境。”王佯许之而去。公叔座派人叫鞅来，对他说：“我向王推荐你为相，王默然不语，显然不许我。因对王说不用鞅当杀之，王答应了。你可赶快逃走，不然将被抓了。”鞅说：“王不用君之言任我，哪能用君之言杀我呢？”公孙鞅没有逃走。果如公孙鞅所料，魏惠王从公叔座家回去对左右说：“公叔座要我任公孙鞅为相，他是病重说乱语，真荒谬！”既认为公叔座是在“说乱语”，当然不会听他的话杀公孙鞅。可见公孙鞅临事不乱，不因听说公叔座叫王杀他而仓皇出逃，是很有见识的。而魏惠王不听公叔座之言，给魏国带来了很大的灾难。魏惠王后悔时已经迟了。

公叔座死后，公孙鞅听说秦孝公求贤，便入秦国，通过孝公宠臣景兰得以求见。公孙鞅第一次以帝道说之，他没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二次以王道说之，也不中意；第三次以霸道说之，孝公大悦，便以公孙鞅为左庶长（秦国是二十等爵，左庶长是第十级，掌握军政大权），实行变法。其主要内容是：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发现奸情不告发的腰斩，告奸者与斩敌人首级一样得到奖赏，匿奸者跟投降敌人一样惩罚。民有二个以上成年不分居的，加倍其赋税。有军功的，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为私斗的，按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处罚。凡努力耕织能多打粮食、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没收为官奴。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爵秩。变法令未公布前，为取得人民对国家法令的信任，他采取了这样的一个措施：立一三丈高的木置国都市南门，下令说：“谁能将之徙置到北门，给他十金。”老百姓见而怪之，没人敢去做。又宣布说：“能徙者给予五十金。”有一人把木徙置到北门，果给他五十金，以表明政府说的话算数。于是，公孙鞅才下变法令。

变法令开始实施时，因循守旧的人意见很多，纷纷反对，太子便是其中之一，他带头反对新法，因而触犯了刑法。公孙鞅说：“法之不行，是因自上犯之。”便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子两个师傅受到严厉的处罚，从此秦人不敢违法，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国日益富强。过去魏强秦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为魏国所控制，340年公孙鞅率兵攻魏，打败魏军，魏被迫割河西之地于秦以求和，魏只好东迁，秦得东向以制诸侯。公孙鞅因功，得商十五邑封地，号为商君。

商君得到秦孝公的信任，得施其法，位极人臣，但得罪于太子及其师公

子虔等，如秦孝公死太子继位，商君前途可想而知，故明智人都知其将来处境危险。有一个名叫赵良的，过去曾跟商君相识，便去说商君，劝他功成身退，让位给他。指出他为秦变法，积怨甚多，其处境“危若朝露”，如果秦王一旦死去，其“亡可翘足而待。”商君不听。果如赵良所预料的，过了五个月，秦孝公死了，太子继位，称秦惠文王，被黥后杜门不出达八年的公子虔便以“谋反”罪名控告商君，派兵去逮捕商君，商君想逃，但投奔无地，终被秦军抓获，秦惠文王用最残酷的刑法“车裂”商鞅。

## 汉景帝斩晁错以“息”七国之乱

君臣关系是极其复杂的。“一朝天子一朝臣”，受到先帝宠信的，其太子继位后大多得不到信任，有不少还遭到杀害，前面所谈的商鞅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商鞅即使不得罪秦惠文王也得不到任用，何况他与之结怨呢？商鞅被杀是必然之事。但是，得到当朝皇帝的宠信也未必免于祸，汉景帝刘启还是太子的时候，晁错便是他的臣属，他很佩服晁错的才能，彼此关系极其亲密，可心说是刘启的心腹。刘启当上皇帝后，对晁错是言计听从，倚为左右手。可是，汉景帝为“息”七国之乱，竟把他杀了，确是：伴君此伴虎！

《汉书·晁错传》记载：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曾向张恢学习法家申不害和商鞅的学说，他也很有文学才华，文章写得很好。他任太常掌故（负责祭祀的小官）时，当时只有原秦博士伏生懂得儒学经典《尚书》，他住在齐，年已九十余，汉文帝便派晁错去齐向伏生学习，他学习回来后上书讲述其所学，得到文帝的赏识，被先后任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博士等职。这时，他写了《言太子宜知术数疏》，文帝称“善”，升为太子家令。他还对当时军国大事发表意见，提出建议，如向文帝上《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贵粟疏》和《举贤良对策疏》，得到文帝的赞许，把他由太子家令提升为掌管议论政事的中大夫。此外，他还上书论宜削诸侯事以及改革事宜，书凡三十篇。文帝对削诸侯事等虽不听，但奇其才，太子则很赞许他的计策。

汉文帝死，太子刘启继位，称汉景帝。景帝任晁错为内史（京师长安的行政长官）。晁错数次晋见景帝言事，景帝都听从，法令多有更改，晁错的宠幸超过九卿。丞相申屠嘉对晁错得到宠幸及其所作所为很有意见，但无力中伤之。内史府座落在太上庙外面的空地上，从东门出入很不方便，错便开门南出，凿通了太上庙外面的围墙。申屠嘉大怒，欲以此过奏请诛错。错知道了，先与景帝说明情况。丞相向景帝奏事，因言错凿庙墙为门，请送廷尉处死。景帝说，“此非庙墙，是庙内空地上的围墙，没有犯法。”申屠嘉回去对长史说：“我当先斩才奏，因先请致误事”。一气之下，发病不起死了。晁错因此更显贵。

汉景帝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他向景帝上《削藩策》，建议凡诸侯有罪过的削其支郡。奏上，景帝令公卿列侯宗室议论，他们不少人虽有意见却不敢说，只有窦婴（窦太后的亲戚）公开反对，由此与错结怨，晁错更改了法令三十条，引起诸侯震动，强烈反对。晁错的父亲知道了，特从颍川跑来，对错说：“皇上才即位，你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引进怨恨，这是为了什么？”错说：“应当这样做。不如此，天子不尊，国家不安。”他的父亲叹气说“刘氏安了，晁氏危了，我还是离开你回去吧！”这位老人一到

家就服毒自杀。临死前说：“我不忍见祸及身。”事情的发展，果如其父所预见。

晁错的削藩主张得到汉景帝的全力支持，为何竟因此而致祸呢？这是因遭到诸侯与其政敌强烈反对，并竭尽心思找晁错的罪过：一是将“吴楚七国之乱”归罪于晁错的主张削藩，二是挑拨晁错与汉景帝的关系，而造成晁错之死主要还是汉景帝从其本身利害出发，对当时“吴楚七国之乱”的本质认识不清之故。

汉景帝开始削藩不久，吴楚七国就公开叛乱。七国散发的书信，以“清君侧”为名，攻击晁错“侵夺诸侯封地，专以劾治污辱诸侯为事，不以诸侯人君之礼待刘氏骨肉，所以要举兵诛之”。其政敌窦婴、爱盎也以此合谋诬害晁错。因窦婴言爱盎知吴国事，汉景帝召他入见，当时晁错也在座。景帝问道：“你尝为吴相，今吴楚反，你看法怎样？”爱盎说：“这不足忧，一定能打败之。”景帝说：“吴王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豪杰，其蓄谋叛变已居。如今他头发都白了，其计不百全是不会起兵的，你为何说他无能为力呢？”爱盎说：“吴国铸钱、煮盐获利是有的，但哪有豪杰为他所诱呢！即使吴招得豪杰，会辅其做正当的事，是不会促使其叛变的。吴所诱的都是无赖子弟，以及私铸钱币的亡命之徒，所以互相勾结作乱。”晁错插话说：“你有何善策。”景帝接口问爱盎：“计将安出？”爱盎说，“请叫左右退出。”景帝叫左右退下，独留晁错，爱盎说：“臣所说的，人臣不得知。”景帝才叫晁错离开。晁错退到东厢，心中十分痛恨。这时，爱盎才说：“吴楚宣称，高皇帝分封给王子弟封地，今贼臣晁错擅自削夺其地，所以起兵共诛晁错，如恢复原有土地就罢兵。为今计，只有斩错，派使赦免吴楚七国，恢复被削夺的封地，则兵可不血刃而俱退。”景帝默然良久，说：“如果能如此，为安天下，我不会爱惜一人。”景帝为了保其帝位，天真地以为杀了晁错，七国就会退了。

景帝下决心杀晁错，还由于他中了晁错政敌的离间计所致。吴楚七国叛变，景帝与晁错商议出军事，晁错主张景帝亲自率军镇压叛乱，他留守长安。晁错本意是为公，并非为私，因为吴楚七国之主皆亲王，皇帝亲自讨伐才名正言顺，易于平息，何况吴楚叛乱牵涉面广，如委派不得力将帅，那将会出问题。晁错因己是景帝信任的宠臣，自己留守则后方无虞，可是其政敌借此给予晁错致命的攻击，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等大臣弹劾晁错说：“吴王反逆无道，欲危宗庙，天下人当共诛之。今御史大夫晁错议曰：‘兵数百万，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居守。徐、僮之旁所未下者可以予吴。’错不颂扬陛下德信，却欲使之疏远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给吴，这是无臣子礼，大逆无道。晁错应斩，其父母妻子不论老少都要杀。”景帝竟批准：“可。”这时晁错还蒙在鼓里，景帝派中尉召错，错穿着朝服以为景帝有事召见，可是经过长安东市时，竟被腰斩。

从刘启当太子到当皇帝，晁错都忠心耿耿地辅佐为之竭智尽力，君臣两人关系亲密无间，有如鱼水关系，晁错当时是汉景帝的宠臣。晁错建议削藩，正如他自己所说：“不如此，天子不尊，国家不安。”可是任何关系都是利害关系，有利则合，有害则分，由于景帝对利害做了错误的判断，竟昧着良心，把始终忠于己的宠臣腰斩了。

晁错被斩后，从前线回来的校尉邓公向景帝汇报军情。景帝问：“晁错死了，吴楚罢兵吗？”邓公说，“吴蓄反已数十年，为削他的封地而早反，

诛错不过是借口，其意不在晁错一人。杀了晁错，臣恐天下之士从此钳口不敢为陛下言事了。”景帝问：“为什么呢？”邓公说：“晁错担心诸侯强大控制不了，故主张削藩，使中央权尊，这是万世之利。削藩才开始，晁错竟被杀，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认为陛下这样做是错误的。”于是，景帝喟然长叹说，“你说的对，我亦后悔了？”当时天下祈盼太平，吴楚等七国之乱是不得人心的，经周亚夫等名将镇压，不到三个月便平息，七个叛王不是被杀便是自杀。晁错削藩之功在于：从此，诸侯王力量大大削弱，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书》作者赞曰：“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

## 十二、媚上保富贵下场可悲

如果说商鞅、晁错善于谋国不善于谋身，对于李斯、杨素来说，艰难以“善”或“不善”之类字眼来绝对断定其谋国、谋身，只能说他俩既善于谋国、谋身，也不善于谋国、谋身。李斯、杨素都很有才智，但其人生的宗旨是为了富贵，遇着开国明君，能顺着历史发展的潮流，时势造英雄，故都能充分发挥才智，协助明君统一天下，成为开国功臣。而其之所能如此，求富贵是其推动力。之后，他俩遇着的继位者都是暴君，为了保富贵都极力媚上取宠，顺着暴君的意志去办事，且都因功高而遭到猜忌，造成的后果基本一样：李斯是亡国亡身，杨素促隋速亡，不早死会族诛。商鞅、晁错虽不得善终，人赞其忠；李斯、杨素同样没有好结果，却被视为卑鄙小人。

### 李斯迎合二世身亡国破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少时，任郡的小吏。他在吏舍厕所中常见鼠吃人粪，一见人或狗，就吓跑了。但李斯见到的仓中鼠则不同，自由在地食积粟，他们住在仓中，没有人犬之忧。于是，李斯有所感慨地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这是说，人的富贵或贫贱就好像鼠一样，看他是否居得其所。要求富贵要有本事，李斯乃辞去小吏到齐国拜荀卿为师，向他学帝王之术。学成，李斯从鼠的不同处境中得到启示，要想有所作为，就要选择一个能发挥自己才智的国家。他认为六国皆弱，难于建立功业，只有入秦才有作为。他向荀卿拜辞时说：“干事业要抓紧时机，今各国争雄，正是游说得用之时。现在秦王为吞天下，广招人才，是游说者立功成名的大好机会。耻辱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处于卑贱之位，困苦之地，却讥世而恶利，以自鸣清高，实是无所作为的人自我解嘲，这非士人的本意。所以，学生将西向说秦王。”

李斯到秦，初为秦相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为郎，因得亲近说秦王。他分析当前秦强六国弱，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一样容易，建议秦王要抓紧“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万世难逢的机会。同时以金玉离间诸侯君臣关系，不肯者，以利剑刺之。秦王用其计，封李斯为客卿。因郑国间谍案件，秦王听从秦群臣的意见下逐客令，李斯亦在被逐之中。李斯便上《谏逐客书》，指出秦穆公、秦孝公、秦惠文王、秦昭王四代都因任用客卿，秦今天才强大。如果逐客，天下之士虽想为秦效忠也不敢来。这实是孤立自己，加强诸侯的力量，“求国无危，不可得也。”此书情意恳切，文词并茂，说服力强，秦王乃取消逐客令。逐客与否是秦能否统一中国的关键所在，事实上秦王时的客卿如李、茅焦、尉繚、王翦、李斯、王贲、李信、王离、蒙恬等，对秦的统一天下起了巨大的作用。秦王统一天下后称始皇，为巩固秦的统治，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他还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以法为师，以统一思想。但这也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功劳卓著，故得到始皇的信任，封为丞相。这时，他为天下立了功，得了富贵。可是秦始皇死后，他为了保富贵，与胡亥、赵高勾结一起，结果不仅富贵保不了，自己的脑袋也不能保，并促进了秦的速亡。

秦始皇出游至沙丘病重，临死前，令赵高写信给在上郡蒙恬军任监军的

长子扶苏说：“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显然，其意由长子扶苏继位。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便死了。时随始皇出游的有子胡亥、丞相李斯和赵高，但书及皇帝玺在赵高手中，赵高与胡亥密谋夺位，便不发书，但没有丞相同意事难成，赵高便往说李斯，他先是试探说：“皇帝死前，给长子书，要他与丧会咸阳后继位，书还未发出，皇帝已死，没有人知道此事。所赐长子书符玺都在胡亥手里，由谁来继位，由丞相与高决定。”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赵高便从侧面质问李斯：“丞相自料比蒙恬怎样？功高比过蒙恬吗？谋远不失比过蒙恬吗？无怨于天下比过蒙恬吗？跟长子的关系深且得到信任比过蒙恬吗？”李斯说：“此五者皆不及蒙恬。”于是，赵高进一步说：“高任内官二十余年，未见秦的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的，结果都被杀戮。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即位必用蒙恬代你为丞相。高受诏教习胡亥，他学法数年，未有过失，尽礼敬士，可以为嗣。”并威胁说：“今天下大权实际掌握在胡亥手里，高将得志。你听我的计，可以封侯，长寿，如果不从，将祸及子孙，实为你寒心。看你打算怎样？”这触及了李斯的要害，他既怕死，又想保持富贵，只能听从赵高的调遣。于是胡亥、赵高与李斯密谋，诈说始皇遗诏给丞相李斯，立胡亥为太子，并矫诏说扶苏为人子“不孝”，赐剑使其自杀；蒙恬为人臣“不忠”赐死。

胡亥登上皇帝位后，称二世，他比始皇更暴虐，诛罚日甚，人人自危，四方叛乱。二世责问李斯说：“贤人之有天下，天下要随其所欲，才算是贵有天下。所谓贤人，必能安天下而治万民，今自己满足不了，哪能治安天下。我想随心所欲，又能长有天下，你有什么好办法。”李斯为保爵禄，便顺着二世的意志，上书提出要行“督责之术。”他说：“夫贤主者，必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也。”所谓“督责之术”，实质是轻罪重罚，他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这样，“群臣百姓救过还来不及，何变之敢图？”李斯认为实行“督责之术，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这就是说只要实行督责之术，臣民都听话，二世要怎样干就怎样干，要什么就有什么，就可使天下太平，国家富裕，君王可以享乐无穷了。二世看了李斯的奏书，十分赞赏，行督责更严，征收赋税重的，他称“明吏”，杀人多的，他称为“忠臣”，弄得天下怨声载道，叛者日多。可见二世的残暴，李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赵高与李斯争权夺利，乃设计害之，诬李斯与其子李由谋反，终被二世杀死。李斯媚上取宠不只保不了富贵，自己被杀，并牵连到夷三族。

### 杨素助杨广夺权不得好报

《隋书·杨素传》记载：杨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少时落拓有大志，不拘小节，好读书，涉猎颇广，有文才，工草隶书法。美须髯，长得英俊。其父杨敷任周朝的汾州刺史时，死于战事，杨素上表要求赠谥，未见允许，便再三申理，周武帝大怒，命左右斩之，素大喊说：“臣事无道天子，死其分也”。武帝壮其言，赦其不死，赠其父为大将军，谥曰忠壮，拜素为车骑大将军。武帝命杨素写诏书，他下笔立成，词义兼美。武帝赞誉之，对素说：“善自勉之，勿忧不富贵。”杨素应声答说：“臣但恐

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图富贵。”所谓“无心图富贵”，是为表明自己志节高尚，以博得武帝的重视。其实杨素是个汲汲于富贵之徒，为了图富贵可以不讲原则，甚至丧心病狂，干出不可告人之事。

周武帝死，宣帝即位，皇后之父，杨坚任大司马，杨素深自结纳，杨坚很器重他。宣帝死。八岁的静帝继位，朝廷大权全落在杨坚手中。尉迥叛变，荥州刺史宇文弼响应，杨素参加平乱有功，升除州总管，进位柱国。杨坚迫静帝“禅让”登上皇位，改国号隋，称隋文帝，杨素以佐命之功，进位上柱国。在隋文帝进行的统一战争中，他参与灭陈和率兵镇压江南叛乱以及北征收厥，战功显赫，成为隋朝开国功臣，任尚书右仆射，与高颖同掌朝政。

杨素的经历和遭遇，跟李斯基本上有相同之处，他俩分别辅佐的秦、隋两朝，是我国两个重要朝代，对后代都有较大的影响；他俩作为开国功臣，是有功于天下的。但在后期，所作所为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灾祸，这主要是参与夺取嗣位的阴谋，李斯与胡亥、赵高勾结，违背始皇本意，矫旨立胡亥，令扶苏自杀；杨素则极力助杨广夺太子位，而杨素所采取的手段比之李斯更加残忍、恶劣。

太子杨勇因穿着较讲究，又多几个内宠，这使隋文帝和独孤皇后很不高兴。因隋文帝是提倡节俭的，独孤皇后则反对多内宠，杨广知道父母不喜欢太子杨勇，便起了夺太子位的野心，他反杨勇之道而行之，矫饰得很朴素、不爱女色，一言一动都装得像个贤王子一样，因而得到父母的宠爱，想废太子立他代之。杨广知后便结纳大臣以夺位，他知隋文帝宠信杨素，便通过其弟杨约说杨素。他派宇文述用大量金宝贿赂杨约，说：“自古贤人君子，莫不善于观察时势，以避祸患。你的哥哥，功名盖世，掌握大权已多年，朝臣受你家屈辱的也无数！如果主上一旦去世，谁人庇护你们呢？今皇太子夫爱于皇后，主上素有废黜之心，你是知道的。只要贤兄一开口，晋王就可立为太子。如果能建这大功，晋王必铭记于心，你家就没有累卵之危，安如泰山了。”杨约深以为然，便将此意转说杨素。杨素凶险，听了高兴得拍掌说：“我的智思，却想不及此，幸得你启发。”约知其计行，又对杨素说：“皇后的话，上无不听，这是个好机会，应早往巴结，这不仅长保荣禄，子孙也得福；且晋王倾身礼士，声名日盛，躬履节俭，有主上之风，以我料之，必能安天下。兄若迟疑，一旦有变，太子继位，大祸将临头了。”杨素遂行其策。

数日后，杨素入宫侍宴，称赞晋王孝悌恭俭，用以试探皇后的意图。皇后泣说：“你说对了。我儿大孝顺，每闻皇上及我派内使到，必出境迎接。言及违离双亲，就哭了。我使婢女去，其新妇常与之同寝共食。哪像眼地伐（杨勇字）跟阿云（杨勇宠妾）相对而坐，终日酣宴，亲近小人，疑阻骨肉，我所以益怜阿（杨广字），常恐他被暗杀。”杨素知皇后厌太子，便极力诋毁太子。这正合皇后的意，便赠杨素金。从此，她决定废太子，经常向隋文帝说太子坏话，隋文帝也就怀疑太子，便派杨素去东宫观察太子。杨素到东宫，故意在外久停，使太子久等，以激怒之。太子很不高兴，形于言色，杨素回向隋文帝说：“太子怨望，恐有他变，要深加防察。”由于他谮毁太子，离间其父子关系，隋文帝对太子更加不满。加上皇后与杨广多方构陷，太子终被废为庶人，立杨广为太子。隋文帝病重，杨广入宫侍疾，因要奸淫陈贵人，陈贵人向隋文帝言太子无礼，文帝大怒，急召庶人杨勇欲传位给他，但不幸诏书被杨素看到，便与杨广谋杀文帝，矫诏赐庶人杨勇死。杨广登上

皇位，称隋炀帝。杨广 父杀兄夺位，文帝第五子汉王杨谅起兵反，杨素率兵镇压，炀帝下诏褒扬，拜为司徒，封楚公。

杨素虽有建立之策，及平杨谅功勋，但隋炀帝是个猜忌又残暴的君主，他对杨素“外示殊礼，人情甚薄。”杨素病时，炀帝常派名医诊治，赐以上药，但密问医生，恐其不死，杨素亦知其意，拒不服药而死。杨素死，炀帝对近臣说：“使素不死，终当灭族。”可见，隋炀帝早就准备要杀杨素。而由他扶起来的隋炀帝，因残暴虐民，众叛亲离，加速了隋的灭亡。对此，杨素是有罪过的。

### 十三、充分信任是合作基础

有充分的信任，才有密切的合作，如果彼此同床异梦，终将会散伙。因此，可以说充分信任是合作的基础。

在元清崛起的历史上，元、清开国者以边疆少数民族竟能将偌大的中国统一起来，利用和充分信任汉族杰出之士为之服务是重要原因之一。如元世祖忽必烈之充分信任刘秉忠，清太宗皇太极之充分信任张弘范，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刘秉忠推动忽必烈实行“汉法”，范文程促进满族汉化，以及帮助元、清发展汉族历代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使之纳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里，其功勋是不可磨灭的。

#### 忽必烈对刘秉忠言听计从

历史上的名臣能使君对其言听计从的，其本人必须是有本事的人，所言合乎君意，能行之有效；而其所谋的，君认为是忠于己的。当然这个君必须是明君，才能听进正确的意见，不然只是对牛弹琴，甚至遭害。忽必烈青年时就醉心于中原文化，任藩王后就有统一中国之志，故积极物色汉族有才能之士为己用，刘秉忠就因此以其博学多智为忽必烈所赏识，始终得到忽必烈的信任，成为其股肱重臣。

《元史·刘秉忠传》记载：刘秉忠，字仲晦，本名侃，因曾为僧，又名子聪，他当官后，忽必烈赐名秉忠。其祖先是瑞州（今江西高安）人，在辽、金当过官。蒙古取邢州（今河北邢台），其父在蒙古人手下当县提领。秉忠生得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十七岁，任邢台节度使府令史。对当刀笔吏不满意，常闷闷不乐。一日投笔于案叹说：“大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待时。”于是辞职隐居于武安山中。不久受天宁虚照禅师招纳为僧，因他能文，任庙书记之职。后游云中，留居南堂寺。在隐居和为僧的八、九年间，秉忠博览群书，学识日增，对《易经》和邵氏《经世书》有较深的研究，还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以及三式六壬遁甲之术。对于世事，也很关注并经常与人探讨。

燕京大庆寺高僧海云禅师被漠北藩王忽必烈召请，途经云中，闻知秉忠博学多才，便邀请他同行。及入见，忽必烈见他论天下事如指掌，深为佩服，以后多次召见向他请教。海云禅师南归时，忽必烈留他在藩王府。忽必烈重其才，对他很喜爱和重视，他为报忽必烈知遇之恩，忠心耿耿地为之竭力尽智，不只辅助忽必烈统一中国起了重要作用，对促使忽必烈推行“汉法”也有重大的影响。

刘秉忠在藩王府时上书共数千言，这实是为忽必烈制定取天下和治天下的政纲，其主要之点有二：

一、总结中国历代王朝治乱之道，指出了蒙古国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应改革之处。他认为“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处须如鱼水。”而“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之。”而现在蒙古官兵生杀予夺，民不聊生，应该改革。他说：“自忽都那演断事之后，差役甚大，加以军马调发，使臣烦扰，官吏乞取，民不能当，是以逃窜。宜比旧减半，或三分去一。招逃者复业，再行定夺。”“今百官自行威福，进退生杀惟意之从，宜从禁治。”主张应在京府州设监守，督责旧官，以遵王

法；仍差按察官守，治者升，否者黜。”他这种不扰民、不虐民的意见，忽必烈都重视和采纳。如邢州原有万余户，由于蒙古官员百般勒索、随意屠杀，百姓大量逃亡，十余年后只剩下五、六百户。刘秉忠建议“择人前去治理，限期见效，以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并推荐儒生张耕、刘肃提当此任。忽必烈任张耕为邢州安抚使，刘肃为副使，他们到任后，铲除贪暴，招复流亡，不到一个月，户口就增加十倍。过去，蒙古军征伐，如拒降就大加屠杀，刘秉忠随忽必烈征大理、云南以及后来伐宋时，由于他劝忽必烈行仁义，不可滥杀无辜，忽必烈果然严禁军士屠杀。不扰民、不虐民政策的实行，削弱了南宋的抵抗力量，使忽必烈能迅速统一了中国。

二、倡议尊孔子兴学校、开科举。刘秉忠说：“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主张“宜令州郡祭祀，释奠如旧仪”。他认为学校不能废，科举要恢复，“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兼科举之设。”蒙古族原是落后的民族，只知尚武而忽略文化，由于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等汉儒的建议，兴学校、开科举，吸收了汉族先进的文化，对于逐步克服其贪暴性起了一定作用。尤其是尊孔子，接受儒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思想，加强了其统治的地位。而思想、文化的统一，必然加强了蒙汉的合作。

刘秉忠长期在忽必烈身边，但一直是以方外人的身份参谋的。他既不要官衔爵位，也不求享受，依旧僧衣斋食，过着出家人的生活，而对于忽必烈的事业是如此竭尽智力，这也许是忽必烈对他极其敬重和信任的原因之一。忽必烈建号立国后，因翰林学士王鄂的建议，忽必烈令其还俗结婚，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预中书省事，赐以府第。秉忠既受命，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军国大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听，忽必烈对他更为宠信。他还极力向忽必烈推荐人才，经他推荐的不少人成为一代名臣。1274年8月，他在上都无疾端坐而卒，享年五十九岁。忽必烈闻噩耗，十分悲痛，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后赠太博，追封为赵国公。

### 皇太极对范文程信任无间

范文程事情三朝四代，一直受到重视，尤其在皇太极开创清朝时期，对他更信任无间。范文程之所以受到重视和信任，是由于他对清的开国和治国都提出正确的方略，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做出了贡献。而范文程能与四代君王协调一致不出问题，还由于他有自知之明。在这里，主要探讨的是他与清四代君臣关系，以及促进满汉合作和使满族汉化所起的作用。

《清史稿·范文程传》记载：范文程，字宪斗，祖籍在江苏，是宋朝大学士范仲淹的第十七世孙。明初其祖先谪沈阳，遂为沈阳人。曾祖范鏊，是明朝的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文程少好读书，为人聪颖、机敏，沉毅。1618年后金努尔哈赤攻占明朝辽东重要军事据点抚顺，范文程因见明朝腐败。后金在崛起，为建功立业，毅然“仗剑谒军门”，投入努尔哈赤麾下。努尔哈赤跟他谈话，器重其才，又知为范鏊曾孙，对身边的亲王贝勒们说：“这人是名臣后人，要善待之。”以后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他都作为亲随，参与机谋，贡献他的才智。

努尔哈赤死，皇太极继位，范文程仍为其亲随。1629年，皇太极避

开袁崇焕在山海关、宁远、锦州一带布置的重兵，绕道深入北京，以及用反间计使崇祯杀袁崇焕事，实是范文程所献的计谋。在后来“破旅顺，收平岛讨朝鲜，抚定蒙古”等军事行动中，范文程都参与其谋。皇太极你帝和定国号为清，削弱八旗贝勒权，加强中央集权，都听取了范文程的意见。由于范文程决策帷幄多有贡献，成立文馆和改为三院，都授以负责机密重任。为招降汉军成立汉军旗时，诸臣提出由范文程任固山额真，皇太极说：“范章京才诚胜任此职，但这仅汉军旗之事，朕方倚为心腹，可另议别人。”可见皇太极把他视为心腹重臣。文程所负责的皆是机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召入。”每昼夜是一百刻，“数十刻”是数小时，一谈便数小时，甚至有时急召，范文程连吃饭、休息的时间也没有。皇太极每与臣下议政，如范文程不在，必问，“范章京知否？”如认为不妥，便说：“何不与范章京议之！”大家说，“范文程也认为应这样办。”皇太极就批准。有时范文程生病不能参加议事，是重要的事就命等他病好了才裁决。写给各国的书敕，皆由范文程负责，初，皇太极还要看一下，后来不再审阅，说：“你写的错不了。”忽必烈对范文程倚重和信任如此！

皇太极死，继位的顺治帝年幼，由其叔父多尔衮掌权、尔后多尔衮伐明的计谋，范文程都参与，攻入北京后政务由范文程处理。当满州贵族争权夺利白热化时、范文程不附多尔衮，养病闭门不出。多尔衮死，顺治亲政，论多尔衮“谋逆”罪，大学士刚林、祁充格以附多尔衮妄改《太祖实录》被杀，而范文程得以保全。顺治时，他也竭力辅佐，后以病为由辞去职务，实是功成引退，“辟东皋为别业，稍构亭馆，植卉木，引辛故，徜徉其中，时以骑课子弟，性廉慎好施与。”平安地度过晚年。1666年（康熙五年）逝世，终年七十岁。康熙亲撰祭文，并为其祠堂写了“元辅高风”，这是清朝统治者对他的最高评价。

范文程其一生的事业中，关心民瘼、促进满汉合作和使满族汉化是有突出贡献的。后金时进攻中原，多以劫掠屠杀为主，如占据遵化、承平，虏掠金帛子女后而返，对中原破坏甚大。范文程归满清后多次告诫黄太极勿屠杀以得人心。多尔衮率师伐明，他上书重申此意，说：“今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宣告进取中原之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贤能，恤无告。如能这样，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多尔衮开始还听从范文程的劝告，故能顺利攻取北京。顺治继位第二年，江南已平定，范文程又上书说：“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可得。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开科取士，这是争取士人的一种有效手段，使天下士有了“学而优则仕”的出路，成为清统治者的臣属，为之效忠尽力；同时使满优秀分子也成为儒学学者，康熙就是满族汉化的最杰出的儒家信徒，这对促使满族汉化起了关键的作用。范文程还针对清朝重满轻汉和用人唯亲大搞宗派的弊政，上疏“请敕总院三品以上大臣，各举所知，毋问满、汉新旧，毋泥官秩高下，毋避亲疏恩怨，举唯其才”，用以充当各级官吏。顺治特允其所请。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满汉官之间的矛盾，并加强了满、汉族的团结。

皇太极是满清王朝的关键创业者，在其统治时清朝取天下和治国的方针已基本确定，而其所策划，范文程实是谋主。皇太极可贵的是不囿于民族偏见，充分信任、重用范文程，军国大事不得到其同意不决，使范文程能充分发挥其才智为之效力。正是由于君臣信任无间，终成大业。

## 十四、伴君如伴虎文人遭难

翻开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文人遭难的事几乎无朝无代无之。究其原因，因为文人读圣贤书，深受“忠君爱国”思想的熏陶，熟悉历史兴亡治乱之道，喜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他们都是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一逆龙鳞便有灾祸，不是因“忠言逆耳”被惩处，便是由于文字陷入“文字狱”。即使是有为之主治国也很难幸免，西汉的司马迁受腐刑和宋代的苏轼屡被贬谪就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 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受奇耻大辱

司马迁在他写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谈及了他的家世：他家学渊源，其先祖任周室太史，其父司马谈任汉太史令。司马谈写的《六家要旨》是我国思想史上一篇重要学术论文，它总结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优劣，充分显示了他学识的渊博。司马迁后来能写出千古不朽的史学著作《史记》，成为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是与受其父的影响和教育分不开的。司马迁是汉左冯翊复阳（今陕西韩城）人，十岁便能诵读古文，二十岁在父亲的鼓励下漫游大江南北，考查遗闻轶事，搜集史料。他父亲收集了大量历史资料，准备写一部记载“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之事”的史书，书未写而病重，临危执迁手哭泣说：“我死，你必为太史，不要忘记完成我想要写的论著！”司马迁俯首受命流泪说：“儿子一定完成。”父亲死三年后，司马迁为太史令，为了撰写《史记》以执行父亲的遗嘱，他认真阅读“石室金匱之书”，搜集天下遗文古事。

但是，正当他全力撰写《史记》的时候，对他最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出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为贰师分敌势，命名将李广之孙李陵率射士步兵五千人从居延深入千里攻击匈奴。李广利大败，突围逃回，因他是李夫人的哥哥没有间罪，而李陵仅以五千步兵抗击单于的八万骑兵，将士英勇奋战，杀伤匈奴万余人。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李陵军且退且战，连斗八日，箭尽粮绝，兵死过半，被匈奴围困于绝道。而仅距居延百余里，边兵却未见出兵支援。匈奴招降，陵因“无面目见皇上”而降匈奴。汉武帝知陵降怒不可遏，朝中大臣都责备李陵。汉武问太史令司马迁对李陵投降的看法，司马迁说：“陵事亲孝，对士信，常奋不顾身赴国难，这是他一贯的表现，有国土之风。如今不幸失败，那些拥妻抱子在家享乐的官员只责备其短，实使人痛心。李陵率领步兵不满五千，深入匈奴腹地，抗击数万强敌，却能重创匈奴，使其救死扶伤不停，于是竭全国兵力以攻围之。李陵转战千里，箭尽路绝，战士张空弓冒白刃，用拳头与强敌进行内搏。李陵得到部下出死力如此，虽古代名将也不能超过。他虽战败了，但其重创敌人的战绩亦足以激励天下。我认为李陵不死，可能是想立功以赎罪。”不料，武帝却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说情，并贬低贰师将军李广利，便以诬罔主上的罪名，判司马迁死刑。按照汉律，想免死罪，可交五十万钱，或受腐刑。司马迁家贫无钱赎罪，为了完成《史记》，只好忍受奇耻大辱，接受腐刑。司马迁谈对李陵投降的看法，是在汉武帝询问之下说的，且司马迁跟李陵从无交往，不是相好的朋友，说为李陵游说是无根据的。即使说错了，也不至于判死刑，而汉武帝一怒之下竟处司马迁以腐刑，专制

帝王的残暴令人可怕，确是“伴君如伴虎！”后来，汉武帝对李陵战败认识到与己有关：只派李陵孤军奋战，而不派兵救援，因而导致这次失败。经过九死一生逃回的李陵残军四百人，过去无人查理，这时，武帝才派使赏赐他们。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首先详细谈其对李陵其人和战败的看法，以及他受腐刑的极其悲愤的心情。他对武帝将他当倡优一样看待的不满溢于言表：“我的先人不是汉朝的开国元勋，我搞的天文、历史、历法、星多工作，被人打入算卦巫师之列，被皇帝视为其所戏弄的玩意儿，把我当作娼妓戏子一样来豢养，也被社会上所轻视。如果我伏法被杀，不过是九头牛掉下一根毫毛，跟蚂蚁之死，有何区别？世人不会认为我是死节，只不过以为我智穷罪大，不得不死罢了。人终要一死，但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死是轻如鸿毛。”接着他指出“人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受腐刑，而我之所以隐忍苟活，宁愿受奇耻大辱，是因我的私事还没有完成，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好使之显扬于后世。”于是，他申明其志向，其所以不死是为完成《史记》，说：“古时生前富贵死后名磨灭的人，不可胜记。只有非常卓越的人物，才能得到后人称道。西伯被拘而推演《周易》，孔丘受困后才作《春秋》，屈原放逐始赋《离骚》，左丘明目盲乃撰写《国语》，孙臆双脚被砍后留下了《孙臆兵法》，吕不韦贬蜀后传播《吕氏春秋》，韩非在狱里写出《说难》、《孤愤》。而《诗经》三百篇，大概是圣贤发愤之作。凡人忧郁，无处申诉、便述往事，使后人知其志。左丘明失明，孙子断足，成了无用的废人，他们便著书立说，以宣扬其思想。我也把我的精力投入写作，收集天下的旧闻进行研究，探讨其兴衰成败之理，凡三百篇，用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书稿还未写好便遭此祸，正因书还未写好，所以受极刑而无怨恨。我能写成此书，将藏之名山，通过适当人使传给世人。这样，就可补偿我以前所受的耻辱，虽然被诛杀万次，也不后悔。然而这只能为智者道，难向世俗的人讲。”

读司马迁《报任安书》，人们为其不幸遭遇及其悲愤之情，不禁流下同情之泪，对他忍辱偷生以完成不朽名著《史记》而无限敬佩！司马迁忍受奇耻大辱的腐刑，将其全副精力投入了《史记》写作，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名著。它上自黄帝，下至汉武帝。首尾三千年，全书计有十二“本记”、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它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传记文学总集。鲁迅称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跟他的《史记》是不朽的，而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以腐刑，也在史书上留下了他永远洗不掉的一桩罪恶！

### “乌台诗案”及苏轼被贬的凄惨遭遇

与其它封建王朝比较，宋代对文人是较重视和宽容的。由于有宋太祖“誓不杀士大夫”的戒规，宋士大夫犯罪一般是贬谪，还挂上个虚衔的官爵。但并不如有人所说“宋代是知识分子的乐园”、凡逆龙麟的，大多遭到贬斥、一旦从高官厚禄的位置上跌到跟平民百姓差不多的地位，其境况是够凄惨的，苏轼大半生就过着这样的生活。

《宋史·苏轼传》清楚地告诉人们，苏轼从其老家到京应考，就以才华

震惊朝野。在欧阳修主持的礼部考试中，苏轼撰写《刑赏忠厚之至论》，欧阳修读后十分惊喜，本想取第一名，因怕是自己学生曾巩的手笔，为避免别人议论，判为第二。并对梅圣俞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仁宗亲自殿试，苏轼及其弟苏辙都被点为进士，仁宗每读苏轼的文章都赞赏说：“奇才，奇才！”未及进用，仁宗便死了。神宗继位接受王安石主张实行变法。仁宗时，曾实行“庆历新政”，苏轼是受其影响的，他对豪强兼并的“已成之局”有所不满，主张要“变政易令”，并针对当时“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等社会政治积弊，提出一系列的改革主张。这说明苏轼是主张改革的。但他对王安石实行的变法却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神宗曾召见他，问：“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苏轼率直地指出：“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神宗对其“三言”，即“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虽表示“朕当熟思之”，其实是不予考虑。之后苏轼上《谏买浙灯状》，被神宗采纳，苏轼“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他认为神宗“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于是，又上神宗皇帝万言书，极论王安石所推行的新法不便，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项建议。于是，为当权者所不满，被派出任杭州通判，后调任密州、徐州、湖州等处地方官。在调任知湖州时，他上表谢恩，而他在任密州、徐州的地方官时，对于新法不便于民不敢言，便以诗托，希望有补于国，对此，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抓住不放，对苏轼进行弹劾。苏轼《谢上表》中有“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的话，认为这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犯有“谤讪讥骂”之罪。又摘录苏轼的诗中的句子与新法的条例一一对照——

陛下发青苗钱以扶植贫贱，苏轼却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为申明法律而考试郡吏，苏轼却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苏轼却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申明盐禁，苏轼却说：“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随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讽诽谤为主。

于是，神宗便派特使皇甫遵赴湖州缉拿苏轼。除了诗外，御史们还将苏轼的文集断章取义地挑出那些所谓犯忌文字，对苏轼进行审问。苏轼对于新法是有意见的，屡次上书和对神宗公开表明其态度，有时在诗中流露其讥讽情绪是有的，属实的苏轼是承认的，但对属于主观猜测横加入以罪的，则矢口否认。这样一直审问了近三个月，王巩、王诜、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二十九人受到了牵连。这次审问本想以叛逆的弥天大罪置苏轼于死地，因大多是捕风捉影的，难于定案，且加上神宗的祖母曹太后的干预，神宗只好将苏轼贬谪到黄州。由于苏轼被系于御史台受审，而御史台自汉代以来又别称“乌台”，所以这次案件史称“乌台诗案。”它是我国历史上著名文字狱之一。性格豪放的苏轼，刚出监狱大门，写如下诗句：“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写完后，丢了笔杆，自我解嘲地说：“我真是无药可救。”

苏轼被贬黄州后，一家人生活艰难，食饭几成问题，老友马正卿为他请得在城东的营防废地数十亩，于是，一家老小开垦耕种，自食其力。他虽还有黄州团练副使的虚衔，实是变成了地道的农夫。这里地名“东坡”，苏轼便自称“东坡居士”。后被调汝州安置，苏轼上书“自言饥寒”，因在常州

有田，乞求在那里居住，很快便被批准了。

神宗病死，哲宗继位，司马光等掌权，尽废新法，苏轼被召任礼部郎中，不久升起居舍人，后任翰林学士。司马光对已行之有效的免役法也要废，恢复差役法，苏轼不同意，认为不对的事也提出意见，故为当权者所恨，苏轼乃请外调知杭州。

苏轼为人正直不阿，以“忘躯犯颜”、“直言敢谏”自许，也以“建功立业”、“致君尧舜”自负；认为应该坚守“独立不倚”、“危言危行”的名节。所以他曾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新法，当司马光当政不分好坏一律废除新法时又加以责备，总之他是对事而不是对人，尽管他跟王安石、司马光曾经是好朋友。正因他这种“独立不倚”的立场，受到了新旧两党的攻击，这便是他忽被起用、旋又被贬的原因。

哲宗亲政，一些冒牌的新党章惇等上台，又提出“乌台诗案”，重议苏轼之罪。据说，苏轼谪惠州有诗云：“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师，章惇冷笑说，“苏子还这么快活？”于是，朝廷下令将之贬谪儋州。儋州时称“鬼门关”，苏轼料无生还之望，在启程前与长子诀别，他又穷，只好“尽卖酒器以供衣食”（《和连雨独饮二首》）。他一到海南，“环视天水无际，凄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儋耳夜书》）恰逢儋州连年歉收，米价贵，生活极其困难，他给友人程天侔的信说：“此间食无肉，病无医，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初还往在破旧的官舍，后竟被撵出，在敬佩苏轼的儋县文人帮助下搭了几间茅房，才得以栖身。尽管生活是如此艰苦，由于苏轼为人旷达，又与人民亲如一家，得到儋县人民的爱戴和支援，终于渡过了在儋县三年的贬谪生活。哲宗死，徽宗继位，苏轼遇赦北归，在常州居住，过了两年便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一生仕途多舛，屡遭排挤，尤其自“乌台诗案”后，基本上过着凄惨的贬谪生活，这是他的不幸。正因贬谪，使他更接近人民和社会，他的诗文更能反映现实的真善美，这是他创作最辉煌的时期。因而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丰富了中国的艺术宝库。“诗穷而愈工”，这也许是这个伟大文豪不幸中之大幸。

## 十五、下梁歪乃因上梁不正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信然！在我国古代史中，凡佞臣专权，导致国事日非，贪污腐化之风盛行，都由于朝廷上出现了荒唐无道的昏君。在一般封建帝王中，尽管“败絮其中”，也饰以“金玉其外”，用皇帝的“神圣”做遮羞布，但有的皇帝却是赤裸裸的，其中最典型的是汉灵帝和明武宗，汉灵帝贪财，明武宗贪玩，且毫无顾忌，明目张胆，导致国事日非，全国贪污腐化之风盛行。

### 汉灵帝卖官鬻职贪官遍地

《后汉书·孝灵帝纪》记载：桓帝死，无子，窦太后和他的父亲、大将军窦武定策禁中，迎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刘宏为帝，是为灵帝。这时灵帝年才十二岁。窦太后临朝，窦武掌朝政。窦武与太傅陈蕃等人准备杀宦官。168年，宦官矫诏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及窦、陈派的朝官，宦官又得专权。

灵帝年幼登上帝位，是在太监和女人手里长大的，必然也受到他（她）们的影响。当时围绕在灵帝身边的太监有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粟嵩、段圭、高望、张恭、韩悝、宋典等十二人，皆为中常侍，史家为整数称“十常侍”。灵帝最宠信的是张让、赵忠，经常宣称“张常侍是我的父亲，赵常侍是我的母亲。”宦官们从历代掌权的宦官的经验中认识到，引导皇帝走上邪道自己就可获大利，于是极力诱他声色犬马，纵情享乐。及长，灵帝虽无治国本领，在经济方面却很有“天才”。这也许与“遗传”有关，他的母亲董太后就是出名的财迷，有关她的童谣就说明这一点：“车班班，入河间，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石上慊慊舂黄粱。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后汉书·五行一·谣》）“车班班，入河间”，是说朝廷派乘舆班班入河间迎灵帝。“河间姹女”是指灵帝母亲董永乐，“以钱为室金为堂”，是说董太后在灵帝当皇帝后可以聚敛金钱满室满堂。“石上慊慊舂黄粱”，说永乐虽积金钱而常嫌其不足，使人舂黄粱而食。“梁下有悬鼓，我欲击之丞卿怒。”是说永乐太后唆教灵帝，使他卖官聚财，又所用非人，天下忠贞之士怨望，欲击悬鼓以求见，主鼓的丞卿为媚顺灵帝，怒而加以制止。这首童谣生动地反映了灵帝及其母亲敛财的情况。

灵帝的玩也与赚钱有关。有一天，他把后宫的房间布置成许多商店，让宫女都穿着商人的服装，有的当店主，有的当采购员，进行交易，讨价还价，好不热闹。有的还进行偷窃，被捉住了，互相争斗。灵帝也穿着商人的服装参加买卖，在设立的酒店里饮酒作乐。这对于灵帝来说，是场赚钱的演习。

有了赚钱的经验，灵帝在西园开了一间卖官的交易所，公开标出出卖各种官的底价，让买官的人来投标。公的价是千万钱，卿五百万钱。地方官一般比朝官价贵一倍，因地方官是肥缺，可以直接剥削人民。二千石（郡守、王国相）价二千万钱，四百石（中下级官）四百万钱，县令（长）当面议价，按该县肥、瘠，定价高低。依正规文官任用条例升迁的官员，只录用一半，或三分之一，其他一半或三分之二，全部出卖。

定价以外，也看买官人身份及财产定价，如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曹操的父亲）家极富饶，买太尉花了一亿钱，比定价高十倍。名士崔烈减一半价用五百万买得一个司徒，崔烈买得官向灵帝射恩走后，灵帝很后悔，说如果

再敲他一下，可卖到一千万钱。殷颖、张温等有战功的名将，缴出巨额金银财宝后才擢升三公。为了鼓励人买官，有钱的一次付清，穷的允许先挂欠账，到任后限期加倍偿还。为了扩大营业额，除西园外，灵帝的左右都可代卖官，出现下一个州郡的官位竟卖了数次，一官上任不久，另一官又去上任，一个月内甚至替换好几次。买官的怕损失，为捞本赚利，一到任就拼命贪污，反正有皇帝做后台，可放手地进行掠夺。

公开卖官还嫌不够，还千方百计敛聚钱财。他令郡国贡献珍宝，而贡献珍宝时须先向皇宫交一笔“导行费”。还要送助军、修宫钱，大郡多至二三十万钱，中、小郡也规定相应数目。新任之官，必须先到西园议价才能上任，有的交不起钱，被迫自杀，清廉的不愿当官，也被迫上任，司马直有清名，新任矩鹿太守，减三百万钱，直说：“为民父母，而割剥百姓，我哪能做这样的事。”以病辞官，不听。行至孟津，上书极陈当时弊政和古今祸败之戒，即吞药自杀。

灵帝为了藏好其搜刮来的财宝，在西园兴建立金堂来储存，并把国库里的金银、绸缎也搬到万金堂中。因黄巾军造反，知帝位不稳，为后路计，将部分私藏寄存到小黄门、中常侍家里，各有数千万。仍觉得不够万全，又在河间购买田地，兴建家宅。刘宏为侯时较贫穷，以无钱为苦，当皇帝后想方设法敛财。初，老是讥笑桓帝不懂得积钱。他尝问侍中杨奇说：“朕比桓帝怎样？”杨奇答道：“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实是讥讽他和桓帝是一路货色，他听了很不高兴，因为他认为自己善于敛财，比桓帝高明得多。

灵帝带头敛财，“十常侍”眉笑颜开，灵帝敛财都是通过这帮奴才来搜刮，入他们私囊的当然更多，张让、赵忠等宦官所建家宅，其豪华不下于皇宫。灵帝常登永安宫高处，“十常侍”怕看见其家，使人谏说：“天子不当登高，登高则百姓离散了。”灵帝自是不敢登高。“十常侍”得到封侯贵宠，其父兄子弟以及侄儿辈，都当上部长、指挥官、州长、郡长、县长，布满全国各个角落，没有一个不贪污凶暴。卖官鬻职，造成贪官遍地，人民困苦不堪，纷纷投向张角领导的黄巾军。郎中张钧上书说：“我认为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成千成万人乐意归附，祸根皆因十常侍派出大批亲人、朋友到州郡当官，搜刮钱财，侵掠百姓，百姓有冤无处诉，故起来造反。宜斩十常侍，把他们的头悬挂南郊，以谢百姓，派遣使节通告天下，可不用兴师动众，大乱就会消失。”灵帝将张钧的奏章交给张让等看，张让等吓得脱下官帽，赤着双脚，跪下叩头，乞求让他们自动前往洛阳监狱投案，并献出家财资助军费。其实“十常侍”如此惊恐是多余的，他们及其所属贪污作恶，灵帝就是总后台，彼此蛇鼠一窝，矛头指向“十常侍”就是指向灵帝，所以他气愤地说：“这家伙真是狂人！难道十常侍中没有一个好人？”张让等便将灵帝发火的事告诉廷尉，廷尉就按照张让等的意见，诬张钧是张角的门徒。于是，逮捕张钧，在狱中酷刑拷打而死。后来黄巾军虽被镇压，张让等宦官在与外戚斗争中被袁绍率兵所杀或被迫投河而死。从此，群雄逐鹿中原，东汉名存实亡。

### 明武宗玩乐厌政佞臣横行

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明朝出现荒唐无道昏君最多。这是由于朱元璋建立

了极端专制主义制度，使皇权无限，皇帝可以为所欲为，视大臣如草芥，任意廷杖，他们对皇帝毫无约束。因此，一轮到他那些在太监和女人手中长大的娃娃或少年皇帝登基，其荒唐行为令人瞠目。朱元璋遗留下的祖训最多，有的始终得到严格执行，如廷杖，这是挟制大臣的有效手段，不合己意就打死勿论，这样谁敢不听话；有不少则被丢到九霄云外，如他亲手在牌子写上：不准宦官于政，竖立在内宫，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后来却被宦官王振把它推倒了，从此，皇权大多由机官行使。这是必然之事，因为实行极端专制主义的君王，既不信任大臣，就只能依靠宦官，而后代皇帝不少是娃娃，被有经验的宦官玩弄在手中就不足为奇了。明代的宦官从其经历中都深刻地体会到：要导引那些娃娃或少年皇帝游乐，搞坏事，权利必然落到自己的手里。弄清了上述的事情，就可理解作为皇帝的明武宗，为什么能够于出那么多的荒唐的玩意儿。

在《明史·武宗纪》里没有谈及武宗干哪些荒唐事，倒是在刘健、谢迁和刘瑾、江彬等人传记里都有详细的记载。明武宗，姓朱名厚照，明代十六帝中的第十帝，年号正德。其父孝宗临死前，将他托孤于宰辅大学士刘健等人，他恳切地执着刘健的手说：“先生辈辅导良苦。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先生辈当劝之读书，辅为贤主。”孝宗死，朱厚照即帝位，由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人辅政，时人赞曰：“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天下称贤相。尽管有三贤相辅政，“好逸乐”的武宗对他们说的话当耳边风，听的是宦官的话。武宗还当太子时，在他身边服侍的有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武宗即位，他们因旧恩得幸，人号“八虎”，而尤以刘瑾最狡诈狠毒。他引诱少年皇帝武宗玩乐，“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并引寻他到外边胡搞，“日游不足，夜以继之”，皇宫禁地成了娱乐场。武宗醉心玩乐，无心理政。游乐需大把的花钱，刘瑾便劝武宗令内臣镇守进贡，到处置皇庄，从中贪污。“八虎”诱帝游乐，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谏诤，不听。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章进谏，刘健、谢迁复上奏请斩刘瑾，司礼太监王岳和太监范亨、徐智也认为刘健等阁臣说的是对的。“八虎”知道了，晚间便到武帝面前跪下哭泣，说：“害奴等的是王岳。他勾结阁臣欲制止主上游乐，故想先杀臣等。且玩狗马鹰犬有什么害处。如果司礼监任用得人，那些外臣哪敢这样。”武宗听了大怒，立命刘瑾掌司礼监，永成掌东厂，大用掌西厂，派人将王岳、范亨、徐智遣送南京，随在途中杀王岳、范亨，徐智也被打得臂都断了。明日早上，刘健、谢迁等大臣入朝，知事已变，纷纷辞职，于是大权全落入刘瑾手中。刘瑾对违己意的尽去之，其心腹则安置在关键位置上。刘瑾每次奏事，必侦知武宗在游乐的时候，这时武宗见他来奏事很不耐烦，说：“我任你干什么，却用这些事来烦扰我。”从此，军国大事都由他专决，不用再向武宗奏报。是时，刘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贪污纳贿，无恶不作，朝政日非，人民苦不堪言。

军国大事既有刘瑾等宦官代理，武宗则可专心致意于玩乐。过去那些鹰犬之类玩腻了，便建豹房二百余间，置各种野兽于其中，尤其喜看武士与野兽搏斗。初喜爱武夫钱宁，后见边将江彬貌魁有力，善骑射，便用他为伴，与之出入豹房，同食同卧。武帝看人斗虎，有一天劲头来了便亲自去捕虎，他被虎所迫，叫宁帮手，宁畏缩不前。正在危急之际，江彬趋向虎扑乃解，武帝还逞强说：“我一人便行了，哪里用得着你。”他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却很感佩江彬而看不起钱宁。江彬为树己势力，盛赞边兵骁悍胜京军，请互

调操练，武宗便调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军入亨师组成团营，由江彬统领，在皇宫、西苑操练，间以角游戏。武宗戎服亲临指挥，把演兵布阵变成大型游戏，呐喊声、火炮声震撼京城，闹得鸡犬不宁。武宗玩厌了，又翻新花样，想出外游戏。江彬数次向武宗称宣府乐工多美女，且可看边兵打仗，在旷野上可骑马驰骋，瞬息千里，何必在皇宫郁郁而居，受廷臣的烦扰。于是，武宗出游宣府，江彬预先已为他建了镇国府第，将豹房的珍玩、女乐、美女搬入其中。武宗在江彬导引下，数夜闯入民家，抢掠妇女奸淫。武宗乐而忘归，称这里为“家里”。蒙古兵来阳和骚扰，武宗以“威武大将军朱寿”名义率军亲征，在诸将力战下，仅斩首十六级，蒙古军虽退走，而明军却死数百人，武宗险些被俘。武宗却使人飞马回京报捷，大肆宣扬“朱寿大将军”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武宗在外玩了近半年才回京。以后，江彬又数次导引武宗外出游乐，所经之处，不论官家民家，见美女就抢，掠的妇女有数十车之多，供他们淫乐。宁王震濠叛变，武宗认为是南下游乐的好机会，便决定“亲征”。未到，震濠已为王守仁所擒，武宗令他保密，仍照原计划南游。他在途中，正遇上湖广参议林文缵，见其妾长得美，便夺之。沿途所经水乡以捉鸟捕鱼为乐。至扬州，占民居为都督府，派人四处抢掠处女、寡妇淫乐。为夺取王守仁平叛战功，派宦官张永、赵忠在南昌大肆搜捕震濠逆党，“士民被诬陷者不可胜计，诛杀刑戮，甚于震濠之乱。”又指使王守仁奏报这次擒震濠，完全是“赖镇国公朱寿指授方略。”武宗以不能亲擒震濠为憾，便在南京演了一场滑稽可笑的献俘仪式。在广场上树起威武将军朱寿大旗，他穿着铠甲手持戈矛，士兵列阵以待。由江彬打开囚车放出震濠，武宗策马持槊冲过去，将之刺倒擒拿，再把他装进囚车，然后宣布大军“凯旋”。班师时途中经过一湖泊时，他看见渔人在湖里打鱼，他也想当渔翁，便坐小舟捕鱼，抛网捕鱼时站立不稳，跟小舟一起翻到水中，捞起来时，吓得病了。回京半年便死于豹房，年仅三十一岁。病危时，他对司礼监说“我的病好不了。以前做的错事责任在我。”与灵帝比较，灵帝始终不悔，并深信其“父母”张让、赵忠；武宗后发现刘瑾叛逆终于除之，最后还知道自己错了。但他和灵帝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祸害是一样深重的。他所宠信的江彬、钱宁在他死后先后被杀，抄家时，在江彬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无数；在钱宁家抄得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

## 第二章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主要是建立在爱情基础上，但对彼此事业，也有互相帮助、共同促进的关系。

夫妻关系有种种：有的是患难夫妻，情深似海；有的为共同事业，奋斗不息；有的互相帮助，共同前进。得一贤内助，嫁一好丈夫，这是人生大快事，其乐也无穷！而有的夫爱妻，是爱其色，色衰则爱弛，妻受尽冷落；有的夫妻沉迷声色，终以淫乐丧命；有的夫妻为权利结合，也为权利而败。取一恶妇，嫁一坏丈夫，这是人生不幸事，也是悲剧之源！

夫妻关系的好坏，不只关系到夫妻的福祸，有的甚至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如果夫妻是处在国家权力的中心的话，能否正确处理夫妻关系，古有鉴诫。本章所写的七节文，是总结古代十九对帝后的关系，其实他们的关系也是夫妻关系，当然帝后的关系与一般有所不同，但从夫妻角度论基本是一样的。前面所举的种种夫妻关系，正是概括这些帝后的关系，也许对处理夫妻关系有所启迪。

### 一、助丈夫创业的女强人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是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一句俗语。那时，女人还没有政治、经济的独立，必然附属于男人，其命运决定于嫁什么样的丈夫。在现代，随着女人在政治、经济上的逐渐独立，其命运也就局部或全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然，在许多地方，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女人附属于男人的历史陈迹还没有消失，女人的彻底解放仍有待于女人的继续奋斗。而在古代，在特殊情况下，女人的命运不是全由男人来决定，历史上不少女强人，她们不只对其丈夫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她们的事迹至今还为人们所传扬。元世祖的察必皇后和明太祖的马皇后便是这样的女强人，在帮助丈夫创大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 察必皇后辅佐丈夫忽必烈成帝业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孙，拖雷第四子，蒙哥汗之弟，他继蒙哥为蒙古大汗，是元朝的建立者。他能登上大汗宝座，创立元朝，是与察必皇后的辅佐和支持分不开的。

据《元史》的《世祖纪》、《察必后传》和《姚枢传》记载：蒙哥汗时，命忽必烈总治漠南汗地。忽必烈在攻占吐善和大理后，在今内蒙建开平府（后称上都）。他任用汉儒，团结汉族，用“汉法”统治汗地，控制关中广大地区。忽必烈势力迅速壮大，有人便向蒙哥进谗言，说忽必烈得中土人心，有独霸中原的野心。于是，引起蒙哥对忽必烈的怀疑，便派亲王阿兰答儿在关中设立机构进行审查，对忽必烈所任的官员，罗织了一百余条罪状，拟将其主要官员杀戮，以削弱忽必烈的势力。为解除蒙哥的猜疑，忽必烈与察必商量，察必毅然带领女儿赴汗廷为人质，以表明忽必烈并无异志。随后忽必烈亲自去谒见蒙哥，兄弟两人相见，知是误会，皆痛哭流涕。在察必的支持和忽必烈推诚相见之下，一场阅墙之祸终于避免了。

蒙哥于1258年分兵三路伐宋，他自率主力进攻四川，开始节节胜利，到

合州受阻，他便亲临钓鱼山下指挥攻城，被宋军炮石击中，回营后，伤势过重而死。随征的亲王穆哥（忽必烈的异母弟）派来使者告知蒙哥死讯，请忽必烈北归以系天下之望，忽必烈说：“我奉命南来，岂可无功便回？”仍然率大军渡江，攻打鄂州。这时在和林，夺帝位的策划正在白热化地进行，先朝诸重臣阿兰答儿、浑都海、脱火思、脱里赤等谋立其七弟阿里不哥。他们假以蒙哥遗命，由阿兰答儿向漠北诸部调兵，脱里赤到漠南诸部搜刮民兵，准备与忽必烈率领的大军作战，以夺取帝位。阿兰答儿拟以调兵为幌子将开平占领。当他率兵距开平有一百里时，察必知其阴谋，一面与儿子真金布置防御，一而派使前去质问阿兰答儿：“发兵大事，太祖皇帝曾孙真金在此，何故不让他知道。”阿兰答儿无语可答，同时，她派人急赴忽必烈军前密报。于是，忽必烈留大将拔突儿等率诸军围鄂州，声言自己率军攻临安，实班师北上。至燕京（今北平），脱里赤正在搜刮民兵，民甚苦之。忽必烈请问其由，脱里赤谎报是蒙哥临终之命。忽必烈察其包藏祸心，立即命其解散所搜刮民兵，人心大悦。忽必烈先在燕京驻军。1260年3月，忽必烈车驾至开平。亲王合丹阿只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刺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忽必烈即皇帝位，察必被封为皇后。而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也宣布即帝位，经过四年多的斗争，阿里不哥以失败告终。由于察必皇后发现对方抱有异志及时密报，使忽必烈迅速回师，阿里不哥夺取帝位的阴谋才不能得逞。察必对忽必烈夺取帝位是立了关键性的一功的。

忽必烈灭宋后，统一了中国。忽必烈举行盛大庆祝宴会，众人都欢乐，只有察必皇后郁郁不欢。元世祖说：“我今平定江南，自此不用甲兵，众人皆喜，你独不乐，这是什么缘故？”

后跪奏说：“妾闻自古以来无千岁之国，我在想怎样才能使我们子孙不重蹈宋朝灭亡的覆辙，那就好了。”忽必烈将宋朝府库所藏的各种宝物摆在大殿上，叫大家来看，察必看后便默默地走开了。忽必烈派宦官问察必，问她想要什么，察必回答道：“宋朝先人贮藏这么多的奇珍异宝遗给其子孙，而其子孙不能守，现在这些宝贝都归属于我们，我哪能忍心取一物呢？”从上述可见，察必皇后已认识到“居安思危”，她在胜利面前并没有冲昏头脑，而是在考虑着如何才能使其后代子孙能够守业。

下面的一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察必皇后已认识到要守业，就要不扰民，让人民安居乐业，才不犯亡国的错误。有一天，四位宫廷近卫军长官向上奏，请割京城外附近之地用来牧马，忽必烈同意了，要割的地方的图也送上来了。察必皇后来到了帝前知道了这事，因忽必烈已批准，正面谏净恐怕有伤皇帝的尊严，看见太保刘秉忠在座，便责备他说，“你是汉人中最聪明的人，皇上最听你的话，你对这种事提出不同意见，皇上是会同意的，你为什么不要谏？如果是在我们初到这里定都时，在京师附近划些地方牧马还可以，现在土地都分定了，人民都安居乐业，如果现在从他们手里夺过来，这不是扰民，将会造成混乱吗？”忽必烈听了，默然不语，便命此事作罢。

察必皇后知错必改，自奉甚俭，心地善良。有一次，她从太府监领了做衣服表里的丝绸各一块，忽必烈对她说：“这是国家的东西，不是我家的私物，怎么可以随便拿呢？”察必知这样做错了，从此不再拿国家的东西，这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宫里要做衣服，便带领宫人收集废弃的旧弓弦，经过加工后做成布，制作的衣服又结实又好看，不亚绫绮。宋太后全氏至京，不习北方水上，察必同情她的遭遇，便向忽必烈请求让她回江南，忽必烈不允，

她奏请再三，忽必烈说：“你妇人无远虑，如使她南返，或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们，她便会遭到灭族之祸，这就不是爱她，而是足以害之。不如留她在这里加以照顾，才能保证她的安全。”察必认为忽必烈说得有道理，于是，对全太后更加厚待。其心地仁慈如此！

1281年，察必病死，忽必烈为失去一贤后痛哭不已！满朝文武和黎民百姓也为之惋惜伤心。

## 马秀英助朱元璋打江山治天下

《明史》的《孝慈高皇后传》和《郭子兴传》都谈及朱元璋与马秀英结合的事。孝慈高皇后原名马秀英，她的父亲与郭子兴是好朋友，临死前将秀英拜托子兴抚养，子兴待之如亲生女。元末，子兴聚众起义，化缘僧朱元璋为避兵祸投到子兴麾下。他来投见，守门者怀疑他是间谍，便将他绑起来，并押到子兴帐上，子兴见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便使人解缚与语，收在身边当十夫长。朱元璋作战很勇敢，数有战功，子兴很赞赏，他的妾小张夫人也指着元璋对子兴说：“此异人也。”子兴为使元璋死心塌地为他卖命，便将秀英嫁给元璋。

一个人能成就大事业，有其种种原因，其中机会和条件很重要，如果不是在元末乱世，像朱元璋这样的一小行僧是不可能登上皇帝宝座的。然而有机会也必须有条件，这包括本人的条件和外部的条件，朱元璋本人具有其图天下的素质，而在外部条件中立足之基是其关键。由于他得到子兴的赏识，并以养女妻之，于是，朱元璋一下子便由一个十夫长变成子兴的女婿和心腹爱将，子兴死后，其军全归属元璋，他就是在这样的起点上发展和强大起来的。因此，可以说，他与马秀英的结合是他成功的关键所在。

马秀英嫁给朱元璋后，便全心全意地为朱元璋及其事业无私地奉献。郭子兴勇敢善斗，但性暴躁难容人，事急时，听从元璋谋议，亲信如左右手；事解，却信谗疏远元璋，将其骨干调走，以削弱元璋兵权。马秀英往往从中调解，特别是讨好其义母，代为说情。她知郭子兴夫妻贪财，将士有所献，都将之送给子兴妻，使子兴对元璋的嫌隙得释。有一次，子兴怒，幽禁元璋，时适灾荒，找食物不易，秀英便偷取炊饼，藏在怀中送给元璋充饥，因饼灼热烫得她胸前起了泡。元璋攻占太平，秀英就率领将士妻妾渡江。及以江宁为根据地，东有张士诚，西有陈友谅，彼此战斗几乎不断。季英亲自组织将士妻妾制衣鞋佐军。陈友谅攻龙湾，元璋率师御之，秀英将所藏金帛都用来劳军，激发了将士的高昂斗志，大破来犯的陈友谅军。于是，收复太平，夺取了军事重镇安庆。

更重要的是，在朱元璋打江山治天下的过程中，秀英以其所长以补元璋之不足。元璋家穷、未尝读书，斗大的字他认识不了几个，他任一方面军的主帅后，这给他造成了很大困难。而秀英有智谋，又懂文史，元璋有札记，都命她掌之，事无大小，都记录以免被遗忘。她从历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人心的向背决定事业的成败，因此，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她经常告诫朱元璋：定天下以不杀人为本。朱元璋在其打江山时确是这样做了，所以得人心，日益强大，能芟除群雄，推翻元朝，开创了明王朝。朱元璋即帝位后，封秀英为皇后，忆起秀英胸怀热饼给他充饥事，比之冯异在汉光武帝刘秀乏食时送给其豆粥、麦饭，于群臣面前常称后贤可比美唐朝的长孙皇后。

元璋退朝后，他告知马皇后，她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与长孙皇后比美。”马皇后的话是语重心长。知夫莫如妻，明太祖朱元璋在得天下后暴虐臣下的苗头已显露，故马皇后的规劝是有针对性的。为了防止朱元璋的暴虐，每当他在前殿决事，或震怒要惩处臣下，马皇后待他回宫后，便随事微谏。尽管朱元璋为人残忍，动不动要用廷杖杀人，经马皇后进谏，使不少得以缓刑或免受杀戮。如参军郭景祥守和州，人言其子持矛欲杀父，太祖欲诛之。马皇后说：“景祥止一子，人言或有不实，杀之恐绝其后。”太祖命人调查，果然冤枉。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其不法，太祖欲召他回来。马皇后说：“严州是与敌人交界的重地，随便换将不好。且文忠一向表现不错，杨宪的话岂可轻信。”太祖便不调动，文忠后来果立战功。学士宋濂因其孙犯罪，竟被牵连判成死罪，其实是明太祖为杀功臣而小题大作。马皇后谏说：“民家为子弟延请老师，还能以礼全终始，何况是天子。且濂在家居住，其孙在外犯罪，必不知情。”明太祖不听。及后侍食，不设酒肉，明太祖问其故，答道：“妾为宋先生作福事。”明太祖为之感动，投箸而起，明日赦濂，安置于茂州。明太祖尝令重囚筑城。这些重囚都是犯罪的官，马皇后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不免于死亡。”明太祖便全部赦免了他们。

马皇后能使秉性残忍的朱元璋纳谏，这与她进谏的方法巧妙有关。她的谏是“微谏”，这是说往往是旁敲侧引，伺机而言，或随其意以谏，即说话不触犯朱元璋的尊严，而是以情感之。有一次，明太祖怒责宫人，马皇后亦佯发怒，喝令将她们送交宫正司议罪。明太祖问，“为何如此？”马皇后说：“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盛怒时，恐怕处罚偏重，付宫正处罚，则斟酌适当，不至于偏轻偏重。即是陛下论人罪亦应诏有司处理。”朱元璋对所属犯罪，不加调查属实，往往随个人喜憎而定罪，或一怒使用廷杖打人，或立即处死。马皇后如此进谏，既随其怒亦佯怒予以处理，又通过交宫正处理以规劝朱元璋在处理犯罪时亦应这样，不然就会在盛怒之下轻罪重惩，冤枉了好人。

马皇后还特别强调治天下要以仁义待人，并经常以此规劝明太祖。马皇后以宋多贤后，命女史录其家法，朝夕阅读。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说：“过仁厚，不比刻薄好吗？”有一天，她问女史：“黄老是什么教，窦太后（汉文帝后）这么喜欢它？”女史答道：“清静无为为本，‘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就是黄老的教义。”马皇后说：“孝慈就是仁义，哪有绝仁义而能孝慈的。”正因她主张实行仁义，故能以仁义待人。有一天，她问明太祖：“现在天下人民安居乐业吗？”明太祖说：“这不是你所宜问的事。”马皇后说：“陛下是天下父，妾辱为天下母，人民是我们的子女！子女的安危，作父母的哪能不问。”每遇旱灾，就与宫人一起蔬食，为民祈祷；凶年，则设麦饭野羹，以赈济饥民。明太祖告诉她已经赈济，她说：“赈济是必要的，但不如使民能蓄积以备荒。”她还告诫明太祖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

马皇后还认识到要治好天下要先得贤，而得贤要礼贤，并以此谏明太祖。有一天，大臣奏事后，会食于廷中。马皇后命中官取饮食尝之，对明太祖说：“人主自奉欲薄，养贤宜厚。”明太祖便叫光禄官以后要改善伙食。明太祖到太学视察回来，马皇后问：“有生徒多少？”明太祖说：“数千。”马皇后说：“人才算多了。诸生由政府供给膳食，他们的妻子凭谁养活呢？”经

明太祖同意，便设红板仓，蓄积粮米，赐给太学生的妻子。太学生家食公粮，自马皇后始。诸将攻克元都，得了许多宝玉，献给朱元璋。马皇后说：“元有这么多宝玉而不能守，我想帝王还有比这更宝贵的宝吧。”明太祖说：“朕知道你所说的是‘得贤为宝’。马皇后拜谢说：“诚如陛下所说。妾和陛下起于贫贱，经千辛万苦才有今天的地位。常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愿得贤人以共治天下。”

马皇后自持甚严、节俭而爱人。她平日穿大练浣濯之衣，虽破旧也不更换。听说元世祖察必皇后煮废置不用的旧弓弦事，亦命取练织为衾绸，赐给孤独的老人。又将余帛类丝制成衣裳，赐给诸王妃和公主，使知养种蚕桑之艰难，以及织成衣服之不易。明太祖欲访后族人封官，马皇后谢说：“爵禄私外家，非法。”坚决力辞。马皇后病重时，群臣请祷祀，求良医。马皇后对明太祖说：“死生，命也，祷祀有什么用。且我病已好不了，医生哪能活得了。使服药不效，医生将可能得罪。”病危，明太祖问她还有什么遗言，她说：“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临死，还以国事民事为念，马皇后不愧为一代贤后。

## 二、内助贤丈夫少犯错误

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使唐初成为我国的一个辉煌的黄金时代。虽然唐太宗是“贞观之治”的缔造者，是这个黄金时代的主角，但不能把功劳全归于唐太宗，如果外没有魏征等良臣的谏诤，内没有长孙皇后和徐贤妃的规劝，唐太宗也许会步上隋炀帝的后尘。在这里，主要是评述长孙皇后和徐贤妃如何佐夫治国，使唐太宗少犯错误的动人事迹，而正是这种不寻常的夫妻关系，被传为千古美谈。

### 长孙皇后劝太宗礼贤纳谏

夫妻之间，因其关系密切，互相又了解，彼此说的话对方易于接受，给予对方的影响也就大。所以说枕边密语是最有效的，妻子既可导致丈夫做坏事，也可促使丈夫做好事。在历史上，后、妃给予皇帝好的或坏的影响的例子不少，长孙皇后就是给予唐太宗好的影响，故为史家所称道，成为后妃的楷模。

《旧唐书·长孙皇后传》记载：长孙皇后，长安人，少好读书，遵循封建礼教。兄长孙无忌，与李世民是布衣之交。她十三岁嫁给李世民。李渊即皇帝位，李世民被封为秦王，她被封为秦王妃。因秦王战功大，太子李建成恐其争位，猜忌日甚。她“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玄武门之变”，秦王发给将士盔甲，她亲临慰问和鼓励，将士莫不感奋，竭力战斗，取得了胜利。李世民即皇帝位，称太宗，她被立为皇后。太宗对长孙皇后十分敬重，常与她谈及赏罚之事，她严守“后宫不顶政事”的古训，说：“牝鸡司晨，家将穷败。妾以妇人，岂敢闻政事。”太宗强要她表示意见，她不回答。这说明她遵守封建礼教，但对关键的国事家事，她还是申明和坚持己见，以至坚决力争。

礼贤纳谏，始能治理好国家，她发现唐太宗与此违背的事，就毫不含糊地尽力规劝，使其在苗头初露时能及早纠正过来，唐太宗因之避免了不少错误。有一天，唐太宗退朝回到后宫，怒冲冲地大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听了惊异地问：“是谁惹陛下这么生气？”太宗说：“是魏征。魏征以前离间我兄弟，劝说太子图谋我，我不记前怨，提拔重用他。可是魏征却常常在朝廷上当面侮辱我，使我难以下台。”长孙皇后听了不说什么，默默地走进自己的房间，换上皇后穿的朝服，出来向唐太宗行参拜大礼。太宗惊问其故，长孙皇后说：“臣妾恭贺陛下！臣闻主明才有直臣，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唐太宗听了怒气才平下去，知道自己“要杀这个乡下佬”是错了。魏征凡是发现唐太宗做错事都进谏，有的还涉及长孙皇后的女儿事，而长孙皇后认为对的都予表扬和鼓励，如果长孙皇后是谋私的女人，也怨恨魏征的话，就会在太宗对魏征的盛怒之下“投石下井”，那么，太宗有可能要杀征“这个乡下佬”，那么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杀了魏征这个有名的诤臣，从此将杜塞进谏之口，唐太宗的许多错误就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就不会有“贞观之风”，也就不可能出现“贞观之治”了。又如唐太宗曾将房玄龄革职，长孙皇后在病中知道此事也予以规劝。房玄龄帮助太宗图天下贡献很大，长孙皇后认为太宗因小事而轻易处分重臣是不对的，她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

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房玄龄是唐代名臣，由于长孙皇后的规劝，得以复职，为“贞观之治”做出了新的贡献。

长孙皇后对于外戚及其子女都严格要求。后兄长孙无忌在开创唐室基业和佐太宗夺帝位中都立了赫赫功勋，因此，太宗以为心腹之臣，有事可以随便出入宫内与太宗密商，太宗将委以朝政重任。长孙皇后知道了觉得这样做不妥，她从两汉外戚专权招来祸害中认识到，这不仅有害于国家长治久安，也将给外戚带来灭族之祸。为此，她每乘便对太宗说：“妾既为皇后，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委以重任。汉之吕、霍外戚专权造成的祸害，可以作为切骨之戒，望陛下不要用我的哥哥为宰相。”太宗不听，竟任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后便密使无忌向太宗苦求，让他辞去宰相之职，太宗不得已许之，改授开府仪同三司，后才放心。后所生的长乐公主，太宗特别钟爱，长乐公主将出嫁，太宗令所司送比自己的妹妹永嘉公主多一倍的嫁妆。魏征谏说：“长公主是太祖之女，于理不可，愿陛下考虑。”太宗以其言告知长孙皇后，长孙皇后不仅不怪魏征，反而称赞他说：“我听说陛下敬重魏征，过去不知其故。今其所谏，实是以礼来开导陛下，使陛下控制止个人的感情，不愧是正直社稷之臣。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曲蒙礼待，情义深重，每要进言还要看陛下的颜色，不敢轻犯圣上威严，而魏征是臣下，情疏礼隔，而敢于直谏，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纳之则国治，拒之则政乱，诚愿陛下详察，则天下幸甚！”太宗便照魏征所谏办。长孙皇后不仅对长乐公主嫁妆力求节约，对太子的生活要求也如此。太子承乾的乳母经常来向长孙皇后说东宫器用缺少，要求增置，长孙皇后不同意，说：“承乾身为太子，所患的是德不立而名不扬，不应斤斤计较身边器物的短缺。”

长孙皇后随太宗到九成宫闲住，不幸忽患重病，太子承乾入宫侍候，他密对后说：“医药用尽，母后尊体还不见好，请奏请父皇赦重囚徒，并度人入道，修福以祈上天的保佑。”后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能改变。如果修福可延长寿命，我一贯不做恶事；如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免囚犯是国家大事，岂可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承乾不敢奏，告知左仆射房玄龄，玄龄转告唐太宗，太宗和侍臣莫不为之伤心流泪。朝臣都请为皇后实行大赦，太宗想后病好便从之，后知此事坚决表示不同意，太宗只好作罢。长孙皇后临危，与太宗诀别时，告诫太宗勿宠外戚说，“妾的亲族，因是国戚而得任高官，他们既无什么德举，易惹出祸端，为使他们保全永久，切勿使处之权要以外戚奉朝，便算幸事了。”并嘱实行薄葬说：“妾生既无益于时，今死不可厚费。且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见。自古圣贤，皆崇薄葬，惟无道之世，大起山陵，劳费天下，为有识者笑。但请因山而葬，不须起坟，无用棺槨，所需器皿，皆以木瓦，俭薄送终，这便是对妾的永远怀念。”死时年三十六，葬于昭陵。

长孙皇后尝撰写古妇人善事，集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序。又著论驳汉明德马皇后，说其不能抑退外戚，令其贵盛擅权，只知戒其龙马水车，这是开其祸源而只知防其末事。其写此书实为自勉，不准让太宗看。她死后，宫司送给太宗，太宗看后痛哭失声，以此书示近臣说：“皇后此书，足可传之后世。我不是不知天命而不能割情，因其每能规谏，补朕之缺，现在再听不到她的善言，感到丧失了一位贤内助，怎能不令人伤心！”

## 徐贤妃谏太宗“慎终如始”

由于唐太宗鼓励臣下进谏又能纳谏，臣下谏诤成风，此风也影响到宫内，长孙皇后之后，又有徐贤妃。《旧唐书·徐贤妃传》记载：太宗贤妃徐氏，名惠，生五月便会说话，四岁读《论语》、《毛诗》，八岁能写文章。她的父孝德叫她试模拟《离骚》，她写的《小山篇》说：“仰幽严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干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她的父亲看了大为惊奇，拿给人看，于是所论著盛传于外。她还喜读经史，手不释卷。太宗知其才名，纳为才人，她写文章，挥笔立成，词很雅美。不久封婕妤，后升充客。当时军旅屡动，宫室常建，百姓颇苦，她上疏谏道：

“贞观以来，已有二十二年，风调雨顺，年丰岁熟，人民无干旱之害，国家无饥馑之灾。”她在肯定“贞观之治”后提醒太宗说：“能够守初保末是不容易的，即使是圣哲能兼顾这两者的也少见。而业大者易骄，善始者难终”，她希望太宗不要在取得巨大成就后忘乎所以，“要谦虚谨慎，善始善终。”

接着她严厉批评了唐太宗好大喜功的错误说：“近年来，东有伐高丽之军，西有昆丘的战役，战争频繁，弄得士兵极其疲乏；运输过重，老百姓十分艰苦。征召兵役，使其家人为生离死别而悲痛，一遇风暴，船翻了人和米便沉入海底。一个农民每年力耕所得无几，而一船的损失比一个农民的收入多百倍。这是用农民有限的粮食，填无穷的巨浪，企图用征伐来压服异族，却使军队遭到很大的损失。除凶伐暴，这虽是国家的常规，但黷武玩兵，先哲所戒。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实行暴政，只传二世便灭亡；晋武帝消灭三国后，其后代不断内讧，导致西晋的覆败。这是由于矜功恃大，弃德而轻邦；图利忘害，肆情而纵欲。占有疆域虽很辽阔，却不能挽救其亡；老百姓被暴政所苦，活不下去只有铤而走险，造成了天下大乱。可见地广非常安之术，人劳乃易乱之源。愿陛下施恩泽于人民，矜弊恤乏，减行役之烦，让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她强调说：“妾又听说为政之本，贵在为无为。皇宫北面的大楼刚建好，又在南面筑翠微宫，不久又造玉华宫，这不能不说是弊政。为了不扰民，圣主安于卑宫粗食；为了享乐，骄主建造华丽的金屋瑶台。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愿陛下使用民力要适当，则民力用不尽；用民力而能让民得以休养生息，老百姓就不会埋怨，且感到高兴。”

她最后说：“知之非难，行之不易，事业顺利容易骄傲，时局安定就会侈乐。希望陛下能控制自己，慎终如始，小过能纠正就集成大德，用今之是来代替前之非，这样，陛下的令名可与日月同在、盛业可与天地永大。”徐贤妃这篇谏文，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唐太宗的错，且文词优美意义深刻，唐太宗看了深为感动，连声赞“善”；给她赏赐甚丰。

太宗死，她回想太宗对她顾遇之恩，哀思日甚，因而致病，病重也不医治，对其亲人说：“陛下对我恩宠实深、我希望早点死去，魂其有灵，得在陵园里服侍太宗，这便是我的志愿。”因赋七言诗及连珠以见其志。死时才二十四岁。诏赠贤妃，陪葬于昭陵之石室。

有贤后又有贤妃，这是唐太宗之幸。由于有这两位贤内助，使太宗避免了不少错误，对于太宗的事业、尤其是促进“贞观之治”，以及使太宗能慎终如始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 三、与夫治国的女中豪杰

孔老夫子说：“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小人是奸佞之徒的代名词，女人与之并列，被戴上“祸水”大帽子就不足为奇了。因之，有“妇女不得干政”的古训。尽管有此限制，但得接近权力的女子，就有可能被卷入政治旋涡之中，女中豪杰就有机会脱颖而出，如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则天武皇后与唐高宗，平起平坐，同理朝政，被人称为“二圣”。后来则天武皇后还堂堂正正地当起了女皇帝。

#### 独孤皇后与隋文帝共同议政

从《隋书·独孤皇后传》看，独孤皇后的貌如何未见记载，其才也谈得很简略，而杨坚创建隋朝当了皇帝后，仍敬而畏之、可能是与独孤皇后的政治背景有关。独孤皇后的父亲独孤信是鲜卑大贵族，任柱国大将军，姐姐是周明帝的皇后；杨坚的父亲杨忠是北周开国功臣，被赐姓普六茹氏，位至柱国、大司空、隋国公，独孤氏与杨坚的结合，不仅是郎才女貌，主要是两个政治势力的联盟。杨坚在北周中势力日益强大，正是由于将鲜卑贵族中可以利用的人都罗致到自己集团中来，也可以说这些人是其依靠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杨坚才能顺利地夺取帝位。独孤皇后就是支持杨坚的鲜卑族那一派的代表，因此，杨坚在处理军国大事时，不能不尊重和听取她的意见。

由于处于政治旋涡之中，严酷的现实逼使她不能不考虑政治问题。她的女儿是周宣帝的皇后，以此关系使其夫妻俩身价百倍，周宣帝死，她的外孙周静帝继位，杨坚掌握禁军和独擅朝政，实际上已成为周朝的统治者，那位娃娃外孙静帝只不过是象征性的皇帝罢了。在南北朝时，谁有实力便可夺皇位，不甘居人下的杨坚早就有窥伺帝位的野心，为了争取人心，辅政时崇尚开明政治，实行清简法令，加上他躬行节俭，改变了宣帝的酷政和奢侈的风气，故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拥护。独孤氏看到了形势所趋，便使人对杨坚说：“大事已然，骑兽之势，必不得下，勉之！”这也就是说，这是杨坚取代他那位八岁的外孙当皇帝的时候了，不要犹豫不决，要抓紧时机。至于他女儿的皇后之位，要由她来取而代之了，在政治斗争中，什么封建伦理关系已不在考虑之列，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是压倒一切的。

于是，杨坚逼使其外孙让位，外祖父安然受禅。让位、受禅的戏演完了，杨坚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帝位，称隋文帝，独孤氏也就心安理得地当上了皇后。隋代北周，这是历史必然，之后，隋文帝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富裕、强大的新王朝，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杨坚能登上帝位，独孤氏的支持与辅佐是有功的，杨坚当皇帝后，议政也就离不开独孤皇后。文帝每次上朝，独孤皇后都跟他一起坐着车子前往，文帝在前殿听政，她在后殿等着。她使心腹宦官侍候文帝，向她汇报文帝处理政事情况，她发现文帝有失误，便向他进谏，以纠正之，这对文帝帮助很大。文帝退朝，便跟他一起回内宫。他夫妻俩就是这样双出双入，形影不离。政事都经两人共同商议、处理，宫中称为“二圣”。

独孤皇后为人朴素，不贪财、不徇私，能从大局着想。突厥与中国贸易，有明珠一筐，价值八百万。幽州总管阴寿禀告独孤后，请她买下。后说：“这不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当今外族屡来寇边，将士疲劳，不如用这八百万钱分

赏有功者。”大都督崔长仁犯法当斩，隋文帝因他是后的表兄，欲免其罪，后说：“国家之事，哪能顾及私情！”崔长仁终被处死。

独孤皇后不仅在政治上主动参政，在夫妻地位上也坚持平等对待。在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富者可三妻四妾，皇帝老婆之多数不清，“除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外，还有无数的宫女，少的后宫三千，多的超过万人，只隋文帝是个例外，独孤皇后在世时，他基本上是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杨坚跟她结婚时，就发誓不与别的女人生孩子，他确是信守誓言，四子一女都是独孤皇后所生。文帝曾自豪地对臣下说：“前代帝王，溺于嬖幸，废立之事由此而生，朕傍无姬妾，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若前代皇子，诸子忿争，国破家亡耶！”这不过是文帝一厢情愿，为争夺继位而父子兄弟内讧或互相残杀，封建王朝无代无之，即使一腹所生也不幸免，后来终于发生杨广杀父、杀兄杀母的悲剧，这是隋文帝意想不到的。但文帝之所以能遵守誓言，不纳姬妾，这也与独孤皇后严密预防有关。史称独孤皇后有“奇妒”，这样称她是否适当姑且不论，事实上，她确是反对男人乱爱和纳妾，不仅对于文帝，对于别人也如此，如她后来厌恶丞相高颖，以及主张废太子勇，也与他俩宠爱姬妾有关。至于文帝并不是不爱好美色，当独孤皇后不在身边时，他也是偷偷摸摸的。有一次，他在新建的仁寿宫中遇见了一个很漂亮的宫女，被她的美色迷住了，他顾不得跟独孤皇后的誓言，便和她发生了关系。他以为这次是瞒过独孤皇后了，他不知道，即使独孤皇后不在他身边，她也派心腹人暗中监视文帝，因此，文帝偷幸宫女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她的耳中，使她妒火升三丈，一俟文帝上朝听政，便派人把这个宫女暗杀了。文帝罢朝回来，听说这个如花似玉的美女被杀了，又惜又恨，因与独孤皇后有誓言在先，又慑于她的尊严，不敢加罪于她，而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飞身上马从后花园飞奔而出，不择路径，一直急跑，冲入山谷间二十多里。大臣高颖、杨素知道文帝单骑出奔，急飞马追上，扣马苦谏。文帝对自己受制于独孤皇后，不禁叹气说：“我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高颖劝道：“陛下岂以一妇人而轻天下！”文帝怒气虽稍平，心里仍闷闷不乐，呆呆地坐在马上很久，到午夜才无精打采地回到宫中。独孤皇后早在阁内等候，一见文帝回来，哭泣拜谢，颖、素又从中和解，乃置酒欢饮，夫妻和好如初。

年五十，独孤皇后病死。这时文帝“得自由”了，可以纳妾了。于是，日夜纵情声色，由是发病。及病重，文帝对近侍说，“使皇后在，吾不及此！”

## 武后高宗并称“二圣”同治天下

如果说独孤皇后得以参政，主要是依靠其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而武则天当上皇后是靠其才貌，之后能与高宗并称“二圣”，以及后来当上女皇帝，则是靠自己的本事闯出来的。当然也由于她遇到好机会好运气，近三十岁了还得到比她小四岁的年青皇帝高宗的宠爱，不然，她只能在古佛青灯、夜半钟声中默默地虚度年华。

据《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记载，武则天是因她貌美，才被唐太宗召入为才人，这时她才十四岁。临别，母亲杨氏恸哭不已，她却显得很从容，劝母亲说：“我去见天子哪能说不是好福气，何必像女孩子那样哭哭啼啼！”但愿望与现实并不一致，她在唐太宗身边当才人长达十二年，只管些食宿生活琐事，才人是低级的内官，她并没有多大福气，比她年少三岁的徐氏入宫

比她还晚些，开始也是才人，因徐氏文才超人，被立为妃，而武则天到唐太宗死时还是才人。唐太宗死后，她和其他侍妾一起被送到感业寺当尼姑。尽管武则天在宫中没有享福，在这十二年中，她熟读诗书，懂得兴亡治乱之道，尤其在太宗身边耳濡目染，了解政治斗争的秘诀，对她后来从政奠下了良好的基础。祸福相伏，是祸是福，往往决定于人的遭遇和机会，正当武则天已感到前途无望时，有一天高宗来到感业寺，她拜见高宗，哭得很悲惨，高宗想起他当太子入侍父亲见到她，那时心虽爱她因碍于父亲无法表示爱情，现在看到她如此处境，由怜引起昔日之爱的激发。王皇后知道了，便主动接她入宫。王皇后这样做是有其目的的。王皇后没有生孩子，高宗正在宠爱肖淑妃，她对则天好是为了拉入自己一边，以阻挠高宗对肖淑妃的宠爱。

“才人有权数，诡变不穷。”武则天是个很有政治野心的女强人，她是得寸进尺，为了爬上高位以至最高位，她用尽政治斗争的一切权数、诡变，且心狠手毒地进行激烈的拼搏。她初入宫，争宠的对象是肖淑妃，对于王皇后则低声下气侍奉，因而得到后的喜欢，多次向高宗赞誉她，故被封为昭仪。当她受高宗宠爱超过了肖淑妃，对王皇后则不那么恭顺了，而是在觊觎着皇后的位置。后为人严肃，与下人较隔膜，于是，后所薄待，她便厚结之，她得到赏赐，都尽分给后、妃的左右，纳为心腹，这样后、妃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她都了如指掌。但是，还找不到中伤后、妃的把柄。她生一女孩，王皇后看见女孩，见很好玩，逗弄了一下，便走了。她回来知后刚来过，便狠心地将女孩掐死，盖上被子。高宗来，她佯作高兴地跟他谈话，高宗揭开被子一看女孩已经死了，惊问左右，左右答：“皇后刚来”。则天假装悲泣，高宗不会想到杀自己女孩的是她的亲生母亲，便恨恨地说：“后杀我女，她与肖妃常说昭议坏话，现又下此毒手！”由是则天得以诋毁皇后，皇后无法申辩，高宗对则天更加信爱，便有废后之意。武则天要立为皇后，必先得到长孙无忌的支持，他是高宗的舅父和拥立者，于是则天先是对他厚赠，继又派人去说情或游说，却遭到拒绝。当高宗提出废后，托孤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和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坚决反对，理由是：后出自名家，不能废；昭仪门第低，不能立。只有另一托孤大臣李勣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则天的党羽中书舍人李义府、卫尉卿许敬宗则上表请立昭仪为后。高宗乃废后，立武则天为皇后，并命群臣及各族酋长朝武后于肃义门，内外命妇来拜见，朝见皇后自此始。这是高宗有意树立武后的威势。在尔后四年中，武后彻底摧毁反对派的势力：王皇后、肖淑妃惨死于冷宫，褚遂良贬死于爱州，王皇后舅父柳奭被杀于象州，长孙无忌贬到黔州后被逼自缢，韩瑗贬死在振州，来济远贬庭州，其党羽、亲属、子弟或被杀或被贬。“自是政归中宫”。从长孙无忌集团覆灭至高宗去世，高宗与武后共同执掌朝政二十四年，史称“二圣时期。”

武则天能登上皇后高位，不仅是靠姿色和权术，主要的是因她有才干，史称“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皆称旨”。而长孙无忌自恃其是国舅之尊，高宗是由他力争而立，又是托孤重臣，故作威作福，独擅政权，高宗大权也旁落。高宗虽中主，但勤于政事，也想有所作为，相权重、皇权轻必然发生矛盾。但高宗为人仁懦，遇事犹豫不决，后纳则天，她以其机智果断补高宗之不足，在则天辅佐和挑拨下，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的矛盾就日益扩大，终于在废后和立后问题上摊牌了。

政治斗争历来就是极其残酷的，往往发展成你死我活的斗争，所以不能

视其采取什么样的手段而论其是非，如唐太宗曾杀兄屠弟夺位，由于他登上皇位，以“贞观之风”，开创“贞观之治”，后人也就原谅他的残忍，歌颂其功德，称其为一代英主。对于武则天也应作如是观。高宗独理朝政只有六年时间，之后苦于风疾，军国大事都委托武后代理。武后为加强思想统治及其影响，组织一批文人（人称“北门学士”）集中于内禁殿，撰写《列女传》、《臣轨》、《百僚新诫》、《乐书》等。还令他们参加机密事的裁决，以分宰相权。674年间，高宗称天帝，武后称天后，这时，她提出“建言十二事”的政纲；即：“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高宗诏准施行。在高宗与武后共理朝政期间，社会稳定，生产发展，边境安定，促进了中国与外邦的文化、经济交流，在这方面武后起了重要作用。这期间还选拔和培养了不少卓越的人才。高宗死后，武后临朝听政，后又当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女皇帝，为治国安邦继续做出了贡献。高宗选择武后并委之以政，对李家皇室来说虽有所损伤，但这是历史的选择，她承上启下，继续发展“贞观之治”，并为开元盛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对促进盛唐攀上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是做出了一定贡献的。

#### 四、远嫁异邦的和平使者

在中国古代，流传着许多动人的和亲故事，这些女人执行着一种特殊的政治任务，即和平使命，为中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和好而远嫁异邦，她们确实为缓和双方的关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她们与夫君的关系主要是政治关系，大多没有爱情可言，且还要受着异族一些落后的风俗习惯的折磨，而她们只能是逆来顺受，自我牺牲地搞好睦邻关系，以稳定边疆的和平，保障边疆人民的安居乐业，因此，至今留传着她们的感人事迹，得到了后人的无限尊敬。

##### 细君怨与昭君青家流芳

周秦以来，中国与边疆民族关系时紧时松，汉兴，采取硬软两手，即抗击与和亲，和亲对睦邻虽有一定作用，但要建立在中央政府军力强大的基础上，不然，和亲则难起作用，边寇依然不断。在边疆侵扰中，尤以匈奴为最。为对付匈奴的侵扰，西汉历代王朝花了很大的力量，和亲是其与匈奴修好的重要政策。

《汉书·匈奴传》记载：匈奴，其祖先是夏后氏的苗裔，称淳维。居于北部（战国时活动于燕、赵、秦以北的地区）。随草畜牧而转移。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各部，势力强盛，统治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汉高祖即位之初，匈奴来侵，乃亲率大军三十万讨伐，当骑兵到平城，而步兵未到齐，冒顿纵精兵三十万余骑围高祖于白登，后用陈平计才得解围，接受刘敬建议并派他与冒顿结和亲之约，之后，基本上采取防御政策。吕后临朝听政时，冒顿致书吕后说他“愿游中国”并说：“陛下独立，孤愤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意是说要吕后陪伴他。吕后看了书虽大怒但不敢惹他，为息事宁人，复书说她“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听，不足自汗”，是说她这个老太婆陪伴不了她。还向他求饶：“弊邑无罪，宜在见赦。”后另派美女与之和亲。

《汉书·乌孙国》记载：迄武帝即位，国力日益强大，对匈奴转采攻势。为孤立匈奴，断绝其与西域关系，乃派张骞出使乌孙（初在祁连、敦煌间，文帝时西迁至今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一带）。张骞转达武帝意，欲妻以公主，以装匈奴，乌孙昆莫（王号）因未知汉情况，没有答应。匈奴因乌孙与汉通，怒欲击之，昆莫惊，以马千匹来聘汉公主。武帝乃选刘建的女儿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原来刘建是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刘非的儿子，因刘非谋反未遂自杀，女儿被收入宫中，儿子刘建成了宫府的奴隶，因细君得封为公主，刘建也就恢复其王爵。细君出嫁，武帝赠送甚丰，还为备宫属宦官待御数百人。乌孙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可见昆莫对汉比匈奴重视。细君公主到乌孙后，自建宫室居住，一年之间与昆莫相会一两次，昆莫来时，置酒欢待，以币帛赐给王左右贵人。昆莫已是一个皱纹满面，胡须花白，年有七十岁的老头子，加上彼此语言不通，细君很是悲愁，自为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许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武帝听到了这歌颇为垂怜，每隔一年便派使者慰问她，并赏赐给她许多帐幕、绸缎等物。昆莫年老，欲将细君嫁与其孙岑陬（官号），身为祖母却妻孙子，细君想不

通，难于同意，便上书武帝，武帝复诏说：“从其国俗，欲与乌孙结盟共灭胡（即匈奴别称）”。细君为了服从大局，便嫁给岑陁。昆莫死，岑陁继位。细君与岑陁生一女名少夫。细君死，汉复以楚王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陁。岑陁死前，将国归其叔义子翁归靡，翁归靡既立，号肥王，娶解忧公主为妻，生三男两女，长男元贵靡，他后来在汉皇帝的支持下，得立为乌孙国王，使汉乌关系更为密切，对孤立匈奴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汉武帝派兵不断打击，尤其在公元前71年汉与乌孙联合出击下，匈奴再次惨败，从此匈奴再无力和汉对抗。之后，匈奴集团发生内讧，先有五单于争立，继有郅支单于与呼韩邪单于的对抗。呼韩邪单于失败，被迫与汉联和，由汉朝派兵保护。公元前36年，郅支被汉朝西域都护甘延寿所杀。

郅支被杀，呼韩邪单于又喜又惊，喜者，敌对势力已消灭，惊者自知不能与汉相敌，于是决定进一步投靠汉朝。便上书说：“常想谒见汉天子，因过去那支在西方，恐其与乌孙挟击，所以无法到汉。今郅支已被杀，愿入朝见。”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时元帝在位，对他的礼遇与赏赐一如既往。呼韩邪自言愿为汉家婿，“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据说王昭君是自愿要求和亲的。这也许由于入宫数年，连皇帝面也没见过，与其孤枕独眠，哪如出塞嫁人。既然被选入宫，当然长得漂亮，《汉书》形容她盛装出见时，“光照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呼韩邪单于得此美女，当然感谢汉帝的恩赐，于是，上书表示愿为汉保卫上谷以西至敦煌的北方防务。呼韩邪单于封王昭君为“宁胡阏氏”（阏氏，音烟支，即皇后），意是安宁匈奴的皇后。由于王昭君的和亲，在呼韩邪单于在位期间，结束了汉匈两族的敌对关系，开创了汉匈两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促进了塞北与中原的统一。

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生一儿子，呼韩邪单于死，大阏氏所生的长子雕陶莫皋继位，号复侏累单于，按“父死妻其后母（不是生母）”习俗，昭君再嫁复侏累单于，又生二女。昭君死后，后人为纪念她，建的昭君墓就有十几个。尤其是文人学士对昭君出塞很感兴趣。据有人统计，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诗词之作，流传至今的达七百七十多首。而一些传说，越传越离事实更远，如说王昭君选入宫时没有贿赂宫廷画家毛延寿，他就把她画得容貌一般，元帝看了图便没有选她。其实是因汉廷处死了一批宫廷画家，其中有一人是毛延寿，有人便将之附会成上述的传说。又据说昭君到匈奴后还写给汉元帝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元帝看了“大为动情，愁绪无聊，恹恹成疾，不久便病笃驾崩。”并说王昭君写的那封信见《汉书·匈奴传》，查《汉书》没有此信，如有应记在《汉书·西域传》，该传同样未见记载，未知此信来自何书？有的作品还说王昭君在被迫前往异邦中，投水而死。把上述传说联一起，把王昭君与汉元帝写成了一对深深相爱的情人，因被生生拆开，彼此为殉爱情而死。这些传说搬上艺术作品还可，如当为历史事实，就会闹笑话。据说王昭君还写了一首《怨旷思归歌》（后人称《昭君怨》），也许昭君因思念故土，想念家人而写此歌，但绝不会是怀念汉廷和汉元帝，因为她在汉廷是深宫怨女，在匈奴是“宁胡阏氏”，受到人民无限尊敬；而她离汉时，汉元帝已是病夫。过了五个月便病死了，她嫁给呼韩邪单于，总比陪伴病夫过的日子好得多。

王昭君主动要求出宫，显示了她超人的胆识，不仅摆脱了汉宫的束缚，在客观上也为汉匈的和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王昭君在内蒙古的墓，人称“青

冢”，它迄今仍为人们景仰，流芳千古。

### 文成公主使“一半胡风似汉家”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结合，标志着汉吐关系和好的开始。是吐蕃的一件大事，至今在西藏布达拉宫和大昭寺都塑有他俩的像。他俩生前的事迹，被人们用许多美丽的神话和戏剧热情地讴歌。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自周至隋，因被诸羌隔开，与中国没来往。其国人称其王为赞普。赞普松赞干布嗣位，他骁武，多英略，其邻国半同及诸羌被其征服。公元634年（贞观八年），松赞干布派使向唐朝进贡，唐太宗也派使臣前往抚慰之。松赞干布见唐使，十分高兴。他听说突厥及吐谷浑都娶唐公主，便派使与唐使入朝，多带金宝，上表求婚，太宗没有答应。吐蕃使回后，对松赞干布说：“初至大国，待我甚厚，许嫁公主。适逢吐谷浑王入朝，进行离间，由是礼薄，遂不许婚。”松赞干布便迁怒吐谷浑，起兵攻击之，吐谷浑不敌，逃向青海，以避其锋，其国人畜为吐蕃所夺。接着，松赞干布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率其众二十余万。屯于松州西境，遣使贡金帛，说是来迎公王，又对其所属说：“如果大国不嫁公主与我，即当入寇。”于是进攻松州。都督韩威轻骑与战，反为所败，边人大扰，诸羌皆叛响应。唐太宗便下诏派吏部尚书侯君集率大军讨伐，先锋进达松州夜袭其营，斩首千余。松赞干布大惊，引兵退，遣使谢罪，因复请婚，太宗许之。松赞干布派其相禄东赞致礼，献金五千两，和数百种宝玩。

641年（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令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前往吐蕃。是年松赞干布二十五岁，这青年藏王率其禁卫军在柏海亲自迎接。他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松赞干布见大国服饰礼仪之美，既羡慕又有愧色。及与公主归国，对其所亲说：“我们祖先没有跟大国通过婚，今得我娶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就建筑城邑和房屋，作为公主住宫。公主认为藏人赭面不好看，松赞干布令国人权且罢之，他自己亦不穿毡裘，效唐人着纨绮，渐慕华风。还派子弟到唐入国学，学习中国《诗》、《书》，又请中国文人任文书之职。

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结婚后，坚决支持和捍卫唐朝。太宗伐辽东回来，他派禄东赞来贺，奉献金鹅，鹅用黄金铸成，高七尺，中可实酒三斛。648年，右卫率府长王玄策奉命前往西域，为中天竺所掠，松赞干布派精兵与玄策击天竺，大破之，遣使来献捷。高宗嗣位，授松赞干布驸马都尉，封西海郡王，赐物二千段。松赞干布致书司徒长孙无忌等说：“天子初即位，若臣有不忠之心者，当勒兵赴国除讨。”并献金银珠宝十五种，请置于太宗灵座之前。高宗嘉之，进封为赞王，赐杂彩三千段。松赞干布请给蚕种及造酒、碾、纸、墨之匠，高宗如数赠送，这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高宗还塑松赞干布石像，列于昭陵玄阙之下。

“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唐代诗人陈陶的诗句，充分说明了文成公主的功绩。松赞干布死后，文成公主继续致力于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事业。她逝世时，吐蕃人民为她举行了最隆重的仪式。文成公主为汉藏两族人民的友好团结作出的贡献，永远为人们所景仰和怀念。

## 五、钟于所爱的痴情郎君

封建帝王忠于爱情的罕见，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的，如汉武帝对于李夫人，汉宣帝对于许平君，始终相亲相爱，永不相忘。

### 汉武帝为失去李夫人哀思不已

汉武帝是一代雄杰，也是个风流天子，他爱好美女，尝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无妇人。”因天下美女任他选，兴建明光宫，一次就选燕赵美女二千人，据说包括其他宫的美女就将近二万；伴他的都是年轻的美人，年满三十岁就不要了。美妇如此之多，他怎能幸得了，宠爱的也大多数年一遇，而不少美女只能一生得幸一次，过后连印象也没有了，许多美女连武帝面还未见过。可是惟独对李夫人，她生时，他神魂颠倒，死后，为之哀思不已，这是为什么呢？

《汉书·孝武李夫人传》记载：孝武李夫人出身于优伶之家。她的哥哥李延年，晓音乐，善歌舞，武帝很喜欢他。每制出新的曲调、歌词，他边舞边歌，听众无不感动。他想将其妹进献给汉武帝，有一次在侍上起舞时，他唱道：“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意思是说，这位绝代佳人魅力多大，能使人倾城倾国；谁不爱惜自己的城、国，但这么美的佳人难得啊，使人看了为之神魂颠倒，城、国倾覆也就不自觉了。汉武帝听了说：“妙啊，世间上真有这样倾城倾国的美女吗？”坐在身旁的他的姐姐平阳公主早就与李延年计议好了，由他唱歌暗示，武帝有意，便为之搭线，故她一听见武帝叫“好”，就向他介绍李延年的妹妹说：“李延年有个妹妹，就是他在歌中所说倾城倾国的绝代佳人。”武帝十分高兴，立即召见，见她妙丽绝人，能歌善舞，果然为之神魂颠倒，立为夫人，亲幸异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红颜命薄，李夫人早死，汉武帝很为悲痛，使画工画其像于甘泉宫。武帝死时，因卫思后废，大将军霍光知武帝十分爱宠李夫人，便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孝武皇后，以了武帝生前之愿。

李夫人病重时，武帝亲临探视，夫人知了，以被蒙头谢道：“妾久卧病，形貌已毁坏，不可以见帝。愿以王（儿子昌邑哀王）及兄弟拜托，请皇帝照顾。”武帝说：“夫人病重，恐怕不行了，见我一面，亲自嘱托王及兄弟，那不是更好吗？”夫人说：“妇人貌不修饰，不拜见君父。妾不敢以病得不像样子的形貌见皇帝。”武帝说：“夫人只要见我一面，将加赐千金，封夫人兄弟高官。”夫人答道：“封高官在帝，不在一见。”武帝又说必欲见之，夫人便转身面壁抽泣，不再说话。武帝无奈，只好快快地离去。武帝走后，李夫人的姐妹责备她说：“你就不能见皇帝一面，亲自嘱托兄弟之事吗？为何恨上如此？”夫人说：“我所以不让皇帝看我的面，正是为更好地向皇帝拜托兄弟。我因为容貌美，才以微贱之躯得到皇帝的宠爱。大凡以美色得人爱的，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皇帝之所以对我恋恋怀念，是想再看我平生的美貌，今看见我现在这副样子，容貌已非昔，必定厌恶而唾弃我，还能追思旧恋而照顾我的兄弟吗？”夫人所说的确是很深妙的心理学，她不见武帝，不让武帝看她久病被毁坏的容貌，正是为了使她昔日绝妙的美貌永远保留在武帝的想象中。这是因为人的视觉与知觉是密切相联的，一切事物都必

须首先反映在人们的视觉里，由视觉再上升为知觉，经知觉判别而进一步得出结论，夫人的容貌在武帝经过视觉、知觉后得出的结论是其美绝伦，如果不让夫人病后的丑貌让武帝再见，其美貌则永远储存在武帝的视觉中，其知觉对夫人的判别则依然不变，因而无服迷恋。如果让夫人病后的丑貌反映在武帝的视觉上，也就永远保留下来，其知觉的判别也就随之改变，其容貌非昔，也就不足以怀念了。正因夫人不让武帝看她病后的丑貌，武帝想象中的夫人永远是美的，这就使他哀思不已。也正因此，夫人死后，武帝以后礼葬之。之后，任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封海西侯，任延年为协律都尉。

武帝哀思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说能召来夫人的灵魂。武帝因迷信又急于想见夫人，便叫少翁做法事。于是，他设帷帐，在夜间点上灯烛，陈摆酒肉，使武帝另居别帐。武帝遥望见一美女如李夫人貌，入帷而坐，又起而徐行，武帝不得近前看，越发想思悲戚，有感而作诗说：“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乐家配曲以歌之。武帝又亲作一赋，以伤悼夫人，表示其对夫人的永远怀念，其词缠绵悱恻，哀思感人，这位“茂陵刘郎”，仅从他对夫人的情意而言，可称痴情郎君。

### 宣帝寻故剑以示不忘结发妻

汉武帝怀念的是绝代佳人，而汉宣帝一旦当上皇帝还不忘糟糠之妻，其对妻子的爱情是纯洁、高尚的。

汉宣帝刘询是汉武帝的曾孙，他生下才几个月，祖父太子刘据因“巫蛊案”而自杀，他的父、母也因牵连被处死。这时，刘询也被关在狱中，廷尉监丙吉见而怜之，他心知太子被诬害，又哀皇曾孙无辜被牵累，便选择谨厚的女犯人，令保养皇曾孙，并住于宽静之处，用自己的财物，供给其生活。也许太子的死敌和曾皇孙尚在，想将之杀死，便使望气者奏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武帝于是下令，凡京都监狱在押人犯，不论轻重罪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奉命来到曾皇孙所在的监狱，丙吉闭门坚拒不纳，说：“皇曾孙在，他人无辜死者犹不可，何况是皇曾孙呢！”郭穰无奈，只好回去向武帝报告。这时，武帝有所觉悟，不仅不追究此事，反而大赦天下。由于得到丙吉的保护，皇曾孙才得以活下来。

汉武帝死后，皇曾孙被召到掖庭（宫中管理宫人事的官署）供养。掖庭令张贺本是刘据太子的家吏，因此时皇曾孙百般照顾。及皇曾孙长大，张贺便为他择婚。掖庭暴室啬夫许广汉有女平君，约十四五岁，曾许给人家，正要结婚，对方病死了，现还未择配。贺知道了，便请广汉饮酒，席间对广汉说：“皇曾孙与皇帝是近亲，将来最低的位置也可以得到个关内侯，你的女孩嫁给他不是很好吗？”广汉很高兴能与皇室攀亲，一下便答应了，便将其女嫁给皇曾孙。刘询由于一生长下来便遭到不幸，过着坎坷艰苦的生活，不像那些长在大监和女人的手里娇生惯养的皇子皇孙，他过的是贫穷的平民生活，知道世间疾苦，发愤读书，知书达礼；自与平君结婚后，一夫一妻相亲相爱，一年后生了个男孩，名刘奭（即后来的元帝）。

昭帝死，无嗣，大将军霍光请皇太后作主迎立昌邑王刘贺继位。贺即位仅二十七日，因淫乱被废，霍光与诸大臣议所立，未定。这时任光禄大夫的丙吉向霍光介绍皇曾孙刘询的情况，说他“今年已十八九岁，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建议立他继位。霍光与诸大臣赞同，即立刘询为帝，称

宣帝。于是落难十八年的皇曾孙，一下时来运转成了天子，啬夫之女许平君也就被封为婕妤。这时，霍光有一小女，与皇太后有亲。大臣们议为皇帝立皇后时，大都心向立霍光的小女。由于宣布是霍光所立。他刚即帝位，大权掌握在霍光的手里，他不敢得罪霍光，但心里对于自己的结发妻情感很深，想立她为皇后，自己又不便于公开表态，于是便下诏寻找他微贱时使用过的一口故剑。这样，大臣们明白了宣帝的意思，即他当了皇帝却不忘糟糠之妻，便立许婕妤为皇后。

许平君当了皇后，霍光夫人显不死心，她还是在千方百计想使她的小女取而代之。许皇后快要分娩时生了病。与显相好的女医淳于衍被请入宫侍候皇后疾病。衍的丈夫为掖庭户卫，对衍说：“你可先到霍夫人那里走走，帮我求安池监的职位。”衍拜访显时提出这个要求，显听了，眼睛一转，心生了毒计，对衍说：“你如能为我做一件事，我当报答你，行吧？”衍说：“夫人要我做的事，哪能不行！”显说：“将军素爱小女成君，想使她大富大贵，所以烦累你。”衍说：“你说是什么意思？”显说：“妇人生孩子，十死一生，现在皇后快分娩时病了，你入侍时投药毒死她别人是不会怀疑的。她死了我的小女就得为皇后了。如果事成，富贵与你共之。”衍说：“药，有人先尝，哪能行？”显说：“这事决定于你。将军领天下，谁敢说什么，如果有事，将军必保护你，但恐怕你不愿意做罢了！”衍想了很久，才点头说：“愿尽力。”于是她把附子捣成碎末，带入皇宫。皇后分娩后，衍取附子末揉在太医送来的药丸中，捧给皇后服。一会儿，皇后喊道：“我头昏闷得很，药中得无有毒？”衍说：“没有。”不久，皇后死了。衍立即出宫，向显报信，显大喜，但暂不敢重谢衍。皇后死得突然，有人上书弹劾诸医侍疾不负责，宣帝即将之收监审讯。显惊恐，便以实情告诉霍光，说：“既失计为之，不要派吏捕衍！”光惊得直瞪两眼话也说不出。但事关全家生死存亡，只好向宣帝为衍开脱，不治其罪。许皇后被毒死，霍光女即被立为皇后。

公元前 68 年，霍光死，宣帝亲政。次年，立许后子奭为皇太子。前 66 年，霍氏阴谋废宣帝。事泄，霍光妻显等人被杀。霍后被废，十二年后自杀。宣帝对许后怀念不已，对其外家给予隆重的恩遇，封许后父广汉为平恩侯，位特进，封广汉两弟：舜为博望侯，延寿为乐成侯，许氏封侯者三人，宣帝以延寿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辅政。

## 六、挟夫作恶带来的灾祸

我们反对所谓“女人是祸水”论，因这是对女人的贬称，是对全体女人的诬蔑，但不能说没有“祸水”的女人，汉成帝宠爱的赵飞燕姐妹和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就是这种恶妇。赵飞燕姐妹恃宠作恶，出现“燕啄皇孙”的事件，但其祸也仅及汉成帝和其皇储以及她俩本身，而贾南风挟夫作恶，其造成的灾害是巨大的，她寻发了“八王之乱”，使中国支离破碎长达近三百年。

### 恃宠行凶赵氏杀害皇储

大凡畏老婆的，都由于爱而引起畏，老婆因之恃宠放肆，而其本人又是个窝囊货，只能对老婆百依百顺。汉成帝是这样畏老婆的典型。本来他贵为天子，赵飞燕姐妹只不过是宫婢之女，因一个跳起舞来轻若飞燕，一个美貌绝伦，自从纳入宫中，“六宫粉黛无颜色，从此君王不早朝。”他不爱江山爱美人，把国家大事搁在一边，整天与这两姐妹厮混，醉生梦死，心满意足地说：“汉武帝好神仙，求白云乡；我终老这‘温柔乡’足矣。”为了讨赵家姐妹的欢心，对她俩是要什么有什么，想怎干就怎干。

《汉书·孝成赵皇后传》记载：孝成赵皇后，是一个姓赵官奴所生。她生时，父母不想养，抛之荒野，三日不死，只好抱回养育。稍长，被赐给阳阿公主为婢，公主使她学歌舞，因其体态轻盈，被名飞燕。成帝经常微服出外寻欢作乐，有一次到阳阿公主家，公主欢宴并以歌舞为娱，成帝见飞燕容貌艳丽，舞伎绝伦，为之倾倒，立即带回宫中，宠幸异常。后见其妹合德更美，也召入，两姐妹都被封为婕妤，贵倾后宫。

许皇后被废，成帝欲立飞燕为后。皇太后王政君嫌她出身低微，没有答应。太后姐子淳于长为侍中，为讨好成帝，积极支持立飞燕为后，为此事在成帝与太后之间往来传语，他将太后的主意转告成帝，成帝乃封飞燕父赵临为成阳侯，于是赵临这个官奴一下子成为权贵，飞燕的出身也就高贵了，再过一个月，就立飞燕为皇后。淳于长也因此得封为定陵侯。

因飞燕不及其妹合德美，宠幸也就差些，合德被封为昭仪。赵昭仪住的昭阳舍，修建得金碧辉煌，中庭用彤朱涂，殿上遍漆漆，门槛用铜涂上黄金，台阶都用白玉，壁间横木镶以金环，墙壁用兰田玉、明珠、翠羽来装饰，确是“金屋藏娇”，赵昭仪得到成帝的无限宠爱。尽管受宠超过姐姐，赵昭仪没有取后位代之的野心，且千方百计保护其姐的后位，飞燕淫乱传开，还为其开脱，使她得遂其私欲。赵飞燕也不因其妹受宠而争风吃醋，而是偷汉自乐。赵家姐妹侍候成帝十余年，都不生子，飞燕知道没有孩子来继皇位就难保其尊贵地位，便与宫中侍郎、宫奴通奸，还使人多次偷运美男子入宫欢聚。为了方便偷汉，她告知成帝不要打扰她，让她独居一室祈祷求子，成帝正在迷恋其妹，当然乐得答应。尽管飞燕得以纵情偷汉，却始终没有怀孕。公元8年，定陶王刘欣来朝，王母傅太后厚赂赵皇后、赵昭仪，要求立其为太子，赵氏姐妹为己打算，向成帝赞誉刘欣。翌年，刘欣被立为太子。也在这一年的某日，成帝在赵昭仪处，早晨起床，刚穿袜子，找不到衣穿，又不能说话，一会儿便呜呼哀哉了。成帝一贯身体强壮，一旦暴死，朝野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王政君诏令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等审查成帝起居发病

情况，赵昭仪惊而自杀。成帝死，太子刘欣继位，称哀帝，因感赵飞燕推立之恩，立为皇太后，对成帝之死也不加追究。数月后，司隶解光揭发了赵昭仪杀害成帝与许美人及中宫史曹宫所生二子的案件：

公元前12年，中宫史曹宫偷偷地告诉官婢道房说：“陛下幸宫。”后数月，官婢曹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说：“御幸有身。”满月，曹宫生了一个男孩子，成帝派六个婢女服侍。这事被赵昭仪知道了，派中黄门田客持有盖御史中丞印的诏书，通知掖廷狱丞籍武说：“新生的婴儿，不论男女，是谁生的，连同婢女六人关进暴室狱。”曹宫位对武说：“藏好我儿胎衣，丞应知道这不是一般的孩子！”过了三日，田客又来追问：“婴儿死了没有？”武说：“还在暴室狱内，没有死。”田客回去，一会儿又来说：“皇上与昭仪大怒，为什么不把婴儿杀死？”武叩头哭说：“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武为挽救婴儿，便写疏请田客转呈成帝，疏说：“陛下还没有继嗣，子无贵贱，请陛下郑重考虑！”田客又来对武说：“今晚你把婴儿交给中黄门王舜，在东交掖门交接。”武问：“陛下看武书，意见怎样？”田说：“看后，瞪着眼直看！”武以儿交舜。也许成帝看了武疏后有所醒悟，嘱舜将儿置于殿中，择乳母张充代养，并告诉她：“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后三日，客又带来诏书给武，中有一小绿筐，诏书说：“告武以筐中物，书予狱中妇人，有药丸二枚，武亲自监视她服药。”武开筐有药丸二枚，有一小纸条写道：“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再入宫。汝心里明白。”伟能即曹宫。宫看了，说：“原来是她姐妹想独霸天下！我儿头发漫延到额前。像其祖父孝元皇帝。今儿不知在哪里？孩子生命很危险！怎样才能使皇太后知道这事啊！”宫饮药而死。六宫婢也被赵昭仪所逼自缢死。以上情况，武皆据实上奏。奶娘张充养儿十一日，昭仪派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从此，婴儿无影无踪。

第二年，许美人因得成帝的御幸生了一个男孩。成帝这次没有瞒赵昭仪，如实告诉她，想求她留下这个孩子作为继嗣。昭仪一听，说：“你常骗我说是从皇后那里来，许美人是怎样生儿子的？你前说不立许美人为后，现在生了儿子，她将立为皇后了！”说罢，这个泼妇以手自捣，以头碰壁柱，从床上投到地上，大哭大闹。饭送来了，也不肯食，说，“今天就打发我走好了！”成帝说：“我老实告诉你，反而生气，真不可理解。”成帝也不食。昭仪说：“陛下常自说‘我已有约，决不负你’今美人有子，这不是负约？”成帝说：“既与你姐妹有约，就不会立许氏为后。没有人能在你姐妹之上，不必担心！”于是，成帝派勒严持诏书给许美人，并告严说：“美人有物交给你，你可放在饰室门窗的南面。”美人将所生儿放在苇筐里交给勒严，勒严照成帝的意办后离去。成帝与昭仪在房里坐，叫侍者打开苇筐后，令侍者都走开，便自关门，须臾开门，叫侍者进来，将苇筐缄封，放在屏风的东面。诏令中黄门吴恭把苇筐交给籍武，叫他告知武：“筐中有死儿，把他埋葬，勿令人知道。”籍武在暴室狱里挖个坑，把死婴埋了。

尽管杀婴儿案件被揭发了，哀帝也不了了之。哀帝死，王氏外戚集团得势，重审赵氏残害帝嗣之事，将赵飞燕幽禁北宫，后又废为庶人，令她搬出皇宫，到成帝陵园去住。是日，飞燕自杀。其实凡嫔妃所生子都被赵氏姐妹所杀，怀孕的都强其堕胎，而被揭露出来的只有上述两案。之所以不厌其详地复述《汉书》所记的这两起杀婴儿惨案的细节，是使人知道具有蛇蝎心肠的赵氏为了其后位，怎样狠毒地害死了两个婴儿。其中的一个婴儿的母亲

服被赐毒药前，为儿子及己之死而发出的凄喊，至今还回响人间！更令人惊骇的是，同意和亲手扼死这两个婴儿的，正是他们的父亲，且又是一个皇帝，他还没有人继嗣，那时一般人还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何况皇帝需人继位，这位皇帝考虑到这个问题，并一度想保存这两个婴儿，但在女人的淫威面前，他屈服了，这个只知在“温柔乡”中醉生梦死而不要儿子的窝囊货，因他对那个女人宠之深而畏之甚，为讨得她的喜欢，要他怎干都情愿，杀自己的孩子，只不过是这个荒唐皇帝干的荒唐事之一，正因他如此荒唐，他的大名才引起人们的注目。

### 夫君痴呆南风矫旨胡为

赵氏姐妹是因貌美得宠而作恶，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则其貌不扬，为人奸恶，因惠帝是白痴，故任她摆布，得以行其好遂其恶，祸害人间。

据《晋书·惠贾皇后传》记载：晋武帝为太子选妃，有人介绍贾充女贾南风，皇后因贾充是开国功臣，拥立晋武帝又有功，想纳其女，但武帝对此女不感兴趣，想取太子少傅卫瓘的女，其理由是：“卫公女有五可，贾公女有五不可。卫家妇人其种贤而多子，貌美皮肤又白；贾家女人其种妒而少子，长得丑而皮肤黑。”皇后却坚持要纳贾充的女，大臣荀凯、荀勖是贾充的亲党，他俩交口吹捧贾充女贤惠，武帝拗不过皇后，又被荀凯等所惑，乃纳贾充女为太子妃。初，欲娶贾充小女贾午，午才十二岁，小太子一岁，长得矮小，连衣服也下会穿，便娶南风，她十五岁，大太子二岁，被立为太子妃。

贾南风姓妒忌多权诈，太子司马衷却是个白痴。有一次他到华林园，听到蛤蟆叫声，他问左右侍从：“此鸣者为官事，还是为私事？”有人答道：“在宫地叫为官事，在私地叫为私事。”及天下灾荒，老百姓饿死很多，他说：“何不食肉粥？”司马衷愚蠢如此。立为太子，大臣都知他不能理政事，卫瓘很为此担忧，晋武帝在陵云台观宴，瓘假醉，跪帝床前说：“臣有事上奏”武帝说：“公想说什么？”，瓘欲说又止的有三次，便以手抚武帝宝座说：“以座可惜呀！”武帝领会他的意思，又怕他明说，便装糊涂说：“公真醉了？”瓘不再说什么。贾南风知道此事，由是怨瓘。由于司马衷如此痴呆，朝臣多属意由晋武帝的弟弟司马攸做来继承皇位，但晋武帝还是坚持由其子来继位。为了杜塞人口，晋武帝便设宴会招待东宫大小官员，派人送去密封疑事让太子即作出决断，其妃南风大惊，忙请外人作答，答者多引古义，只有给使张泓说：“太子不学，而所答引古义，皇上必知是别人代笔，将受到谴责。还是以直对为好。”南风大喜，对泓说：“便为我好答，富贵与共之。”泓代答了，由太子亲自抄写。武帝看了，非常高兴。先给卫瓘看，他明知是假，又不好说，故表面装恭敬而心里很不安，众人看了卫瓘的表情，知其对太子有看法，因武帝赞太子，殿上皆呼万岁。贾充密使人告知南风说：“卫瓘老奴，几破汝家。”由于武帝有意庇护，南风又善于作假，太子司马衷终于蒙混过关。

南风性酷虐，尝亲手杀死数人，甚至以戟掷孕妾，使婴儿随刃堕地。武帝知道了，大怒要废之。贾充的亲党纷纷为她说情，有的说：“贾妃年少，妒是妇人的常情，长了自知改正。”有的说：“陛下忘记了贾公的拥立之功吗？”武帝因贾充之故，也就作罢。

武帝死，惠帝即位，贾南风被立为皇后。南风暴戾日甚，由于操纵了白

痴皇帝，诏书都由她手出，故能为所欲为。初，皇太后父杨骏专政，南风便矫诏使司马玮等杀死杨骏及其党羽数千人，废太后杨氏为平民，以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不久，又矫诏使司马玮杀司马亮，再矫诏用“擅杀”的罪名杀司马玮。尔后各王互相残杀，史称“八王之乱”。晋室诸王内讧，引起中国大乱，她实是祸首。

她擅政十年，荒淫放恣，无恶不作。除了与太医令程据等淫乱，还经常派人物色美少年偷运入宫淫乐。洛阳城南部有一个盗尉部的小吏，长得十分俊秀，他薪奉很低，忽然之间却穿起很华贵的衣服，人们怀疑是偷窃得来的，军尉也认为他有问题，就逮捕他开堂审问。贾后的远亲财物被偷也到堂听审，想找回被偷的东西。这位小吏照实供认说：“有一天，我遇见一老妇人，说她家有人病了，巫师占卜说宜找到城南少年来镇邪，病才能好，欲暂麻烦他，还说必有重报。于是，我便跟随她去，上了车，她放下了车帷，叫我进入一个大竹箱里，走了大约十余里路，过了六七道门槛，她开箱放我出来，忽见很多金壁辉煌的亭台楼阁。我问老妇人：这是什么地方？说是天上。到了一豪华房间，以香汤给我沐浴，又送来美味佳肴和漂亮衣服。进来了一妇人，约有三十六、七岁，个子短小，肤色青辉，眉毛后面有一小疤。我被留了数夜，跟她共枕欢宴，我离开时，就赠我各种贵重东西。”贾后的远亲听了所述女子的形貌，知是贾后，讪讪地笑着走了。军尉也明白了。当时其他入者，贾后满足其淫欲后便将之杀死，因贾后特别喜欢这个小吏，才让他活着出来。

后因贾南风废太子又派人将之活活打死，激起朝廷上下愤怒。赵王司马伦、梁王司马彤等便联合司马氏诸王发难，率兵入宫，矫诏逮捕贾后，并矫诏派人送金屑酒给南风，逼其饮下，于是这个奸诈、狠毒、暴虐天下的女人便一命呜呼了。

## 七、御丈夫有妙术的女人

一般来说，能御使丈夫的，或以其有美色，或恃其多金，或因其强大的政治背景，总而言之，她必有所恃，使丈夫不得不受或甘心受其御使。但也有一些特殊情况，有些女人完全没有上述三个条件，且恰恰与之相反，这就是说既无美色可恃，出身又贫穷、微贱，而丈夫却服服贴贴地受其指挥，如辽国章宗的元妃，明宪宗的万贵妃。她们靠什么手段而能如此，这确是个谜。有人对此进行探讨，企图将这谜解开，却不能给人满意的答复。

### 万贵妃为夫当好保姆擅权内外

《明史·万贵妃传》记载：万贵妃，名贞儿，山东诸城人。四岁被选入宫，初为孙太子宫女，及长，到东宫服侍年幼的太子朱见深，以年龄论，她足可当太子的母亲，实际上她那时是当保姆，照顾太子的起居饮食。由于她对太子照顾得无微不至，太子很喜欢她，便诱引太子与她发生了性关系，她是太子第一个宠幸的女人。英宗死，太子继位，称宪宗，这时宪宗才十六岁，而贞儿已有三十五岁了。宪宗纳的后妃，年纪还比宪宗小些或差不多，且年轻貌美，其宠爱却远不及贞儿。皇后吴氏就是因她进谗言被废的。她为宪宗生了第一个皇子，宪宗大喜，封她为贵妃。可是皇子不久便死了，从此她没有再怀孕。但她不让别的女人怀孕，凡宪宗御幸而怀孕的，她都强其饮药堕胎。据说太子朱祐樘即后来继位的孝宗生时，头顶有寸许没有头发，便是由于其母服堕胎药所致。后来，其母纪淑妃之死，实是万贵妃所害。宦官汪直、梁芳、钱能、韦兴等辈都假借贡献为名，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万贵妃的欢心。她以奇技淫巧为乐，祷祠宫观，糜费无数。万贵妃死时，宪宗悲痛得很，为之罢朝七日。

皇后吴氏因她进谗被废的事情是这样的：朱见深在东宫时，英宗为他择配，得十二人，后选吴氏、王氏、柏氏三人留宫中，作为太子妃的候选人。未及决定谁为太子妃，英宗便死去。宪宗立，太后派大监牛玉去挑选立后。经牛玉观察和太后决定，立吴氏为皇后。有一次，万贵妃有过，吴后叫人用杖打之，宪宗知了大怒，立即下诏废吴后，说，“先帝为朕选贤妻，原定王氏，留在别宫待婚。太监牛玉竟以己落选的吴氏，向太后建议选吴氏为皇后。举行了册立典礼，朕见她举动轻佻，礼度率略，德不称位，经过观察才知她非原先预选的。因此，请命太后批准，废吴氏于别宫。”（《明史·宪宗废后吴氏传》）显然，预选和复选都经太后同意，个中情况太后是明了的，不会有弄虚作假之事，而宪宗能用假证据以废后，这是对太监牛玉刑讯逼供的结果。本来皇后为后宫之主，因贵妃有过杖之并非了不起之事，而因此吴后立一月便被废，足见万妃之利害。宪宗如此宠受这个半老徐娘，宁愿废掉年轻貌美的吴皇后，这是什么原因？

凡是宪宗御幸怀孕者都被逼服药堕胎，事前显然宪宗无所知，而万贵妃何以有如此力量使诸妃、妾听从，且对她十分畏惧，则是一个谜。纪淑妃事件便是个典型例子。纪氏是广西贺县人，是当地土官的女儿，她是在一次朝廷派兵征伐当地民族起义时被俘入宫的。她为人机敏又通文字，初作女史，后命管宫中仓库。时万贵妃专宠而性妒，后宫被御幸怀孕的逼其堕胎，柏贤妃生子被宪宗立为悼恭太子，亦为万贵妃所害，这事纪氏是有所闻的。有一

次，宪宗偶然到宫内仓库，跟纪氏谈话，见她应答合意，很高兴，御幸之，就怀了孕。万贵妃得到其耳目报告此事，妒性大发，派宫婢去惩治她，该婢假报说，纪氏不是怀孕，而是肚子里长有痞块。万贵妃便将她谪居安乐堂。满月，纪氏生了一男孩，万贵妃知道后，便叫门监张敏将孩子溺死。敏惊说：“上未有子，奈何弃之？”他便将孩子抱去藏在别室，用米粥加蜜糖哺养。孩子至五六岁，未敢剪发。时废后吴氏住处近安乐堂，密知其事，也时常来哺养孩子。因哺养的极其保密，万贵妃无从侦知，宪宗也无所知。自悼恭太子死后，宪宗久无嗣，朝臣都以为忧。有一天，宪宗叫张敏代他梳头发，照镜叹说：“老将至而无子。”张敏跪在地说：“臣有死罪，不早报告万岁，万岁已早有孩子了。”宪宗听了为之惊愕，问孩子在哪里，张敏说：“奴才说了必死，万岁要为皇子作主。”这时在旁边的太监怀恩叩首说：“张敏说的是真。皇子现养在西内，现在已六岁了，恐遭不测，故藏匿不敢让人知道。”宪宗大喜，当即到西内，派使往迎皇子。使至，纪氏抱皇子哭道：“儿去，我不得生。儿见穿黄袍有须的，就是儿的父亲。”她给儿子穿上小红袍，扶儿子坐上小车。孩子被使者带至殿下，他发长披地，孩子见穿袍有须的便投入其怀前。宪宗抱他坐在膝上，抚视久之，悲喜泣下说：“确是我的儿子，很像我。”派怀恩向内阁告知这喜事，群臣皆大欢喜。明日，都入贺，颁诏天下，移纪氏居永寿宫，封为纪妃，数次召见。万贵妃知道了，日夜怨泣说：“群小欺哄我。”不久，纪妃忽然死了，有的说是万贵妃害死，有的说是自缢。纪妃的孩子被封为太子，自己又贵为妃，数被召见，这时自缢是不可能的，显然是被万贵妃所害。张敏也因惊而吞金死（《明史·孝穆纪太后》）。问题是，纪妃暴死，张敏又吞金死，宪宗却毫不过问，这又是什么原因？

汪直、梁芳、钱能等都是历史上有传的宦官，都得到宪宗的宠信，尤以汪直为最，是当时的宦官头儿，他权倾天下，大臣见之跪拜，而他们却竭力竭财以结万贵妃的欢心，他们与万贵妃有什么关系？

宪宗虽不是明主，但开始还是想有所作为，《明史·宪宗纪》的“赞曰”称他初还有“人君之度”，“能笃于任人，蠲赋省刑，闾里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复见。顾以任用汪直，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夫明断如帝而为所蔽惑，久而后觉，妇寺之祸固可畏哉。”所谓“妇”实指万贵妃，其实汪直之得志，其后台是万贵妃。据说万贵妃“机警，善迎帝意。”“帝每游幸，妃戎服前驱。”这寥寥数语，已勾画出万贵妃既机警又泼辣的形象。如前所说，宪宗年幼时因她这个保姆“善迎帝意”而得宪宗的喜爱，由主仆关系变成夫妻关系；及宪宗即位，她仍担当其保姆角色，这时，她不仅是照顾宪宗的生活，而是照管宪宗的一切行动，由于其“善迎帝意”，她这种照顾也就得到宪宗的赞许。通过特务组织刺探臣民的言行，实行极端专制的统治，明朝一建国就是这样做的，太祖留下的这个规矩明历代皇帝都执行，宪宗也是靠此实行统治的。汪直原是万贵妃的小内侍，因其人机敏甚得万贵妃的欢心，也就得到宪宗的赏识，升为御马监太监。宪宗想刺外事，便设西厂命汪直掌管，所领官校倍于东厂，掌东厂太监尚铭听其指挥，锦衣卫千户吴绶为其爪牙，权势远出东厂及锦衣卫之上。当时特务遍布朝廷内外，宪宗就靠着这些耳目爪牙，统治他所统治下的王国。汪直横行霸道，作恶累累，因有万贵妃的保护，宪宗对他宠信不衰。汪直作恶有万贵妃做后台，而万贵妃也利用汪直横行后宫，对吴后的诬害和毒杀妃、妾以及皇子，显然是通过汪直这帮特务干的。而梁芳、韦兴、钱能则是一个宦官的贪污集团，其贪财手

法：一是“糜费帑藏”，累朝积下的七窖金都花光了；二是假出外采办为名。到处勒索，苛敛民财。为得到万贵妃的保护经常向她进贡美床珍宝，有了万贵妃这个后台，宪宗对他们的胡作非为也不过问。这是因为：万贵妃所做的正是宪宗之所需，她利用汪直的西厂刺事使宪宗能实行专制统治，接受梁芳的贪污集团的贿赂以满足宪宗的穷奢极侈，故深得宪宗的欢心和信任，这也就是这个半老徐娘能御使这位年轻皇帝和擅权内外的关键原因。

### 李淑妃以才智御夫操纵朝政

如果说万贵妃是以保姆身份以御使丈夫，李师儿则以其才智投夫所好而操纵丈夫。金章宗完颜璟在即位之初，宵肝忧勤，选才治国，政简刑清，堪称守成之君。自纳元妃李师儿后，宠信有加，元妃导之纵情享乐，军国事尽委之裁决。元妃因之得以广结朋党，与尚书右丞胥持国勾结，操纵朝政，排斥异己，由是金势渐衰。

《金史·章宗元妃李氏传》记载，无妃，姓李，名师儿，父亲李湘，母王盼儿，因有罪被没入宫监籍，李师儿也以监护妇子入侍宫廷。是时张建在宫中学校当教师，师儿与诸宫女皆从之学。按照惯例，宫中教师授课时，师生不得见面，要以青纱隔开，学生有不识的字及提问疑难，都自青纱屏风内映纱指字询问，教师在青纱外解答。诸宫女中，李师儿最聪慧和易于领解，张建不知是谁，但听到她的声音很清亮。章宗好学，善文辞，他想选择一宫女为近侍，便问张建：“你所教的宫女中，哪个最可教？”张建答道：“就中声音清亮的最可教。”章宗据建所言求得之。师儿相貌虽一般，但性聪黠，能作字，知文义，会说话，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故得到章宗的宠爱。初被封昭仪，不久封为淑妃。李淑妃得宠，泽及枯骨，全家显贵：父湘追赠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陇西邵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赠；曾为强盗的哥哥喜儿与弟铁哥皆当大官，一些谄谀附势之徒争趋走其门，南京李炳、中山李著与通谱系，得以升官，胥持国依附李淑妃得以任宰相。一日，章宗在宫中欢宴，优伶璫头献戏于前。有人问：“上国有何符瑞？”璫头说：“你没听说凤凰出现吗？”其人说：“听说过，但未知其详。”璫头说：“其飞有四，所应亦异。如向上飞则风调雨顺，向下飞则五谷丰登，向外飞则四国来朝，向里飞则加官进禄。”章宗虽知其意所讽，不便明责，只好一笑作罢。

章宗喜爱李淑妃，也因二人气味相投，章宗好文辞，淑妃也善诗。李淑妃为使得章宗欢乐，常导他出游，中都（今北京市）名山胜景都留下其足迹，章宗在中都八景之一的“玉泉垂虹”上为李淑妃建梳妆台于其上。一次章宗偕李淑妃到此游览时在台上小憩，章字吟诗说：“二人土上坐”李淑妃立即口续说：“孤月日边明。”章宗见其才捷如此，大为赞誉。李淑妃谈吐诙谐，每见章宗愁闷或不满，经她一语解颐。有一天章宗驾幸蓬莱阁举行内宴，见阁内所陈玉器俱刻有宣和年号，惻然不乐。李淑妃察言观色，知他是因宋徽宗乃亡国之君，将亡宋器皿陈列于此，乃不祥之兆，便解释说：“做此器皿的未必用，用此器皿的未必做，一饮一啄，皆由天定。宋徽宗做此器皿，不过为陛下预备而已。”章宗听了怡然开颜。

章宗自宠爱李淑妃后，其权逐渐转移到她手中。他因敬佩她的才干，认为是自己的爱妃，可以为己分忧，便把许多军国大事交予她裁决，自己乐得

偷闲享乐，于是，便从一个励精图治的君王变成厌于理政无所作为的庸主。而李淑妃对于军中上奏，报喜不报忧，凡坏消息，抑而不告，间或有金军小胜即呈报章宗，使其欢笑。当蒙古兵逼近金都时，章宗还蒙在鼓中，有大臣奏知此事，他才惊慌失措，责问近侍说：“此等大事，你们为何不早为奏闻？”近侍说：“章奏都在淑妃处，臣等无由得见。”章宗听了，无话可说，因宠爱淑妃，也不责备。李淑妃就是这样瞒上欺下，把持朝政达十年之久。由于她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与胥持国等朋党为奸，使国事日非，给金国埋下了覆亡的种子。

李淑妃曾生一子，二岁时便夭亡，因章宗无子，想立其叔父卫王永济为继承人，章宗死，李淑妃与大臣便拥卫王登上帝位，称卫绍王。后卫绍王为打击李淑妃的势力，便诬以他故赐其自尽。李淑妃对金国的覆亡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她被诬而赐死则是冤枉的。她拥卫绍王是有功的，而反被卫绍王所杀，可见封建王朝为争权夺利而斗争之残酷和复杂。

## 八、野心勃勃的女阴谋家

凡已有先例的，人将效之。自从吕后临朝称制，两汉后妃步她后尘的不少，以后也大有人在。而她们有此勃勃野心是由于其后妃地位所决定的，当然其中安份守己的更多，虽不少后妃都有此机会，也不敢效之。武则天则不仅效吕后临朝听政，甚至公然当上了女皇帝。其媳妇韦后很羡慕婆婆所为，恰好其夫君唐中宗李显是个庸主，揽权擅政的野心越来越大，可是当地进一步学其婆婆时，结果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明神宗朱翊钧也是个昏君，故其贵妃能恃宠谋权，想争当皇后，争立其子为太子，也想来一次临朝听政，但到头来，机关算尽，心机也费尽。

### 韦后夺权毒死夫君落得族诛

韦后和唐中宗原是患难夫妻，后来由于权欲膨胀，韦后竟狠心地毒死了曾经跟她相亲相爱的夫君。

《旧唐书·韦庶人传》记载：韦氏，唐京兆万年（今陕西临潼北）人。中宗李显为太子时，纳为妃。中宗即位，立为皇后。不久，中宗被其母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将他俩安置在房州（今湖北房县）。鉴于两个哥哥曾被武则天废杀，李显惊不自安，每听说朝廷派使到房州，就惶恐得很，欲自杀。韦氏安慰他说：“祸福倚伏，何常之有，人总要一死，何必这样害怕！”他两就是这样互相依靠，互相安慰，在房州度过了十五年的艰危生活，因此，两人情义甚笃。李治曾对韦氏说：“一朝见天日，任你所为，誓不相禁忌。”他俩共生一子四女，其中小女安乐公主生于房州，生时李治脱衣裹之，故名裹儿，对她特别宠爱。及中宗复立为太子，又立韦氏为妃。

705年（神龙元年），武则天病重，宰相张柬之等乘机拥戴李显复位，杀死武则天内宠张易之兄弟，逼武则天让位于李显，上尊号为应天神龙皇帝，立韦氏为顺天皇后。

为扩大自己的权力，韦后与武氏族人结为朋党，专擅国政。在李显复立为太子时，韦后恐再遭不测，便与武氏攀亲，以讨好母皇武则天，她将三女儿永泰公主嫁给武则天的侄儿、武承嗣的儿子武延基，小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则天另一个侄儿、武三思的儿子武崇训。中宗复位后，虽有人建议除掉武氏，他不仅不接受，因韦后和爱女安乐公主为之说情，武三思及家族又恢复了权势。韦后将曾为武则天专掌诏命的才女上官婉儿推荐给中宗封为婕妤，后封昭容负责诏命，使她成为自己的党羽。又经上官昭容的牵线，韦后与武三思私通，武三思可随便出入宫中，坐在御床上，跟韦后玩双陆，赌输赢，中宗却坐在一旁为他俩数筹码，以为欢笑。韦后还将和尚慧范引入宫中淫乐，丑声日闻于外。上官昭容及受宠的宫人，都在外建私宅，出入不受节制，那些邪佞的朝官与之狎游。谄谀结纳，通过走内线以升官。韦后的亲属，内外封拜，遍列要职。安乐公主尤其显贵，设立公主开府，配置属官。她恃宠骄恣，卖官鬻职，宰相以下臣僚，多出自其门。由是官吏骤增，宰相、御史、员外官人数均多，有“三无坐处”之话。她势倾朝廷，常自草制敕掩其文请中宗签批，中宗不看笑而从之。她的官衙所用的人，都是邪佞小人，跟她一起作恶。她广营第宅，极其豪华，水泰、永寿、长宁三公主也迭相仿效。强占民田，滥征民工，弄得怨声载道。韦、武两族就这样互相勾结胡作非为，

而中宗昏庸懦弱，听之任之。

李显复任太子时，子重润立为邵王，他因不满武则天内宠张易之兄弟所为，曾与人议论，被武则天赐死。中宗复位后，立李重俊为太子，韦、武集团视太子为眼中钉，想去之而后快，安乐公主及其丈夫武崇训经常辱太子，呼为奴才。韦后和上官昭容也经常在中宗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太子对韦、武集团极为愤恨，并为自保计，便与左翊林大将军李多祚决定实行政变，便起兵杀死武三思全家，后政变失败，太子被杀。太子既死，安乐公主要求立她为皇太女，以继承皇位，中宗虽不同意，也不责备。

上官昭容劝韦后行则天故事，而韦后虽已取得与中宗并列听政之权，但心还不足，千方百计以扩大其权力。她的党羽宗楚客率百官上表，要求加韦后号为顺天翊圣皇后。韦后还使人散布祥瑞，妄称韦后衣箱有五彩云飞，中宗信以为真，使画工绘之，拿给百官看。右骁卫将军、知太史事迦叶志忠这个拍马屁能手，认为是取悦皇后的好时机，便上表为她鼓吹说：“昔高祖未受命时，天下歌《桃李子》；太宗未受命时，天下歌《秦王破阵乐》；高宗未受命时，天下歌《侧堂堂》；天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武媚娘》；应天皇帝未受命时，天下歌《莫王石州》；顺天皇后未受命时，天下歌《桑条韦也》、《女时韦也》。臣认为后妃之德，韦后为盛，合为国母，主蚕桑以安天下。谨进《桑条歌》十二篇，请宣布中外，编入乐府，待皇后祀先蚕时，在宗庙演奏。”中宗看了很高兴，表示同意，其实，将韦后与唐代皇帝并列，预示着她将效行则天皇帝的故事。

韦后的勃勃野心日益暴露，中宗有废后之意，但犹豫不决，韦后知了先下手为强，710年（景龙元年），韦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中宗。少帝李重茂即位，尊韦后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后与党羽密谋，害少帝以自立。当她正在做当女皇的美梦时，相王李旦之子李隆基发动政变，拥李旦即位，称睿宗。韦氏、武氏宗族，无少长皆斩之。这个野心勃勃的女阴谋家终于遭到身死族灭之祸。

### 郑贵妃争位谋权费尽了心机

郑贵妃是韦后式的人物，为争位谋权，引起“三案”事件，加剧了党派之争，一直到明亡。

《明史·郑贵妃传》记载，郑贵妃，陕西大兴（今临潼北）人。万历初被选入宫，封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升皇贵妃。明神宗对她特别宠爱。外廷疑妃有立子之谋，群臣不断上章争言立储事，皆指斥宫闱，攻击执政，神宗概置之不问。由是门户之祸大起。

初，神宗幸服侍李太后的宫女王氏，王氏怀孕。按规定，皇帝幸宫女，必有赏赐，而所幸年月及赐物都有专人记录在案。神宗隐瞒此事，左右也不敢说。有一天，神宗陪李太后食饭，太后说及此事，神宗不吭声。太后叫拿宫内起居注给神宗看，好言对他说：“我老了，还没有孙子。如果能生一男子，是宗社之福。母以子贵，哪能分等差？”于是，封王氏为恭妃。八月后，生皇长子朱常洛。神宗对恭妃很冷淡，而宠爱的郑贵妃生皇三子朱常洵时就被进封为皇贵妃，却不进封恭妃。及皇长子生了孙子，恭妃才进封为皇贵妃。几年以后，又把她的贵妃头衔革去，幽禁冷宫，她病危时，朱常洛请旨得往探视，而宫门犹闭，破门才得入。这时，她双目已失明，手抚着皇长子哭泣

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便死了。

郑贵妃恃宠对神宗施加压力，要立其子为太子，自己则可进封为皇后，神宗也有意立朱常洵嗣位，但由于群臣大多坚持立嗣以长的旧规，而神宗又不同意，于是采取拖延之策。郑贵妃为争立其子费尽了心机。先是，侍郎昌坤为按察使时，撰写《闺范图说》。太监陈矩看见了，拿给神宗看，神宗将之赐郑贵妃。妃重新刻印，吕坤实未参与其事。后有人为《闺范图说》写跋，名曰《忧危竝议》。作者匿其名，在京师散发，指出坤书有汉明德皇后由宫女晋升为皇后的记载，意在说郑贵妃可以为后，而妃刊刻此书，实藉此为立己子之据。书中采用问答的形式，说：“郑福成者，郑氏福王之子当成也。”现在神宗以朱庚为首辅大学士，庚与更同音，寓意将有更易之举动。书名《忧危》，以坤曾有《忧危》一疏，因借其名以讽。此书当时被称为“妖书”。神宗看了大怒，令锦衣卫搜捕撰书者甚急，久之，得噉生光，被严刑拷打，终于诬服，处以极刑。

神宗溺于酒色，不理朝政，因爱郑贵妃，为立其子却花大气力。为争立太子，即所谓“争国本”，先后持续十五年之久。迫于众议，乃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为福王。其实太子和福王都是一丘之貉，明后期那些大少皇子们都是昏庸货色。

虽立了太子，郑贵妃并不从此罢休，为争立太子谋后位仍耍尽阴谋，著名的“挺击”、“红丸”、“移宫”三案事件都与之有关。“挺击案：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傍晚，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随后被捕。经反复审问，作军人名叫张差，他供认，是郑贵妃的内侍宠保、刘成指使他闯入慈庆宫，并说“打死小爷，有吃有穿。”因涉及郑贵妃，神宗乃大事化小事，只杀张差和秘密处决庞保、刘成，不了了之。史称“挺击案”。“红丸案”：神宗死，太子常洛继位，称光宗，因其酒色过度，不久便生病，郑贵妃使她的心腹医官崔文升为他看病，给他服泻药后，腹泻不止。鸿胪寺丞李可的献红丸一颗，自称仙丹，光宗服后，称觉舒适。过了半日，又献上一丸，光宗服后睡至凌晨死去。史称“红丸案”。“移宫案”：光宗死后，皇长子朱由校继位，号熹宗。光宗的宠妃李选侍和郑贵妃不肯搬出乾清宫，妄图借帝年少垂帘听政。由于大臣反对，逼她俩迁出乾清宫。史称“移宫案”。三案是按照东林党人意图结案的。高宗后期几年，魏忠贤专政，组成阉党，为“三案”翻案，逼害东林人。郑贵妃想东山再起，魏忠贤虽尊重她，却不让其插手政务。这位女阴谋家的野心始终没有得逞，终于在失望中默默地死去。

## 九、迷酒色终于倾城倾国

酒色是人们的生活必需，每当喜庆事，亲友相聚，举杯以表祝贺，而“酒逢知己千杯少”，亦人间快事；美色足以悦人，世间不爱美色的罕见。但任何事物过了一定的限度，就将会走向它的反面，酒色过了度也足以伤人误事，这是对个人而言，如是负有国家重任的，“不爱江山爱美人”，以至于倾城倾国的教训，屡见不鲜。唐玄宗和李煜便是这样的典型人物。由于沉迷酒色，唐玄宗是倾城，李煜则是倾国了。从夫妻间的关系来说，杨贵妃只不过是唐玄宗的玩具，李煜和大小周后还算是意味相投，都善诗词，喜歌舞，夫唱妻随，其乐无穷，但只乐于此，置国家和人民于度外，到头来，国倾了，自己成了阶下囚。

“此恨绵绵无尽期！”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廩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这是诗人杜甫在《忆昔》一诗中描写的开元年间的盛况，创造这“开元盛世”的是我国历史上比较有名的皇帝唐玄宗，开元是他的年号。“开元盛世”得来不易，是他即位后较长的一段时间励精图治的成果，促使唐皇朝发展到它的最高峰。但在这样的辉煌成就面前，他被胜利冲昏头脑，国家的富裕使他忘乎所以，飘飘然，沉醉于声色之中，尤其是自纳杨家女为贵妃以后。

《新唐书·杨贵妃传》记载：玄宗贵妃杨氏，原籍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幼年便失去父亲，由叔父抚养。始为唐玄字的儿子寿王妃。武惠妃死后，后宫虽美女无数，却没有人当玄宗的意。有人向玄宗推荐寿王妃，说她资质天生，美丽无比，当充后宫。玄宗召来一看，果被她的姿色迷住了，因是自己的儿媳妇，让她先当女道士，赐道号“太真”，在宫中为她建一“太真观”，实是他与“太真”合欢之处。玄宗另为寿王聘了韦诏训之女。而太真“善歌舞，邃晓音律，且智算警颖，迎意辄悟。”深得玄宗的宠爱，宫人称她为“娘子”。后封贵妃。一人得宠，全家富贵：追赠父玄琰为太尉、齐国公，升叔父玄珪为光禄卿，任堂兄钊为鸿胪卿，筠为侍御史、驸马都尉，娶太华公主。远亲杨国忠因贵妃关系而得任金吾兵曹参军。因他工于心计，善于奉迎，甚得玄宗的宠信，升官很快。后来还当了宰相。贵妃的三个姐姐都长得很漂亮，玄宗呼为姨，分别封为韩、虢、秦三国夫人，出入后宫。恩宠声焰震天下。“四方献饷结纳，门若市然。”

从唐玄宗宠爱杨贵妃后的奢侈与他以前的节俭相比，可以看出其不同的变化：他即位后下诏说，“宫中凡是豪华的车轿和金银玩器必须销毁，作为军队的一部分资费：珍珠、美玉、锦绣之类，都集中到殿前烧毁。凡是皇后、妃子以下的宫人，不能穿用锦绣衣服，更不能装饰珠玉。”由于他提倡节俭朴素，改变了武周以来的奢侈之风。曾几何时，由他自己倡导的节俭之风也由他自己带头破坏了，为博得贵妃的欢心，并把她打扮得更漂亮，为她装衣服的织锦刺绣工人就有七百，为她制造金银首饰的雕刻熔造的工匠，也有数百人。因此，贵妃的衣服首饰，日新月异，变化若神。四方官僚争贡奇珍异

宝。玄宗将之分赐杨家兄弟姐妹。贵妃爱吃荔枝，唐玄宗命从广东等地换乘驿马昼夜不停地送上长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奔波数千里，不知死了多少传送者，才保存荔枝的鲜味送到贵妃面前，以博得贵妃一笑。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杨家五宅”也随往，每家为一队，五家服色各异，锦绣珠玉，鲜艳夺目，当五家队合在一起时，只见五彩缤纷，映照如百花之焕发。

唐玄宗沉湎于酒色而不能自拔，杨贵妃唱的“霓裳羽衣”妙曲使他昏昏迷迷，他的耳朵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愿听逆耳的忠言了，他对于敢于谏诤的韩林、张九龄等贤相极其厌恶，而对于口蜜腹剑的李林甫的甜言蜜语却很欣赏，对于心居叵测的安禄山也十分信任，终于导致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从其黄金的高峰跌落下来，从此一蹶不振。

诗人白居易写的《长恨歌》就生动而真实地记下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首先写唐玄宗纳杨贵妃后迷恋声色的情况：“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可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峨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是写安史之乱，唐玄宗狼狈出逃的情况。当安禄山率十五万人马直逼潼关时，玄宗仓惶西逃，到马嵬驿，从行将士恨杨国忠误国，将之杀死，逼玄宗下令缢死杨贵妃，玄宗“救不得”，只有伤心流泪而已。诗后半篇则描述“安史之乱”被平定后，玄宗从成都回到长安和晚景的凄凉，对杨贵妃缠绵悱恻的相思。最后写道：“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此恨”是指对贵妃之死的无限惋惜，当然也包括玄宗晚年的悔恨。762年（上元二年），唐玄宗因受已即帝位的儿子肃宗的冷遇，在寂寞、悲愤与疾病交加中死去。

唐玄宗的悲剧，不仅是爱情的悲剧，还有政治的悲剧，前半生曾经是一个英明的君主，后半生因沉迷于声讨而变成了一个昏庸的帝王。

###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是南唐后主李煜国破家亡当了阶下囚后写的《虞美人》，倾诉其怀念故国的哀愁。尽管他对自己过去的昏乱有所悔恨，但已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而这种“悔恨”却给他招来杀身之祸。

《宋史·世家一·李煜传》记载：煜字重光，是李景第六子。少聪悟，喜谈书，善文词，工书画，知音律，是个多才多艺的书生，他的父亲李景是南唐国创立者李升的长子，李升死时，李景及其弟齐王景遂、燕王景达在升棺前盟誓，兄弟相继。先立弟景遂为太弟，后立长子冀为太子，但景遂与冀先后去世，立李煜为太子，李景死，李煜继位。

李景在位时，国势已弱，先后向北周和宋称臣，李煜继位时处境更加困难，仍是向宋哀求图存，而不想振作，且整日沉迷于宫廷宴乐，诗词歌舞之

中。他最宠爱的皇后周宪，史称大周后。据史书记载，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才女，她“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琵琶”，“至于彩戏奕棋，靡不绝妙”。她爱梳高髻，穿轻衣裙，“人皆效之”。她创制新声时，喉无滞音，笔无停思，可以顷刻即成。这样一个才貌绝妙的美人配上以诗词冠世又知音律的风流天子李煜，俩人确是一对理想的伴侣。据说大周后的妹妹的才貌更超绝，在宠爱大同后的同时，李煜与其妹经常偷欢，李煜曾有几首《菩萨蛮》词，描述了他俩幽会的情景，其中一首：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霄好向郎边去。

划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勾画出她倒提着金缕鞋，只穿着袜子，轻手轻脚，心神不定地出来与情人相会的形象。大周后死，李煜立其妹妹为皇后，史称小周后。据说，小周后“警敏有才思，神采端静”，更受到李煜的宠爱。李煜为了跟小周后玩得更畅意，别出心裁地在花丛修了个穷极华丽的小亭子，上覆红罗，饰以玳瑁象牙，雕镂得极其精巧，亭子建得只容二人促膝而坐，他俩在其中饮酒作乐，欢唱艳曲，唧唧我我，紧紧偎在一起。当然，李煜宠爱的不只大小周后，还有不少妃嫔，而他对美人的欣赏和寻欢作乐花样也日益翻新，宫女窈娘，体态轻盈，纤丽善舞，李煜就让人做了六尺高的金莲花，莲花中间作五色彩云，叫她在上面起舞。据说窈娘以帛缠足，成新月状（这便是后世妇女缠足的由来），素袜纤足回旋于莲花之中，有凌云之态。

李煜就是这样跟其大小周后及其宠姬朝朝欢醉，夜夜歌舞，享尽人间的乐事。对于国政，他搁在一边不理；对于北方强敌，他卑躬屈膝，摇尾乞怜，只想得当藩属于愿已足。他即位之初，派户部尚书贡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纱罗缁纒三万匹，且上表申明其继位是偶然之事说：他在诸兄弟之中，并非治国之才，而他这个书生一向对利禄是淡薄的，只想追随古代不愿为君的隐士巢父，许由、伯夷、叔齐等人，过优哉游哉的生活。由于他的兄长冀太子等早亡，才不得已做了继位的国主。在表里极尽其委曲求全之意，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唯坚臣节，上奉天朝。”以后经常贡钱贡物，甚至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希望当个藩属，使他仍能优游生活下去，但这不过是李煜的幻想。赵匡胤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时由宋来统一天下的趋势已形成，哪能让南唐再偏安江南。宋军十万，水陆并发。当宋军迅速推进时，李煜还在寻欢作乐，或到佛堂听和尚法师诵经，请隐士到宫中讲解《易经》八卦。下面军书告急，乃多不通达，宋军已临城下，他还在梦中。一日，他偶然登城看见宋军旌旗遍野，始大惊。李煜只好出降。当李煜及其近臣后妃被宋军押解北上时，他回顾金陵，泪如雨下，吟诗说：

“江南江北旧家乡，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闲坐细思量。”

之后，他在开封过着俘囚的生活，宋太祖时还受到优待。

迄猜疑多忌的宋太宗继位，见其被俘后写的哀愁之词，认为他心怀怨恨，强其服下牵机药的毒酒，这个才四十二岁的昏君和天才词人受尽痛苦凄惨地离开了人间。

### 第三章 父子关系

血统论者有云：“老子英雄儿好汉”，此论无据，自古至今，涌现英雄无数，而其后代能称英雄的有几？刘邦可称大英雄，而西汉一代，“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夫道”。“卓尔不群”的，只有河间献王一人而已。其他开国皇帝的后代大都如此。这说明老子英雄儿未必是好汉。父的某些素状对子女有所遗传，但非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因素是后天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父母对子女们言传身教和所受的教育以及所处环境的影响。在这一章里，正是探讨这些问题。历史事实说明，二流子来自娇生惯养，像海昏侯、东昏侯这样昏乱荒诞的人正因此而不断涌现。对此，其父母难辞其咎。环境如何对儿子影响是很大的，暴君石虎、朱温等，他们本人就是杀人的魔鬼，他们以自己的兽行来影响儿子，正像在狼群中生活的孩子必有狼性一样，儿子将之宰了是不足为怪的。由于娇生惯养、缺乏严格的教育和受到环境的不良影响，王子王孙大都“娇淫失道”，这些人如有机会继位，必然使国事日非，天下大乱，以至国破家亡身死。

#### 一、接班人关系国家兴亡

自古到今，接班人的好坏，对国家的兴亡关系很大。

这方面，古代史留下很多的教训。我国古代开国皇帝，都是在逐鹿中原中成长起来的，他们没有超人的本事，就不可能芟除群雄、统一天下；他们一般还能接受前朝衰亡的教训，轻徭薄赋，让民休养生息，使社会稳定，生产恢复发展，以至曾一度出现盛世。但一到其后继者，大多逐渐走向反面。其原因虽有多种，“传嫡长制”是主要原因之一。“嫡”是指皇后所生的孩子，其中以长者继承，皇后无子才轮及其他嫔妃的儿子。皇子都娇生惯养，又都长在妇人、太监群里，大多是花花大少，碌碌庸人，而立为太子者又限以嫡长居先，他们继位之后不把朝政搞乱那才怪哩！我国传延较长的朝代有汉、唐、宋、明、清，前四个朝代都用“传嫡长制”，其“传延较长”是因有不少忠臣辅佐，并非君王都贤明。因传延较长，当皇帝也就多，昏君占的比例也就高。只有清朝没有采用“传嫡长制”，择其贤者立之，故能干的君王较多，未见出现昏君。

“传嫡长制”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只要是嫡长子，即使是不肖或白痴也要其继位，如汉成帝和晋惠帝便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 刘骜继位汉政权全归王氏

《汉书·成帝纪》及有关人传记载：孝成皇帝，名骜，元帝太子，是世嫡皇孙。宣帝很喜欢他，许字太孙，常带在左右。三岁时，宣帝死，元帝即位，立为太子。及长，好读经书，表现还宽博谨慎。由于元帝的溺爱，逐渐沉于宴乐，好酒爱色。因此，元帝不想让他继位，而定陶王多才艺，母亲傅昭仪又得宠，元帝常想废太子，以定陶王为嗣。驸马都尉侍中史丹经常为之辩护。元帝患病，不亲政事，留意于音乐。元帝击鼓音节很妙，宫中知音乐的也不能比，定陶王亦能之，元帝数赞其才。侍中史丹说：“凡所谓才者，敏而好学，温故知新，皇太子是也。如果取才于丝竹鞀鼓之间，那么善于音

乐的陈惠、李微才高于精通经学的名儒匡衡，可任用他俩为相国了。”说得元帝也笑了。中山哀王刘竟死，太子前往吊丧。刘竟是元帝的小弟，从小到大都跟太子一起学习相处，元帝见太子来了，想起小弟刘竟，悲不能自止。而太子至灵前，毫无悲戚之容，元帝大恨说，“哪有这样不慈仁的人可奉宗庙为民父母！”元帝责备史丹对太子失于教导，史丹急上前免冠叩罪说：“臣恐陛下悲哀过甚，担心陛下身体受损，就告诫太子不要哭，以免增加陛下哀伤。罪乃在臣，该死！”元帝以为然，意才解。后元帝患病，傅昭仪及定陶王常侍左右，而皇后、太子难得进见。元帝病渐笃，忽又生废立太子之心，曾与近臣谈及此事。太子长舅阳平侯王凤为卫尉、侍中，与皇后、太子皆为此忧心忡忡，计无所出。史丹以亲密臣得侍疾，侍元帝独寝时，直入卧内，叩头伏于元帝榻前，哭着谏道，“太子以嫡长立已十余年，天下莫不归心。定陶王得陛下宠爱，现在都说陛下要废太子另立定陶王。如果是这样，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陛下先赐臣死以为群臣之先。”元帝见史丹情意恳切，至为感动，便叹气说：“我病日重，而太子、两王幼少，对后事能不考虑！但没有废太子之议。且皇后谨慎，先帝又爱太子，吾岂可违之！附马都尉哪里听来这种传说？”史丹又叩头说：“愚臣狂闻，罪当死！”元帝又对史丹说：“我病加重，恐好不了。望善辅导太子，毋违我意！”史丹嘘唏而起。由是太子得以不废。

元帝死，太子继位，是为孝成帝，皇后王政君为太后，以太后弟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外戚王氏之兴自凤始。初，王商为丞相，成帝甚尊任之。王凤儿女亲家杨彤为琅玕太守，因玩忽职守，所治灾害频繁，王商派人前往查处，王凤向王商说情，但王商不徇情，将杨彤免官。王凤怀恨在心，寻机报复，后以“闺门丑事”诬告王商，逼成帝将商免相。王商为人正直，一旦被诬悲愤交集，三日呕血而死。从此，政权全归王凤。王凤的兄弟有五人被封侯。王氏外戚权倾天下，“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是时，政出王氏，成帝也受其所制，连用人不得王凤点头也不行。因他有太后做靠山，成帝又不敢违其母意，于是，凡事听从王凤处理。

王氏集团能独擅朝政，也与成帝厌政而纵情于酒消游玩有关。他纵欲奢侈无所不穷其极，或大建宫殿，所建霄遥宫、云雷宫、飞行殿，极其豪华；或大肆围猎，率领千万匹铁骑追逐野兽，声震千里之外；或微行出外，走市串巷，斗鸡玩狗，随意寻欢，后得赵飞燕姐妹，整天迷于温柔乡里，对朝政更不闻不问。由于成帝骄奢淫逸，上行下效，诸王、列侯、外戚、公卿，凭藉权势，拼命聚敛财富，竞相奢侈享受。成帝嫌国库财富不够多，竟置私田于民间，畜私奴车马于北宫，千方百计搜刮钱财，以填其无底的私壑。后成帝终以淫乐丧生。从成帝起，汉家政权掌握在王氏集团手里，直到王莽篡位，西汉终于灭亡。

### 白痴司马衷为帝天下大乱

《晋书·惠帝纪》记载，惠帝，即司马衷，晋武帝第二子。武帝死，即皇帝位。公元290—306年在位。他是个白痴，谁掌握他便可矫诏，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在位期间，“政出群下，纲纪大坏，货赂公行”，造成天下荒乱，百姓饿死，而他竟说：“何不食肉粥？”其痴呆如此！初由皇后贾南风专权，引起皇族互相残杀的八王之乱。其后诸王互相攻伐，相继擅政，他只不过是

个傀儡，相传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

为何晋武帝让司马衷这个白痴登上皇帝位呢？

本来，齐王司马攸是个理想的继承人。司马攸是司马昭所生，晋武帝司马炎的弟弟，史称，其人“清和平允，亲贤好施，爱经籍，能属文，善尺牍，为世所楷，”不论才能或德行，都在其兄司马炎之上，他的祖父司马懿很器重他。他的伯父晋王司马师无子，命攸为嗣。司马师死，司马昭继兄为晋王执政，他认为将来应让其兄的嗣子攸再继承其事业，对攸特为宠爱，每见攸，便抚其座位呼攸小名说：“此桃符座也，”他虽想立攸为晋王太子，由于“传嫡长制”思想的局限，他还是立司马炎为太子。司马昭病危时对司马炎和司马攸讲淮南王刘安、魏陈思王曹植的故事，嘱他兄弟俩不要骨肉相残。司马炎的母亲死时，也流泪对司马炎说：“桃符性急，而你为兄不慈，我若不起，恐必不相容，以是嘱你，勿亡我言。”司马炎父母所顾虑的并不是多余的。

司马炎后代魏，称武帝，灭吴，统一了天下，国号晋。武帝晚年，诸子都弱，太子又是个白痴，而司马攸德高望重，朝廷内外，都希望由齐王司马攸继位。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统因谄谀武帝而得高位，司马攸对这些佞臣很厌恶。勖等以众望在攸，如其继位，祸必及己，便向武帝进谗言说：“陛下万岁之后，太子不得立也。”武帝问：“何故？”勖说：“朝廷内外皆归心于齐王，太子哪能继位呢？陛下可试下诏让齐王归封国，举朝必挽留，就可知道臣说的话是对的。”冯统也插言说：“陛下遣诸侯回到其封地，应先从亲的开始。而亲的莫过于齐王。”武帝也深忌齐王，知道如果不及早处理齐王，他逝世，自己的儿子则难继位，故很赞成荀勖、冯统的意见，于是便下诏要齐王回到他的封国去。诏书一下，果然遭到皇室和大臣的反对，纷纷上书劝阻，征东大将军、扶风王司马骏（司马懿之子，武帝的叔父）也出来说话，连武帝的两个女儿常山公主和长广公主也替司马攸说情，武帝气愤他说：“今出齐王是朕家事，”把她俩痛骂一顿，武帝还把挽留齐王的大臣分别处理，或贬官、免职，或关进监狱，有的进谏被责活活气死。齐王知荀勖、冯统在陷害自己，愤怒致病，乞求武帝准其守母后的陵墓，不许。武帝派御医诊视，诸医知武帝意，皆说齐王没有病，因不得医治，病转重，武帝还是催促他马上起程，齐王不得已，只好入宫向武帝告辞。齐王素讲究容仪，虽病重，还强自整容和打起精神，武帝见其举止如常，更疑其无病，辞出过了一晚，吐血而死，死时年仅三十一岁。

逼死众望所归的弟弟齐王之后，不少大臣很是失望，有一次武帝在凌云台举行宴会，卫瓘欲言又止，想说又不敢明说，便装醉用手摸摸武帝的座位说：“此座可惜！”中书和峤也为太子愚昧担忧，但不敢直说太子愚昧，婉转地对武帝说：“皇太子为人淳朴，而世道险恶，恐怕无法应付险局。”武帝为了替太子遮愚，并以说明自己立太子的正确，便导演了考太子的戏。朝廷内外都知司马衷这个白痴不能理政事，为证明其非，武帝便召集东宫大小官属，设宴招待他们，而密封以尚书事派人送到东宫，令太子决之。太子看了不能对答，其妃贾南风便请人代对。武帝看了高兴得很，并夸示东宫臣属。要考试，可召来太子面试，却让太子在东宫自答，显然武帝也知其子愚昧，是有意让人代答，实是自欺欺人。

据说，武帝之立太子司马衷，除了出于传子的私心外，还由于其孙司马遹聪明过人。认为在司马衷之后可让他继位。遹是司马衷长子，幼而聪慧，武帝爱之，常带在身边。宫中尝夜失火，武帝登楼观望。通当时才五岁，牵武

帝衣拉他入暗处。武帝问其故，说：“夜间仓卒，宜备非常，不宜在火光处被人看见。”武帝由是奇之。邈尝陪武帝看猪栏，对武帝说：“猪很肥，何不杀以享士，为何久养以浪费五谷？”武帝认为其说得对，即使人烹之。因抚其背，对近臣说，“此儿当兴我家。”尝对群臣称司马邈似其祖司马懿，于是令誉满天下。其实小时聪明，大时未必。及长，不喜读书，整天与左右嬉戏，生活奢侈，后为贾南风毒死。武帝的“此儿当兴我家”的希望成了泡影。

由于以司马衷这个白痴为继承人，实则把权交给其皇后贾南风这个淫毒女人，她是引起“八王之乱”的导火线，也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关键人物，这已在第二章《挟夫作恶带来的灾祸》里评述，在这里不重赘了。

## 二、严加教育儿子才成才

父母、老师的教育对孩子都具有关键的影响。孩子幼时，父母的言行身教，孩子耳濡目染，都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及稍长，老师的传道解惑，对其成长所起的作用也很重要。

古代创业之主对其接班人即太子的教育很重视，如元世祖忽必烈对真金太子，明太祖朱元璋对朱标太子，不仅自己谆谆教诲，还精心聘请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名儒为其师、保，使之茁壮成长，德才都可观。

### 元真金太子学以致用政绩卓著

《元史·真金传》记载，真金，元世祖嫡子。少从姚枢、窦默受《孝经》；请王恂为师保，学习汉书。在任中书令时，以儒道治国，卓有政绩。真金的成长，首先是与其父元世祖忽必烈重视其教育有关。忽必烈因受汉儒的影响，主张“附会汉法”，对其子也要求学汉学，真金十岁时就叫他跟藩府名儒姚枢、窦默学习《孝经》，施以三纲五常的教育，孝道熏陶着他幼小的心灵，及长对父母很孝敬。尝从其父忽必烈巡幸宜兴，其父身体欠佳，真金忧形于色，夜里睡不着觉。听说母后忽得风疾，他伤心得哭了，“衣不及带”前夫探望。母后病死，他悲痛欲绝，“勺饮不入口者终日”，设庐帐为母守孝。为了使真金能守业治国，忽必烈任王恂为太子赞善，专门负责真金的日常教育。王恂是汉人，精通天文律历，尤以算术为最，后学于博学多才、“论天下事如指掌”的刘秉忠，秉忠荐于忽必烈，忽必烈命辅导太子，他“每侍左右，必阐明三纲五常，为学之道，及历代治乱兴亡之所以然。又以辽、金近事，区别其善恶，论著其得失。”中书左丞许衡，集唐、虞以来嘉言善政编成一书呈上，忽必烈令恂讲解，并令太子学习。由于王恂谆谆教诲，太子学业大有长进。太子每与诸王近臣习射之暇，讲论经典，研究《资治通鉴》、《贞观政要》。每当王恂等老师为他讲述辽金帝王行事要略，以及《武经》等书，对它提供的鉴戒，为之“洒然改容。”太子因努力探讨历代的治乱得失，为他后来参政起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忽必烈为了培养太子参政能力，在封太子为燕王的同时任其为中书令。太子初上任，虚心向大臣请教，丞相史天泽入启事，太子说：“我年幼，缺乏从政经验，希望你老多指教。”同时请其老师王恂预闻政事，以便从中协助。有空还与诸王和从官谈做人之道，有一次对他们说：“现在我们闲着无事，请尽谈个人心得。”撒里蛮说：“太祖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伯颜说：“皇上有训，欺罔盗窃，人之至恶。一为欺罔，则后虽出善言，人终弗信。一为盗窃，则事虽未觉，心常惴惴，若捕者将至。”太子指出这些至训是与孔子学说一致的。可见，太子是将孔子学说与其祖训联系起来，以便更好地推行儒家的政治学说。

真金为政主张“节用”、“爱民”。忽必烈下诏将江西尤兴路割给他作为采邑，他对左右说：“能否找到清官如邢州张耕那样的人去治理？得这样的人去治理，这可使江南诸郡效法，人民将安居繁集。”于是，令其属官选择一位清廉爱民的官员前往治理。江西行省以岁课四十七万缗进献，真金勃然大怒说：“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钱粮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钱粮虽多，安能自奉？”尽却之。阿里以民官兼课司，请每年送上三百只羊，

真金以其越例，罢之。参政刘思敬掠民为俘，派其弟思恭送来一百六十户，真金问民所从来，思恭答道：“是思敬征重庆时所俘获的。”真金皱着眉头说：“回去告诉你哥哥，可将他们放还为民，不要失人心。”乌蒙宣抚司上贡的马匹超过原定数额，谕之说：“去年已令不要多进马，恐所经之地，烦扰人民，以后不要再多贡了。”

真金生活也很节俭。他任中书令时，乳母给他送上新衣，他笑而却之说：“吾何事美观也。”他穿的衣服污了，命侍臣拿去染，侍臣请织绞制新衣，真金说：“衣服还可穿，何必弃之。”东宫香殿建成，有人请凿石为池，如曲水流觞故事，真金说：“古有肉林酒池，亦欲吾效之耶！”不许。

真金疾恶如仇，尤其对那些害民之徒尤其憎恨。阿合马任中书平章政事，推行“重取于民”的敛财政策，真金恶其奸恶，未尝假以颜色，甚至以弓击其头。益都千户与高和尚知阿合马所伯的只有太子，便伪为太子夜入京城，召而杀之。朝廷正在审查此事时，真金揭发了阿合马贪污西域商人进献给忽必烈珠宝的罪状，使忽必烈大发雷霆，“乃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食其肉。”

太子在任中书令期间，明于听断，凡是不利于民的事，便奏请罢免。右丞庐世荣提出多取于民的办法，真金不以为然，说：“财非天降，哪能多取于民？恐生民膏血，将被吸尽。这不只害民，实是国之大蠹。”

忽必烈年已七十，江南行台监察御史请禅位于太子，太子知忽必烈权欲重决不禅位，恐疑其有夺位之举，心里很害怕。台臣不敢将这些事上奏，而阿合马余党以台臣隐匿，乘间发之。忽必烈怒甚，太子益惊，因惊致病死，年仅三十四岁。

### 明朱标太子笃学待人仁慈

《明史·朱标传》记载：朱标，明太祖朱元璋的长子。朱元璋称吴王，立朱标为王世子。朱元璋即皇帝位，封为皇太子。朱元璋很重视对朱标的教育，不仅言教身教，还择名儒宋濂为师，学习儒学，让他在实践中培养其治国才能，使之成为守业之主。太子为人仁慈而贤明，可惜英年早逝，死时年仅三十八岁。

朱元璋对太子的教育较为经常和严格。吴元年，朱标已十三岁，为了使他知道民间疾苦及其创业不易，命朱标回临濠祭祖，临行时嘱他说：“商高宗旧劳于外，周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皆知小民疾苦，故在位勤俭，为守成令主。儿生长富贵，习于晏安。今出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其因道途险易以知鞍马勤劳，观农桑生产以知衣食艰难，察民情好恶以知风俗美恶，在祖宗的居地访问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不易”，是冬，从朱元璋观效坛，令左右引导参观农家，遍观农民服食器具，使朱标了解农民生活。途中，朱元璋指着道旁生长的一种叫荆楚的小灌木条，对朱标说，“古时用此为刑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杀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吾儿应记住。”

朱标为王世子时，就择名儒授经书，使其学习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理，以及“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史称：“濂傅太子先后十余年，凡一言功，皆以礼法讽劝，使归于道，至有关政教及前代兴亡之事，必拱手曰：“当如是，不当如彼。皇太子每敛容嘉纳，言必称师父云。”朱

元璋还建大本堂，取古今图书充其中，聘四方名儒教太子诸王，命选品学兼优的国子生十余人伴太子读书，并对殿中待御史郭渊友等说：“诸生习于文艺，但与太子相处，要端正其心术，使不流于浮靡，这才对太子的德行有所补助。”

在培养太子的治国能力方面，朱元璋能从实际出发，采取与元朝不同的做法。中书省都督府请仿元制，今詹同探讨历代东宫官制，选有德行的勋臣和贤明之士兼往东宫官。于是命左丞相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右丞相徐达兼太子少傅，中书平章录军国重事常遇春兼太子少保，御史大夫邓愈、汤和兼谕德，御史中丞刘基、章溢兼赞善大夫，治书侍御史文原吉、范祖兼太子宾客，其他东宫属官也选有德才者兼任。朱元璋告诉他们说：“朕于东宫不别设府僚，而以卿等兼领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易生。又所以特设宾客谕德等官者，且选名儒为之，是为辅成太子德性。要教太子居安虑危，不忘武备。因为继世之君，生长富贵，只知安乐，不谙军旅，一有缓急，不知所措。”当朱标二十三岁时，为进一步培养其独立处理政事的能力，朱元璋“令自今政事并启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向太子提出了四条治国原则：“惟仁不失于疏暴，惟明不惑于邪妄，惟勤不溺于安逸，惟断不牵于文法。”并以己治国态度勉励太子说：“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亦所亲见。尔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也。”

其实，朱元璋所作所为不少是违反儒学的，如他说“惟仁不失于疏暴。”他为人并非，在对待功臣上是极其“疏暴”的。且是一个绝对专制主义者，他之所以信儒学，是因其认识到儒学可以巩固其统治，故以儒学教子，而在德高望重的名儒的辅导和影响下，太子确是成为儒学的身体力行者，与其父皇在不少方面是有分歧的。宋濂长孙宋慎，因胡惟庸案被牵连，年六十八岁已告老还乡的宋濂竟连坐，朱元璋要杀他，马皇后反对说：“民间延一师，尚始终不忘恭敬，宋先生亲教太子诸王，岂忍杀之！且宋先生家居，宁知朝廷事耶？”太子十分敬爱宋濂老师，哭着谏道：“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贷其死。”朱元璋大怒说：“侯汝为天子而有之。”太子不能救老师，便跳水自杀以尸谏，幸被人救起。朱元璋被迫赦免宋濂的死刑，改为流放到四川的茂州。对朱元璋滥杀功臣，举朝惶恐，无人敢表示异议，朱标直谏说：“陛下诛夷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说：“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朱标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朱元璋与朱标比较，一暴一仁，泾渭分明。

朱标为人友爱、仁慈。秦、周诸王数犯错误，朱标多方调护，使他们得返封地。有人告晋王有异谋，朱标哭泣为他辩解，朱元璋为之感悟。对朱元璋的兄子文正、姐子李文忠及养子沐英等，马皇后待之如己子，朱元璋以事加罪，朱标请母后为他们说情。

以朱标的为人和才干，可对明初政治发挥更大的作用，可惜活了三十八年便病死了，这对明朝是一个损失。

### 三、对儿子溺爱足以害之

爱子，是动物的本能，是传延种群的需要。便是虎，虽毒也不食子。人为万物之灵，受子不仅出于本能，而且是自觉，对于子爱更其亲切。爱子要有一定的度，爱过度就会走向反面，这是说过于溺爱儿子反足以害之。因为凡是人，都有欲，如果纵其欲，任其发展，将会遗害人间。汉明帝对刘畅，明神宗对常洵，由于过于溺爱，使他俩走上了邪路，以至害己害民害国。

#### 刘畅从小娇贵私欲恶性发展

《汉书·梁节王刘畅传》记载：刘畅，是东汉明帝的儿子，因母阴贵人得到明帝的宠爱，刘畅也就得到溺爱。他初封汝南王，汝南是当时大封国，地区富庶，租赋收入比其他封国多一倍。后改封为梁王，除了梁地外还增拨陈留郡的六县给他。刘畅性聪慧，由于得到父母宠爱，他在诸王中的地位较高贵，也就养成其高人一等的骄傲性格，凡事任性而行，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把王法放在眼内，归到封国后，更恣意而为。他数次有恶梦，惊疑不安，其从官卜忌自言能驱使六丁（道教所奉的神）为人指示凶吉，便请他占梦。卜忌卜筮后，为谄媚刘畅，胡说刘畅将当天子。刘畅的乳母王礼也自言能见鬼神事，说能占气，即通过观察云气预测吉凶，她也附和卜忌的说法，称刘畅将大富大贵。其实他们贪图刘畅财物，便用迷信来欺骗他，刘畅上了当也不知，反而暗自高兴，飘飘然地做起了皇帝梦，对卜忌和王礼更加信服，整天与卜忌、王礼密商怎样才能登上大位。当刘畅正在得意忘形时，其阴谋被外泄，豫州刺史梁相上奏揭发他密谋反叛。这时和帝在位，便派使逮捕他进行审讯，他不承认。有司请将他送监狱由廷尉定罪，而定反叛罪是要杀头的。因他是和帝的皇叔，和帝不忍将他置重刑，故没有同意。有司又请取消他的封国，将他流放到九真（今河内越南以南），和帝也不忍心将他流放到这么远的荒蛮之地，只从轻处罚，削去了他的封国中的成武和单父两个县。

刘畅原以为犯了这“弥天大罪”，必死无疑，想不到和帝对他的处理是这么轻，因而无限感激，便上疏谢恩，叙述他犯罪的原因，并恳切地表示其悔过之情。他说自己之所以犯罪，是因“生长在深宫，长在奶娘之手，只听从他们的话。及归至封国，从官侍吏贪图我的财物进行欺骗，自己暗昧不明，跟他们胡搞在一起，不自知陷于死罪，及被审讯，肌栗心悸，后悔已迟了。自谓当即伏诛，惊得魂魄离身，以为命将归黄泉，不意陛下大开圣恩，赦免死罪。”接着表示无限愧悔说：“自赦免以来，战栗连月，未敢自安。每念有负先帝，且令陛下枉法赦臣而有损圣誉，羞愧得无地自容，臣知赦免不能再，誓约束自己和妻子，不做有违法纪的事，不敢复有所奢侈。臣租入有余，乞裁夫食邑睢阳、谷孰、虞、蒙、宁陵五县，这样还余四个县的食邑。臣有小妾三十七人，其无子的送基本家。奴婢就只留二百人。其余所受的武士、骑兵、伎人、仆役、奴婢、兵器、马匹等一概奉还官署。臣以骨肉近亲，乱圣化，污清流，诚无面目复当大官，受大国食邑。愿陛下加大恩，开臣自悔之门，给臣改恶从善之路，令天下知臣感不杀之恩，颇能自悔。”

刘畅因从小娇贵，任性而行，私欲恶性发展，犯了“弥天大罪”。因得赦免，才不被杀。从其所上之疏，说明颇能改悔，以后未见胡作非为，终得善终。

## 朱常洵得宠纵欲恶贯满盈

《明史·福恭王常洵传》记载：朱常洵，神宗第三子。初皇后无子，王妃生长子，即朱常洛。常洵是次子，其母郑贵妃最得神宗的宠爱，因母及子，常洵也就娇贵异常。神宗与郑贵妃谋立常洵为太子，但群臣坚持立长子常洛，纷纷上章言其事，神宗以贬官进行威吓，而言者不止。神宗深厌苦之，甚至因此懒得上朝听政。后在群臣的压力下，不得已立常洛为太子，封常洵为福王，给其赏赐、封地都十分优厚，远超常制，超过诸王。他在河南荒淫奢侈，掠夺人民，民不聊生，引起大乱。李自成攻入洛阳，杀死朱常洵。

神宗欲立常洵为太子，并非因他有才能，他是个花花大少，只知吃喝玩乐，之所以要立他，是因宠爱郑贵妃之故。为了想立常洵为太子，因遭到群臣反对，神宗只好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请立太子，即所谓“争国本”。坚持立常洛的，是因他是长子，而神宗却要立次子常洵，当时的斗争是极其激烈的。这种斗争持续了十五年之久。这说明，神宗对朱常洵是多么宠爱。

在生活上，神宗对常洵的照顾无所不至，史称：“耗天下以肥王，洛阳富于大内”，这确是事实。常洵结婚时，就花去白银三十万两；为常洵营建洛阳的王府，就用了白银二十八万两，十倍于常制。当时，神宗派税使、矿使遍天下，每月进奉明珠异宝锦绮，堆积如山，搜刮的钱财以亿万计，大多用以赏赐常洵。当常洵被遣返封国时，神宗依依不舍，召还数四，嘱他三年入朝一次。下诏赐田四万顷，有司力争，才减半。由于王室、官僚、地主兼并激烈，国有土地早被占无余，河南肥田不足，则取山东、湖广良田补之。此外，朱常洵又奏乞得朝廷所没收的原大学士张居正的财产，及江都至太平沿江南北千余里的杂税，以及四川的盐税茶税。明祖制，藩王封地内的租赋由朝廷派官统一征收，神宗却下诏准许福王府自遣官吏在封地内督租征课。于是，福王府内的属官、太监以履亩督租为名乘驿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催租逼税，渔肉官民，所至骚动。又请得淮盐一千三百引，在洛阳设店卖盐以牟取暴利。王府太监到淮、扬等地取盐，强取勒索，实际取的盐比原额多数倍。河南原食河东盐，朱常洵强迫改食王府的淮盐，河东盐卖不出，断绝了边防军响的来源。廷臣请改给福王府的食盐于河东，不要与商民争利，神宗置之不理。

神宗长年不理朝政，他在位四十八年有二十多年不与群臣见面，即使大臣也难得见到神宗，如内阁大臣沈一贯，辅政数十年，只见过神宗一次面。神宗对于群臣的章奏大多置之不理。但对朱常洵的章奏却特别重视，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当时四方奸人及亡命之徒，奔走贿赂于福王府门下，请求保护。

光宗朱常洛病，因食红丸致死，时人疑是郑贵妃指使下毒。皇长子朱由校继位，在位七年死，弟朱由检嗣位，即崇祯帝。朱常洵是崇祯皇叔，得到朝廷尊礼。这时，河南大旱又逢蝗灾，赤地千里，人民无以为食，人相食的惨剧到处出现。可是，朱常洵不顾人民的死活，照旧横征暴敛，以填其无底私壑，照样闭门饮淳酒，沉迷于声色，尽管福王府收藏的金银财富比朝廷还多，朱常洵却一毛不拔不肯拿出用于军饷。当时河南大乱，李自成军进攻河南，朝廷派援军到洛阳时，无饷大哗，“王府金钱百万，而令吾辈枵腹死贼手。”这时，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洛阳老家，闻之大惊，以利害说常洵，

他不以为意。不久李自成军攻破洛阳，他藏匿迎恩寺，后被捕杀。据说，自成将其肉和鹿肉烧煮，置酒大会将士，号“福禄酒”。可见，农民军对他仇恨之深。

#### 四、明于知人却昧于知子

常言：“知子莫若父”。因从孩子呱呱堕地，从小到大，一举一动，一言一语，父亲都比别人熟悉。当然这是从比较角度而言，但不能说父都了解子。人是变化的，小孩时是纯结的，或是善良、诚实的，随着经历的增长，环境的变化，条件的不同，善良可能变为凶恶，诚实可能变为奸诈。

唐太宗李世民，清圣祖康熙都是一代英主。由于明于知人，发挥臣民的智慧 and 力量，太宗造成“贞观之治”，圣祖为“康乾盛世”奠下了基础，对历史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他俩选择太子都出现了问题，这不能说是因不关心太子的教育，恰恰相反，他们不仅选择良师教导太子，还经常亲自加以训诫，可以说是精心培养。关键在于主客观方面都存在问题。太宗、圣祖都爱太子，爱则往往看不到太子的小过，小过逐渐积累会形成大过；又在大权大利的引诱下，太子“羽毛丰满”时都急于继位，也就与父皇发生矛盾，这时，想教育已经晚了，只好忍痛割爱。这便是太宗、圣祖昧于知子的原因。

#### 太宗为子事几乎自杀

《旧唐书·恒山王承乾传》记载：李承乾，唐太宗长子，生于承乾殿，因以名之。一岁，封恒山王。太字即位，为皇太子，那年他才八岁。李承乾性聪敏，太宗甚爱之。太宗为其父太祖李渊居丧时，承乾十七岁，让他听断政事，他能处理。以后太宗外出。常令他留守监国。及长，好声色，戏游无度，但惧怕太宗，不敢让其知道。每临朝视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后，便与群小戏嬉褻狎。每当宫臣进谏，承乾必先揣度来意，正襟危坐敛容，引咎自责，以表示其虚心纳谏。承乾虽表里不一，因他善于伪装，以正人君子的面貌出现，唐太宗和宫中臣僚都以为他贤明。

承乾有脚病，步行艰难，唐太宗四子魏王泰有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被废立，甚忌魏王泰，泰亦负其才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互为仇敌。太常寺有一十余岁的乐童，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为“称心”。秽行传出，太宗大怒，将称心杀了，连坐死的又有数人。因此，承乾对太宗不满，托疾不朝达数月之久。承乾认为这是泰告发，对他更为仇恨。于是，召壮士左卫副率封师及刺客张师政、纥干承基，并深为礼遇，重加赏赐，令他们暗杀魏王泰，因防守严密，阴谋没有得逞。害怕太宗废已立泰为太子，承乾便与汉王元昌、兵部尚书侯君集、左屯卫中郎将李安俨、洋州刺史赵节、驸马都尉杜荷等谋反，将纵兵入西宫，提前夺位。

634年（贞观十七年），齐王祐反于齐州。承乾对其心腹纥干承基说：“我东宫距大内只有二十步远，这么近，齐王造反哪能比我方便。”李祐造反被镇压，纥干承基曾与之勾结，被捕入狱，审讯时招供承乾谋反事。太宗便将承乾关起来，命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房玄龄、特进肖瑀、兵部尚书李勣、大理卿孙伏伽、中书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马周、谏议大夫褚遂良等共同审理，事皆明验。谋反本应处极刑，太宗念骨肉之情，废承乾为庶人，流放黔州，元昌赐自尽，侯君集等咸伏诛。645年，承乾死于流放地，太宗为之废朝，葬以国公之礼。

本来唐太宗是很重视对儿子的教育的。他说：“古来帝子，生于深宫，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以顷覆相踵，少能相济。我今严教子弟，欲皆得安

全。”为此，他不仅经常言教身教，还为他们选择贤德之师，如于志宁、李纲、李百药、杜正伦、孔颖达、房玄龄，张玄素等名臣名儒先后为太子李承乾之师，王珪为李泰师，长史薛元鼎、权万纪辅导李祐，他们都能尽其责，犯颜切谏，但收效不大，这些皇子还是我行我素，有的如李祐因恨权万纪谏净而派人将之杀了。这说明教育并非万能，教育要能起作用，还要决定于受教育者能否接受，如果其本质太坏，对所受的教谏进行抗拒，只不过是东牛弹琴。承乾等本质不好是一方面，对唐太宗来说，他对儿子的溺爱也起了反作用。638年，太宗下诏：“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皆降乘。”王珪上奏，认为“非礼”。太宗说：“卿辈苟自崇贵，轻我诸子。”魏征说：“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为王降乘，诚非所宜当。”太宗说：“人生寿夭难期，万一太子不幸，安知诸王他日不为公辈之主！何得轻之！”太宗要“三品以上”遇见皇子要下乘，实是抬高皇子地位，以显示其尊贵，这样做，必然促使其骄傲，目中无人。李承乾本已奢靡嬉戏，太宗还降诏：“皇太子出用库物，所司勿为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这使承乾更其奢侈纵欲。后因宠爱李泰，每月赐料物超过太子。承乾与李泰的矛盾到势不两立，也与唐太宗有关，因李泰有文才，太宗曾许立他为太子，故李泰加紧进行夺嫡活动。在处理承乾问题时，太宗下诏承认其宠爱泰造成不良后果说：“魏王泰，朕之爱子，实所钟心。幼而聪令，颇好文学，恩遇极于崇重，爵位逾于宠章。不思圣哲之诫，自构骄僭之咎，惑谗谀之言，信离间之说，以承乾虽居长嫡，久缠足恙，潜有代宗之望，靡思孝义之则。承乾惊其凌夺，泰亦日增猜阻，争结朝士，竟引凶人。遂使文武之官，各有所附；亲戚之内，分成朋党。”他认为“承乾悖逆，泰亦凶险。”于是贬泰为东莱郡王。

在处理承乾和泰、祐事件后，太宗对立谁为太子，犹豫不决。朝罢，群官尽出，他独留无忌及司空房玄龄、兵部尚书李祐，对他们说：“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真令人心痛！”说了，自投于床上，抽佩刀欲自刺，无忌等惊惶，急上前扶抱，取其佩刀，才不出事。关于立谁为太子，无忌主张立李治，太宗说：“雉奴（李治小字）仁儒，得无为宗社忧？奈何！”他想立有文武全才的吴王李恪，因是庶出，无忌等又反对只好作罢，后不得已才立李治，即后来的唐高宗。太宗因爱子被承乾假象所惑，虽知李恪有英才被臣下反对不能如愿，前昧于知子，后寡于果断，一代英主理国事得心应手，理家事举步维艰，使绝代英雄悲愤得几乎自杀，可见理家事不易！

### 清圣祖挥泪废太子

《清史稿·理密亲王允初传》记载：允初，清圣祖康熙第二子。两岁时，康熙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为皇太子。1708年，即允初三十五岁时，康熙以允初“不法祖德，不遵朕训”将他废黜。次年，又复立。过了四年，再颁诏将之废弃。允初两次被立又两次被废，这是什么原因呢？

康熙对允初是非常眷爱的，尽管是两岁的小孩，却赞其“日表英奇，天资粹美。”康熙很重视对允初的教育，亲自教他读书，允初六岁，令大学士张英、李光地当他老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允初十二岁，康熙召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领詹事，辅导太子。允初通满汉两种文，熟练骑射，从康熙出外，仍然积极学习，朗诵诗书，因而得到康熙的更加宠爱。他二十一岁时，康熙亲征噶尔丹，命太子代行郊记礼，各部院奏章，都让太

子处理，重要事件，先由诸大臣议定，再启奏太子。

允礽得父皇宠爱，又居太子之位，但不能严格要求自己，私欲不断膨胀，以致恣意妄行，恶行日增。他结党营私，侮辱廷臣，鞭挞平郡王纳尔索、贝勒海善、公普奇等贵族，不少大臣亦遭毒手。允礽与其所属无恶不作。蒙古王公向朝廷贡名马，他竟派人于半路截夺，致使蒙古各部俱不心服。对于允礽的恶劣行为，康熙初未发现，及被揭露，他已成人，虽屡加责备，已无济于事，仍我行我素，使父子关系逐渐恶化。1690年，康熙征噶尔丹时忽患病，召允礽前往侍疾，他以为其父将死，面有喜色，康熙很不高兴，认为他“不孝”，对他“誉爱”之心渐衰。允礽随康熙出巡塞外，“每夜逼近布城，裂缝窃视。”有人告发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暗助太子，潜谋大事。”康熙捕而杀之。允礽深恨其父，欲为索额图复仇。因此康熙提心吊胆，“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在这种情况下，父子俩关系发生了变化：允礽因宠而放纵作恶，以至想提前夺位；康熙从爱子至忌子，甚至惊子加害于己。1696年，即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召集诸王大臣宣布：“允礽不法祖德，不尊朕训”，并揭露其“肆恶虐众，暴戾淫乱”的事实，认为“似此不仁不幸，太祖、太宗、世宗所缔造，朕所治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康熙且说且泣，以至仆于地上。即日囚禁允礽，命直郡王允礽监视，杀索尔图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苏尔特、哈什太、萨尔邦阿；罪稍减者，遣戍盛京。康熙既废太子，悲愤不已，六夕不安寝，召诸近臣涕泣言之，诸臣皆呜咽。康熙又对诸近臣说：“观允礽行事，与别人大不相同，像是患狂疾，似有鬼物凭身”。废太子是不得已，因其对太子是如此溺爱，一旦废之，内心是何等痛苦。他不分析太子作恶之因，竟疑有“鬼物凭身”所致，这说明他并不知其子，但这却为其后复立太子提供了借口。

皇太子允礽既废，康熙三十五子中不少人在觊觎其位。皇长子允礽奏说：“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术士张明德尝相允礽必大贵，如诛允礽，不必出皇父手。”康熙怒，诏示允礽凶顽愚昧，并说：“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诸皇子中八皇子允礽谋最力，康熙命抓付议政大臣议罪，免去其贝勒职。皇长子允礽也在暗中进行夺嫡活动，他叫喇嘛诅咒废太子，康熙得知，派侍卫搜允礽住处，得厌胜物十余件。康熙虽废允礽，时常想念他，“日日不释于怀”，他曾疑是“鬼物凭身”，今发现此物以为真是如此，便召见允礽，使迁居咸安宫。康熙对近臣说：“朕召见允礽，询问前事，竟有全不知者，是其诸恶皆被魇魅而然。果蒙天佑，狂疾顿除，改而为善，朕自有裁夺。”诸大臣知其意，请复立太子，康熙终于同意。

其实太子允礽并未改恶从善。由于康熙在位久，允礽等得不耐烦，说：“自古以来，哪有当太子四十年的？”允礽复立后结党以扩大其势力。步军统领初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都统鄂缮、迺图，都谄附太子结党以作恶，受贿贪婪，违法胡为。康熙发觉后，或处死或幽禁，康熙为此事告谕诸臣说：“诸事皆因允礽。允礽不仁不孝，徒以言语货财嘱此辈贪得谄媚之人，潜通消息，尤无耻之甚。”于是，复废太子，禁锢于咸安宫。康熙接受教训，不复立太子，终清之世，都是预写遗诏藏好，待皇帝死后才宣布。康熙因病逝世，皇四子雍亲王允礽奉遗诏即位，即雍正帝。

## 五、二流子来自娇生惯养

古代皇子皇孙，因其降生于帝王之家，视之如宝贝，被称为金枝玉叶。幼小时娇生惯养，大多数长大了便形成“骄淫奢靡”的二流子作风，及其掌权私欲日益膨胀，为害人间，以致败国亡家。西汉的海昏侯刘贺、南朝肖齐的肖宝卷便是这种人物。

### 海昏侯尽情玩乐昏乱无双

班固在《汉书》卷五十三的“赞曰”指出：“昔鲁哀公有言：‘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信哉斯言也！虽欲不危，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为鸩毒，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多骄淫夫道。何则？沉溺放恣之中，居势使然也。自凡人犹系于习俗，而况哀公之伦乎！夫唯大雅，卓尔不群，河间献王近之矣。”这是说，早在春秋时“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鲁哀公就是不知“忧惧”的花花大少，也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那类人；至西汉，以百数的皇子皇孙，大多“失道”，只有河间献王刘德“卓尔不群”，可见皇子皇孙表现好的是凤毛麟角了。在西汉诸多王中，昌邑王刘贺是其中较昏乱荒诞的一个。刘贺就是那个“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美人李夫人的孙子，因汉武帝宠爱李夫人，封其儿子刘髡为昌邑王，刘髡死，刘贺继位为昌邑王。昭帝死，无子，以刘贺继位，因他胡为当了二十七天的皇帝便被霍光废了，可以说是历史上当皇帝时间最短的人了。

《汉书·刘贺传》记载：昭帝死，无嗣，大将军霍光征得太后同意，下诏特派少府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前往征刘贺乘驿车急速来京主持丧礼。刘贺随使者天未亮便出发，半天急走了一百三十五公里，使“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尽管是急奔丧，刘贺途中还不忘玩乐，到济阳，寻求长鸣鸡，途中购买积竹杖；经过弘农时，叫家奴物色美女载于车上供其淫乐。至广明东郭门，昌邑郎中令龚遂对刘贺说：“按礼制规定，奔丧望见国都要哭。前面就是长安东郭门。”刘贺说：“我喉咙痛，不能哭！”至城门，遂又提醒他，刘贺说：“城门跟郭门都一样。”快到未央宫东阙，遂说：“宫阙外设有昌邑帐，未到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向西、拜伏，哭尽哀止。”这时，刘贺不得已勉强干哭几声，算是尽了丧礼。接着他受皇帝玺绶，即皇帝位。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刘贺从少到长吃唱玩乐惯了，要他停玩一刻也不行，不仅在奔丧途中听鸡鸣玩女人，昭帝灵柩还在前殿，他照样吃唱玩乐：他跟从昌邑带来的从官、马宰、官奴二百余人，在宫内到处游邀嬉乐，作长夜之饮；他发放乐府乐器，引昌邑乐人入宫内，击鼓歌吹演戏；还与昭帝宫人蒙等淫乱，并诏掖廷令说：敢泄言要斩。昭帝安葬当天，刘贺返驾途中，召来祭祀宗庙的乐工，在“辇道”和“牟首池畔”，“鼓吹歌舞，悉奏众乐”。刘贺在即位短短的二十七天中，派使持诏到诸宫署要这要那以供其享乐的，计有一千一百二十七事，但无一涉及国家事务。

对于刘贺的淫乱，大将军霍光与群臣议，征得太后同意，决定废刘贺归故国。这时，刘贺还蒙在鼓中，他入朝皇太后，乘车欲返温室，刘贺入门，中黄门宦者立即将宫门关闭，不让昌邑群臣入内。刘贺问：“这是干什么？”

大将军霍光跪说：“皇太后有诏，不准昌邑王群臣入内。”刘贺悻然说：“且慢！何乃惊人如是！”霍光令将昌邑群臣尽赶出宫外，接着车骑将军安世使羽林骑将他们二百余人全都逮捕，送交廷尉监狱。刘贺对霍光喊道：“我的旧臣有什么罪，大将军竟抓他们！”一会儿，太后有诏召刘贺，他才害怕说：“我有什么罪却要召我！”太后穿着珠襦，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数百人皆持兵器，刘贺伏前听诏。尚书令宣读大臣的上奏，列举刘贺的罪恶，主张废刘贺，皇太后诏说：“可”。于是遣刘贺返国。

宣帝即位，因刘贺还在，对他有所忌，便暗派山阳太守张敞去了解他的情况。据张敞向宣帝上奏：谈及他与刘贺相会时，刘贺年已二十六七，脸青黑，眼睛细小，鼻梁尖塌，须眉疏落，身材高大，穿着短衣、大裤，患风瘫，行步不便，从刘贺穿着、言语和行动看，已像个白痴。这是长期纵欲过度的结果。张敞向他提出，为其父守陵的歌舞者十人，既无子女，又非姬妾，应让她们回家，刘贺却不同意说：“为先王守陵的歌舞者，生病不给治疗，互相杀伤不按法治，是使其死去，太守为何让她们回去？”刘贺虽已是白痴，但依然残忍。宣帝知其无所作为，便封他为海昏侯，过了几年，即三十三岁时，这位二流子在过度淫乐中耗尽了生命。

### 东昏侯荒诞残暴世间罕见

西汉有个海昏侯，南朝齐有个东昏侯，二人一样二流子气十足，但东昏侯却比海昏侯荒诞残忍得多。

《南史·齐东昏侯传》记载：东昏侯肖宝卷，字智藏，齐明帝肖鸾次子。明帝死，肖宝卷即帝位。其人荒诞残暴至极，不理政事，每日出游，以残民为乐。百姓苦于赋役，号泣于路。其父死前，以尚书右仆射江祐、侍中江祀、始安王肖遥光、尚书令徐孝嗣、领军将军肖坦之、卫尉刘暄辅佐他，他认为这些人妨碍自己，先后将之杀掉，使朝中人人自危。有的举兵谋反，被其打败，于是更无顾忌，胡作非为日甚，使众叛亲离。501年，南康王肖宝融于江陵称帝，遣肖衍东下攻建康。城内兵变，侍中张稷等杀肖宝卷。齐太后下诏贬他为东昏侯。

东昏侯在东宫时，便好玩，不喜读书，他闲得无聊，在宫中夜捕老鼠达旦，以为笑乐。明帝死，灵柩停放在太极殿，对他玩乐不便，感到厌恶，要求立即埋葬，尚书令徐孝嗣力争，他才同意停放一个月。在守丧期间，既无悲容，也不哭，每当要哭，他就说喉痛哭不了。太中大夫羊阐来吊唁，哭得前俯后仰，帽子哭掉了，露出他的光头，宝卷看了大笑，对宦者王宝孙说：“这是秃子在啼。”他即帝位后不理政事，日夜于后堂戏马，鼓噪为乐。有一次，他骑马游玩，马忽发惊，问左右马为何如此，左右为规劝他少出游，便托说：“刚看见先帝大怒，这是他不喜欢你整天游乐。故弄惊你的马警告你。”东昏侯大怒，拔刀与左右寻觅先帝，找不到，就叫人用菰草缚成其父明帝形象，拔剑斩之，悬首苑门，才算罢了。

他在宫中玩厌了，就到外面去玩，初，不欲让人见他，其所经之处驱逐百姓，只剩下空屋而已，他回宫后百姓才敢回家，往来迁移，怨声载道。每次出游，带上五六十骑跟随，又选营署无赖小人善走者数百人，跟着马跑，人与马，骑与骑，互相追逐。宝卷往往在夜间外出，外出则清街，以打鼓为号，百姓听到鼓声必立即回避，大路两旁还要挂幔幛，并设有乐队奏外族音

乐助兴。他出入无定处，也不定时，而是随兴而出，兴尽而返，经过之处，随从抢劫，工商停业，而来不及回避的便倒霉。有一家人逃避时来不及抬病人，将病人藏于青溪草丛里，被发现了推水中，用泥覆其脸，一会儿便死了，其家人回来连骸骨也找不到。前魏兴太守王敬宾新死未敛，家人被赶走，无人留看，及家人回来，两眼被鼠食了。东昏侯到沉公城玩，有一个孕妇因临产不能躲避，问：“你为何敢独留？”答道：“临产行不得。”东昏侯就用刀剖开其腹，看是男还是女。游至蒋山定林寺，一个生病的和尚跑不了，藏于草门，有人劝他饶和尚一命，东昏侯说：“这是条獐鹿，你见了亦不射吗？”便把和尚乱箭射死。

他玩乐的花样日新月异不断翻新。他在苑中模仿大城市市场建立店铺，由宫人、宦官为商贩，让其最宠爱的潘妃为市令，自己为市吏禄事。他有小过失，潘妃就用杖打他。有时，自己开肉铺卖肉，潘妃卖酒。当时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东昏侯不仅是最坏的二流子，也是一个罕见的暴君。其父明帝曾告诫他：“做事不可在人后。”意是说“应先下手为强”。这是明帝从宋、齐两朝内江中得出的经验之谈。在那时，为争帝位，有如群兽狂斗，刘宋自刘邵开始，就互相残杀，儿弑父、兄弟叔侄相残，至刘準称帝时，刘宋宗室除他的特别亲近的人外，都已被杀尽，所以肖道成轻而易举地取代刘宋，建立了齐朝。但至肖昭业即位后又步刘宋后尘，宗室内部又互相残杀，肖鸾心狠手毒，他起兵杀肖昭业后，又残杀反对己的同宗子孙，认为自己能称帝是由于自己果断、敢杀。而肖昭业想杀他，因犹豫不决而反为他所杀，以此作为教训，并告诫其子东昏侯。东昏侯对其父毫无父子感情，但教他杀人，他是牢记在心，且不学自明，这是其本性使然。不仅杀百姓，杀大臣，也杀宗室亲人，但他并不因“果断、杀人”而能保住帝位，这个二流子暴君最后同样变成孤家寡人，被人杀了。

## 六、偏爱偏恶的不良后果

对人的看法，不能以个人的爱恶来决定其好坏，因为人总有所长，也有其所短，如果其所长超过其所短，以其所短来否认其人，显然是片面的。偏爱偏恶的人如是掌握用人大权的话，对人的任用，就可能出现错误，甚至带来不良的后果。

秦始皇和隋文帝都是历史上了不起的人物，始皇创建的秦朝，文帝创建的隋朝，是我国两个重要朝代，各对其以后的王朝有较大的影响。他俩都想将其朝代传之万世，但传世仅及二代而亡，且时间很短，何以如此？这与始皇和文帝对待儿子的偏受偏恶有关。

### 始皇偏爱幼子致有沙丘之变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以吏为师”，其他学说的书籍都焚烧，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始皇长子扶苏对其实行严刑峻法有意见，数次向秦始皇直谏，尤其是对焚书坑儒持有不同的看法，说：“天下初定，四方百姓辽没存归附，诸儒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治之，臣恐将使天下不安。请皇上详察之。”始皇听了大怒，便派他到上郡城去监蒙恬军。由于始皇不满扶苏，这时还没有立扶苏为太子。因此，公元前210年始皇出游时，扶苏没有随行，儿子中只有始皇最爱的幼子胡亥得以跟随。始皇到平原津时病重，他自知将死，便为玺书赐长子扶苏说：“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书在中车府令赵高手里，到沙丘平台，始皇死。赵高便与胡亥和丞相李斯三人阴谋夺位，诈称丞相李斯在沙丘受始皇遗诏，立子胡亥为太子，另矫诏赐扶苏、蒙恬死。扶始皇尸回到咸阳，才发丧，胡亥即位，为二世皇帝。由于二世暴虐害民，又内讧不断，赵高指使胡亥大肆屠杀始皇子女后，又先后杀李斯和胡亥，秦更衰弱，人民厌秦更甚，陈胜揭竿起义，四方响应，秦迅即灭亡。

始皇偏爱幼子胡亥，偏恶长子扶苏，这与他重法轻儒有关。始皇非常信仰法家学说。他读了韩非子的《孤愤》、《五蠹》两书，说：“我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也不恨了！”始皇如此崇拜韩非，是因韩非的思想对他进行统一战争很有作用。韩非指出，国家没有永远强盛不衰的，也没有永远贫弱而不能强盛的。强弱的关键在于是否进行法治教育，而“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他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应“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他认为“儒以文乱法”。由于始皇崇信法家思想，其身边重臣如李斯等大多是法家。为了定法家思想于一尊，便容不得其他思想的存在，李斯说：“今诸生师法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他提出焚书的主张也得到始皇的赞同，因此以后的坑儒便是必然之事了。恰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扶苏与之持相反意见，也就必然引起他冒火，就把扶苏赶到上郡城去监军了。始皇之所以爱幼子胡亥，也许因他是“以吏为师”，赵高也因学法，得到始皇宠信，使他为胡亥之师。

不可否认，始皇以法家学说治国治军对其统一全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人是有感情的，因而必有爱恶，爱恶分明是必需的。而爱恶要实事求是，不能偏受、偏恶，对于任何事物过于偏那就会陷于片面，就会绝对化，绝对化了，也就可能出现问题，对人的取舍如此，对于治国如此，对待各种

学说也如此。任何学说的出现都不是偶然，它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原因，它之所以出现和得到承认（当然是一部分或大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都有其合理的部分，因为合理才能存在，如果完全是荒谬的就不可能存在了。不论是什么学说，不可能是任何时候都可照搬，它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条件的更新而向前发展，或者被其它学说所吸取，或与其它学说互相融化成为一种新的学说。秦始皇“以吏为师”促使秦国强大，消灭了六国，但在统一后，仍严刑峻法，加上他私欲膨胀，至胡亥更甚，使民不聊生，除了起来推翻暴秦外，别无生路。在对待各家学说上，吕不韦就没有始皇那种片面性，或绝对化，他主编的《吕氏春秋》，对先秦的儒、法、道、墨、兵、农、阴阳各派，兼包并容，有取有舍，融诸子，自成一家。他主张博采百家，化众为一；既强调君主集权，又强调君主无为；以“德法”为主，法治为辅。西汉统一天下后，也实行法儒并用，又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用于治国，使国家生产迅速恢复发展，之后取得了“文景之治”。始皇见不及此，对法治强调得绝对了，一概否认其他学说，其观点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是对立的，他只实行君主集权，对民众不是“无为”而是胡为；只讲法治，而不讲德治，从而把自己置于与人民对立的地位；对于长子的直谏，不采其合理之言，反而责为异端。对那些以法为名，实是害民之赵高、胡亥等爱之用之，放在中枢，使之得以夺权篡位，致使秦传二世而亡，始皇的偏爱偏恶不能辞其咎。

### 文帝偏恶长子次子矫饰守位

《隋书·杨勇传》记载：杨勇，字 地伐。隋文帝的长子。周时，以其父杨坚军功，被封博平侯。及杨坚辅政，立为世子，拜大将军、左司卫、封长宁郡公。出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总统旧齐之地。后召回京师，进位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诸禁卫皆属之。杨坚代周即皇帝位，立为皇太子，军国政事皆令勇参决之。他对政事认为不妥的多提意见，杨坚每纳之。杨勇颇好学，会词赋，性宽仁和厚，又率直，不虚伪。他辽虚己待人，结纳才能之士。杨坚崇尚节俭、反对浮华，见杨勇身穿贵重的“蜀铠”，又用金玉装饰，很不高兴，便批评他。也因他多几个内宠，尤爱云氏，不爱元妃，后元妃心病暴死，而其母独孤皇后最不喜人纳妾，疑元妃是被害，便不喜欢杨勇。杨坚次子杨广知父母不喜欢杨勇，便乘机谋夺太子位，伪装俭朴、恭敬群臣和孝敬父母，勾结大臣杨素等进谗言，千方百计诬害杨勇，使杨坚初是从生活小节对杨勇不满，进而怀疑杨勇有谋害之心，终于废杨勇立杨广。后杨广弑父兄夺位（杨坚死后谥文皇帝，故称隋文帝）。

隋文帝是我国颇有贡献的皇帝，他结束了四百年分裂割据的局面将中国重新统一，废除弊政进行改革，“躬行节俭”，“爱惜民力”，促成了隋初的政治清明、国内安定、经济繁荣。但隋文帝是个“至察而不明”的人，对事物只见其局部看不到其整体，因此，只重视杨勇的小节，而忽视了他的大节。且他为人又猜忌多疑，杨广及其党羽杨素等便抓住他这种心理状态对杨勇进行诬陷。他便将一些非政治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来处理。杨勇爱穿用金玉装饰的蜀铠，这也许是青年人爱美，即算是有点奢侈，也还属小节问题，而从大节看，杨勇是好的，尤其是处理政事上颇多高见，且能从人民利益着想。隋建国之后，杨坚认为山东流民很多，便想徙民北实边塞。杨勇便上书谏道：“念土怀旧，民之本情，流流失所，实不得已。北齐之末，其

主昏暗，迄周平东夏，又使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他们不是厌恶家乡，愿意羁旅族在外。若假以时日，待社会安定了，流民自然返回故乡。虽北有边患，但城他严固，毋须远迁以劳民。”杨坚读了很赞其有见识，便罢徙民之事。作为太子，即皇帝的接班人，其能否称职，主要是要看他有否治国安民本领，而杨坚不是从大处考虑，却从小处着眼。他重视节俭是一种美德，但不能用此衡量一切，也不能不管奢侈的大小而一律等量视之。由于杨坚的偏恶，于是，便开始对太子杨勇有厌恶之情，致使其次子杨广及其党羽能乘虚而入，以诬害太子。加上杨坚为人猜忌多疑，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冬至节至，百官向杨勇朝贺，勇以鼓乐相迎受贺。本来百官朝贺是件好事，说明太子受到百官的爱戴，可是却引起杨坚的怀疑，认为是非分之举。他问朝臣说：“近闻至节，内外百官，都前往朝东宫，这是何礼？”太常少卿辛亶答道：“于东宫贺，是不得言朝。”杨坚认为是有违礼制，下诏以后不准。自此对杨勇恩宠渐衰，对他日益怀疑，经常派人查太子之过，杨广党羽就加以谮毁，杨坚就无中生有疑太子将谋害他，以至整天疑神疑鬼。他曾愤激地对东宫官属说：“仁寿宫离此不远，使我每次从外回到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我怕被害，睡觉也不敢脱衣服。昨夜想住后房，那儿上厕所方便，恐有变故，只好移住前殿。是否你辈要坏我国家？”便抓唐领是等人，送有司审讯，并下诏数杨勇罪过，说：“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今欲废之，以安天下。”

杨坚偏恶杨勇，却偏爱杨广，他之所以偏爱杨广，是被他的矫饰骗了，只看到杨广的表面，而看不到他的本质。杨广知父皇母后不喜欢太子杨勇，便想方设法矫饰，只纳姬妾数人，但只与肖妃住在一起。住处也布置得很朴素，有一次杨坚到其住处，看见乐器弦多断了，又都蒙着尘埃，如未用过，就以为他不好声色，大为称“善”，由是父皇母后更薄勇，愈称杨广德行。他处处表现他的仁孝：有一次观猎遇雨，左右给他拿来油衣，他说：“士卒皆沾湿，我哪能独自穿此衣！”令拿去。他每次来朝，车马侍从，都很俭素，敬接朝臣，礼极卑屈，声名日隆，超过诸王。临回扬州时，入内辞母后，表示其留恋之情说：“这次离别，不能侍奉，未知何日又得拜见。”说了痛哭失声，伏地不起。其母后亦说：“汝在方镇，我又年老，今日又要长别了！”也哽咽流泪，母子相对而泣。这时杨广乘机进谗说：“我不知何以得罪东宫，日夜担心被他毒害。”其母后愤然说：“我为他索得元女，望隆基业，他竟冷落她，专宠阿云，将她视如豚犬。前新妇本无病痛，忽然暴死，是他投药，致使夭逝。事已如是，我没有处理，何因又有害你之意？我在他敢如此，我死后，当鱼肉你。每思东宫竟无正嫡，至尊千秋万岁之后，汝等兄弟要向阿云前再拜，问讯，这是多大的痛苦事！”杨文再拜，痛哭不止，其母后亦悲不自胜。杨广知其母后意属于他，始构夺宗之计。其母后也极力向杨坚要求废杨勇立杨广。由于杨广善于矫饰，上下都称为仁孝，他夺宗之计终于得遂。

其实杨广即隋炀帝是最残忍、最骄奢、最淫乐的人，这在他夺得太子位及称帝后的所作所为中已暴露无遗。文帝病重，宣华夫人与太子杨广看护，杨广欲淫宣华夫人事被文帝发觉，文帝愤然说：“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皇后）误我！”下诏召勇，被杨广所知，便谋杀文帝，并矫诏杀其兄杨勇。他在位十三年，穷奢极欲，荒淫无度。他营建东都洛阳，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西苑，收尽大江南北、五岭以北奇异花石，珍禽猛兽，置于其中，穷极华丽。遍修离宫，仅从长安到江都就有四十余所。常年为之服役者数百万人，使人民困苦已极。敢谏者处死，朝中无人再敢言。605年，乘龙船出游江都，

随行侍从数万，船队连绵二百余里，两岸骑兵护送。途经之地，令百官贡献食物，多者提升，少者降级。从此，每恣出游。在位十三年，居长安不足一年。对外则兵戎不断。因其暴虐无度，百姓怨声沸腾，天下大乱，618年，在江都被禁军将领李密及裴元绍等发动兵变，将之缢杀。因其“逆天虐民”。被谥炀皇帝。

## 七、迷信权欲使父子内讧

在古代，一个国家之衰亡，多由于内讧所致。而内讧都因为保位夺权引起，不仅在上下之间，父子之间也屡见不鲜。汉武帝晚年猜疑多忌，总怀疑人要夺位谋害，扩大巫蛊案，逼使太子刘据冤死；南朝的刘邵权欲膨胀弑杀其父宋文帝，都是骇人听闻的事件。

### 汉武帝迷信儿子被冤杀

《汉书·刘据传》记载：刘据为汉武帝和卫皇后所生，他生时武帝已二十九岁，故很高兴，七岁便被立为太子。及长，武帝为之建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可见武帝爱之深。武帝晚年，猜忌多疑，且又迷信，以为左右皆为蛊道害他，便派其宠信的江充穷治其事，此案涉甚广。江充因与太子有隙而嫁祸于太子，他派人搜太子宫中得桐木人。时武帝病，避暑甘泉宫，太子为自卫计起兵收捕江充并斩之。后太子战败逃亡，被围自杀。

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即位后就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进行改革和控制，以加强中央集权、并巩固和发展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他也犯了很多错误，主要是对外长期战争，对内加重人民负担，农民被逼起来反抗，有燎原之势。他感到问题严重，便下诏“深陈既往之悔”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下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从此停止征伐，采取利民的措施，使社会安定下来，生产恢复和发展。可见武帝既敢作敢为，又肯于承认错误，不愧为英明之主。可是，这个英明之主一生却好神仙、搞迷信，一些好佞之徒也就投其所欲将之害人，其中以江充治巫蛊案为害最大，京师及邵国牵连被冤杀者数万人，其中有太子、皇后、公主以及丞相等大臣。

江充原名齐，是赵国邯郸人，其妹善鼓琴歌舞，嫁赵太子丹。后赵太子疑齐以己阴私告其父王，使吏捕齐，不得，便杀其父兄。齐逃出甘邯，更名充，他向汉武帝揭发太子丹与同胞姊乱，并与郡国豪强勾结为非作恶等事。武帝怒，派使捕太子丹，论死，因此得到武帝接见，充为人魁伟。容貌甚壮，武帝见而异之，对左右说：“燕赵固多奇士”。既至前，问以当世政事，得到武帝赏识。后充被封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三辅治安工作。充丁管皇亲贵戚，均按法办事。充遇馆陶长公主（武帝姑母，陈皇后母）行皇帝专用的驰道中，充上前盘问，公主说，“有大后诏。”充说：“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尽没收车马被具，大多家的使者乘车马行驰道，也被江充发现，他加以逮捕，没收了车马。太子派人向他求情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皇上知道，希望江君宽之。”充不听，还是向武帝报告。武帝说：“人臣当如是。”于是，大见信用，威震京师。江充奉法阿公，应予肯定，但此人治巫蛊案的表现，说明此人是居心叵侧，并作正直的人，其“奉法阿公”实力取得武帝的宠信而已。

史称：“巫蛊之祸起于朱安世，成于江充。”卫皇后姐姐君孺的丈夫公孙贺任宰相，其子敬声任大仆，父子并居公卿位。敬声自恃是皇后姐子，骄奢不奉法，擅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大侠朱安世不能得，武帝求之急，贺自请追捕安世以赎敬声罪，武帝许之。后果捕得安世。安世知道贺捕他是为赎子罪，便上书告敬声与卫皇后女阳百公主私通，

派人在甘泉埋木偶诅咒武帝，公孙贺父子被杀，灭族，阳石公主亦被子。巫蛊祸从此起。后武帝在甘泉宫养病，充见武帝年已老，自己与太子有隙，恐武帝死后为太子所杀，便起奸心，奏言武帝患病是因巫蛊作祟。于是，武帝以充为使者治巫。是时，武帝疑左右都用巫蛊诅咒他，而因此祸而致死者，都不敢诉冤。充既知武帝意，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再掘蛊于太子守宫，得桐木人。太子惊，与少傅石德商量，德说：“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坐此祸，今巫与使者掘地得木桐人，是巫所置，或实有之，难以自明，可矫诏收捕充等关进监狱，穷治其奸诈。且皇上患病在甘泉宫，皇后及太子吏请问皆不报，皇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难道忘了秦扶苏的教训吗？”于是，太子派使收捕充，自临斩之。骂说：“赵虏！你乱赵国王父子还不够，又来乱我父子！”武帝知道了，赐丞相刘屈氂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坚闭城门，不要令反者得出。”武帝从甘泉抱病来到建章宫，下诏征集三辅兵由丞相率领。太子亦矫诏赦长安囚徒，出武库兵，发长乐宫部，得数万人，到长安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盈沟中。长安扰乱，言太子反，故众不肯附。太子失败逃亡，后在湖县一穷人家发现太子，派人围捕，太子自缢死，其两子三男一女皆被杀，只有生下才几十月的孩儿关在狱中，因得廷尉丙吉保护才免死，即后来的汉宣帝。太子母后卫氏也因此自杀。诸太子宾客也被杀，其随太子发兵、反叛的被灭族，吏士被太子劫略反者皆流放到敦煌郡。

过了几年，巫蛊案渐被揭露，武帝也知巫蛊事多不可信，也了解太子是因一时惶恐而采取除江充之策，他并没有叛变之意，车千秋也为太子伸冤，武帝升千秋为丞相，下令族灭江充家，并在长安建思子宫，在太子自缢之地湖县建“归来望思之台”，天下人莫不为太子冤死而悲伤。武帝也从迷信中醒悟过来，车千秋请求武帝斥退方士，不要再搞求神求仙的迷信事，武帝同意说：“向时愚惑，为方士所欺。天下岂有仙人？尽妖妄耳！”但武帝因迷信已铸成大错，建“宫”建“台”何补于事？虽承认“愚惑”，而过了一年多武帝就死了。他的“愚惑”造成的灾祸也无从纠正其万一。

### 刘邵权欲迷心弑父夺位

《南史·刘邵传》记载：刘邵，字休远，南朝宋文帝长子。年六岁，立为皇太子。十二岁，出居东宫，纳皇门侍郎殷淳女为妃。他好读文史，尤爱弓马。及长，美须眉，大眼方口，身長七尺四寸（约合今1.70米）。亲览宫事，延纳宾客，意欲所为，文帝必从之。东宫置兵与羽林军。453年，杀父文帝及大臣江湛、徐湛之，自立。同年五月，其弟刘浚起兵讨杀刘邵。随即帝位。

刘邵弑父自立，这与宋文帝纵恣有关。文帝因爱子，随其所欲，让其置兵东宫，培植死党，使他野心日益膨胀，早就窥伺帝位。其弟刘浚跟他蛇鼠一窝，勾结作恶。刘浚养母潘淑妃深得文帝宠爱，刘邵母亲元皇后因之嫉妒致死，刘邵十分恨淑妃，刘浚也知此事，他怕太子刘邵将来继位对他不利，便曲意佞事刘邵，且二人臭味相投，刘邵就与之相好。二人结党胡为，多有过夫，屡为文帝所责备，便深恨文帝。文帝对儿子幼少时过于宠爱，纵其胡为，恶性形成，长大要教育已无济于事，反而促使父子仇恨加深。

宋文帝是个较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期间，勤于政事，社会安定，经济

复兴，被史家称为“元嘉之治”，他十分重视农桑业，使宫内皆养蚕，以此劝励天下。有女巫严道育因其夫为盗伏法，被没入官府为奴婢。她通过刘邵的姐姐东阳公主的婢女工鸚鵡向公主吹嘘，说她可通神灵，公主便向文帝托说道育善于养蚕，求召道育入宫。道育入宫见公主说：“所奉天神，最为灵验。”初，刘邵和刘浚两兄弟使道育祈请，他俩做的坏事不要让文帝知道。道育便弄神弄鬼，歌舞咒诅，不舍昼夜。道育对他俩说：“自上天陈请，必下泄露。”邵等敬事道育，号为天师。刘邵想及早继位，便请道育巫蛊，以玉刻文帝形像，埋于含章殿前。

不久事泄，文帝想不到刘邵兄弟竟干此事，大为惊惋，即收捕参与其事的王鸚鵡并搜其家得刘邵与刘浚写的诅咒信，在含章殿前掘得所刻的文帝形像。道育叛亡，捕之不得。文帝诘问、责备刘邵、刘浚，他俩把罪过推给道育。刘邵却将道育变服为尼，藏匿在东宫。刘浚前往京口时，便挟带她逃出。文帝以骨肉之情不愿深加追究，使刘邵等以后得遂其谋。文帝对其弟江夏王义恭说：“常见曲籍载有子谋害父事，以为是书传空言，不意今天果亲见，邵即位之日，已不关我与你的事，你儿子多，将来也许会有这种不幸事。”文帝又对潘淑妃说：“太子图富贵，是有其打算，虎头（刘浚名）复如此，非意料所及。你母子岂可一日无我。”

453年1月，狂风夹杂着冰雹袭击京都，文帝以为是天示警，担忧有人谋反，但对太子毫不怀疑，意增加太子兵，将东宫的卫队增到万人，以保卫皇宫。这时，有人向文帝报告：“京口有一尼姑，经常出入征北将军刘浚府内，似是严道育。”遣使至京口搜捕，只捕得两女婢，据供：“道育已随征北将军刘浚回到京都。”文帝大为惊骇，急令送二婢来京都对质，打算查实后废太子刘邵赐刘浚死。文帝将此事及其决定告诉潘淑妃。潘淑妃将此事告刘浚，抱刘浚位说：“你始咒诅事发，文帝不追究，希望你悔过自新，想不到竟藏严道育。我今天不想活了，可送毒药给我，我当先死，不忍见你祸败。”浚拂衣而出说：“天下事我会自理，必不累你。”刘浚毫无改悔之心，立即将文帝的决定告知刘邵，兄弟俩便加紧策划弑父阴谋。刘邵每夜犒饗将士，与东宫卫队的心腹将领密谋，趁严道育的两婢还未解到京之际，矫诏以有人谋反为名杀进皇宫，杀文帝及大臣江湛、徐湛之。又使人杀潘淑妃，剖其心。又杀文帝亲信左右数十人。刘邵反诬江湛、徐湛之谋反。于是，刘邵即皇帝位。丧事时，刘邵登殿临灵，伪装号恸，以示其“孝”，同时大赦天下，博访公卿，询求治国之道，还薄赋轻徭，以争取人心。但刘邵所为，已激起上下公愤。其弟刘骏起兵时得到广泛支持，原归附他的也叛变，其叔江夏王义恭投奔刘骏时，刘邵将其十二个儿子都杀了，其残酷如此！刘邵终被打败。邵将败，刘浚劝邵运珍宝辇帛下船入海，但已逃不了。他躲入井中，其卫队副将他从井中牵出。刘邵至殿前，参加讨伐刘邵的丹阳尹臧质见而恸哭，并责其奸逆，邵答道：“因将被废，不能作狱中囚。问计于肖斌，斌见劝如此。”刘邵还希望能保命，问质说：“可得乞请远徙否？”质说：“主上（指刘骏，这时已即帝位）自有处分。”其弟刘骏命先杀其四子，又斩刘邵于牙帐前。临刑前，刘邵叹说：“想不到宋家宗室如此互相残杀。”此外，又杀与刘邵有关刘氏子女要媵及同党数百人，将刘邵、刘浚尸弃大江，严道育、王鸚鵡鞭死后焚尸扬灰。一场弑父夺位引起的悲剧到此暂告结束。但宋室另一悲剧在后又重演，这是封建社会争权夺利的规律，不足为怪，但这已与本文无关了。

## 八、狼群中生活必有狼性

人的性格的形成，既有先天的遗传，又有后天的影响，而以后者为主。后天的影响，一是家庭的影响，言教不如身教，父母的行为的影响是关键的一环；二是客观的影响，如其所受的教育和所处的环境以及机遇、条件，等等。

十六国时的后赵石虎父子、五代十国时的后梁朱温父子都毫无人性，比野兽还凶，他们不仅以杀人为乐，父子也互相残杀。这种野兽性格的形成，与当时的客观实际大有关系。十六国时代和五代十国时代颇有相似之处，在逐鹿中原中，或为灭人国，或为争夺王位，都要大开杀戒，谁兵强马壮，谁就可称雄称王。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下，角逐权力的人大都残忍成性，如自西晋“八王之乱”，即司马氏之间互相残杀的悲剧出现，十六国时就不断重演类似的悲剧。唐灭亡以后崛起的五代十国，这种悲惨的历史又再现。这是为追逐权利泯灭了人性，恢复了兽性。而之所以如此，也由于当时的环境、机遇、条件所决定。人性如此残恶，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正如在狼群中生活长久的孩子必有狼性一样。

### 石虎父子之间互相残杀

《晋书·石季龙传》记载：石季龙即石虎，石勒侄，屡立战功，拜征虏将军，及后赵立国，任大尉、尚书令，封中山王。石勒立石弘为皇太子，石虎不满。333年，石勒死，石弘即位，石虎任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专擅朝政。334年，废杀石弘自立，称居摄赵天王，以子石邃为太子。石虎在位期间残忍奢侈异常，是历史上最凶恶的暴君之一。337年，太子石邃作乱，欲杀石虎，事泄被诛。遂立子石宣为太子，以石韬为太尉。石宣杀石韬，并要谋杀石虎，事泄，石虎又杀石宣。石虎父子之间就这样互相残杀。石虎父子骨肉相残，这是因他们兽性发作的必然结果。

石虎年轻时就很残忍，好驰骋射猎，游荡无度，是个凶恶的流氓。在军中他常用弹弓打人为乐，因他是后赵王石勒的侄儿，奈何他不得，军中以为毒患。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武艺超群，勇猛过人，将佐亲戚莫不敬畏。石勒深为赞赏，封为征虏将军。军中有武勇、策略与己相等的，便设法害之，前后所杀甚众。每攻下城池，不分善恶，一律杀死，少有遗存者。石勒虽屡加责备和劝诫，他还是我行我素，酷虐如故。但石虎御众严而不烦，部下不敢违犯，指授攻讨，都勇往直前，故得到石勒宠信，委他专司征战之职。石虎以为自己功高，原以为大单于官衔非己莫属，谄料石勒却授予太子石弘，便深恨之，私对其于石邃说，“主上只发号施令，我为他亲冒矢石。二十余年来，南擒刘岳，北逐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打下十三州的地盘。成大赵的基业的是我，大单于的头衔应属于我，今竟给予乳臭未干的小儿。每想到此，就气得吃不下、睡不着。待主上晏驾之后，绝不给他留下后代。”对扶持其成人并给宠信的叔父，赵王石勒，其深恨如此，石勒死后，他就废石弘而代立之，把石弘及石勒的后代都杀了，果然“不给他留下后代。”

石虎任居摄赵天王后，以石邃为太子，让他总揽军政大权，早存野心的石邃就更急于夺位。石邃跟他父亲石虎一样残暴荒淫。他白天饮酒作乐或外出游猎，晚间就到宫臣家淫人妻妾。他挑选宫中美女将她妆饰后，斩其头，

洗去血后，将头放在盘上，让人传看。他还遍游各寺，见到有姿色的尼姑就强行奸淫，然后杀之，将其肉和牛羊肉一起混煮而食之，并分赐左右。其残忍不下于其父，且一代超过一代。石虎沉于淫乐，石邃向其奏事，感到厌烦，不奏就责备，以至屡受杖捶，石邃深恨之，私对左右说：“官家（指石虎）难侍候，我欲行冒下顿杀父夺位之事，你们愿意跟我于吗？”左右吓得说不出话。邃称病不管事，带领东宫文武五百余骑在中庶子李颜家里欢宴，对颜等说：“我欲至冀州杀石宣，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李颜叩头固谏，邃亦昏醉而归，邃母后郑氏知道此事，私派宦官责邃，邃杀之。石虎听说石邃有病，派女尚书去探看，邃叫她至床前，抽剑砍之。石虎大怒，抓李颜等诘问，颜具告之，石虎将东宫属官李颜等三十余人杀了。幽禁邃于东宫，不久又赦之，引见于太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一会儿便出。石虎派人对话说：“太子应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傲然出不顾。石虎大怒，废连为平民。是夜，杀邃及妻张氏并其子女二十六人，同埋于一棺之中。杀其宦臣支党二百余人。废皇后郑氏为东海太妃。另立其子石宣为天王皇太子。

但石虎父子相残的丑剧并不到此结束，父子的兽性还继续发作，且愈演愈烈。石虎以石韬为太尉，与太子石宣轮流处理尚书奏事，生杀和任免百官都不用上奏，由他两人独自决定。这种分权，造成谁也不听谁，谁也不服谁，两兄弟为争权矛盾日益激化。石宣对其左右说：“谁能杀石韬，就将他的全部国邑分给他。韬既死，主上（指其父石虎）必亲临丧，见机行事，将他杀掉，天下就是我们的。”石宣便派亲信到东明观把石韬杀了。第二天早上，石宣将石韬被杀的事上奏。石虎听了惊欲绝，久之方醒，将要夫临丧时，司空李农谏说。“杀人者恐在肖墙之内，临丧会出事。”石虎才不去。便陈兵于太和殿，为石韬举行丧事。石宣乘素车，从者干人，临韬丧，不哭，使举衾看尸大笑而去。石虎疑是宣害韬，谋召之，惊其不入，乃伪言其母因悲伤过度危急。宣想不到自己见疑便入朝中宫，石虎便将他监禁。由于知情者告，捉到凶手，供出石宣是主使者，石虎极为悲愤，下令将铁环穿透石宣两颌销之，作数斗木槽，放入饭菜，让他像猪狗一样进食。石虎取害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使韬所亲宦官拔宣之发、抽其舌，断其手足，挖眼开腹，置之柴堆上焚烧。石虎率昭仪以下数千人登上中台观看。石宣被烧成灰，将其散在诸门交通道中，让过往路人，车马辗踏。又杀其妻子九人，石宣卫士三百人、宦官五十人被施以车裂之刑，将碎尸投进漳河。

349年，石虎病死。但这个家族的兽性还是在发作，继续互相残杀，继位的石世才立三十三天，就被其兄石遵杀了；石遵立一百八十三天，被其弟石鉴杀了；石鉴立一百零三天，被石虎的养孙冉闵杀了。立国三十一年后的后赵终于在骨肉相残中亡国，石氏父子相残的丑剧才闭幕了。

### 友珪将杀朱温大骂“老贼万段”

《旧五代史·太祖纪》记载：后梁太祖，原名朱温，又名朱全忠、朱晃，宋州砀山（今安徽）人。877年，参加黄巢起义军，任同州防御使。882年，叛变降唐，任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因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不断升迁，由招讨副使升宣武节度使，进而封为梁王。他占有广大地盘，成为割据势力，并逐步兼并其他叛镇，势力日益强大，他与李克用及其子李存助长期混战，兵祸连结。907年，杀唐昭宗，自立为帝，国号梁，史称后梁。912年，被子

朱友珪所杀。

朱温出生于贫苦家庭，有兄弟三人，他是老三，在其兄弟幼年时，父亲已去世了，因无法为生，母亲带领三子佣食于肖县人刘崇家。朱温长大，不事生产，好食懒做，流氓成性，以雄勇自负，同里人对他很厌恶。刘崇因其慵慵，往往加以责骂或鞭打。唐末，关东饥荒，黄巢举起义旗，饥民一下附从者数万。朱温便参加义军，因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得到黄巢重用，任为同州防御使。朱温这人会看风转舵，谁势力大就投靠谁，因见黄巢军战不利，便投降唐。当时僖宗在蜀，正在需人之际，知道朱温来降，高兴他说：“是天赐予也。”便下诏授朱温金吾大将军，兼河中行营副招讨使。朱温一翻脸，便视其曾参加的起义军如仇敌，拼命为唐朝效力，残酷地屠杀起义军。他用兵很严峻，每次战斗，凡队的主将战死，或战败的，都借故杀一批或全部处死，称为“跋队斩”。因其用法酷虐，士兵多逃亡，窜匿州郡，难于追捕，便在士兵面上刻字，发现文面的逃兵就随时处死。对于所属将领如稍有违背或看不顺眼，也立即杀死。因其残暴，将士心虽恨而不敢违其命令，只能拼死作战，故战无不胜。由于镇压黄巢起义军有功，得以封王，成为兵力最强的军阀。他骗取昭宗迁都洛阳后，指示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琼等心腹大将将昭宗、何后及字室九王都杀了，为了推卸其杀昭宗的责任，却嫁祸于蒋玄晖、朱友恭、氏叔宗，先后将他们杀掉。他令张廷范收捕朱友恭，朱友恭临刑时大呼说：“卖我性命，欲塞天下之谤，其如神理何？操心如此，欲望子孙长世得乎？”又对张廷范说：“你的下场当和我一样。”果然，不久张廷范也被处死。朱温先立十三岁的李祚为帝，随即杀之于曹州，自己登上了皇帝位。

朱温虽称帝，当时仍有不少割据者，为实现个人野心，不断穷兵黩武。因他为人残暴，竟以杀人为乐。在巨野东南追杀贺正军万余，生擒三千多人，适逢是日狂风暴起，朱温竟说：“此乃杀人未足所致。”遂下令将所俘三千多人杀死。攻博昌时，强迫十多万民伕运土筑土山，后又将人畜杀死，混合土石中以增加高度，被屠百姓哭声抢天，远闻数十里，惨不忍睹。城陷后，又尽杀城中居民。

朱温一向荒淫，行同禽兽，不仅在战争中，掠人妻女奸淫，对于大臣妻女也经常进行污辱，他在张全义家里住几天强要全义妻子、女儿、媳妇陪他睡觉。对自己的儿媳也如此，他有八子，诸子在镇时，皆取其妻入侍。据《资治通鉴》记载：朱温纵声色，诸子虽在外，常征其妇入侍，友文妻王氏色美，朱温对她特别宠爱，也想立友文为太子。另一子友珪知道了，既妒又恨。友珪有过，朱温常鞭打，友珪心很不安，常恐被杀，朱温病重，命王氏召友文前往东都，欲与他快别，付以后事。友珪妻张氏亦朝夕入侍，知道此事，密告友珪说：“大家（转朱温）以传国宝付王氏怀往东都，我们死无日了。”夫妻相对哭泣。左右说：“事急计生，何不图改，时不可失。”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珪，将情况告诉他。珪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杀，惊不自保，便与友珪合谋。珪以牙兵五百伏于禁中，中夜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朱温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说：“非他人，是我。”朱温说：“我固疑你此贼，恨不早杀你，你悖逆如此，天地哪能容你！”友珪骂道：“老贼万段！”一刀刺进朱温肚中，直透其背。友珪给裹上一条破毡子，埋在寝殿，密不发丧。又命均王友贞杀友文。假朱温名下诏说：“博王友文谋逆，遣兵突入殿，赖郢王友珪忠孝，将兵杀之，保全朕躬。然疾因

震惊，弥致危殆，宜令友珪权主军国之务。”及知友文已死，乃发丧，友珪即皇帝位。次年，友珪被禁军所杀，朱友贞继位。因朱温残杀将士，人心离散，又加以朱氏父子、兄弟互相残杀，国力削弱，朱友贞与晋王李存勖混战中，923年，友贞自杀，后梁亡。

## 第四章 同事关系

如何处理同事关系，这是个复杂的课题。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不只是自己，而是有一群人，这就必须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发生纵的横的关系，而与人关系的好坏，对工作对自己都有影响。我国古代流传了不少正确处理同事关系的佳话，如蔺相如不计较与廉颇的私怨，寇恂与贾复解嫌结友，对国家有利，个人也得美誉；肖何、魏无知竭力举才，周瑜、鲁肃、吕蒙、陆逊辗转相荐，终助其主成大业；夏元吉、娄师德以德报怨，显示其“腹里能撑船”，因能容众，故得众人爱戴。而那些斤斤计较私怨如田蚡、窦婴以及杨炎之辈，到头来落得两败俱伤。害别人以爬上高位如李林甫、严嵩等鄙佞之徒，则为人所不齿。以害人求官贵如秦桧、杨素之流，其为人极其阴险诡诈、心狠手毒。以上的正面教材，可作为人们学习的楷模；反面教材，可了解奸谗者害人的手段，有如打“防疫针”，免受这种人所害。

### 一、以国事为重不计私怨

同事之间总有矛盾，矛盾解决不好，可能使之激化，会结怨成仇，对私对公都不利。历史上流传着许多解决这种矛盾的佳话，其中陶相如对廉颇、寇恂对贾复的释怨结友的生动事迹最为感人。他们以国事为重不计私怨的崇高风格，一直被后人所赞扬，也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 蔺相如屈于廉颇释私怨

蔺相如是历史上很有胆略的人，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司马迁生动地描述了他“完璧归赵”和“强使秦王为赵王击缶”的故事。赵惠文王得楚和氏璧，这璧天下无双，因其无瑕，珍贵异常，秦昭王知道了，说愿以十五城来交换。秦赵是当时的两个强国，但秦比赵还强，赵不同意交换，怕与秦交恶，给又恐被秦欺骗，因此犹豫不决。赵宦者令缪贤的舍人蔺相如在其主人的推荐下，自告奋勇说：“臣愿奉璧前往。秦给城则留璧，不给，臣请完璧归赵。”赵王于是派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在章台会见相如，相如送上璧，秦王大喜，却不谈给城事，相如上前说：“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退立倚柱，怒发冲冠，严斥秦王无意给城，说，“如欲强取璧，臣头与璧将俱碎于柱！”相如持璧睨柱，欲以击柱。秦王恐他破璧，便召有司案图，指从此以往十五城给赵。相如知其诈，便对秦王说璧是稀世珍宝，来时，赵斋戒五日才送璧，要秦王也斋戒五日才献璧。秦王知不可强夺，就同意了，叫人带相如住在广成传舍。相如知秦王虽斋戒决不给城，便使从者怀璧，从小道逃走，归璧于赵。五日后，秦王会见相如，相如说璧已归赵，要秦先割十五城，赵必送上璧。秦王左右欲杀相如，秦王认为杀相如也不能得璧，而使秦赵绝交，不如礼待之，使之归赵。这便是相如“完璧归赵”的经过。相如“强使秦王为赵王击缶”的故事是：秦王派使告知赵王，欲与赵王结好相会于西河外渑他。相如认为：“王不与会，是示弱于秦。”赵王便与相如前往。相会时，秦王酒酣，说：“寡人听说赵王好音，请奏瑟。”赵王鼓瑟。秦御史上前书“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相如上前说：“赵王听说秦王善为奏声，请秦王奏盆缶，以相娱乐。”秦王怒，

不许。于是相如进缶，跪请秦王，秦王不肯击缶。相如说：“五步之内，相如将得以颈血溅大王了！”秦王左右欲杀相如，相如张目叱之，左右惊不敢动。秦王虽不高兴，不得不击缶。相如叫赵御史书：“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秦群臣说：“请以赵十五城为秦王祝寿。”相如亦说：“请以秦之咸阳为赵王祝寿。”饮酒始终，秦王占不到便宜。在赴会前，相如和赵大将廉颇计议，已盛设兵以待秦，秦不敢动。

“完璧归赵”到“强使秦王为赵王击缶”说明：相如智超人，胆包天，在强秦威胁下，他以一介之使，无所畏惧地站在秦王面前，以持壁击柱的威姿吓住了对方，完璧归赵而秦王不敢加害，反而厚遇之，得以毕礼而归。在渑池相会，相如又以将用“颈血溅大王”使秦王及其左右不敢轻举妄动，不得不为赵王击缶。这两次外交的胜利，为赵国增光不少。

因“完璧归赵”之功，相如被封为上大夫；渑池之会后被拜为上卿，位在赵大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蔺相如徒以口舌为劳，而位居吾上，且相如素贱人，吾羞，不忍为之下。”宣言：“我见相如，必辱之。”相如听了，不肯与会。相如每朝时，常称有病，不与廉颇争位之上下。相如外出时，望见廉颇，便叫车夫开车避开。

曾经以大无畏的精神打下了欲吞天下的秦王的威风，为何对位在己之下的廉颇这样低三下四呢？对此连相如的舍人也不理解，他们对相如说：“我等所以离开亲戚来跟随您，是由于慕您的高义。今您与廉颇同为上卿，廉颇以恶言威吓而您惊怕避匿不敢见他，恐惊如此，庸碌的人尚且感到羞耻，何况是将相呢！我等跟随您觉得很春光，请辞去！”相如挽留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比得上秦王吗？”舍人答道：“不如秦王。”相如说：“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在廷上叱之，辱其群臣，相如难道怕廉将军吗？我考虑的是：强秦之所以不敢加兵于赵国，因有我和廉将军在。如果两虎相斗，其势不俱生。我所以畏匿之，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廉颇听到，感到惭愧，便带着宾客到相如府前，肉袒负荆谢罪，说：“鄙贱之人，想不到将军如此宽容。”于是相如与廉颇尽释前嫌，建立了刎颈之交。由于将相和，团结为国，赵国日强，在攻齐、魏和与秦的战争中，曾多次取得了胜利。

### 寇恂学相如与贾复解嫌结友

寇恂与贾复都是东汉的开国功臣，贾复因私怨欲杀寇恂，寇恂效蔺相如对待廉颇之法，终于化于戈为玉帛，两人结成好友。

寇恂是个有勇有谋的人。他曾任上谷郡功曹，甚得太守耿况的重视。王莽败，更始立，派使到诸郡国宣谕：“先降者复爵位。”恂从耿况迎使者于蜀上，况送上印绶，使者纳而不还。恂带兵入见使者，请还印绶，使者不与，恂责其失信，将“不能号令它郡”。使者不应，恂叱左右以使者命召况，取印绶给况。使者不得已，复况爵位。割据者王郎派使催况发兵，恂认为刘秀将成大事，力劝况归附之。他袭杀使者，与况南下归刘秀。刘秀拜恂为偏将军，号承义侯，随刘秀征战有功。寇恂数与邓禹谋议，禹奇其才。刘秀南定河内，需人驻守，问邓禹说：“诸将中准可守河内？”邓禹说：“寇恂有文武全才，非他莫属！”刘秀任恂为河内大守，行大将军事。光武对恂说“昔高祖留肖何镇关中”而助其成帝，今派恂守河内亦是此意。要他“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勿令北度。”寇恂不辜负刘秀的重托，出

色完成了任务，不仅足食足兵，且破来犯的更始将军苏茂之军，追至洛阳，斩其副将贾强，使投河死者数千，生获万余人。苏茂的三万余军损失了大半，洛阳敌军震恐，城门尽闭。捷报至，刘秀大喜说，“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刘秀即位，号光武。寇恂不愧为汉光武帝的肖何（《后汉书·寇恂传》）。

贾复也是汉光武帝的一员猛将，他随光武征战，未尝败北，数与诸将溃围解急，身被十二创。如他从光武击青犊头于射犬，大战至日中，敌军很顽强，胜负未分，光武传召复说：“吏士皆饥，可先吃饭。”复答道：“先破之，然后食。”于是复举着旌旗，身先士卒，向敌猛攻，所向皆靡，敌乃溃败。诸将都服其勇。又北与五校战于真定，大破之。复伤创甚。光武以为他将死大惊说：“我所以不令贾复独当一面，是因他轻敌。果然失吾名将。听说他的妻子已怀孕，生女，我子娶之，生男，我女嫁之。”复创伤愈后，即追上光武于蓟，君臣相见甚欢，大飨士卒，令复打先锋，击邺，破之。贾复因以功大，光武即位，拜为执金吾，封冠军侯。后还屡立战功，封胶东侯，加位特进，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后汉书·贾复传》）。

从上所述，可见寇恂和贾复者是汉光武帝的名将，都拥有相当实力，如果两人内讧将是一场灾祸，对新创立的东汉将是重大损失。由于寇恂处理得当才能化敌为友。事情的经过发生是这样的：当时寇恂任颍川太守。执金吾贾复在汝南，其部将杀人于颍川，寇恂将之逮捕关进监狱。是时东汉新政权刚建立，法制下完备，军人犯法，大多互相宽容，寇恂却将贾复的部将杀了，复以为耻。他经过颍川时，对左右说：“我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哪有怨仇不报呢？今见恂，必用手剑杀之！”恂知其意不善，不欲与相见。他姐姐的儿子谷崇说，“我带剑侍侧，如有变，足可相当。”恂说：“昔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于廉颇，是为了国家着想。小小的赵国人，尚有这种胸怀，我哪能与他寻仇相报。”便通知所属各县，准备丰盛的酒菜，一人要供二人的酒菜。贾复一到，寇恂就前往迎接，但以身体有病不能久陪不辞而返。贾复欲率兵追之，而吏士都醉了，只好作罢。寇恂回来后，派谷崇将此事上奏，光武帝便召寇恂入朝，恂到，时复已先在坐，欲起身相避。光武帝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私斗？今日朕为你俩解和。”于是，坐在一起交谈甚欢，朝罢，寇恂与贾复两人共车同出，结为好友而去。

## 二、为共同事业推荐贤才

知人才不易，人才被推荐也难。人才如已脱颖而出，人皆知之，此非所谓“知人才”。说“知人才不易”是转人才未被人发现之前，知之则非易。而能知之者必须有超人的眼光，才能知人才于其默默无闻之时，就是常说的：慧眼识英雄。韩信归汉，人未见其奇，只有肖何奇之，始向刘邦推荐；陈平投汉，人谗其“盗嫂受金”，独魏无知知其才，力荐于刘邦。可见，知才才能举才。但知才未必肯荐才，如碰上妒贤忌才的人，不仅不推荐还要害之；且在封建时代，推荐错了，推荐者还要受到牵连，以至连坐其罪，故说“人才推荐也难”。惟有着眼于共同事业而不为私，其本人又是知才的贤才，才肯荐才，东吴四英——周瑜、鲁肃、吕蒙、陆逊，既是人才又是贤才，才能辗转相荐，当时吴国能与魏蜀三分鼎立，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 肖何、魏无判为汉高祖推荐奇才

在楚汉相争中韩信和陈平都先事楚而后归汉，他俩在楚时都得不到重用，韩信位不过郎中，数次向项羽提出奇谋深策，不被采用；陈平也只当个都尉，且被疑几乎掉脑袋，这两个奇才在楚是被埋没了。可是他俩投汉却得到了重用，他俩的奇才才能充分发挥，对汉高祖刘邦打败西楚霸王项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韩信、陈平在汉得到重用，当然与刘邦善于用人有关，但这两个奇才被发现，首先归功于肖何和魏无知。

以项羽为首的诸侯军消灭暴秦后，项羽便分天下，封诸王，刘邦被封为汉王，封地包括巴、蜀、汉中，建都于南郑。为防止汉王东出，项羽三分关中，分别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为王，以抗拒汉王。可见项羽对刘邦是不信任和具有戒心的。而刘邦当时与项羽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不得不听从项羽的分封。为免引起项羽的疑心，刘邦用张良计，“烧绝所过伐道，示天下无还心”。而随汉王的都是关东人，由于思乡和认为入蜀无所作为，在行军途中纷纷逃亡，其中就有将官数十人。韩信曾数次与肖何谈话，肖何奇其才，深为赞赏，韩信料肖何已数次向汉王推荐，却不见用，便认为在此“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也逃亡了。肖何听说韩信逃亡了，来不及告诉汉王，立即骑马往追，以挽留他。京剧有“肖何月下追韩信”，即指此。有人告诉汉王说，“肖何丞相逃亡了。”刘邦与肖何是患难之交，肖何是刘邦起事的策划者，刘邦一贯依靠肖何设谋决策，一听到肖何也逃亡的消息，认为他无义十分愤怒，而肖何“逃亡”了又感到如失左右手。过了两天，肖何追回韩信后来见刘邦，刘邦既恼怒又高兴，骂肖何道：“你也逃亡了，这是什么原因？”肖何答：“臣不敢逃亡，臣追逃亡者。”刘邦问：“你追的是谁？”肖何说：“是韩信。”刘邦又骂道：“诸将逃亡的有数十人，你无所追究，追韩信是假。”肖何说：“诸将易得。至于韩信，国土无双。王如只想在汉中称王，用不着韩信；必欲争天下，非韩信无所与计事者。这看王是怎样决定的。”刘邦说：“我亦欲东向天下，哪能郁郁久居此地。”肖何说：“王决计东向争天下，能用信，信则留；不能用，信终要逃亡。”刘邦说：“我听你的，以韩信为将。”肖何说：“虽为将，信必不留。”刘邦说：“任他当大将。”肖何说：“很好！”于是，刘邦欲召信拜之。肖何说：“王一贯对人傲慢无礼，今拜大将像呼唤小儿，这样韩信还是要去的。王真的要拜韩

信为大将，请择良日，斋戒，设坛场，用拜大将之礼才行。”刘邦许之。听说刘邦要设坛拜大将，诸将都很高兴，有些人以为自己可能被拜为大将。至拜大将，却是无名小将韩信，使一军皆惊。韩信被拜为大将后，对刘邦分析了楚汉的劣优势，认为西楚霸王“名虽为霸，实失天下之心，秦民尤恨之，故说其强实弱。”而汉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大王为秦王。”如果“大王举兵东向，三秦可传檄而定。”刘邦听从韩信计，举兵东向，果定三秦，旗开得胜。在尔后楚汉战争中，韩信建立了大功。刘邦即皇帝位时，总结其得天下是因能用张良、肖何、韩信三杰，对韩信的评价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克，吾不如韩信”，没有韩信的“战必胜，攻必克”，刘邦就不能在垓下之战中打败项羽。这说明肖何推荐韩信的功劳是很大的（《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陈平原事魏，魏王任为太仆，以计献魏王不被采纳，又有人向魏王说陈平的坏话，陈平便离魏归楚。汉王定三秦后继续东征，殷王反楚，项羽以平为信武军，率军击殷，殷王投降。不久，汉王攻下殷，项王怒，要杀死殷的将吏，陈平惊，背楚投汉。魏无知知陈平是奇才，向汉王力荐，汉王使典护军。周勃、灌婴等反对，说陈平“盗嫂受金”，他当护军，受诸将贿赂，金多的得善处，金少的得恶处，是反覆乱臣，不可重用。汉王也因此疑平，责备魏无知为何推荐这样的人。无知说，“臣所说的是指陈平的才能，陛下问的是关于陈平的德行。今有尾生、孝己那样的孝行，无益于汉与楚争天下的胜负，陛下用之有什么作用呢？今楚汉相拒，臣推荐奇谋之士，这要看其计能否有利于国家，至于盗嫂受金又何关大局？”汉王又召平责备说：“先生事魏不合，去而事楚，今又投我，这是否多心？”平答道：“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才离楚。听说汉王能用人，故归大王。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生活。臣的计策可以采用，愿大王用之；如果不能，金具在，可封还官，请得骸骨回去。”汉王向他道歉，厚加赏赐，拜为护军中尉，负责管理将官的人事工作。后陈平六出奇计，对汉打败楚起了重大的作用。据说有的奇计颇秘，世人都不知道。（见《史记·陈丞相世家》）

### 东吴四英团结无间辗转相荐

诸葛亮任“隆中策”中谈到东吴时指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力之用。”由于“贤能为之用，”

为他献智效力，故得到人民的拥护，国家也就富强，使长江成为不可逾越的天堑。在东吴诸贤中，东吴四英是其中佼佼者，魏、蜀先后来犯，而东吴岿然不动，实有赖四英之智力。

周瑜与孙权兄孙策有刎颈之交，孙策死，周瑜辅佐孙权。曹操南征，降刘琮，得荆州，拥有船步兵数十万，东吴将士皆惊恐，权召见群下，问以计策，议者认为不可力敌，皆主张投降。周瑜分析彼此劣优势后，坚决主张抗击。在这以前，鲁肃已说刘备与吴抗操，因有刘备协力，孙权便决计派周瑜率精兵三万人，与刘备并力。孙、刘终于在赤壁打败曹军（《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这一战不仅保卫了东吴，且为三国鼎立奠下了基础。

孙权一见鲁肃，甚悦其人，独邀其合榻对饮，肃为之策划图天下的战略，认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

之衅。”趁袁绍与曹操在北方争霸，曹操不能南顾之际，“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史称此策为“榻上策”，孙权纳之，奉为国策。曹操南下，鲁肃是东吴头一个主张联刘备抗曹操的人。尔后一直坚持吴蜀联盟抗魏。鲁肃是稍迟于诸葛亮预见天下三分，也是三国鼎立的促成者之一（《三国志·吴书·鲁肃传》）。

吕蒙出身于行伍，因其勇敢善战，屡立战功，获得孙权赏识。为人粗猛，不读书，由于孙权的勉励，他笃志读书，学识英博，成为文武全才的将帅。他袭取荆州，可以说是攻心的绝唱：先是麻痹关羽，使他不为之备，诱使关羽尽调主力军北上围攻樊城，继而白衣渡江，兵不血刃地袭取荆州；占领荆州后，对随关羽出征的吏士家属和百姓施以恩惠，并使之传到关羽军中，关羽回军收复荆州的途中，军心瓦解，不战而溃，关羽终于被活捉。袭取荆州，实现了鲁肃的“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决策，吴国防更加巩固了（《三国志·吴书·吕蒙传》）。

陆逊是儒将，深懂韬略，在抗击刘备倾国来犯中立了显赫的战功。初，刘备引八千兵埋谷中，派吴班将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制止说：“此必有谲”。坚守不动，备知其计不可，只好引伏兵出。诸将对陆逊坚守不战意见纷纷，说，“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待七八月，其诸要害皆以固守，击之必无利。”诸将不知陆逊是引敌保入，伺机消灭之。备欲战不能，而天气酷热，只好驻军于密林近水之地，陆逊乃以火攻之，烧其四十余营，死者数万，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刘备夜遁，令军士尽脱袍铠，塞道而焚，以阻追兵，才能逃入白帝城。猇亭惨败，西蜀再无力东顾。

东吴四英确是非凡之辈，而孙权能用四英，固然是因他善于“举贤用能”，但也由于四英的辗转相荐。周瑜为居巢长，前往访鲁肃要求他资助粮食，肃家有两困粮，各三千斛，肃将一困赠周瑜，瑜见其慷慨如此，遂与结交。后荐于孙权。周瑜病重时，上疏推荐代己说：“鲁肃智略足任，乞以代瑜领兵。”吕蒙为寻阳令，鲁肃往访与谈，见其学识超人，抚蒙背说：“我原以为大弟只有武略，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遂拜蒙母，结友而别。肃死，蒙领其军。蒙从陆口称病还，权问：“谁可代者？”蒙说：“陆逊意思深长，才堪负重，观其规虑，终可大任。”逊遂代蒙。四人相继，曹操、刘备、关羽皆为所败，东吴边境无事达三四十年。

### 三、彼此合契才能搞好工作

“团结就是力量”，这是至理名言。同事之间只有彼此合契才能把工作做好，如果闹意见闹分裂，不仅有如南辕北辙前进不了，甚至会倒退，把事情弄糟。能从大局着想的人，为了互相团结，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迁就对方；即使是一些原则问题，不影响大局的话，也不计较。东晋王导就是这样，晋元帝能在南方站稳脚根，与王导能团结人大有关系。唐时房玄龄与杜如晦二人合契很好，史称“房谋杜断”，对辅佐唐太宗创业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 王导团结南北士族巩固东晋政权

西晋自从白痴惠帝继位，任其后贾南风胡作非为，引起八王之乱，互相残杀，国势日衰，至愍帝，被匈奴族、汉主刘聪所灭，西晋亡。司马懿曾孙司马睿创建东晋。东晋的创建与王导的辅佐及其团结北、南士族是分不开的。

《晋书·王导传》记载：司马睿被封为琅玕王时，适逢八王之乱，他恭俭退让，得免于祸。王导素与琅玕王亲善，二人倾心相交，雅相器重，契同友执。王导见王室内江天下大乱，劝琅玕到封国。琅玕王出镇建康，王导帮助他依靠避乱南迁的北方大族，团结江南大族顾荣、纪瞻等，在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发展自己的势力。愍帝被俘，琅玕王于建康称晋王，建立政权，首称东晋。愍帝被害，晋王称帝，即晋元帝。

王导在辅佐元帝期间，一直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司马睿即位后，以王导为开府仪同三司，王导堂兄王敦力大将军、江州牧，故当时有“王与司马共天下”之说。实际上东晋权力掌握在王氏手里，故元帝称帝时，一再令王导到御床共坐，以受百官朝贺，王导固辞说：“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元帝乃止。元帝表面尊重王导，暗地里却想削弱王氏势力，他任戴渊为征西将军、刘隗为征北将军，名义是北伐石勒，实是对付王敦。初王敦恐元帝年长难制，想更议所立以专国政，王导固争乃罢。及刘隗受元帝宠信，王导渐被疏远，他“澹如也”，不与计较。王敦以“清君侧”为借口，从武昌举兵攻入建康，杀戴渊等，刘隗逃奔石勒。攻陷建康后，王敦对王导说：“不从吾言，几致族灭。”想篡夺政权，王导坚决反对，王敦阴谋没有得逞。及元帝死，明帝即位，王敦以为有机可乘，因病由其兄王含举兵内向，王导部署兵迎击，王含大败。王敦不久病死，其分裂势力终被镇压。明帝死，王导与庾亮等同受遗诏，共辅幼主，是为成帝。庾亮出镇于外，有人向王导进谗说庾亮可能举兵内向，劝导密为之防，导说：“我与庾亮休戚与共，他若来了，我就回家去，有什么可怕！”其不计较个人进退如此！王导辅东晋王朝三代，协调王氏势力与司马氏势力的矛盾，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南北方士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分裂势力，以巩固东晋在南方的统治。

在南方，司马氏势力是很单薄的。西晋灭吴国后，排斥南方望族，故他们对司马氏很不满。这些望族如周氏、顾氏等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如遭其反对，将会引起动乱。同时，“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他们都拥有部曲、佃客，因而也与南方望族发生矛盾。所以，如何争取南方士族的支持，调和南北士族的矛盾，是东晋王朝的要务。王导采取的措施是：一是安置好渡江的北方士族，使他们居住于南方望族势力较弱地区，使彼此少接触，以免引起磨擦；二是任用南方士族的首领如顾荣、贺循等，通过他们团结南方

士族，并对南方武力强宗采取忍让的态度。如周勰父亲周王已因受北士轻侮而气死，死时嘱周勰为他报仇。周勰拟起兵叛乱，因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反对，周勰不敢发兵。但其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如果由朝廷发兵征讨，将扩大与周氏的矛盾，王寻乃派周勰族弟周蒞带兵去镇压，周蒞用计杀了周续。对于周勰，则不穷追，抚之如昔，把周氏族众争取过来。

人至察则不明，能糊涂则安静。至察的人，能见秋毫之末，而往往忽略事物的整体，对事物的看法就可能作出错误的结论，故说人至察则不明。所以在特殊的情况下，明智的人为避免引起麻烦，便装作糊涂以求得一时安静，而明智的人假装糊涂是不容易的。故说难得糊涂。当时东晋靠以建立的基础很不牢固，那帮渡江来的北方士族只想偏安江左，南方士族则不尽支持司马氏，而东晋王朝必须依靠北方士族，团结南方士族，得罪哪一方都会激化矛盾，可能引起动乱，所以王导只能采取“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方针。而不管是北方士族或南方士族，为了本家族的利益，百般掠夺百姓，大多违法乱纪，且这些士族都拥有部曲，如果违法者都绳之以法，非朝廷力量所能及。何况北方统治者无时不在虎视眈眈，大敌当前，内部团结是最要紧的。因此，只要不危及东晋的统治，王导总是睁一眼闭一眼，装作看不清或看不见，置之不理，使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以求得暂时安静。王导任扬州刺史时，派属官到本州各郡去考察政治得失，回来后向他汇报，只有顾和默不作声，王导问他看到些什么？顾荣说，你是国家首辅，应该让吞枣的大鱼也能漏出网去，何必计较地方官的好坏。王导连声称赞他见解高明。王导晚年常说，人家说我糊涂，将来会有人想念我这糊涂。糊涂便是王导能团结南北士族，使东晋求得暂时安静的秘诀之一。

### 房谋杜断为唐太宗图天下

唐太宗能图天下，固然因他手中有许多猛将，如尉迟敬德、程知节等，更重要的是他有杰出谋臣房玄龄、杜如晦的辅佐，为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可贵的是，他俩配合得很默契，房知社善于决断，杜知房善于出谋，便各发挥其所长，遇事互相商量，然后作出决定，经过房谋杜断，于是正确的策略也就形成了。这使唐太宗在图天下时，由于有正确的策略指导，战无不胜；世民即皇帝位后，他俩也团结无间，共同为唐太宗制定治国方略，对贞观之治作出了贡献。

据《旧唐书》的《房玄龄传》和《杜如晦传》记载：玄龄“幼聪敏，博览经史，工草隶，善属文”，如晦也“少聪悟，好谈文史。”在他俩还默默无闻时，善于知人的吏部侍郎高孝基就对他俩深为器重，他对房玄龄的评价是：“仆阅人多矣，未见如此郎者，将来必成伟器。”对杜如晦的评价是：如晦“有应变之才，当为栋梁之甲。”在隋末还安定时，他俩都预知天下将大乱，房玄龄曾对其父泾阳令彦谦说：“废嫡立庶，倾夺嗣位；贵族又竞相淫侈，隋终将内相诛夷，不足保全家国。今虽清平，其亡可翘足而待。”李渊父子揭起义旗入关，李世民攻取渭北，时任隋隔城尉的房玄龄立即前往投到其麾下，世民一见便如旧识，任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杜如晦曾任滏阳尉，知天下将乱，早就弃官归去，及世民平京城，被引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从此，房、杜二人得遇知己，便竭力献智，知无不为。

房玄龄能宽客人，善于团结同事，他知人善任，帮助李世民选拔贤才。

玄龄随李世民出征，每次战胜，众将竟求珍玩，他“独先收人物，致于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时秦王府中多英俊，被外调的日多，房玄龄听知杜如晦将要外调，当即去对李世民说：“府僚去的虽多，都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是王佐之才。如果大王只当秦王，不用他也行，必欲图天下，非此人莫可。”李世民大惊说：“你不说，几失此人！”便奏请为府属。

由于秦王李世民战功最大，军力最强，威望最隆，太子李建成深忌之，便与其三弟李元吉相互勾结，想中伤世民并陷害之。建成对元吉说，“秦王府中可怕的，只有杜如晦与房玄龄。”因向高祖李渊进谗言，于是，杜、房两个同时被斥逐。

李氏兄弟矛盾越来越深，以太子建成和三弟元吉为一方，世民为一方，保嗣位和夺嗣位的斗争在发展，各方都使计设谋以消灭对方，已到了“弓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房玄龄早预料到这种形势的出现，他对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说：“今彼此嫌隙已成，危机将发，大乱必兴，不仅祸及秦府。且危及唐朝的统治。不如效法周公除掉管、蔡那样，消灭建成、元吉势力，内安李氏，孝敬高祖。古人说，‘为国都不顾小节’，不然，国家将沦亡，我们也身败名裂！”无忌说：“我也久怀此谋，不敢说出，公今所说，正好我心。”无忌便将此意告诉世民。世民召见房玄龄跟他商议施行措施，玄龄便与杜如晦秘密策划，同心戮力为世民效命。及建成、元吉将有变时，世民令无忌密召已被驱逐在外的房玄龄、杜如晦，他俩穿着道士服，潜入秦王府计事。于是发生“玄武门之变”，除掉建成、元吉，世民继为太子，高祖退位由世民为皇帝。论功行赏，以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尉迟敬德、侯君集五人为最。后杜如晦与房玄龄共掌朝政，他俩同心协力，为唐太宗治国安邦，甚获当代的赞誉。谈唐初良相，后代史学家都推崇房、杜。

#### 四、以德报怨终释了私嫌

在同事之间，能以德报怨的不易，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宏度大量不行。历史上有一些人，从才干和德行来说，都值得称赞，但对于私怨却不能原谅，非报不可。有的由于个人意气从事，为了达到泄忿的目的，竟不择手段诬陷以至杀害对方，因而自己也得了害贤之名，遭到舆论的责备而惶惶不安。在同一章，即下面的《为私仇互斗两败俱伤》这篇所谈杨炎诬杀刘晏的案件，便是这样的例子。武周时的娄师德和明时的夏元吉，则对于涉及个人的私怨从不计较，反而以德报怨，他俩这种宽厚待人的雅量，使时人无限的敬佩，一些排挤或攻击他俩的人也愧悔万分，为他俩的高尚风格赞叹不已！

#### 娄师德荐贤反被排挤却坦然置之

《新唐书·娄师德传》记载：娄师德，字宗仁，中进士，任江都尉。高宗时为监察御史。后率师讨扰边的吐蕃，屡有战功，他得重任是在武周朝时。初任左金吾将军，检校丰州都督。他穿着皮衣，带领战士屯田，积谷数十万，使部队自给自足，不用受转运粮食之艰并为国家节省了买粮的费用。武则天曾致书慰劳，令他负责边军屯田事，任河源、积石、怀远军及河、兰、鄯、廓州检校营田大使。后调入朝廷，先后任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兼检校右肃政御史大夫，参预政事。娄师德虽位至宰相，又得到武则天的宠信，却从不以势欺人，而是以能宽容人著称。他深沉有度量，人有忤己的，却能宽容，不见怒形于色，而是谦逊相待。

师德身高八尺，方口厚唇，长得又高又胖，走路很迟慢。有一次李昭德跟他同行，几次停步等他，不耐烦他说，“为田舍子所留。”师德笑说：“吾不田舍，复在何人？”他的弟弟守代州，不满意其所任，想辞职，他教其忍耐。弟说：“被人唾面，抹净算了。”师德说：“不！抹净，反促其怒，要使之自干。”所谓“自干”，实是要其弟对处理矛盾的事情要有高度的容忍性。

狄仁杰未辅政前，娄师德因见他有才干，便积极向武则天推荐，及狄仁杰参政，与师德同列，却看不起师德，数次排挤他，令他充外使，武则天发觉了，问仁杰：“师德贤吗？”仁杰答道：“为将还谨守，贤则不知道。”又问：“他知人吗？”答道：“臣跟他同事，没有听说他知人。”武则天说：“朕用卿，是师德推荐，他推荐得对，确是知人！”便将师德推荐仁杰的奏章拿给仁杰看，仁杰看了，感到十分惭愧，便叹说，“娄公盛德，我为他所容乃不知，我不如他远了！”师德推荐仁杰竟为仁杰所排挤而坦然置之，且从不以推荐仁杰之功示之于人，如果不是武则天将此事告知仁杰，仁杰还不知“娄公盛德。”师德为人如此，确是正如武则天所谓“贤而知人”。狄仁杰是武周朝的名相，深得武则天所器重，但如没有娄师德的推荐，也许他不能脱颖而出，师德为将相达三十年，恭勤待下，孜孜不怠，虽参预朝政，始终谦虚谨慎，武周时不少将相动辄获罪，而师德竟能以功名始终，这与他器量宽厚大有关系。

#### 夏元吉宽厚待人且有雅量

《明史·夏元吉传》记载：夏元吉，湘阳人。因努力读书被乡荐入太学。诸生喧笑，元吉却正襟危坐，适逢朱元璋到太学考察，见了颇为赞赏，擢为户部主事。永乐时升至户部尚书，至宣德时病死，历事五朝，主持财政工作达二十七年之久。因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能团结同事做好工作，故政绩卓著。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成祖令元吉治之。他带领十余万人日靖奋战，他布衣徒步，盛暑不张盖，说：“民劳，吾何忍舒适。”终于治好，农田大利。他任户部尚书时，裁冗食，平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清仓场，广屯种，不仅给边苏民，且便商贾。在他任职期间，财政较裕，国用不继。

夏元吉做事既能顾大局又能为人着想。北京宫室建成，成祖派元吉召太子、太孙。既还，元吉向成祖建议：“连岁营建官室，今已告成。宣抚流亡，免所欠赋税以宽民力。”过了一年，三殿被火烧，成祖以殿灾下诏征求直言，群臣多言建都北京非便。成祖怒，杀主事肖仪，说：“迁都前，与大臣商议，久而后定，非轻举也。”言官便弹劾大臣，成祖命大臣、言官都跪于门外质辩。大臣争骂言官，只有元吉奏言：“言官应诏直言无罪。臣等备员大臣，不能协赞大计，罪在臣等。”成祖意稍解，对言官和反对迁都北京的都原有之。有的大臣怪元吉背初议，元吉说：“吾等历事久，说错了，帝可能原谅。如果言官得罪，会影响不好，人们将不敢说话了。”诸大臣听了，深为叹服。山东唐赛儿反，事平，俘其众三千余人至京，元吉奏请宽大处理才得释放。谷王穗叛，成祖疑长沙有通谋者，元吉以全族百口保之，事遂平息，才未株连扩大。

元吉有雅量，同事有善则采纳之；或有过，必为之掩护。甚至代部下受过，即使被同事攻击，也从不进行报复。吕震尝攻击元吉，后震为子乞官，元吉不因他攻击己而拒绝，却以震“靖难”时有守城功，为之请。平江伯陈瑄初亦恶元吉，元吉不因此而怨他，却经常称赞瑄的才干。有人问元吉：“量可学吗？”元吉答道：“我幼时，有人犯我未尝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了就没有什么事不可忍了。”

## 五、坚持原则不同流合污

在同事之间，凡权重势大的，不管其品格如何，人多附之。但有些耿直的士大夫，对于一些品格坏的权贵，却拒绝与之接近或相交，显示其不愿同流合污的高尚人格，武周朝时的宋璟和明嘉靖时的吴梯就是这样耿介的士大夫。

### 宋璟疾恶如仇拒不见二张

《旧唐书·宋璟传》记载：宋璟少时耿介有大节，博学，工于文翰。二十岁时中进士，当官正直，曾任凤阁舍人，舍人是皇帝亲近的属官，负责撰拟诏旨，武则天对他很重视。他敢于与则天内宠二张斗争及拒不与之相见的事迹，为时人所称道。

张易之诬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顺之言，引凤阁舍人张说到御前证此事。到御前对证，张说心里很惶恐，不否定张易之的诬告，元忠将被杀，为元忠辩诬，又怕遭到张易之的迫害。宋璟鼓励他说：“名义至重，神道难欺，必不可党邪陷正，以求苟免。如因犯颜遭到流贬，那是光荣的事。倘如不测，我必叩阁救子，将与子同死，不要畏前惧后，努力为之，万代瞻仰，在此一举。”说感其言，在御前对证时，力证元忠无不顺之言，是张易之所诬告，使元忠得以免死。

宋璟恃正不阿，更得到武则天的敬重，升为左御史台中丞，这时，他对二张的非法行为，继续予以揭露，不因二张是武则天内宠而有所畏惧。张易之与其弟昌宗恃宠恣意胡为，倾朝附之，连武则天侄子武三思、武承嗣也卑躬屈膝奉之如主子。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观吉凶，言涉叛逆，为飞书所告。宋璟廷奏请穷究其罪，则天说：“易之等自己奏闻，不可加罪。”璟说：“易之等事露自陈，情实难恕，且谋反大逆罪，不容首免。请勒令易之等到御史台审讯，以明国法。易之等久蒙驱使，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于心，虽死不恨。”则天听了不高兴。内史杨再思恐他忤旨，急宣敕令璟出。璟坦坦说：“天颜咫尺，亲奏德音，不烦宰臣擅宣命。”则天见其忠直意稍解，便命收易之等到御史台，将加拘问，则天又有特敕免二张，并令二张向宋璟辞谢，璟拒而不见，说：“公事当公言之，若私见，则法无私也？”

璟尝侍宴朝堂，时易之兄弟皆力列卿，位至三品，璟官阶六品，在下座。易之素畏璟，想向他讨好，便向璟作揖说：“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说：“才劣品卑，张卿以为第一人，问也？”当时朝列，皆以二张是内宠，不称其官名，敬呼易之为五郎，昌宗为六郎。天官侍郎郑善果对璟说：“中丞奈何呼五郎为卿？”璟说：“以官言之，正当为卿，如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郑善果何其懦弱！”

宋璟明知二张为则天所宠，揭露二张并与其之作斗争，明知“言出祸从”，因“义激于心”，早把生死置于度外。则天令二张辞谢拒而不见，二张向其讨好也不买账，其刚正如此！

### 吴梯不屑与伊王为友、与严嵩同僚

《明史·吴梯传》记载：吴梯，字思诚，金谿人。嘉靖十一年中进士，

先后任乐安、宣城知县，继任御史。他是“理学名臣”，很重视节操，即使是权贵，如为人卑劣的，他都拒绝与之为交，以至耻于同列。

吴悌出按河南时，明宗室伊王朱典模惮其秉正威名，欲与之相交，致书称之为友。朱典模为人肆恣跋扈，在河南无恶不做，对于官吏不如意的便构陷之，侮辱后将之驱逐；过其境的，强其入朝而辱之。故缙绅往来，多绕道避之。他选民间女子七百余，只留色美的九十人，其他令用金买回，其贪悖如此。河南官吏，即使不与之结纳，因惧其势也不敢得罪。吴悌鄙其为人，不愿与之交，便夏书说：“殿下，天子亲藩，非悌所敢友。悌天子宪臣，非殿下所得友。”朱典模读了复信愈惮之。

夏言以善揣嘉靖意和代写青词而得力首辅，曾一度当国。吴悌跟他是同乡，但他不利用这种关系与之交结，没有公事，从不前往拜见。有一次，他因公事去见言，众人见言穿着新官服都争着上前称誉，只有悌默默地站在旁边不前。言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俟谈少间，当以政请。”言为之改容。

严嵩也与吴悌是同乡，吴悌不因有此关系而与之来往。严嵩长期独擅朝政，结党营私，贪污横行，吴悌鄙视其人，又无奈其何，耻于与之同僚，便辞官归去，时间长达二十年，嵩败，他被复故官，一年问升至南京大理寺卿。后升刑部侍郎。吴悌坚持“出污泥而不染”的气节，为世人所赞。他与吴岳、胡松、毛丰三人，被称为“南部四君子。”其乡人建祠，与陆九渊、吴澄、吴与弼、陈九川并祀，称五贤祠，学者称他疏山先生。

## 六、为私利互斗两败俱伤

同事之间，关系处理不好，往往结怨成仇，其严重的寻求报复，互相残杀。考其致怨之因甚多，或因争夺职位，或因意见分歧，或因爱憎不同，或因党派各异，概言之，为私事结怨的多，为公事结怨的少。西汉魏其侯窦婴与武安侯田蚡就为私怨而积斗，结果是两败俱伤。唐时杨炎以私仇诬害刘晏，杨炎也被卢杞所冤杀。杨炎害人也被人所害。

### 田蚡与窦婴因争杯事结冤仇

窦婴和田蚡都是西汉王朝的外戚。窦婴是汉文帝的皇后窦氏堂兄之子，田蚡是汉景帝（文帝子）的皇后王氏的同母弟。文帝时，婴任吴相，因疾辞职。景帝即位，窦皇后为太后，窦婴任詹事（管理皇后、太子家的官）。吴楚反时，景帝任婴为大将军，婴守荥阳，监齐、赵兵。七国之乱平走后，封婴为魏其侯，时婴权重势盛，诸游士宾客都争附其门下。后为栗太子傅，栗太子被废，魏其数次力争不得，曾称病闲居数月。其姑窦太后数次推荐他为相，景帝说：“魏其为人沾沾自喜，行为多轻易，难为相。”后来魏其得为相，却由于田蚡的谦让和推荐。婴为大将军时，田蚡为诸郎，事之以子侄礼。景帝晚年，田蚡因其姐姐王皇后故日益宠贵，任太中大夫，景帝死，太子立，号武帝，田蚡姐为太后，封蚡为武安侯。丞相绾因病免，武帝议置丞相、太尉。籍福对武安侯说：“魏其贵已久，天下士归之。今将军初贵幸，但资望还不及魏其，如果皇上以将军为丞相，要让给魏其。魏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地位都一样尊贵，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便将此意告诉王太后，当时魏其姑窦氏尚在，已是太皇太后，王太后同意，太皇太后当然不反对，于是魏其得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向魏其祝贺，并劝他说：“君侯资性喜善疾恶，方今善人誉君侯，故任丞相；但君侯疾恶，恶人众，也将毁伤君侯。君侯能兼容两者，则能幸久；不能，将为人所毁。”魏其不听，后果如籍福所言。本来武安让位于魏其，说明武安此时对魏其还是尊敬的，而魏其也应感激武安，为什么后来两人结怨成仇呢？

这主要是由于彼此都自恃是外戚，而其导火线是由于武安失约赴宴，而以军功自傲酗酒使性的灌将军夫的介入更使双方矛盾日趋激化。《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记载：太皇太后窦氏死，因王太后故，武安为丞相。这时，魏其夫势赋闲在家，天下吏士趋势利者，皆去魏其归武安。魏其因无势，其宾客也纷纷引退，只有灌夫将军没背魏其，魏其也独厚遇灌将军。灌将军是何许人？吴楚反时，其父为校尉战死于吴军中，灌夫也随军，他悲愤誓言，“愿取吴军将军头，以报父仇。”于是率其从奴十数骑驰入吴军，直奔吴将麾下，杀伤数十人。回汉壁，只与一骑归。夫身中大创十余，伤稍愈，又向将军灌何请求，“我已知吴壁中曲折，请复往。”将军壮之，因恐其伤亡，止之。吴已破，灌夫因此名扬天下。前任中郎将，淮阳太守。后入朝任太尉。因酗酒打人及违法，被免官，居长安。灌夫为人刚直，不好面谀，但酗酒使性。家累数千万，食客日数十百人，所交皆豪杰大猾，宗族宾客，横行于颍川。灌夫与魏其，气味相投，互相倾慕，且彼此都失势，同病相怜，结为忘年交，相处如父子。有一次，丞相田蚡对灌夫说要与他前往拜访魏其，灌夫说将告知魏其，请田蚡明天如约到魏其家。魏其与其妻备好酒菜以迎接田蚡，

可是等到了中午还不见田蚡来。灌夫以为田蚡忘了便亲往催请。田蚡本来是随便说的，并没有想去拜访魏其。及夫到田蚡家，田蚡还高卧不起。田蚡谢说：“我昨日酒醉忘了。”便与灌夫前去，但慢慢行，灌夫心里不高兴。酒酣，夫邀田蚡起舞，田蚡不起，夫在座上以语讥之。魏其见灌夫醉，便扶他离去。田蚡饮至夜，尽欢而散，不久，田蚡派籍福请魏其让其城南田给他，魏其不许，怨恨说：“将军，虽贵也不应恃势夺田！”夫知道了很为冒火，骂籍福，籍福恐两家结怨，便劝田蚡说：“魏其老将死，侍以后再说。”田蚡后知魏其不给田和夫骂籍福事，亦怒说，“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对魏其不错，魏其为何吝惜数顷？夫何干预此事？”田蚡由此怨恨灌夫、魏其。后田蚡向武帝揭发灌夫家族在颖川横行霸道，灌夫亦以丞相田蚡阴事上告，经宾客从中劝解，事情才作罢。可是，事情至此没有结束。田蚡娶燕王女为夫人，王太后下诏，要列侯宗室前往祝贺。魏其邀灌夫同去，灌夫以数次因酒得罪为辞，强请之才去。酒酣，灌夫起敬酒，至武安，武安说：“不能干杯。”夫怒，强笑说：“将军是贵人，要干杯！”武安仍不肯。敬酒至窦婴孙临汝侯贤，贤正与程不识耳语，又不离席，灌夫怒无处泄，便骂临汝侯说：“你一贯说程不识一文不值，长辈向你敬酒，乃效女儿附耳语！”武安对灌夫说：“李广是东宫卫尉，程不识是西宫卫尉，今当众辱程将军，置李将军处于何地！”灌夫说：“死也不怕，何知程李！”当众人起更衣时，魏其恐灌夫怠事，叫他出去。蚡怒说：“夫如此骄横，是我纵客之故。”令人留夫，籍福恐事态扩大，强使灌夫谢罪，灌夫不肯。田蚡便以“灌夫骂座不敬罪。”将之逮捕扣留。派吏审处灌氏宗族宾客在颖川违法事件，追捕归案处死。灌氏宗族宾客得消息，皆逃匿。

如果魏其不介入，祸只及灌氏。由于魏其很重义气，与灌夫交谊又深，情如父子，请宾客从中调解。田蚡不理。婴夫人谏说：“灌将军得罪丞相，与太后家作对，哪能救？”婴说：“最大不过失去侯爵，而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无所谓。不能使灌夫独死，婴独生。”便向武帝面奏，说灌夫不过因醉怠事，不能杀。武帝表示同意，赐婴食，说：“东朝廷辩之。”魏其东朝时，极力赞灌夫，说他因醉饱得过，丞相以它事诬陷之。蚡则揭露灌夫为横恣违法、罪逆不道。魏其也揭蚡短处。蚡反驳说：“天下幸而安乐无事，蚡得为帝王心腹，所爱好不过音乐狗马田宅，以及倡优巧匠之类，而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议论和诽谤太后与皇上，天下有变，他俩将得以立大功。”武帝问朝臣：“两人谁说的对？”御史大夫韩安国说：“魏其言灌夫父死事，他负载率十余骑驰入强盛的吴军，身被数十创，名冠三军，此天下壮士，非有大恶，争杯酒，不能以它过诛之。魏其说的是。丞相亦言灌夫通奸猾，侵细民，家累巨万，横恣颖川，蹈践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谓支大于胜大于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魂其，内史郑当时初说魏其对，后不坚持。其他朝臣都不敢表态。上对内史发火说：“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促像辕下的小马，我将把你们斩了！”即罢朝，入侍太后食。太后已知廷论始末。太后怒不食，说：“我在，人皆侮辱我弟，我百岁后将被人鱼肉了！皇帝哪能像石人一样，是非不明！”武帝谢说：“都是外戚，故廷辩之。不然，一狱吏便可决断了。”于是武帝使御史责魏其，并将他扣留，论灌夫罪族诛，朝臣无人再敢为之说话。婴说尝受景帝遗诏：“事有不便，可上奏天子”，便使家人士书言之，查尚书之中却无景帝遗诏，魏其被劾矫诏。罪当斩。灌夫族诛。魏其知被劾

当斩，即称中风欲绝食死。听说武帝无意杀他，复食，治病。田蚡散布流言蜚语，说魏其诽谤武帝，于是被斩于谓城。田蚡在灌夫、魏其被杀那年也病死了。据说，蚡病时，一身尽痛，似有人打他，他像小儿般号呼连称眼罪。武帝使视鬼者看，说魏其与灌夫共守在他身边，笞杀之。当然这是传说，也许田蚡冤杀灌夫、魏其于心有愧，以至疑神疑鬼所致。

从以上所述。可见武安、魏其两人都意气用事，因都是帝王外戚，生而娇贵，为了面子竟把一些芝麻小事看得很重要，而灌夫恃功自傲、酗酒使性，把问题越弄越大。因此，意气用事及酗酒使性都可招祸，这可引为鉴戒。当然，这仅是表面现象，实质上是窦王两家外戚集团争宠夺权的反映。在西汉王朝，这已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个外戚与那个外戚之争几乎无代无之。文、景两帝时，以窦婴为代表的窦氏外戚集团得势，天下归之。而景帝时皇后王氏开始崛起，及武帝即位，王皇后进为太皇太后，其同母弟田蚡任丞相，不压倒窦氏外戚集团，则不能擅权独宠，故其上告窦婴、灌夫以叛逆罪，不如此难以打倒对方。问题是窦氏外戚集团在势孤宠衰的情况下，窦婴还进行挣扎，想挽颓势，这便是其招祸之因。田蚡得胜是因有姐姐王太后为他撑腰，故能以杯酒之争，而诬以叛逆罪冤杀对方。而与人斗争并非轻松，由于心机费尽，机关算尽，田蚡也筋疲力尽；何况对方是否叛逆，田蚡心里是明白的，当时人又迷信，认为诬杀人将有鬼报应，田蚡死前号呼服罪也就不足为怪了。

### 杨炎诬少刘晏也被卢杞所害

刘晏是著名的理财家，杨炎是著名的经济改革家，他俩对唐代经济的发展都有较大的贡献。

刘晏七岁被称为神童，因写《东封书》被玄宗所赏识。肃宗时任京兆尹，后被贬任通州刺史，代宗时得到重用，主管国家财政工作。他理财以“爱民为先”，善于理国家财，却不理私财，理财时间长达二十年，却两袖清风。刘晏任吏部尚书时，代宗派他负责审理宰相元载案件。刘晏因元载往相多年，结党营私，其党羽布满天下，不敢专断，请派他官共同审讯。审处结果，按照代宗意图将元载判处死刑。其党羽王缙亦判极刑，刘晏认为附从者应从轻处理，王缙得以免死，其他党羽也得到从轻处分，其中受到元载提拔为礼部侍郎的杨炎也被贬为道州司马。因此，杨炎深恨刘晏。德宗时，杨炎任宰相，便对刘晏进行报复，先是免去刘晏转运使等职务，贬为忠州刺史。炎欲诬构其罪，知庚准与晏素有隙，便任他为荆南节度使，令其诬陷刘晏，准便奏晏致友人书，言多怨望，炎又证实其事，诬晏谋反，德宗便批准杀晏，这时刘晏已是六十六岁的老人了，天下冤之。家属流放岭南，其部下受到株连的达数十人（《旧唐书·刘晏传》）。

杨炎内才外貌都很好，他“美须眉，风骨峻峙，文藻雄丽”，尝写李楷洛碑，辞甚工，文士莫不传诵。元载拟选朝士有文学才望者一人厚遇之，将以代己。因赏识杨炎之才，升之为吏部侍郎，使修国史。载败，炎也被贬。德宗即位多得元载之力，故倾向任用其党羽，议用宰相，崔祐甫推荐炎，德宗亦闻其名，便拜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在他任相期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成绩显著，曾一度使唐王朝的财政、经济状况得改善。杨炎在经济改革上虽取得成效，但他诬杀刘晏，朝野为之侧目。淄州节度使李正己上表就杀晏事指斥朝廷，炎惊，便派心腹至诸道，向节度使们表白说：“晏之得罪，以昔

年附会奸邪，谋立独孤妃为皇后，上自恶之，非他过也。”于是有人密奏，说这是杨炎“恐天下以杀刘晏之罪归己，推过于上。”德宗派宦官查落实，自此便有意伺机杀炎。于是，任卢杞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炎转任中书侍郎，仍任平章事。二人同事秉政，杞无文学，貌又丑陋，炎很讨厌他，每托辞到他阁，不愿意跟他同食，杞因此亦恨之。卢杞对附己者使之平步青云，怨恨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炎子弘业违法，又受贿赂为人说情，卢杞便使心腹、御史大夫严即将弘业逮捕审讯，并查知杨炎在玄宗“巡幸之所”建家庙，杞使散布流言蜚语说：“此地有王气，炎故取之，必有异图。”德宗早就想杀杨炎，于是，贬为崖州司马，途中又派中使“赐死”。杨炎死时五十五岁（《旧唐书·杨炎传》）。

刘晏、杨炎两人都有政绩，都是清廉之士。刘晏判元载极刑是据其罪按上意处理，对附从者主张从轻处理。但杨炎为人过于恩怨分明，他“酬恩报怨，以私害公”，为报元载知遇之恩和个人私怨，竟诬杀刘晏，这对于杨炎来说是最不光采的，后他被人所责于心不安，想“推过于上”，结果弄巧成拙。对刘晏、杨炎先后被诬杀，有的史学家认为“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报仇，卢杞为刘晏报怨。”说炎由于朋党而杀晏是有理的，但卢杞杀杨炎，实出于报个人私怨所致。卢杞为人心险，他为相三年与己结怨者必害之，非仅“为刘晏报怨。”

## 七、害别人爬上高位的人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人，他们能爬上高位，并非凭真才实学，或作出卓越的政绩，而是因其有两手绝招：媚上以取宠，对同僚位高于己的用毒计除之以夺其位。唐朝李林甫和明朝严嵩就是用此两手猎取高官厚禄，因其行为卑劣又作恶多端而臭名永扬。

### 李林甫对势位超己者必构陷之

《旧唐书·李林甫传》记载，李林甫为人阴险，城府甚深，爱憎不形于色。他“无学术，仅能秉笔”，因此，尤忌文学之士。由于他是宗室，得以接近权贵。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威王以母爱得到玄宗特别宠爱，太子瑛益被疏薄。是时任吏部侍郎的李林甫见有机可乘，便托宦官转告惠妃说：“愿保护寿王。”这是说要支持寿王当太子，惠妃听了很高兴，心里很感激林甫。侍中裴光庭妻、武三思女，与李林甫私通，宦官高力士出自三思家，及光庭死，武氏哀求力士，请向玄宗要求让林甫代其夫位，力士不敢说。但力士知玄宗将任韩休为相，便将此消息告知武氏，令林甫向韩休说知此事。休既入相，甚德林甫，便向玄宗推荐林甫为相，惠阴助之，被拜为黄门侍郎。林甫就这样爬上高位。

林甫因善伺候人主意，深得玄宗眷遇。这是因他厚结宦官、贵妃，玄宗动静都预知之，故出言进奏，都能称旨。林甫“口蜜腹剑”，口说得好听，心里却很狠毒，对于才能或官位高于自己的，必千方百计进行诬陷除之而后快。他与裴耀卿、张九龄同列相位，但林甫位在九龄之下，玄宗较器重九龄，林甫因猜忌便伺机诬害。有人告知惠妃转告玄宗说太子瑛等以母失爱，有怨言，玄宗怒，谋于宰臣，将罪之，张九龄说：“太子国本，未见有过，陛下奈何以喜怒而忍废之？臣不敢奉诏。”玄宗听了不高兴。林甫不表态，背后却对宦官说：“家事何须谋及于人。”他通过宦官之口转告玄宗，既可促玄宗加罪太子使寿王能继位，又可激使玄宗对九龄的不信任。玄宗因以朔方节度使牛仙客有政能欲实封之，九龄不同意说：“边将训兵秣马，储蓄军实，这是常务，陛下赏之可以。牛仙客，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赐以实赋，恐未得宜。”玄宗很不高兴。林甫退而对宦官说：“但有才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听了九龄更加不满。玄宗与宰臣议事，林甫对九龄的意见，当面不说，背后却放冷箭伤人，林甫为人就这样阴险！由于林甫挑拨，玄宗对九龄信任日衰。后元琰坐赃，九龄好友中书侍郎严挺之救免其罪，玄宗疑挺之是从私人感情出发，九龄为之辩解，玄宗认为九龄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以林甫代九龄为中书、集贤大学士、修国史。

林甫为陷害李适之，便设“陷阱”，使其自投“罗网”。李适之和林甫分别任左、右丞相，适之为人耿介正直，对伺机弄权的右相林甫，适之是“每事不当”，且适之得到玄宗的信任，于是遭到林甫的不满和猜忌，便挖空心思想法以构陷适之。林甫先告诉适之说：“华山之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皇上还未知道。”叫他上奏玄宗，适之性疏而不忌，不疑林甫有他意，他日奏之，玄宗听了很高兴。后玄宗问林甫，林甫说：“臣知之已久。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不可发掘，故臣不敢言。”适之由是渐被疏远。于是，林甫又乘机阴构陷之，贬适之于袁州，又使人迫害他，使适之仰药而死（《大

唐新语》卷七)。林甫耍两面三刀的手法，使玄宗疏远适之而害之，又向玄宗显示其忠心，此人之奸险确是奸险到绝。

林甫不仅构陷、排挤位高于己的，对于势位逼己者，亦必百计去之。玄宗设乐于勤政楼，垂帘外望。兵部侍郎卢绚以为皇上已去，便在马上垂鞭按辔，横过楼下，玄宗见其“风标清粹，仪态潇洒”，深为赞赏。林甫以厚金贿赂玄宗左右，玄宗举动必知之，此事很快传到他的耳中，他恐绚将被重用，便告知绚子弟说圣上将调尊君去治理交州、广州，如不愿远行，可要求就近任职。绚惊远调，如其所言申请。林甫便任他为华州刺史。还未赴任，便以他绚有病为由，免他的官职（《资治通鉴·唐纪》卷215）。林甫就这样用其狡诈之术，将一个可能被玄宗重用的有才能之士除掉了。

林甫将势位超己或逼己的同僚除掉后，就独掌中枢，天下威权，尽归于己。这时，他还不放心，仍怕有人与己争权，故所推荐为相的都是庸碌之辈，如他荐门下侍郎、崇玄馆大学士陈希烈为相便是一例。希烈讲老、庄之学，专用神仙符瑞取媚玄宗，林甫因希烈为玄宗所爱，且柔佞易制，便以他同知政事，而希烈对政事不敢参议，唯林甫意志是从，军国机务皆由林甫在私家裁决，由主书抱成案到希烈处请其签名而已。玄宗晚年，倦于政务，恣行宴乐，沉迷于声色，甚至夺儿媳为妻，不以为耻，国而一切事都委林甫办理，使林甫得以胡作非为，使国事日非。开元时，皆以节爽使入知政事，林甫为巩固其地位，以杜出将入相之源，便向玄宗上奏：“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玄宗以为然。因高仙芝、哥舒翰不识文学不能入相，便专任为大将；安禄山是蕃将而得以任大将。“安史之乱”，林甫应负其责。盛唐走向下坡路，其标志是以林有擅权开始。

### 严嵩陷害夏吉以夺其位

《明史·严嵩传》记载：严嵩善侍和古文辞，但无他才略，而是靠一意媚上排挤同僚爬上高位的。他任礼部右侍郎时，明世宗朱厚熜派他去祭其生父陵地显陵，回来编造一些祥瑞以取悦世宗，说什么在刻碑的所在地枣阳群鹤集绕，运碑入汉江，天降大雨，河水突涨，祭祀时大雨忽然停止，他认为这都是上天的眷爱，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记其事。这么一捧，世宗很高兴，立即升他为礼部左侍郎，世宗诏追尊太祖朱元璋高皇帝溢号时，严嵩又上奏说见庆云，请受群臣朝贺，并写《庆云赋》、《大礼告成颂》上呈，世宗容颜大开，给他加太子太保，赏赐与辅臣一样。

严嵩向上爬的本领与李林甫一模一样，这是一切佞臣的共同特点，可以说他们是一丘之貉。严嵩在媚上取宠的同时，对势位超己者也都伺机构陷之以夺其位，他对夏言的谋害便是他的最精彩表演。严嵩中进士在夏言之先，但位在夏言之下。他在夏言手下工作时，卑恭屈膝，极其恭敬。他尝摆酒请言赴宴，自己亲到言家恭请，夏言辞不见。向夏言汇报，他都挺着身子两腿跪着。夏言以为严嵩实下己，不疑而加以信任。世宗崇信道喜戴香叶中冠，也将五顶赐给夏言、严嵩等大臣。夏言等认为朝官戴道冠是违祖制，故不遵命，世宗对夏言等很恼火。严嵩被召时，特戴上香叶中冠，还笼上轻纱以示郑重，这使世宗更宠信他。严嵩知世宗因夏言不戴道冠很不高兴，表面上尊敬夏言实则伺机构陷之，现在严嵩认为机会来了，于是便在世宗面前进谗言说夏言不戴道冠是傲慢犯上，这更激怒世宗，立即罢了夏言大学士职务。夏

言去职后能写青词（道士设坛上奏天神的表章）称世宗意的只有严嵩，因而更受到宠信，被拜为大学士，入文渊阁值班，仍掌管礼部事。但小人得志更猖狂，久了，世宗也觉嵩横，便复用夏言。夏言因严嵩进谗致被免职，甚恨严嵩，他官复原职后，盛气陵嵩，斥逐其党，嵩无奈其何。严嵩子世蕃横行公卿间，胡作作为，夏言欲揭发其罪行，嵩父子知道了大为惊恐，便到夏言家，长跪在其榻下哭泣哀求，夏言为人心软，见他父子如此，误以为他已悔过，也就作罢，严嵩在夏言面前装一副可怜相，实则对夏言更恨，暗中在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为巩固北部边防，夏言支持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提出收复河套地区的计划。严嵩知世宗害怕蒙古鞑靼军不会同意，便攻击这一计划是“好大喜功”、“穷兵赎武”。这时恰巧内宫失火，皇后又去世，严嵩又诬称是由于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地区，混淆国事造成的。世宗便罢免夏言官职。不久，鞑靼军进扰延安等地，严嵩又进谗说因夏言、曾铣要收复河套致激使鞑靼军出兵，世宗便以开边事之衅罪将两人先后处斩。严嵩既构陷夏言，便爬上了首辅高位。完全掌握了内阁大权。严嵩大权在握，贪污纳贿，鱼肉百姓，排除异己，无恶不作，他窃政二十年，也是明代最黑暗的时期。他是历史上著名奸臣

## 八、奸谀者与之共事危险

奸谀者的本性是：结党营私，陷害异己。由于其狠毒而狡诈，且喜怒不形于色，令人莫测高深，防不胜防，与这种人相处，确是危险！杨素、秦桧便是这种类型的代表人物。

### 杨素狠毒阴险害人误国

《隋书·杨素传》记载：杨素在杨坚开创隋朝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功居第一。但其人狠毒，在其统军作战中已显示出来。他对敌应变无方，但以杀立威，用以指挥作战。每与敌战前，都找人过失而斩之，多的百余人，少也不下十人。流血盈前，他言笑自若，及其对阵，先令一二百人赴敌，陷阵则已，如不能陷阵而回的，不问多少，全部杀掉。又令三二百人复进，还如前法。将士股栗，知不战胜必死，便拼命向前，由是战无不胜。杨素就是因此被称为名将。建国后，他这种狠毒手段更阴险地以另一种形式体现。

杨素任尚右书仆射得参预朝政后，凡附己的及其亲戚即使没有才干，都予以提拔；对于违己的则暗中害之。如忠直之士贺若弼、史万岁、柳或等都被杨素构陷。史万岁武艺高强、作战勇敢，以功拜大将军，进位柱国，后任河州刺史。突厥达头可汗犯边，史万岁率师出塞迎击，至大斤山，与突厥军相遇，大破之，斩敌数千，敌遁逃而还。杨素忌其功，便向文帝诬陷万岁说：“突厥本想投降，并不寇边，只是来塞上畜牧罢了。”文帝信其言，万岁虽上表报捷也置之不理。文帝从仁寿宫返京师，决定废杨勇太子，便追查东宫党羽。文帝问万岁现在哪里，当时万岁实在朝堂，杨素却说：“万岁谒见东宫去了。”以激怒文帝，使其认为是东宫党羽，文帝果然被他骗了，杨素居心叵测如此！正因杨素如此阴险害人，朝官畏其势大多被逼依附。只有治书侍御史柳或为人正直，敢于面忤杨素，素深恨之。或尝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派人来求，或送之，秀赐或奴婢十人。后杨广篡位，秀得罪，杨素诬奏或以内臣交通诸侯，或被废为民，流放怀远镇。或到高阳，有诏征还。至晋阳，汉王谅召或与计事。或为使所逼，入城知谅反，便诈称病笃，谅因他不附己便将他送进监狱。显然是拒绝谅所请不参与谋反，杨素却不放过他，竟诬奏或心怀两端，以候事变，迹虽不反，心实同逆，或终被流放敦煌。

杨素虽是隋朝开国功臣，也是隋亡的促成者。杨素早就与晋王有所勾结，他知文帝与独孤后有意废太子勇和想使晋王代之，便加紧与晋王进行夺嫡活动，诬告和中伤太子勇，使晋王广的阴谋得逞。太子勇以己无罪被废不服，想向文帝面申冤屈，杨广阻之。勇于是爬上树大叫，希望文帝听了得以召见，杨素诬勇说：“勇情志昏乱，为癡鬼所著，不可复收。”文帝以为然，卒不得见。及文帝病，所宠陈夫人言太子无礼，文帝怒叫召勇，侍疾的兵部尚书柳述将所写诏书示杨素，素告杨广，广指使张衡谋杀文帝。于是杨广登上帝位。隋之速亡是因杨广暴虐奢侈所致，但没有杨素为之谋，杨广夺嫡阴谋不能得逞，故说隋之速亡，杨素是促成者。

### 秦桧两面三刀暗箭伤人

《宋史·秦桧传》记载：桧两次任相，时间长达十九年，他挟制君父，包藏祸心，倡和误国，亡仇附敌。对忠臣良将，诛杀殆尽；附己从者，无不升官。其党专以诬陷善类为功，除谋杀抗金英雄岳飞外，受其构陷的无数。

秦桧从金军营归宋，自说杀金人监己者乘船航海而来，朝士多疑之；认为被拘的还有他人，他何以独归？途程长达二千八百里，岂无阻者，安能杀监者而南？即使金人纵之，必以其妻为质，安得与王氏同归？宰相范宗尹与桧相好，力荐其忠，为之辩护，始释群疑。宋高宗被桧所惑，认为“桧朴忠过人，又得一佳士。”于是，桧得拜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但秦桧没有对范宗尹感恩戴德，而是在窥伺其相位。先是，范宗尹建议讨论崇宁、大观以来的滥赏之弊，桧初极力赞成，后见高宗坚决反对，便说宗尹坏话，顺势将之排挤。宗尹既去，相位久虚，桧扬言“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有人问他为何不说，桧答道：“今无宰相，不能实行。”他被拜相，吕颐浩复相，与之同列，桧谋夺其权，暗使其党向高宗建议：“周宣王内修外攘，故能中兴，今二相宜分任内外。”高宗同意说：“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于是，颐浩建都督府于镇江，桧得专权政务。

秦桧对张浚、赵鼎两人的挑拨离间、两面三刀、暗箭伤人，更显其阴险、狠毒。张浚与赵鼎是好友。浚先显达，极力推荐赵鼎，尝共论人才，浚力赞秦桧，鼎说：“此人得志，我们无立足之地下。”浚不以为然，故推荐桧，后与共事才知其奸。张浚辞相时，高宗问：“谁可代卿？”浚默然。又问：“秦桧如何？”浚答道，“与之共事，始知其暗。”高宗说：“然则用赵鼎。”于是复用赵鼎为相。桧因浚不荐已，甚恨之，便向赵鼎进谗说：“上欲召公，而张相迟迟不肯。”企图激怒赵鼎使排挤张浚。桧对赵鼎唯命是从，鼎素恶其人，由是反深信之。秦桧为擅权，先后诬陷二人使之一再被贬。鼎与浚后来在闽相遇，谈及此事，始知皆为秦桧所卖。秦桧诬陷二人将之下贬还不甘心，千方百计置之死地而后快。对被贬在吉阳军的赵鼎，使人严加看管，令该军每月申报存亡，鼎知桧非逼死他不可，遣人告其子说：“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便绝食而死。张浚被滴永州后，桧使人诬浚是国贼，与人谋叛，来决，适逢桧死，张浚才得免于难。

将这些可能使宋朝中兴的贤相、名将诬陷、排挤后，得专国事的秦桧又谋杀抗金英雄岳飞，终于与高宗向金人卖国议和。他的阴谋虽得逞于一时，其人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 第五章 朋友关系

朋友关系，是一种变幻莫测的关系，也是一直为人们所重视的关系。它之所以被人重视，是因为交好朋友，可引导人上进；交了坏朋友，可诱使人堕落。管宁割席与华歆绝交，王杰誓不与和珅为伍，便是古人重视择交把它视为头等大事的典型例子。管仲由于鲍叔牙始终厚爱和推崇，他才能从囚徒变成宰相，功成名遂。像他俩这种关系是罕见的，也是极其可贵的，故一直被传为千古美谈。朋友关系之所以变幻莫测，是因它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或因忌才而害友，如庞涓害孙臆，李斯谮杀韩非；或因求荣而卖友，如丘和出卖元胄；或因地位变了忘记穷朋友，如陈胜称王后斩昔日的旧交；或因误会而变成仇敌，如张耳对陈余，王叔文对韦执谊，等等。而凡因利而忘义，结果大都不得好报，庞涓、李斯害人害己，陈胜斩旧交使人心离散而失败。朋友关系如此变幻莫测，交友时不可不慎重。

### 一、患难与共生死永不忘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好坏往往以利害为转移，故见利忘义的大有人在。但这并非绝对，以义为重的也不乏其人，彼此一缔交，就患难与共，生死永不忘，鲍叔牙对管仲，栾布对彭越就是如此。

#### 鲍叔牙厚待管仲始终如一

《史记·管晏列传》记录了鲍叔牙与管仲的深厚友情，以及始终以义气力重的动人事迹：

管仲，又名夷吾，颖上（今安徽颖上县）人。管仲青年时，家中很贫穷，他虽属于士的阶层，但为了谋生，不得不从事当时被人认为是微贱的商业。他跟一位好朋友鲍叔牙一起到南阳经商，每次分利润时，管仲都要多拿，鲍叔牙知他要供养老母且家又贫穷，故从不跟他计较，管仲尝为叔牙谋事，不仅没办好，反而使叔牙更困难，但叔牙不以为管仲没有本领，认为事情没有办好，只是由于机会还不成熟。管仲曾三次做官，三次被其君所驱逐，叔牙不以为管仲不好，而是认为他不遇其主之故。叔牙就是这样关怀和理解他的好朋友管仲。

后来，叔牙和管仲分别做了齐襄公的弟弟公子小白和公子纠的师傅，齐襄公荒淫暴虐，使国事乱糟糟，叔牙和管仲都预料到齐国将大乱，各为其主计，叔牙保护公子小白到莒国躲避，管仲保护公子纠到鲁国躲避，以静观政治风云的变化。果如所料，在公元前686年，齐国内乱爆发，齐襄公被其兄弟公孙无知所杀，公孙无知随即被齐国贵族所杀，齐国一时无君，叔牙立即请公子小白向莒国借兵回国，鲁国也派兵护送公子纠回国，于是，一场争夺继位的战斗开始了。管仲率兵预先埋伏在公子小白所经之地，一见公子小白到来便张弓射之，只射在小白的铜制衣带钩上，小白装死倒下，待管仲领伏兵走了，小白与叔牙率兵迅速奔向齐国，顺利登上了君位。管仲以为公子小白已被射死。君位只能由公子纠继承了，于是，不慌不忙，过了六天才到齐国边境，这时才知道公子小白当了国君，便请鲁国起兵进攻齐国，企图用武力夺取君位。双方在乾时会战，鲁国大败。公子纠自杀。叔牙为了管仲、坚

决要求鲁国押送活的管仲回齐。一到齐境，叔牙早在等候，命令打开囚车，去掉刑具。叔牙劝他辅佐齐桓公，管仲以不能死节尽忠为耻，叔牙开导和鼓励他说：“做大事的人，往往不拘小节；立大功的人，往往不需他人谅解。你有治国奇才，桓公有做霸主的抱负，如你能辅佐他，将会功高天下，德扬四海。”

叔牙劝桓公忘一箭之仇，任用管仲。他对桓公说：“君只是治齐国，用高傒和叔牙足够了。君欲当霸主，非用管仲不可。”于是，桓公从之。桓公欲任叔牙为相，叔牙辞之，推荐管仲说：“臣不若管仲者有五：宽和惠民，不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结于百姓，不若也；制礼义可法于四方，不若也；执抱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桓公使用管仲相齐。

管仲果然没有辜负叔牙的推荐，他相齐桓公后，使之成为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有如此贡献，是因为：他首先懂得要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必先得人心”，因为他认为“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故主张“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俗之所俗，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这就是说，人民喜欢的就干，人民不喜欢的就不干。他强调，“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反之，则“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意是说做不到“仓廩实”、“衣食足”，人们就不知礼义廉耻，国家就要灭亡了。为使“仓廩实”、“衣食足”，他根据齐国处于海滨的地理位置，大力发展林、盐、铁、渔业，同时极其重视商业，使互通有无，以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经济繁荣了，财源充足，赋税日增，因之，齐国官兵强，无敌于天下。

叔牙既推荐管仲为相，自己则心甘情愿位居其下。叔牙对管仲的厚爱和推崇，使管仲无限感激他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故史称：“天下不多管仲之贤而多鲍叔能知人也。”叔牙对朋友如此情深义重，更为后人所颂扬。

### 栾布冒死抗旨哭祭彭越

栾布只不过是西汉所属梁的大夫，地位不高，也无什么大功勋，而班固之所以将他写入《汉书》，为之立传，是因他抗旨哭祭彭越，大义凛然之故。

《汉书·栾布传》记载：

栾布梁人。彭越还是平民的时候，尝与布是好朋友。当时，他两人都很穷苦。彭越在酒家当佣工，数年后跟布告别他去，而布也被人捉去卖于燕为奴。布为其主人报仇，燕将藏荼见他有义气，便推荐他为都尉，荼为燕王，升布为将，及荼叛汉，汉起兵击燕，燕被打败，布被虏。这时，早已归汉的彭越因其战功显赫已被封为梁王，彭越并没有忘记这位老朋友，知道布被俘的消息，当即向汉王刘邦请求，赎布为梁大夫。

栾布奉梁王彭越命出使到齐地还没有回来，而汉王刘邦却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梁王身上，诬他谋反，夷其三族，枭首雒阳，并下诏如有收尸和哭祭的就逮捕。布回来，由于对彭越情深义重，他不顾一切，冒死抗旨奏事于彭越头下，祠而哭之。有关官吏见了，立即将他逮捕，并向刘邦报告。刘邦召布骂道：“你要与彭越谋反吗？我禁止人收尸，而你却胆敢祠而哭之，反形已明。”说至此，立即命左右：“拿他放下镬去煮了！”这时，已准备

的镬里水正烧得沸腾，布被提向滚滚的开水时，他回头向刘邦要求：“愿一言而死。”刘邦问：“说什么？”布说：“当皇上被困，败于荥阳、成皋时，项王不能向西追歼汉军，是因为彭王在梁地，在楚后方骚扰和绝其粮道之故。当是之时，彭越有举足轻重之势，与楚则汉破，与汉则楚破。且垓下之会，彭王不参战，项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传之万世。今皇上征兵于梁，彭王因病不行，却疑其谋反，反形未见，却以苛细之过诛之，臣恐功臣将人人自危。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请就煮。”刘邦便释布，拜为都尉。

栾布是任侠之徒，他说，“穷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孝文时，为燕相，官至将军，对已尝有德的，厚报之；有怨必以法灭之。

## 二、政见虽不同友谊常在

即使是知交好友，也往往因政见不同而闹翻，甚至结怨成仇。当然也有不因此而影响友谊的，如苏轼曾公开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吕岱曾推荐徐原却常受到徐原的批评，可是，彼此政见虽不同，友谊却始终保持。他们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彼此都具有公心，且都有宽大的胸怀。如果是心胸狭窄和斤斤计较个人私利的人，是绝做不到的。

### 苏轼、王安石政见对立友情仍笃

《宋史·苏轼传》记载：苏轼对王安石的变法有不同意见，尝上万言书提出自己的主张，即“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并当面批评神宗推行新法存在严重缺点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入太锐。”安石赞神宗独断专任，苏轼又提出疑问，说“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哱传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这里暗示，在变法上，神宗的独断和对安石的专任并非好事。由于屡遭苏轼反对，安石很恼火，“使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但查不出什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被迫申请出任地方官。苏轼对新法并非都反对，对有利于国于民的是支持的。如王安石下台，司马光上台，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苏轼认为实行免役法利多害少，而差役法害多利少，故不同意废免役法。

可见，苏轼对待王安石进行的新法，以其于国于民有利与否而决定支持或反对，对此，并不存在个人的私见。王安石实行变法也是出于其富国裕民的目的。这说明王安石推行新法和苏轼对待新法的态度都出于公心，这是其共同点。王安石虽对苏轼反对新法恼火，但并没有对苏轼进行构陷、打击，在神宗之世，苏轼虽不被重用，也没有被贬斥，仍能在地方任知州之职。他俩政见虽不同，彼此矛盾还未激化。另是，苏轼和王安石都以诗文名闻于当世，彼此都互相敬佩。以上所述也许是他俩政见虽不同而友谊常在的原因。

苏轼和王安石在野时的交往，说明他俩的关系还很好。王安石变法失败，以特进观文殿大学士的虚衔闲居于金陵，苏轼于1084年（元丰七年）离黄州南下，经金陵时谒见王安石。苏轼虽已被贬，仍不忘国家大事，他对王安石说：“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为何独无一言以救时呢？”安石说：“二事皆惠卿启之，安石在外，哪敢言？”轼说：“在朝才说，在外就不说，这是事君的常礼。但皇上待公以非常之礼，公待皇上哪能以常礼呢？”安石听了，激动地大声说：“我一定说。”在这次访问中二人对酒和诗，欢笑无间。苏轼写了《次荆公韵四绝》，其中有一首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从诗里可以看出王安石曾建议苏轼在金陵买田居住，苏轼也有此打算，他在《上荆公书》就谈了他的这种意图：“轼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屦，老于钟山之下。”苏轼逗留金陵期间，还数次与王安石聚会，足见他俩的友谊之深厚。后因其他原因，苏轼在金陵买田宅的愿望没有实现。之后，二人还有书信往来，《上荆公书》便是这次别后，苏轼写给王安石的。苏轼对秦观的诗文十分欣赏，他在这封信里将秦观推荐给王安石，除对其文高度评价外，还赞其博学多才，为人忠义，希望王安石为之揄扬。王安石对秦观诗也赞赏，认为“清新似鲍谢”。

由于苏轼和王安石的推举，秦观始举世知名。从上所述可见他俩下野后还为国事和推举人才操心。

### 吕岱常受徐原批评仍视之为“益友”

《三国志·吴书·吕岱传》记载：吕岱，字定公，广陵海陵人，为郡县吏，后避乱南渡。孙权统事，投在其麾下，出守吴承。权到诸县巡视断事，见吕岱理狱、办事甚称意，由是赏识。后参加征战，屡建功勋，官至大将军，成为孙权的股肱重臣。吕岱当官廉洁奉公，待人宽容，闻过则喜，为时人所称道。

公元220年（延康元年），吕岱任交州刺史。交阯太守士燮死，其子徽叛，举兵守海南海口以拒吴军，于是吕岱率兵三千人越海讨伐。吕岱公而忘家，因历年不寄薪给回家，妻子饥乏也不知。孙权知道了深为叹息，责备左右说：“吕岱出征身万里，为国勤事，家里困乏，而孤不知。股肱耳目，其责安在？”于是，每岁加赐其家钱米布绢。

初，吕岱与吴郡徐原相交，见其慷慨有大志，敬佩其人，常赐给衣帽等物。后在吕岱的推荐下，官至侍御史。徐原性忠直，他当侍御史后，并不因吕岱的推荐而包庇其过失，一发现岱的错误就当面谏净，如是涉及公事还公开批评。有人认为徐原太不讲人情了，并将徐原批评的事说给岱，岱并不怨恨徐原，反而更加敬佩徐原说：“是我所以贵德渊（徐原字）者也。”及原死，岱哭之甚哀，说：“德渊，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复于何闻讨？”所谓好朋友，一般来说，就是要互相关怀，互相帮助。对此，人们看法不同：有的认为互相吹捧、互相包庇才是好朋友；有的则相反，认为朋友有困难应尽力帮助，对朋友的缺点也应及时指出，以免其犯错误，这才是真正的朋友。徐原对吕岱就是采取这种态度。更可贵的是：吕岱对徐原的批评，不认为徐原忘恩负义，是对他的打击，而是把徐原当作一面镜子，从他的批评中知道自己的缺点，得以及时纠正。吕岱这种“闻过则喜”的可贵品格，在当时人们已传为美谈。吕岱与徐原如此处理朋友关系，正是古人所说的“君子之交”的典范。

### 三、把择交视为头等大事

交友对个人的一生或前程都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孔子就很强调君子慎择友，他说：“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化之矣；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人化矣。”故曰：“丹之所藏者赤，乌之所藏者黑，君子慎所藏”（刘向：《说苑·杂言》）。所以，古人往往把择交视为头等大事。

每人择交的对象，决定于其人的志向、品格和爱好，如忠贞之士不可能与好佞之徒为友，廉洁奉公者必憎恶贪官污吏，才干不凡的人会看不起碌碌庸人，讲信义的人则鄙视见利忘义之辈，这是因志不同道不合则不相为谋，不能为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们择交将择与其志同道合者，这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管宁与华歆割席分坐，王杰不与和珅相交，便是古人慎重择交的例子。

#### 管宁割席与华歆绝交

《世说新语·德行》记载：“管宁、华歆共在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观。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上述管宁与华歆对待金和显贵仪仗过门时的不同态度，即宁是淡然置之，歆则不忘荣利，说明他俩志趣不同。而宁竟割席与歆绝交，也说明宁对择交是何等重视。

但古今论者，把他俩对待荣利的不同态度当作大节来看，赞扬宁志高行洁，贬斥歆“贪慕荣利，趋之若鹜”，这对于歆的评价是否过份了？歌见金拾之又掷，也可说他拾金不昧。显贵仪仗过门，外面这么热闹，出外看看是发生什么事，这也是人之常情，又何足为怪。

《三国志·魏书》的《管宁传》、《华歆传》也说明：由于二人志趣不同，所走的路也各异：管宁在乱世始终隐居不仕，华歆则历任显职，官至太尉。管宁确是个志行清高之士，天下大乱时，他避祸辽东，与人语只谈经典，不及世事，对同避难者做好事而不让人知，是一个明哲保身而肯帮助人的好人。华歆，史称他“事上以忠，济下以仁。”献帝时，任豫章太守，“政清静不烦，吏民感而爱之。”后曹操以天子诏征歆，先后任议郎、尚书、侍郎、尚书令等职。魏文帝即位，任司徒。欲居官廉洁，清贫自持，上有所赐都用以施赈亲故友人，家无担石之存粮；朝廷赏给公卿被没收的妇女，只有歆让她们出嫁。他对当时避祸于辽东的学友管宁，并不因尝与他“割席绝交”而有所怨恨，而是向文帝推荐宁，文帝以软车征宁，宁还。诏以宁为太中大夫，宁固请不受。明帝继位，拜歆太尉，歆称病祈退，让位于宁，明帝不许，拜宁为光禄勋，宁又固辞，后屡次聘请，宁也不奉诏，在野隐居，以八十四岁高龄寿终。事实说明：宁固清高，歆也廉正，而华歆显贵不忘老友，也值得称赞！

#### 王杰誓不与和珅为伍

和珅与清乾隆皇帝是儿女亲家，权势显赫，但其人权诈百出，贪黷无厌，

凡向他贿赂者都予保护，异己者则予打击，故无人敢忤其旨，趋势者都向他攀附，唯恐不及，但也有正直之士王杰，不屑与之相交。

《清史稿·王杰传》记载：王杰，字伟人，陕西韩城人。乾隆二十六年，中进士。乾隆重其人品、学识，拔为第一，选在南书房，屡掌文柄。先后任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兵部尚书等职，后任军机大臣，不久拜东阁大学士，管理礼部，在平定台湾，廓尔喀中立功勋，两次图形紫光阁，加太子太保。王杰在中枢十余年，凡认为正确的或错误的事，都向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当时和珅任相，甚得乾隆信任，事多独断，同列隐忍不敢言，王杰认为不可的则据理力争。杰每与和珅议事，因鄙其人声名狼藉，与之保持一定距离，默然独坐，不与之私谈。但和珅因其忠直，而自己坏事于尽，对他也有所畏惧，也想与之相交，便对他进行拉拢，有一日，在议事时，和珅执其手讨好他说：“何柔荑乃尔！”杰正色说：“王杰手虽好，但不能要钱耳！”杰反唇相讥，正说中其要害，和珅被讽刺得脸都红了。

王杰高不逾中人，白须数茎，对人和蔼近情，持守刚正，对奸佞之徒则鄙夷之，“誓不与之交。”因其忠直，被乾隆所倚重，和珅虽被其鄙视、讥讽也无可奈何。

#### 四、对旧交好坏后果两样

对待旧交的好坏，对一般人来说，是属于道德、品质问题，是个人之间的事；如果是处于政治风云中的人物，可能会引起政治问题，即关系到得人心与否的大事。秦末，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中原，其中，陈胜之失败，刘邦之得胜，跟对待旧交都有一定的关系。

##### 陈胜称王斩老友失人心

陈胜率领九百戍卒揭竿起义，四方立即响应，形成星火燎原之势，这是因当时人们被暴秦苦甚，厌恨其已到极点，故陈胜一带头起义，全国人民便心向往之。而后来，陈胜之失败，原因虽有种种，失人心却是个重要的原因。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阳城人，字涉。陈涉青少年时，家庭穷苦，为人当雇工。有一天，他跟其他雇工辍耕在田垄上休息时，对那些穷朋友说：“苟富贵，无相忘。”后来，陈胜率众起义，进展极顺利，陈被拥立为王。过了六个月后，曾跟他一起当雇工的那些穷朋友知道陈胜称王，大家高兴得很，便相约一起到陈去投陈胜。他们到了宫门，便向守卫士说明来意：“我们要见陈涉。”一听直呼陈王的名，宫门令火了，便叫人把他们捆起来，他们自辩说是陈涉的老朋友，宫门令将他们放了，但没有代他们通报。他们便在门外等候，陈王出来了，他们遮道喊“陈涉”，陈王见了，便让他们坐上车一起回宫，一入宫，看见殿屋帷帐豪华得很，惊羨他说：“哗！陈涉当了王多阔气啊！”这些人自以为是陈王的老朋友，便毫无顾忌地跟人谈及陈涉的旧事。有人便对陈王说：“这些人愚蠢无知，胡乱说话，有损王的威信。”陈王认为这些朋友谈及其旧事是揭其底，使其受到耻辱，极其恼火，且这时他已忘记其“苟富贵，无相忘”的许诺，便下令把这些穷友斩了。影响所及，陈王的旧交也纷纷离去，由是没有亲陈王的人。这说明：陈涉当了王，地位变了，人也变了，他高高在上，傲慢待人，专权自恣，动辄杀人。由得人心至失人心，也就从胜利走向失败。

##### 刘邦不忘旧交得人多助

刘邦起事时团结“五湖四海”，称帝后虽杀几个功臣，但对他的旧交如肖何、曹参、樊哙等是厚待和重用的，使这些人不只帮助他打天下，也尽忠为其守江山。

肖何曾当沛县主吏掾。刘邦还是平民时，因其人无赖，常惹事因得肖何救护，才得以无事。刘邦任亭长，也得到肖何的帮助。刘邦被派往京城咸阳办公事，其他小吏送刘邦三百钱作资俸，唯独肖何破例送五百钱。刘邦在沛县起事，肖何是主谋，正是在他和好友曹参策划下，杀县令，被群众拥为沛公。之后，肖何忠心耿耿为刘邦竭尽心智，他留守后方将之治理成牢固的根据地，刘邦能坚持到最后胜利，肖何之功最大。刘邦对肖何的功勋评价最高，对其信任也超过别人。他即帝位后，论功行封，封肖何为酈侯，食邑最多。功臣都不平说：“臣等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肖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刘邦说：“诸君知猎乎？”“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

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肖何，发踪指示，功人也。且诸君独以身随我，多者两三人。今肖何举宗数十人随我，功不可忘也。”后拜肖何为相国，始终信任，肖何也为巩固汉政权竭尽全力（《史记·肖相国世家》）。

曹参是沛人也是刘邦的旧交，刘邦在沛县起义，曹参出生入死，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论功行封，仅次于肖何。曹参始终得到刘邦信任，他对汉也始终效忠。惠帝时，肖何死前推贤唯参，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肖何所定法令。百姓歌之曰：“肖何为法，讲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樊哙也是刘邦的同乡，初以屠狗为业，刘邦聚众于芒砀山时，他参与其事，肖何与曹参策划武装起义，就是派樊哙去迎接刘邦等数百人到沛县的。樊哙一直受到刘邦的信任，他也屡立功勋，且曾救过刘邦。项羽设鸿门宴招待沛公（刘邦），范增谋欲杀沛公，令项庄舞剑以击沛公，项伯也舞剑以蔽之，正在危急之时，樊哙闯入帐下，谴责项羽听小人言欲杀有功的沛公，项羽认为他说得有理，无话可说，沛公才得脱。樊哙对刘邦的错误能及时提出批评，如刘邦入关，被美色和豪华宫殿所述，欲留在秦宫享乐。樊哙认为这是步亡秦的后尘，谏说：“沛公欲有天下邪？将欲为富家翁邪？”沛公说：“吾欲有天下。”哙说：“今臣从入秦宫，所观宫室帷帐珠玉重宝钟鼓之饰，奇物不可胜极，入其后宫，美人妇女以千数，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愿沛公急还霸上，无留宫中。”张良支持樊哙意见，谏说：“夫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编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霸上。（《史记》《樊哙传》、《留侯世家》）能否接受樊哙谏，对于沛公是一件关键之事，正因沛公采纳樊哙谏，对美女、重宝无所取，与秦人约法三章，不扰民不费民，故甚得秦民之心，故在楚汉相争中，秦民竭力支持沛公，对汉打败楚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樊哙对刘邦是有大功的。刘邦定天下，封樊哙为舞阳侯。

肖何、曹参、樊哙都是刘邦的同乡，他们不仅是刘邦的患难之交，也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对刘邦的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五、救友误国与卖友求荣

上一节所谈的是对待旧交好坏后果两样，这一节说的是：为救友误国与升官卖友，其动机虽不同，后果却一样，都应受到批评或谴责。

### 项伯为报恩救张良误了国事

《三国演义》写关羽甘犯与孔明立的军令状，在华容道上冒死放走了曹操，人们都认为关羽是为小义而忘了大义，其实史无其事，这是小说家虚构的。但这种虚构并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确是有这样的事实：项伯为义救张良，使西楚的潜在敌人刘邦得以脱难，项伯这样做实是对西楚的背叛，后来汉能灭楚，项伯应负一定的责任。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张良行刺秦始皇不遂，被通令搜捕，良便更名改姓，逃匿于下邳。但张良并不从此罢休，而是广交游，扶弱抑强，聚集少年，伺机义举。项伯尝杀人，到良处藏匿。因此，项伯对张良感恩戴德。项伯是项羽的叔父，后随项羽西证入关，因先入关的刘邦派兵守函谷关，项羽大怒，准备明天一早起兵攻关。当时，项羽兵四十万，刘邦兵十万，彼此力量悬殊。项伯因张良从刘邦，恐破关后张良被杀，于是在晚上到刘邦军，私见张良，要他离开。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便将之告知刘邦，刘邦大惊说：“为将奈何？”良说：“沛公诚欲倍项羽乎？”刘邦说：“鲋生教我拒关内诸侯，秦地可尽王，故听之。”良说：“沛公度能胜项羽乎？”刘邦默默良久，说：“固不能也。今为奈何？”良便强邀项伯见刘邦，刘邦设宴与项伯欢饮，与之结为儿女亲家。并要求项伯回去说刘邦不敢违背项羽，派兵守关是防备他盗。项伯回去告知项羽，项羽才不攻击刘邦。

在鸿门宴上，如无项伯保护刘邦，刘邦将被杀。《汉书·高帝纪》记载：由于项伯的帮助，刘邦得与项羽和解后，第二天早上带百余骑到鸿门向项羽道谢，项羽留刘邦饮酒，范增使项庄舞剑杀刘邦，项伯也拔剑起舞，以身翼蔽刘邦，项庄才不能下手。

项羽入关后，大封诸王，自封为西楚霸王。刘邦被封为汉王，以巴蜀为封地。刘邦赐良金百镒，珠二斗，良都送给项伯。刘邦也通过张良厚赐项伯，使代请汉中地，项羽才许之。这不仅使刘邦的势力扩大了，且为其后来下三秦提供了直接的跳板，对刘邦东向与项羽争天下是有重要作用的。

本来，项羽的谋主范增已预料到刘邦是与项羽争天下的劲敌，他曾向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项羽也同意了，因有项伯的从中说情，范增之谋不得实施。鸿门宴时，范增再三示意要项羽杀刘邦，项羽默然不理。范增便外出召项庄，说：“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但因有项伯的保护，范增杀刘邦之计又落空。当时，天下之权已归项羽，诸侯王都要听令于他，实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如果不是项伯从中帮助刘邦，刘邦必将被杀，项羽将少一争天下的强敌，其政权可能得到巩固。项伯为了救好友张良而误了西楚大事，也许是他始料所不及的。

## 丘和出卖老友元胄求荣被人不齿

《隋书·元胄传》记载：元胄，河南洛阳人，少英俊，多武艺，美须眉，周齐王宪见而壮之，引为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杨坚为丞相，委为心腹。周赵王招知杨坚将倾周室，邀杨坚到其家，请入寝室，拟刺杀之。元胄挺身入卫，促杨坚出，赵王谋不得逞。杨坚夺取帝位，盛称胄功，说：“保护朕躬，成此基业，元胄功也。”升胄为右卫大将军。但杨坚为人猜忌多疑，功臣宿将被废杀殆尽，元胄也不例外。杨坚废太子勇，立杨广为太子，其第四子蜀王秀意甚不平，杨文及其党求其罪而谮之，秀终被废为庶人，被连坐的有百余人，元胄是其中之一，说他与蜀王秀有交往，将之撤职。

杨广即帝位，元胄被排除在外，心中未免有怨气。适慈州刺史上官政因坐事被贬岭南，将军丘和亦以罪被废，元胄与丘和是老朋友，又因彼此处境一样，“同病相怜”，数与和游。有一次，元胄因酒醉放言，对上官政被贬认为不当，对丘和被废也表示同情。詎料丘和竟卖友求荣，将元胄说的话向炀帝报告，元胄因之被处死，炀帝认为丘和对己效忠，便召回拜为代州刺史。

谚云：“祸从口出”，信然。元胄醉后失言，又对老友“表错了情”，竟因此招祸被杀。丘和出卖老友虽得以升官，但被人所不齿。

## 六、友才超己狠心下毒手

妒忌出于自私，其严重的表现极其恶劣，甚至设毒计以害人。这种人大多没有好结果，害人反害己，历史不乏其例。

### 庞涓害孙臧终得恶报

《史记·孙臧传》记载：孙臧是著《孙子兵法》的孙武的后裔，齐人，曾与庞涓在鬼谷子先生门下学兵法。庞涓提前下山投奔魏国，得到魏惠王的赏识，当上了将军。当时魏国是独霸中原的强国，庞涓自知才能不及孙臧，有孙臧在自己就难得志，正因其嫉贤妒能，于是使出一条毒计：私自派人去请孙臧来魏国，孙臧原与庞涓在学习期间相好，不疑有他，且也想施展自己的所学，便来至魏国，哪料到庞涓竟诬陷他与齐国私通，以此为罪名对他施以臧刑（挖去膝盖骨），并在脸上刺字。庞涓却说是惠王所为，假以同学情分将孙臧养在庞府。

齐国使者因公事来到魏国，孙臧便暗中去会见齐使，在相谈中齐使奇其才，便设法将孙臧偷带回齐国。齐将田忌赏识孙臧，待之以客礼。田忌与齐诸公子赛马，彼此都以上马对上马，中马对中马，下马对下马，足力相差不大，孙臧便教忌取胜之法：以下马对彼上马，以上马对其中马，以中马对彼下马。下次比赛，忌照此法赛马，结果一负两胜，赢得了千金，仅此就显示了孙臧不凡的才智，它揭示了军事上一条很重要的规律，即在战争中要有全局观点和善以优击劣，就能取得胜利。惠王知田忌用此法赛马是孙臧所教，称赞其才，田忌也乘机将孙臧推荐给威王，威王问兵法，觉得孙臧见识超人，更为敬佩，就以他为师。

自孙臧为齐王师，得参军机，这时齐魏争霸日趋激烈，也就宣告庞涓的末日将至。庞涓率魏兵伐赵，赵急，求救于齐。齐威王欲用孙臧为将，臧辞谢说：“刑余之人不可。”于是，便任田忌为将，以孙臧为军师，他居辎车中，坐为什谋。田忌欲北上邯郸，与魏军决战，孙臧认为了妥，提出“批亢捣虚”、“围魏救赵”的作战方针，他说：“今魏攻赵，必是轻兵锐卒在外，老弱残卒在内。如果我们乘虚直指魏都大梁，占据它的交通要道，袭击其空虚的后方，魏军必然回师自救。这对于我是一举两得，既可解赵之围，又可乘魏军回师因长途跋涉疲困而将其歼灭。”田忌从其计，庞涓征赵之师果听孙臧指挥，在桂陵遇以逸代劳的齐国伏兵，魏军几乎全军覆灭。对于庞涓来说，这次还算幸运，仅以身免，但在下一次与臧较量时，他逃不掉了。

桂陵之战后十年，魏又派庞涓率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领兵救韩，仍用攻其所必救的作战方针，直指魏都大梁，庞涓闻之，急退军赶回，这时齐军已入魏地。孙臧对田忌说，“魏军素悍勇而轻齐，认为齐军怯战，善战者可因其势而利导之。”于是提出“退兵减灶”之计以诱魏军，即在退兵途中，第一天造十万人做饭的锅灶，第二天减为五万人的锅灶，第三天减为三万人的锅灶，以此显示齐兵怯战日有逃亡。庞涓回军见齐东撤，便向前追击，行军三日见齐军锅灶每日减少，高兴他说：“我国知齐军怯战，入魏地三日，士卒已逃亡过半了。”便弃其步军，亲率轻军锐骑猛追。孙臧预计魏军晚将至马陵，而马陵道狭，地势险要，且多密林，是设伏歼敌的好战场，便在两旁埋伏一万名善射的弓弩手，下令说：“夜里一发现火光，就一齐放

箭。”并砍去一大树的树皮，在白色的树干上写下八个大字：“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果夜至斫木下，见白树干处有字，便执火照之，读其书未毕，齐军万弩俱发，魏军纷纷中箭，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恨恨他说：“遂成竖子之名！”便自刎。齐军乘胜尽歼魏军，虏魏太子申以归。孙臆因而名扬天下，世传其兵法。

庞涓如有像鲍叔牙对管仲那样的器度，与孙臆一起辅佐魏国，不仅可使魏国保持其霸主地位，且可使两人佳名传于后世，而庞涓嫉贤妒才，竟狠心地陷害好友孙臆，结果是害人也害己。

### 李斯困韩非才超己进谗谋害

《史记·韩非传》记载：韩非，是战国后期韩国诸公子之一。他喜刑名法术之学，对黄老之学也深有造诣，非为人口吃，不善说话，但善著书立说。与李斯曾是同学好友，他俩都学于荀卿，李斯自己也承认其学识不如韩非。

韩非见韩国日益衰弱，多次上书谏韩王，提出富国强兵之术，不被采纳。于是韩非总结历史上的“得失之变”，写了《孤愤》、《五蠹》、《说难》等书，计有十余万言。这些著作，可以说是集战国时期法家学说之大成。他主张“以法治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指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说难》列举了说者说君主不当，致触逆鳞或不被采用的种种例子，反过来，他认为只要说得当也就不难为君主所用，此书实是总结说者的经验教训。

韩非的著作传至秦国，秦王嬴政读了《孤愤》、《五蠹》，这位崇法的君王，被韩非学说深深迷住了，无限敬佩他说：“寡人如果得见此人并与之游，死也不恨了！”李斯说：“这些著作是韩国公子韩非写的。”于是，秦王派兵急攻韩国，索取韩非。韩王始不用非，今事急便派非出使到秦。秦王见了韩非很高兴，因他是韩国公子，且初到秦国，还没有了解其人，故未见信用，李斯忌其才，恐秦王重用，位居己上，便向秦王毁谤他说：“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今王欲并吞各国，非终将为韩而决不为秦，这是人之常情。今王不用，久留在这里将了解秦国情况，让他回国将自遗祸患，不如以过用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便将韩非交司法机关处治。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使自杀。韩非欲见秦王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使人赦免，韩非已死了。韩非著《说难》，知说之难易，不能见秦王说之，终死于秦，不能自脱，这是可悲的！

李斯是个富贵迷，人秦是为求富贵，本来追求富贵是人之常情，也是推动人们前进的动力之一，李斯正为此见重于秦，后为秦朝的丞相。但求富贵而不择手段，诬陷以至害人，这是最卑鄙最恶劣的，李斯正是这种人。他害韩非虽未立即得到报应，但他这种卑劣行为并没有收敛，后来为保富贵而与胡亥，赵高谋害扶苏，使胡亥得夺帝位而胡作非为，赵高得志于时而横行霸道，李斯后与赵高因争权而闹矛盾，终被赵高所杀。俗云“恶有恶报”，信然！

## 七、由于误会好友成仇敌

朋友之间，往往发生误会，既然是误会双方发生的矛盾无不可解决，对朋友误会者能冷静考虑又有雅量，是非将会澄清，误会自然消除；如果意气从事，且斤斤计较个人得失，那将互相结怨。张耳对陈余，王叔文对韦执谊，就因此由好友变成仇敌。

### 张耳误疑陈余竟成死敌

《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记载：张耳、陈余都是魏都大梁人。余年轻，父事张耳，两人为刎颈之交。秦灭魏，闻两人是魏名士，下诏以千金购求张耳，五百金购求陈余。张耳、陈余便变名姓，逃匿于陈地，暗中进行反秦活动。

陈涉率众起义，至入陈，兵数万。张耳、陈余谒见陈涉。涉及左右早闻张耳、陈余贤名，未尝见过，见了大喜过望。陈涉派其旧交武臣率兵北略赵地，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因人心厌秦，赵地豪杰归附，下赵数十城。当时，陈涉听谗言动辄诛杀将领，张耳、陈余劝武臣自立为赵王，武臣从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后赵王为其将李良所杀，张耳、陈余便立赵歇为赵王。秦将章邯引兵来攻，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被秦军围困。这时，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驻军于巨鹿北面。秦军急攻，巨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次使人向陈余求救，陈余自度兵少，不敌秦军，不敢出击。张耳大怒，派张廩、陈泽前往责备陈余忘却刎颈之交不肯相救，陈余说：“我度终不能救赵，前往如以肉委饿虎，何益？且余之所以不同死，欲为赵王、张君报秦。”张廩、陈泽说：“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于是陈余派五千兵随张廩、陈泽先去相救，结果全军皆没。

后项羽与诸侯率兵救巨鹿，大破秦军，赵王歇张耳才得出。张耳与陈余相见，谴责陈余不肯救赵，质问张廩、陈泽的去向，陈余如实以告，张耳不信，以为被陈余所杀，数次追问陈余，陈余怒说：“想不到你怨我如此之深！”便脱解印机交给张耳。张耳佩其印，收兵。陈余便走出，跟他所善的数百人到河上渔猎。由此陈余、张耳结怨。

项羽入关，封诸侯王。张耳随其入关，项羽分赵地封张耳为常山王；陈余不从入关，仅以南皮旁三县封为侯。张耳封王，陈余益怒，说：“张耳与陈余功一样，今张耳封王，陈余封侯，项羽分封不平。”齐王田荣叛楚，陈余附齐。在田荣支持下，陈余起兵袭常山王张耳，张耳败走投汉王。陈余复收赵地，迎赵王。后汉派韩信与张耳击赵，斩陈余泚水上。追杀赵王。汉立张耳为赵王，汉五年，张耳死，谥为景王。

张耳、陈余原为刎颈交，誓同生死。秦围巨鹿之初，秦军势大，以陈余当时的兵力实难救，而陈余之不与俱死，正如他所说是：“欲为赵王、张君报秦”。尽管如此，陈余还是派五千兵随张廩、陈泽前往，结果是正如陈余所预料，“如以肉委饿虎”。后诸侯齐集解巨鹿之围时，陈余也起兵攻秦。因此，不能说陈余有负于张耳。而张耳不体谅陈余当时的处境和困难，又不调查研究，主观地疑陈余杀张廩、陈泽，由于张耳对陈余的误会不消除，导致两人结怨成仇，以引发陈余起兵袭击张耳事件。从此，彼此成为死敌，陈余终被所杀。

## 叔文执谊意见分歧反目成仇

王叔文、韦执谊原是生死之交，都是“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由于彼此内外协作很好，使“永贞革新”进展较快，且曾取得成效。后由于两人在处理人事问题上意见分歧，王叔文误会韦执谊与之作对，终于反目成仇。

《旧唐书》的《王叔文传》、《韦执谊传》记载：王叔文，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善下棋，粗知书，明治国之道，德宗命他到东宫侍奉太子。太子对他极为尊重和信任，东宫之事，都倚之裁决。常与太子讨论当代人才，说：“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他密结当代知名之士，以在太子继位时辅佐之。他与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定为生死之交，而韦执谊与王叔文相交，是由太子介绍的。韦执谊，京兆人，他幼聪俊有才，能诗善文，年轻中进士，召人为翰林学士，才二十余岁。德宗诞辰，太子献佛像，德宗命执谊为画相写赞文，令太子赐执谊缣帛以酬之。执谊至东宫向太子道谢。太子问执谊：“学士知王叔文吗？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执谊由是与王叔文相交甚密。

及太子继位，是为顺宗。顺宗久病不能理朝政，政事都委任王叔文，王叔文便推荐韦执谊为宰相。叔文理事于内，执谊理政于外，并与柳宗元、刘禹锡等结生死交形成一个新的政治集团。他们志同道合，“共立仁义，辅佐教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一定的成效，史称“永贞革新”。

但是，在“永贞革新”顺利进行时，顺宗不幸中风不能理政，宦官势力又极力进行阻挠和破坏。同时，革新派内部又出现了问题，这是指王叔文与韦执谊交恶。起源于两人在处理人事上的意见分歧。如侍御史竇群上奏，攻击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应在朝，王叔文要罢竇群的官，执谊认为竇群有倔强正直之名，罢官影响不好，加以阻止；羊士谔反对王叔文，叔文要杖杀之，执谊不同意。因此，叔文认为执谊与他作对，很为恼恨。本来执谊被叔文荐为相，对于叔文是感激的，对于“永贞革新”是赞成和极力推行的。但认为叔文处理一些人的问题不妥，故不同意。为此，执谊还密派人对叔文说：“我决不相负。我这样做，也是为更好地推行改革。”他希望能解除叔文对他的误会，但得不到叔文的理解，彼此就反目成仇。这对于推行“永贞革新”起了坏的作用。后来“永贞革新”终于失败，执谊、叔文等都被贬，执谊被贬崖州，死于贬所；叔文被贬渝州，过了一年诛死。

